CHAIRMAN MAO

(叁)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Zedong and the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泽东与 文化大革命 (三)

上海**反到**底战斗兵团 上海**斗私批修**出版社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内部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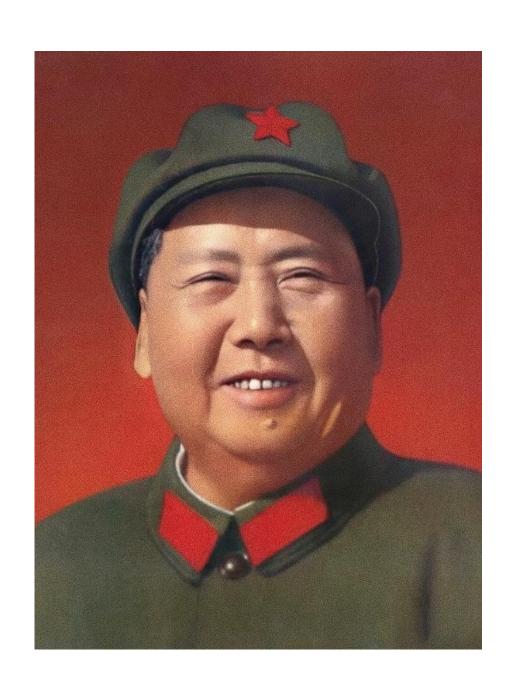
*

斗私批修出版社

斗私批修出版社出版发行

2023 年 1 月第三版 (上海), 2023 年 1 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 1——200 册

每册: 5.0 元



毛泽东

毛主席语录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 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 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 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 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 而是因为斗争力量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 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 了,但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出版说明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我们:"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过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青年学生被残酷的现实所打醒, 他们自发地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为了适应 广大工人阶级及革命青年学习十年文革历史的迫切需要,我们再版了 这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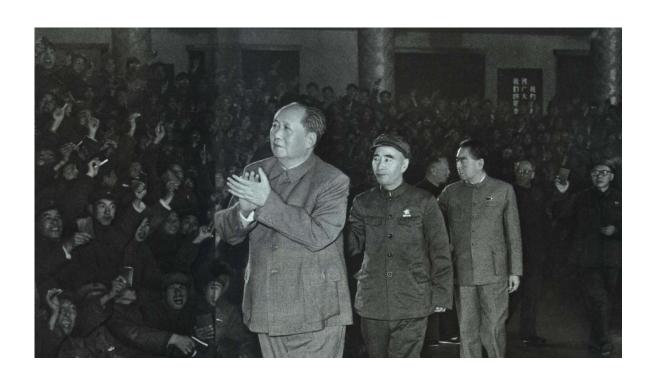
本书作者尝试着用其他角度去看去写十年文革历史,也是一种辩证法运动化的实践,他尝试着弱化阶级立场的绝对范畴,这样更能偏向立场不存或者淡化时靠近没有立场影响的另一种主观的状况,单纯凭某种要素和发展趋势的点来判断容易陷入机械思考和形而上学,望读者同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辩证地阅读、思考、学习。

上海斗私批修出版社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日























目 录

前言	(3)
第二十一节林彪事件	(7)
第二十二节短暂的周恩来时代(514)



前言

(1)

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先生,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的传记文学,他 曾说:"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

什么是传记文学?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不过可以简明扼要地给传记文学这样一个定位:"传记文学是讲给人民大众听的、客观真实的历史故事。"

要求人民大众去一字一句攻读枯燥的专业历史论文,或所谓的"正史",显然是不现实的。作为中国人,读过正史《三国志》的寥寥无几,读过《三国演义》的却不计其数。因为《三国志》是写给专家学者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很差;而《三国演义》是写给大众的读物,首先注重就是趣味性和可读性,因此赢得了无数的读者。

不过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只能算是"文学",并不能算是"传记文学",因为它的真实性太差了,即使谈不上"肆意篡改历史",说它与真实的历史相差太远,也毫不过分。《三国演义》的作者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旁观立场上,客观地描绘这段历史,而是完全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上,违背历史真实地拔高刘备和贬低曹操,这就违背了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话题转到我们的正题:毛泽东和文革。现在中国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书,可以说多得不计其数,这里且不讨论有关这方面的专业学术论文,专门讨论一下写给人民大众看的"通俗读物"。虽说这种读物的数量也不算少,但绝大部分并不让人满意,又再一次印证了百年前胡适先生的话:"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

现在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书,主要有三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是作者的立场性太强。很多作者不是站在书外的第三者立场,作为旁观者来讲述,而是作者自己跳到书里去,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上说话。这样的书,要不然成为作者宣扬自己政治理念的宣传品,要不然惧怕政治压力,处处掣肘,不敢畅所欲言,达不到"传记文学"的要求。

第二大问题是选材缺乏客观性。真实的历史人物,绝不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好人"或"坏人",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令他光荣的事情,也有令他不光彩的事情。在描写历史人物的选材时,应该做到客观公正,既选他光荣的事情,也选他不光彩的事情,就像鲁迅所强调的那样,在写人物传记时必须顾及全人。鲁迅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2)

现在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书,在选材上的倾向性非常严重,要不然专挑毛泽东光荣的事情,把毛泽东神格化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现世神;要不然专挑毛泽东不光彩的事情,把毛泽东妖魔化为一个以整人为乐的现世魔。当然那些书中所说的毛泽东的光荣和不光彩,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捏造,但根据单方面的事实来给毛泽东"定性",就像鲁迅说的那样"岂不冤哉!"

第三大问题是缺少历史高度的分析。作者过于纠缠于一些琐碎的事件细节, 缺少站在历史高度上的分析和洞见,就像谚语说的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毛泽东这样的历史巨人,必须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上才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因为存在上述问题,我们感到有必要写一本全新概念的"传记文学",为人

民大众讲解毛泽东和文革的故事。我们严格遵守传记文学的标准,力争做到以下 几点:

- 第一, 要有趣味性和可读性,成为人民大众"能看懂"和"喜欢看"的读物。
- 第二, 要把自己定位于第三者的旁观立场,不成为书中人物的代言人,不 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上说话。

第三, 要选材公平, 既选择光荣的事情, 也选择不光彩的事件。

第四, 要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当然这里所谓的"真实", 只能是相对的真实, 不可能是绝对的真实。如果绝对的真实, 把毛泽东的讲话一字不漏全篇照抄, 那就成了历史档案, 完全失去了可读性。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有疑问:"你们有什么独家秘闻材料吗?你凭什么说你们写的故事是真实的呢?"我们的回答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通过一个个的历史细节,演绎推证出历史的真实。

这种逻辑推理的方法,被广泛地用于侦破案件。犯人一般是不会交待案情真相的,那么如果犯人自己不交待的话,我们就无法知道案情的真相吗?非也!我们可以像福尔摩斯侦探案那样,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最终推证出案情的真相。

在这里,我们把文革和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案件来侦破或破解,归纳总结一个个分散的历史细节,从一个个似乎是毫不相干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出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最后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推证出这个历史案件的真相。

我们这里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写作形式,把全书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正 文部分和点评部分。正文部分强调可读性和趣味性,完全独立成章;而点评部分 是对正文部分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事件的补充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评解, 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没有兴趣的朋友,只看正文部分即可。

另外,我们还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对历史事件进行一些评述,力求在给读者揭示历史真相的同时,还给读者带来一些哲学的感悟或感顿,让读者通过历史的真实,通过文学的美,去了解毛泽东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去了解毛泽东的那个时代。

最后引用一句先哲的格言:读书不是要让你信仰书中的结论,而是要让你思考。

第二十一节 林彪事件

(1)

虽说"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 42 年了,但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似乎是走入了歧途,结果越研究越糊涂。国内、海外的研究者们,把关注点放在具体的细节上,比如林立果怎么策划暗杀计划,林彪怎样仓惶出逃,却忽视了最关键的动机问题: 林彪出逃的动机何在?

历史案件和现实案件一样,动机是理解案情最重要的东西。搞不清作案动机的案件,自然让人感到无法理解,感到扑朔迷离。人们认为林彪事件扑朔迷离,其原因也就是人们想不通林彪出逃的动机。

关于林彪的动机,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但说服力都不强。第一种说法是来自 1972 年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定性: 林彪是因为篡党夺权的阴谋暴露,迫不得已乘飞机外逃。在第一种说法中,毛泽东对林彪是仁至义尽的,一点责任没有,林彪事件完全是因为林彪个人野心膨胀的结果。这种说法可以自圆其说,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人们信服。

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其证据主要有两个:第一个证据是林彪争当国家主席;第二个证据是林立果搞的"五七一"计划。第一个证据的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其实完全是光明正大搞的,谈不上什么阴谋。如果林彪真的策划暗杀毛泽东,那一切都应该在暗中进行,就没有必要争当国家主席,主动把自己的篡党夺权"阴谋"暴露出来。

第二个证据倒是非常符合阴谋论,可是不符合林彪的性格。林彪是一位身经 百战的将军,他应该非常清楚,靠林立果那几个人的"小舰队",要想暗杀毛泽 东,成功的可能性百分之一都不到。林彪绝不是一个莽汉,所以他不可能拿自己 的全家性命押宝,去干一件成功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一的"五七一"计划。

由于林彪动机的第一种说法难于让人信服,从 1980 年代末开始,又出现了第二种说法。比如著名文革专家王年一教授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制造出来的。"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一小节《把林彪逼上绝路》,也声称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

在第二种说法中,林彪对毛泽东是仁至义尽的,一点责任没有,林彪事件完全是因为毛泽东"逼"林彪的结果。关于这种说法,很多人举出不少的"证据",但他们都无法解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逼"走林彪对毛泽东有什么好处?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毛泽东可以说是林彪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林彪出逃对毛泽东没有任何好处可言。毛泽东"逼"林彪出逃,等于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还不至于愚蠢到这样的地步。因此"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逻辑的。

毛泽东单方面主动"逼"林彪出逃,是不符合逻辑的;林彪单方面主动"篡党夺权",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合理的解释是:"九一三"事件并不是毛泽东或林彪单方面造成的,它是双方各种矛盾和斗争激化的结果,这也就是谚语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

其实,"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和林彪两败俱伤,谁也没有好处,因此"九一三"事件应该是毛泽东和林彪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既然"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和林彪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为什么又发生了呢?这就应验了一句哲学名言: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

我们要理解林彪事件,在分析它的细节之前,要先考虑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一)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或者说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二)"九一三"事件是林彪与毛泽东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偶发事件?

我们先分析第一个基本问题: 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与林彪的矛盾,有"可以调和"的部分,也有"不可调和"的部分。这个"不可调和"的部分,就是毛泽东不能让林彪接班。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能够接续他的"革命路线",而不是仅仅接替他的国家领导人职位。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只能接替他的职位,而不能接续他的路线。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已经反映出林彪的思想与毛泽东相距甚远,他并不赞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如果毛泽东让林彪接班,那么林彪肯定不会继续革命的,而肯定会停止文革,一切回到老路上。

所以,毛泽东让林彪接班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算是白搞了,毛泽东为"继续革命"付出的一切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了。因此,从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出发,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林彪接班的,这是毛泽东与林彪不可调和的部分。1966年为了打倒刘少奇,不得已让林彪暂居党内第二把手的位子,那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

既然毛泽东不能让林彪接班,而林彪现在又已经是名义上的"接班人"了,因此毛泽东必须考虑怎样让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第一种选择是让林彪体面地下来,保留林彪的荣誉和地位;第二种是让林彪不体面地下来,那就是要打倒林彪了。这就是毛泽东与林彪"可以调和"的部分,是选择让林彪体面地下来,还是选择打倒林彪。

毛泽东让林彪体面地下台,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林彪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并且积极辅佐毛泽东的新接班人,那么毛泽东可以考虑让林彪体面地从接班人的位子上下来。关于这点,毛泽东曾经当面对林彪提起过让张春桥接班的问题。

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之事,一些严肃的文章和回忆录,都提到过这件事,但都没有讲具体的细节。有人根据这件事,编造了一段细节,说毛泽东亲自带领张春桥去林彪在苏州休养的别墅,对林彪说:"你看小张怎么样?"之类的话,这些都是编造出来的细节,不能当作历史真相来相信。但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一事,应该是有的。毛泽东和林彪对话的大概内容是:毛泽东提出让张春桥当林彪的接班人,林彪没有说话。

毛泽东对林彪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呢?这就是要试探一下林彪的态度。如果 林彪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主动提出把接班人让给张春桥,并表示要尽力扶持张 春桥接班,那么毛泽东就可以采用第一种方法,让林彪体面地下来;如果林彪听 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不做任何表态,那就是林彪不肯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那 么毛泽东就只能让林彪不体面地下台了。

因此,这次林彪对毛泽东的表态,其实也就决定了林彪的命运。林彪选择不表态,也就是表示不肯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只能选择打倒林彪了。那么为什么林彪对毛泽东的话做出这样的反应呢?这些我们在后面继续分析。

(3)

林彪是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人,毛泽东提到张春桥接班,林彪应该马上明白, 这是毛泽东暗示他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张春桥。林彪应该也清楚,毛泽东已经给 他安排了两种下场:第一种下场是林彪答应让位,那么毛泽东可以让他体面地下来;第二种下场是林彪不答应让位,那么毛泽东就要打倒他了。但林彪最后选择了不表态,也就是"不让位"。

林彪此举,是因为他看到还有第三种下场,这就是违反毛泽东的意愿,"强行"接班。当然第三种下场不是毛泽东安排的,也不是毛泽东愿意看到的,而是要林彪通过自己去争取的。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毛泽东进行一场斗争了。

前面分析了从毛泽东的角度出发,来看他与林彪的关系;这里再分析一下从 林彪的角度出发,来看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与毛泽东的矛 盾,也有"可以调和"的部分和"不可调和"的部分。

林彪本来并没有想要上党的第二把手,是 1966 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在 林彪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林彪"推"上了党的第二把手。如果说刘少奇上党的第 二把手,是自己主动想上来的,而林彪上党的第二把手,则是被动上来的,不是 林彪争取的结果。

林彪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英雄主义者,非常注重名誉,从不检讨。据说当时的中共高官当中,从未检讨过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因此,如果毛泽东向林彪"要回"接班人的位子,林彪的自尊心会难于接受。从林彪看来,这样他就像一个被人任意拨弄的傀儡一样,需要他的时候,把他拉上台表演,不需要他的时候,又要把他推下去。林彪这样自尊心强的人,怎么会甘心给别人当傀儡呢。所以,林彪一旦上了接班人的地位,再让他退下去,他就不干了。况且这个接班人也不是林彪抢来的,是别人请的。

还有,林彪如果从接班人的位子上退下去,受影响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一 大批人。首先是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因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跟着鸡犬升天, 他们当然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了。还有林彪的一批老部下,靠着林彪的提拔有了今 天的高官地位。如果林彪下台,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台的接班人,肯定不会再 用林彪的旧党,林彪的旧党们就要靠边站了。所以林彪的一批亲信高官,也不希 望林彪退下去。他们都用各种手段,劝说林彪不能退下去。

再有,如果让林彪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周恩来,林彪或许还有可能答应。因为林彪认为今天共产党的天下,周恩来是立了大功的人,他"服气"周恩来当接班人。可是让林彪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张春桥,林彪就不服气了。新中国是林彪这些人拼着流血牺牲,花了伤残的代价,才换来的。林彪自己也在战争中受重伤,成了半残废。张春桥不过摇笔杆子写了几篇文章,就要来"摘桃子"接班,林彪肯定是忿忿不平的。

让林彪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可以,要林彪去接受张春桥的领导,林彪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不仅是林彪一个人,就是军内一大批老将军,也很难服气张春桥的领导。在林彪看来,与其让张春桥接班,还不如我来接班,这应该是林彪争当接班人的心情。把这种心情说成是"野心",当然也可以,但毕竟还有一些不同。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 林彪的底线就是接班人的位子不能让, 特别是不能让给 张春桥等文人, 这是他与毛泽东"不可调和"的部分。

(4)

当然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也有和毛泽东"可以调和"的部分。如果毛泽东尽管不情愿,最后还是让步,保留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让林彪和平地接班,那么林彪将依旧把毛泽东看成是大恩公,依旧忠于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坚持不让步,非让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那么林彪也就不再忠于毛泽东了,就要"强行"接班。既然是"强行",也就不排除使用暴力手段,包括暗杀手段。因此,林彪与

毛泽东"可以调和"的部分,就是选择和平接班,还是选择强行接班。

毛泽东的底线,是不能让林彪接班;而林彪的底线,是一定要接班。两个人的底线相差太大,最后导致出现"九一三"事件,也就不奇怪了。林彪看清了毛泽东的底线,而毛泽东却没有看清林彪的底线,而且大大低估了林彪坚守底线的决心。毛泽东以为只要给林彪足够的压力,林彪就会让步,交出接班人的位子。因此后来毛泽东一再提高对林彪的压力,没想到最后压出一个"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的内心中,并不想与林彪摊牌,更不想打倒林彪,因为这样对他本人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毛泽东一直在设法和平地解决与林彪的矛盾,毛泽东在对林彪"施压"的同时,又一直给林彪留有退路。毛泽东对林彪施压的目的,只是要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而不是要打倒林彪,这点与刘少奇完全不同。只要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毛泽东就不会为难林彪,会让他体面地下来。

林彪的内心中,更不想与毛泽东摊牌,毕竟他是弱者,毛泽东是强者,他与毛泽东摊牌的风险太大了。因此,林彪为了避免最后与毛泽东摊牌,他也要向毛泽东"施压"。林彪试图让毛泽东知道:林彪和林彪集团不是任人宰割的,在军队里是有威信和有力量的。如果毛泽东一定要拿掉林彪接班人的位子,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林彪希望毛泽东看到这件事的严重后果,主动知难而退,最终让他接班,从而和平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林彪向毛泽东施压,小的事情不说,大的事情就有"林副主席一号令"和"设立国家主席"等。当然林彪的施压也不是恶意的,他希望这样可以让毛泽东知难而退,避免最后的摊牌。这些事将在后面详述。

林彪的另一种防卫之策,就是打击和削弱江青集团,特别是不能让江青集团 把威信树起来。只要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威信树立不起来,毛泽东即使想让他们 接班也很难,这样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稳固了。所以,"九大"以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就发生了激烈的内讧。

林彪集团要打压江青集团,江青集团也要打压林彪集团。因为江青集团也想接班,特别是江青想接班。江青接班的障碍,首当其冲就是林彪,不搞倒林彪, 江青是不可能接班的。而且,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已经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如果 毛泽东去世,林彪接班,江青集团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江青集团为了今后自 身的生存,也要跟林彪集团斗争。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王子们,为了争夺接班人而发生内讧,可是这样的内讧又必然地爆发,让皇帝头痛不已。毛泽东虽不是皇帝,但他也不希望看到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可是这两个集团出于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夺接班人,不可避免地爆发起内讧,也让毛泽东头痛不已。

(5)

林彪和毛泽东斗争的性质,与刘少奇完全不同。刘少奇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 刘少奇想用自己的威信,压过毛泽东的威信。刘少奇跟毛泽东当面争吵,当众说 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过时了",这当然是毛泽东无法容忍的。而林彪当 众对毛泽东毕恭毕敬,手中挥动小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从来没敢挑战过毛泽 东的权威。可是"九大"之后,林彪开始变了,他悄悄地开始挑战毛泽东的权威 了,这就让毛泽东感到:第二个刘少奇又来了。

确切的说,林彪不是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而是要对毛泽东"施压"。林彪想迫使毛泽东让步,想让毛泽东放弃换接班人的想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林彪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军队中显示自己的威信,林彪要让毛泽东知道,他也是可以单独指挥军队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著名的《林副主席

这里先简介一下《一号令》出笼的背景。前面说过,中苏关系由于 1969 年 发生的几次边境流血冲突,极度紧张起来,大战有一触即发的局势。1969 年 9 月 11 日,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达成临时协议,暂时缓和了一下关系,但双方仍处于紧张对峙的局面。

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建立20周年的大庆日子,可是因为当时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中国,人们无心搞重大的庆祝活动,只搞了简单的庆祝节目。国庆口号的最后一条就是:"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

虽然有人建议毛泽东出于安全的考虑,取消例行的国庆节登天安门,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还是在10月1日登上天安门。林彪在天安门讲话,重点也是战争,林彪说:"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妄图策划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公然对我国进行核讹诈。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们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

据说在 1969 年 10 月中旬,毛泽东得到一份情报,声称苏军将于 10 月 20 日大举入侵中国。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也从侧面"证实"了苏军发动核突袭的具体日期。因此,中国马上开始了紧急战争准备,首先是领导人的紧急疏散。吴法宪回忆说:

【过了 1969 年国庆节以后,从各方面看来,情况也确实比较复杂。10月 15日,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根据一部分情报,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会以 10月 20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做幌子,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另外,周恩来在会上 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 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6)

会后,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当场表示说: "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当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恩来 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

根据这个指示,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由于这次紧急疏散行动草率进行,以至对一些老同志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例如造成了刘少奇主席病逝在开封,实在是令人遗憾。不过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紧急疏散的决定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一号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疏散决定之后发出的。

10月1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10月17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部撤离到了北京西山。周恩来把我们已撤到西郊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毛泽东这次是真的认为苏联有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对战争准备进行了认真的部署。毛泽东和林彪疏散到外地,成为"二线",周恩来带领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一线",周恩来成为临时军队总指挥。按照常理,林彪是军队的负责人,又是国防部长,应该由林彪留守北京"一线",担任临时军队总指挥。可是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夺了林彪的军权,交给了周恩来,这肯定让林彪十分不悦。作为军人,在打仗的关键时刻,却离开了军事指挥部,被夺了指挥权,林彪怎能

高兴呢?

毛泽东的这个安排,显然是不信任林彪。毛泽东对林彪的不信任,除了以前提到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毛泽东要防范"吴三桂"式的人物。从历史来看,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总会出现"吴三桂"式的人物。因此毛泽东不仅要防范苏联的入侵,更要防范"吴三桂"式的人物,借着苏联入侵的机会,投靠苏联一起向毛泽东进攻。

毛泽东对周恩来是放心的,因为不论从周恩来的历史,还是从他的表现,都 说明周恩来是坚决反苏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不会在关键时刻投靠苏联。可 是毛泽东对林彪就不放心了,他担心林彪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投靠苏联。后来"九 一三"事件中林彪外逃苏联,也验证了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林彪 10 月 16 日到了苏州,心中郁闷;10 月 17 日,林彪让秘书起草了一份 "防备苏联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也就是所谓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10 月 18 日,《一号令》由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出。《一号令》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号令: 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突然袭击,尤其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7)

《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次, 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向全军发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它还是新中国 第一次发出随时准备发射核导弹的命令。《一号令》发出后,全军近百万人马上 行动起来,把数千架战机、数千辆坦克、数万门重炮疏散到野外,核导弹随时准 备发射。因为武器疏散到野外,操纵武器士兵也必须跟随武器一起疏散,近百万 士兵从军营疏散到野外,宿露了近两个月之后才重新回到军营。

从原则上讲,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是极其重大的指示,这样的指示应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至少应该由中央军委集体发出。以"林副主席"个人的名义发出这样的指示,显然是不正常的。林彪为什么要发出《一号令》呢?目前存在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第一种观点是: 林彪误判了战争形势,是无意中造成的误会,这不是林彪的阴谋;第二种观点是: 这是林彪的阴谋,他要以此来试探他调动军队的能力。

探究林彪发出《一号令》的动机十分重要,因为这牵扯到整个林彪事件的性质。有人因此推论说林彪是无辜的,是冤案的,所以这里我们多花一些笔墨,探究一下《一号令》的细节。先看支持第二种观点的《汪东兴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负责保卫工作的汪东兴回忆说: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0月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 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 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

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 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副主席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发布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 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 讲林彪的不是。】

(8)

另外在《聂荣臻回忆》中,聂荣臻也说:【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10月19日,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志同意。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

毛泽东同志听了报告,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

聂荣臻提到的林彪和黄永胜"造谣",指的是叶群解释毛泽东"烧掉"《一号令》传阅件,是为了"保密"。叶群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

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

汪东兴和聂荣臻等人指控林彪搞"阴谋",有四项罪名:

罪名之一: 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一号令》。

罪名之二: 总参谋长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直接把林彪的《一号令》下发至全军。

罪名之三: 10月18日林彪的《一号令》下发至全军,10月19日林彪才 向毛泽东汇报,造成"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

罪名之四: 谎称毛泽东把《一号令》传阅件当场烧掉,是为了"保密"。

不过这里说林彪搞"阴谋"也不确切,因为林彪都是明着干的,不应算阴谋。

从各种情况来分析, 汪东兴和聂荣臻所代表的第二种观点是合理的, 因为他们指控的"四项罪名"是成立的。

第一,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一号令》这种极其重要的命令,显然是错误的,"罪名之一"成立。

第二,中央军委从来没有以个人的名义发布过指示。以前林彪起草的《军委八条》、《军委十条》等重要文件,都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的,而不是以林彪个人的名义发出的。黄永胜主持的总参谋部以林彪个人的名义发出《一号令》,显然也是错误的,"罪名之二"成立。

第三,如果说《一号令》在发送之前,上报远在武汉的毛泽东,时间上可能来不及,有"先斩后奏"的理由。而周恩来就在黄永胜身边,两人同时住在北京西山,黄永胜去请示周恩来,不过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周恩来呢?所以"先斩后奏"的"罪名之三"是成立的。

第四,毛泽东烧掉《一号令》传阅件,显然不是为了"保密",因为《一号

令》都已经发出去了,还有什么保密的?所以"罪名之四"也是成立的。

(9)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烧掉《一号令》的传阅件呢?这是因为毛泽东考虑到他与林彪的关系。《一号令》传阅件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必须在传阅件上批示"同意",或者批示"不同意"。

毛泽东当然不会批示"同意"。虽说毛泽东可以不做批示,但那就意味着默认,就是默认林彪在军队中的权威,毛泽东当然不愿这么做。因此毛泽东既不能批"同意",也不能不做批示。

那么毛泽东批示"不同意"行不行呢?也不行。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很客气的,从来没有对林彪送来的材料直接批示"不同意"。如果这次毛泽东在《一号令》传阅件上批示"不同意",不仅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的事,同时也就是公开了他与林彪的矛盾,那就要与林彪发生公开冲突了。

这时毛泽东还不想与林彪公开冲突。因此,毛泽东在《一号令》传阅件上批示"同意"不行,批示"不同意"也不妥。这里毛泽东就来一个高招: 烧掉传阅件。毛泽东烧掉了传阅件,不能再批示了,也就省去了批示的麻烦。这样一来,毛泽东既表示了对林彪的强烈不满,又给林彪留下退路,不至于造成两人的公开冲突。毛泽东烧《一号令》,看似鲁莽,其实是高招。

前面提到的为林彪辩护的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要想成立,必须要推翻上述 第二种观点指控林彪的四项罪名。那么,第一种观点提供的材料,能推翻这四项 罪名吗?这里先看佐证第一种观点的重要材料,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张云 生说: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住在一个以前曾是

宋美龄私人别墅的院子里。因为林彪是以"紧急战备"为由疏散到这里,我奉命随林彪、叶群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幢西式建筑里,叶群住在宋美龄住过的一所旧式小楼上。

林彪到苏州后第二天的下午,林彪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

林彪示意我作一下记录,我坐在沙发上记录,而林彪像平时常见的那样,站 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句地口述着:"一、……;二、……;三、……"

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 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

林彪问我:"都记下了吗?再念一遍。"

我说:"都记下来了。"我又照念了一遍。

林彪说:"好,就这样。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这几条传给他。"

我问林彪:"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东西宁可压半天。今天 这个电话是否还要压一下再打出去呢?"

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说:"噢,当然要压一下。 宁慢勿错,可以压几个小时。把这个电话记录稿,送给叶群看看。"

(10)

我到叶群那里,把记录稿给了她。叶群看了一眼,问我:"首长叫打这个电话,你们就打呗!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故意转了一个弯子,说:"如果要想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

叶群蛮有兴趣地问:"哪两条建议?"

我说:"第一,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

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对,对,这条建议好。"但她又说,"首长这是过去在战争时期,指挥打仗时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毛主席报告。首长对毛主席是一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对他也信得过。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毛主席是应当的。"

.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个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由 我负责向主席那里报告,由你负责传给黄永胜。"

我问:"再压多久呢?"

叶群说:"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两个小时以后,即当晚7点钟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 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 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并给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 统帅一号战斗命令"。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个战斗号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估计 10 月 20 日那天,苏联会发生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林彪发出"第一个战斗号令"之后,我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似也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奉命开始全面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战备状态。确有一种剑拔弩张之势,似乎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开始了。

但是,只要冷静地、全面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这样一场虚惊是完全不必要的。当然这是马后炮式的分析。】

这里要提一下,张云生说林彪与 10 月 17 日抵达苏州,这个时间不正确。

据当年主持接待林彪的苏州市负责人黄厥明在《关于林彪及其死党叶群来苏活动情况的揭发》中说,林彪在 10 月 16 日抵达苏州。其他材料也说林彪 10 月 16 日抵达苏州,只有张云生说林彪 10 月 17 日抵达苏州,所以张云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张云生的回忆可以推翻上述林彪的四项罪名吗?第一项罪名是: 林彪背着中央和毛泽东发布《一号令》。张云生的回忆不能推翻这项罪名,反而做出一个反证: 他曾经建议叶群向毛泽东请示,叶群并没有立即向毛泽东请示,还说林彪可以"先斩后奏"。但叶群也无法拒绝张云生的建议,只是答应由她向毛泽东请示。那么叶群到底请示了没有?张云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项罪名是: 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就把林彪《一号令》下发至全军。张云生只是说他用电话把林彪的《一号令》直接传达给黄永胜,至于黄永胜是不是向上汇报了,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张云生的回忆也不能推翻第二项罪名。

(11)

至于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张云生没有参与这些事,不清楚情况,当然 不能推翻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

张云生解释说: 林彪发出《一号令》, 是林彪本人误判形势, 以为 10 月 20 日那天苏联会对中国突然袭击, 所以让全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前面提到过,苏联有可能在 10 月 20 日对中国发起突然袭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 10 月 15 日就知道了,大家还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如果毛泽东和大家认为有必要让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那么在 10 月 15 日会议上,就应

该做出这样的决定。10月15日会议上没有做这样的决定,就说明毛泽东与大部分中央领导人不同意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毛泽东做出的决定只是领导人的疏散。

因此,即使是林彪个人以为 10 月 20 日苏联会对中国突然袭击,他也应该 先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而不是擅自发出命令。所以用林彪误判形势, 作为发出《一号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份常常用来佐证林彪"无罪"的材料是《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说: 【林彪 10 月 16 日到了苏州,17 日下午他找秘书口授了"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

林彪口授后,让秘书整理成记录稿。然后,叶群要秘书把记录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另一份由秘书传给北京的黄永胜。

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 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

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阎仲川(副总参谋长)叫到军委办事 组,向他作了传达,阎仲川作了记录。传达时,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李德生都 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告诉阎仲川说:"你去传达吧。"

阎仲川问: "怎么传达呢?"

黄永胜说:"先用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

阎仲川回到总参作战值班室以后,同作战部一起拟了一个电话稿。阎仲川考虑,这是军委办事组转移到西山以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从第一号编起,于是

就要值班参谋将这个命令编为《第一号命令》。所以,这个《第一号命令》的名字,还是阎仲川起的。】

吴法宪的回忆可以推翻上述林彪的四项罪名吗?第一项罪名是: 林彪背着中 央和毛泽东发布《一号令》。

吴法宪说林彪 10 月 17 日向秘书口授《一号令》,抄了两份,一份由叶群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另一份由秘书传达给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还说,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

(12)

而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完全没有叶群加上这句非常关键的话。是张云生说假话?还是吴法宪说假话?从逻辑上来看,吴法宪的说法有很大问题。也许吴法宪说的也是真话,只是他被叶群"忽悠"了。

叶群说"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报毛主席",那么毛泽东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呢?还都没有结果。在毛泽东的意见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急着下发《一号令》,显然就是不经过毛泽东同意,擅自发出《一号令》。这些材料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

吴法宪又说:"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吴法宪这里的"后来",意思非常含糊。如果这个"后来"是在林彪已经下发《一号令》之后,那么林彪就是在毛泽东同意之前,擅自发出《一号令》了,问题的性质并没有变。

当然,这里的"后来"也可以理解为林彪在得到毛泽东同意之后,发出了《一号令》,这样可以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但各种事实无法证明毛泽东事先同意

过《一号令》,汪东兴没有说他接到过叶群的电话,更没有说毛泽东"没有意见"。而且,毛泽东把《一号令》传阅件烧了,没有留下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更不能说明毛泽东同意过。因此,吴法宪的话,还是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一项罪名。

吴法宪的话能推翻林彪的第二项罪名吗?这个第二项罪名是: 黄永胜在没有 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直接把林彪《一号令》下发至全军。

吴法宪回忆说: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副总参谋长阎仲川 叫到军委办事组,传达林彪指示,当时吴法宪等人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就 让阎仲川用电话向各大军区传达。黄永胜既没有报告毛泽东,也没有报告就在身 边的周恩来。所以,吴法宪的话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二项罪名。

关于林彪的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吴法宪都没有提出辩解材料,当然也就不能推翻第三项罪名和第四项罪名。不过吴法宪还是为林彪做了一些辩解,他说:

【以后有人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政变的总预演,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当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没有受到威胁,"九大"以后接班人的位置名 正言顺,没有必要搞政变。

第二、防范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问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常委会的共同决策。不能因为林彪一个人倒了,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把本来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

第三、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过多次防范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样,林彪也是人,预防了一次没有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就说他是神经质,说他要搞政变呢?】

(13)

吴法宪的辩解是无力的。第一,吴法宪说"当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没有受到威胁",这句话并不对,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早就受到威胁了,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想让林彪接班。这些在前面多次提到,不在赘述。

第二,吴法宪来了一个"偷梁换柱",说林彪《一号令》的内容没有错。事实上,林彪《一号令》的内容也确实没有错,而是他不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以个人名义擅自发出《一号令》的方式错了。

第三,吴法宪还是用"偷梁换柱"来辩解,说林彪误判了形势,不能当成罪过。其实对林彪的指责,并不是他对形势的误判问题,而是他把擅自发出军事命令的问题。

当然,把林彪的"六项指示"传达为《林副主席一号令》,可能不是林彪的本意,而是传达人员阴差阳错地搞错了。但名称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即使是《林副主席一号令》的名称改为《林副主席六项指示》,性质还是一样的。

以上吴法宪的辩解,并无法推翻林彪的四项罪名,所以说上述第二种观点是合理的,林彪擅自发出《一号令》是"别有用心"的。林彪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发这个《一号令》呢?这应该是林彪不满毛泽东在关键时候夺了他的军权,所以林彪要向毛泽东示威,他要让毛泽东明白,林彪在军队里说话是算数的。

因此,这次林彪有意不通过毛泽东,不告诉周恩来,自己一个人单独发出命令,看看部队会不会接受林彪的个人命令。林彪在《一号令》中,既不提党中央,也不提毛泽东,只是说"林副主席指示"。果然,各个部队看到"林副主席指示",马上就行动起来,没有疑问,毫不犹豫地执行林彪的命令。

如果是朱德、刘伯承、陈毅等人,用个人的名义向部队下命令,部队肯定会

有疑问;即使是周恩来用个人的名义向部队下命令,部队也不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因此,林彪用《一号令》证明了他在部队中是有威信的,林彪说话是算话的。

10月19日,毛泽东看到林彪的《一号令》后,马上做出相应措施,指示总参谋部接受周恩来的领导。本来毛泽东已经授权周恩来,在危机期间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无论是中央政治局和总参谋部,都要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可是林彪亲信控制的总参谋部,只接受林彪一个人的领导,无视周恩来的权威。

10月20日,周恩来亲自前往总参谋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总参谋部每天早晨8时前向他书面汇报过去24小时发生的情况。这样就迫使总参谋部不得不同时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这也是毛泽东所谓的"掺沙子"。

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题为《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的文件,下达全军执行。该文件指出:"军队调动团以上部队,必须上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在中苏边境地区,凡是作战行动,无论规模大小,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林彪和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以后,方可付诸实施。"

这个文件显然是针对林彪的,声明调动军队必须经过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的 批准,这其实就是禁止林彪再次单独发号施令。

(14)

毛泽东对林彪的《一号令》,虽说非常不满,亲手烧了《一号令》的传阅件,可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处置还是非常轻微的。毛泽东不仅没有批评林彪,甚至不再提起此事,只是做了一些防范动作。而这些防范动作,不是最高层的官员,根本看不出是针对林彪的。毛泽东这么做,可以说是对林彪的一种让步。

如果这次毛泽东对林彪采取比较严厉的处置,那么后来林彪"争当国家主席" 的事情,可能就不至于发生了。林彪看到毛泽东让步,促使他感到,现在是"逼" 毛泽东让步的最好时机,因此林彪要再"逼"一步,"逼"毛泽东放弃另立接班 人的想法,真正让他接班。

作为军事家的林彪,知道政治斗争和打仗一样,取胜的机会将是瞬间即逝,决不能错过取胜的机会。林彪说他打仗取胜的经验是:"我有长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决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林彪看来,目前是打赢他与毛泽东的这场政治战争的最佳时刻,这个机会一 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为什么是最佳时机呢:

第一, 毛泽东已经把红卫兵和造反派遣散了,又把老干部得罪了,毛泽东 暂时只有江青集团等一些文人,力量不够强;

第二, 第二,毛泽东想通过"整党建党",在党内建立起一支新的力量,可是"整党建党"才刚刚开始,新的力量还没有建立起来,是毛泽东青黄不接的时候;

第三, 第三,目前林彪派系在政治局中占据三分之一以上,是林彪势力在 党内的最高时期。综合这些因素,现在是林彪向毛泽东"挑战"的最佳时机。

林彪已经看出来,毛泽东并不想让他接班,早晚要拿掉他的接班人,只是毛泽东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如果等到毛泽东拿掉林彪接班人的准备完成之后,林彪那时再动手,就为时过晚。因此,林彪要在毛泽东准备好之前先动手,让毛泽东措手不及,才能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让步。

林彪正式"挑战"毛泽东,开始于1970年3月。在此之前,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从来没有与毛泽东唱过反调,更没有在公开场合下,提出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

(15)

1970年3月,毛泽东明确指示: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会当国家主席。可是林彪却一反常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提出宪法中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知道,即使是发生了《林副主席一号令》等令毛泽东非常不快的事,但 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还有挽回的余地。可是一旦他公开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 也就是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那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就无法挽回了。

建国后,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至今为止只有两个人:彭德怀和刘少奇。这两个人的下场怎样,林彪是最清楚不过的。然而,林彪还是鼓起勇气,成为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公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第三个人。至于林彪的想法,我们后面再详细分析。

毛泽东在 1965 年 5 月重上井冈山,一年后的 1966 年发起文化大革命;林彪在 1969 年 9 月也重上井冈山,一年后的 1970 年 8 月,他也发起了挑战毛泽东的"庐山之战"。林彪重上井冈山时,也学毛泽东,做词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没蒿菜,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共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再回顾一下毛泽东 1965 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林彪的这首词,无论从笔法还是从意境上,都无法与毛泽东的词媲美。本来, 林彪并不是擅长做诗的诗人。林彪到井冈山上寻找的,大概也跟毛泽东一样,是 在故地激发自己的雄心壮志,重新开展一场人生的奋战。这两首诗,反映了毛泽 东和林彪两人在"决战"前的雄心壮志。

不过毛泽东是一个人孤独地上井冈山的,而林彪却是带着妻子叶群、儿子林 立果一起上井冈山。

(16)

一位当年的老赤卫队员向林彪赠送了一块井冈山产的玉石,林彪把此石带回北京后,让人刻成一方砚台。1970年5月1日,林彪在该砚台背后题写诗句后,赠送给叶群。诗句是:"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出自田汉的话剧《关汉卿》)。

林彪还在题诗之后,写了题名:"书赠战友叶群。林彪。1970年5月1日" 叶群看后,回赠林彪一幅字,写道:"教诲恩情感不尽,天长地久永相随。"

林彪给叶群赠物,是他到了"决战"的时候;向叶群赠言,要叶群做好最坏的准备。林彪把叶群称为"战友",也是恰当的,因为叶群的角色,早已超出妻子,称"战友"名符其实。一年后,林彪和叶群还真的实现林彪题诗的"死同穴",也实现了叶群题诗的"永相随",这是后话了。

1970年3月,中央开始讨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日程安排,以及修改《宪

法》的问题。毛泽东首先提出:"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可是林彪却一反过去恭顺的常态,居然与毛泽东唱反调,提出宪法中要设立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4月,毛泽东明确反对设立国家主席一事,说:"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可是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4月下旬,毛泽东再次拒绝当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此后林彪仍然坚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7月,毛泽东再次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但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2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说出这样的话情况下, 林彪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 坚 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最后放"狠话"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说到这个地步,林彪才不再提国家主席一事。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当国家主席呢?要理解这个理由,我们必须站在毛泽东的 角度上来分析。

(17)

最初提出国家主席问题的人是周恩来,据汪东兴回忆:【1970年3月初,

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总理的信中谈到: "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

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 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 他不再当国家主席。

3月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 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

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次政治局会议,住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同志向林彪同志转达毛主席的意见。"】

根据汪东兴的回忆,周恩来在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首先指出"设国家主席"不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政治局常委"提出的。并且,周恩来用"国家主席是不是还写上?"这样的语气,表示出他和政治局常委是倾向于"设国家主席"的。

当时的九届政治局常委只有五个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周恩来所说的"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就是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他四人的意见。既然政治局常委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必须表明态度。这次毛泽东十分慎重,专门让汪东兴回北京传达他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具体是什么呢?汪东兴本人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不提,而《吴法宪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都提到汪东兴传达的内容。

吴法宪回忆说:【1970年3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 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天晚 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最后, 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 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 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 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邱会作回忆说:【1970年3月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其主要内容是听取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汪是专程从武汉赶回来的。汪说主席的指示:"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这里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的问题。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18)

会上没有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没有要讨论谁当国家主席。散会时, 汪东兴还有些余兴未尽的样子,对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走 走走,时间还早,到我那里再坐坐。"我们都欣然同意了。早在1968年3月"杨、 余、傅事件"发生以后,汪东兴就和我们走近了,过去他还摆点"高高在上"的 小架子,"九大"以后他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我说的站在一起,是指对江 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在汪东兴家里,大家开始也是扯乱谈。后来,吴法宪又请汪东兴核实刚才在 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要林彪来当"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 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我当时的认识是:主席对林彪这个接班人很关 心,很周到。其实,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

吴法宪和邱会作回忆的毛泽东原话,大同小异。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不

要国家主席。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这里要注意到,毛泽东专门提出"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这句话说得很重。毛泽东说的"大家"是谁呢?显然是指周恩来信中说的四位政治局常委。 现在周恩来这封信的内容还没有透露,单从毛泽东讲话中"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的语气来看,周恩来这封信中提出的政治局常委建议"设国家主席",是比较认真和郑重的。

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的"不设国家主席"指示后,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当场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不布置"讨论"也是正常的,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最重要的林彪缺席。在林彪缺席的情况下,是不好讨论这个问题的。因此,周恩来特地吩咐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从这次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明显和以前不一样。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都是让叶群亲自去他的住处,他亲自向叶群说明自己的想法,然后由叶群直接向林彪汇报。可是这次,毛泽东不仅没有叫叶群去,甚至没有提到向林彪转达他的意见,还是周恩来提出让叶群去向林彪汇报。

从周恩来"设国家主席"的信,毛泽东就察觉出,这封信的主使人应该是林彪。因为其他三个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与国家主席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使是设了国家主席,也不会轮到他们三人当,只有林彪一个人与此有利害关系。因此,毛泽东察觉到,林彪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周恩来的信,向毛泽东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林彪想要当这个国家主席。

(19)

林彪的建议是非常巧妙的,他提出"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了让毛泽东

当国家主席。这样一来,一些头脑比较简单的人,反而认为林彪是为了毛泽东好,是忠于毛泽东的表现。因此,毛泽东在这里要把林彪的目的"点破",说:"我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毛泽东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一个人可以当。 因此,设国家主席的得益者,只能是林彪,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自己为什么不 能当国家主席呢?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分析。

汪东兴回忆后来的事情,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8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 林彪却让他的秘书, 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 "林副主席建议, 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在 3 月 17 日至 20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才正式讨论毛泽东 3 月 8 日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这时林彪表示出不同的意见。林彪让自己的秘书跟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彪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这个电话,公开表示他与毛泽东有不同的意见。此时,毛泽东还给林 彪留面子,他没有直接对林彪的意见表态,而是说"问候林彪同志好",间接地 表示反对林彪的意见。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我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让秘书给毛主席那里打了电话,但主席并没有正面表态,只让秘书打电话,问候林彪。】

关于此事,林彪秘书张云生也回忆说:【林彪、叶群从苏州回到北京后不久, 于运深给我看了一份叶群在苏州和主席秘书来往的电话记录。叶群给主席秘书的 电话说,请他转报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因为 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

主席秘书回给叶群的电话,说:他已经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提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国家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

(20)

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大部分人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事情发展到此,本来可以就过去了。可这次林彪一反常态,他不让事情过去,还要继续坚持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回忆说:

【4月1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林彪的三条意见:"(一)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国家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关于这件事,邱会作也回忆说:【4月11日,由林彪口述,秘书记录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二)关于国家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

这次是林彪亲自向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与用电话记录的书面形式,正式提出他的三条意见。由于林彪的地位,周恩来又召开会议,讨论林彪的意见。邱会作回忆说:【3月8日,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一致同意了,这种同意是拥护毛主席的惯性,大家并没有深想。

现在林彪的意见又来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念了,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来担任的意见,包括江青在内。我现在都认为,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中肯的,是维护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是毛、林之间有什么分歧,而是毛主席和大家的意见相左,林彪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主席很快就对林彪的建议(政治局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传出叶群与毛主席秘书来往的那次电话内容以后不久,我在北京看到了一份毛主席批件。这是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建议,主席旁批:"此议不妥。我不宜再做此事。"

在这以后,我又在毛家湾看到中办印发的《宪法》修改草案的两种方案:一种是《宪法》条文有"国家主席"的一章,另一种则没有。这反映出,尽管毛主席对"设国家主席"一事并不赞成,但政治局内的意见并不一致,林彪的那个"提议"还在起作用。】

这是林彪第一次公开用书面意见的形式,提出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而且林 彪的意见,得到包括康生在内的其他四位政治局常委的同意。由于林彪的意见是 多数人的意见,这让毛泽东犯难了。

(21)

设不设国家主席,对于除了林彪之外的三位政治局常委来说,并无直接关系。但是,由此引起的间接关系,还是与三位常委紧紧相关的,因为国家主席是关系到将来谁"接班"的问题。

如果林彪当了国家主席,那么林彪接班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相反,如果林 彪不能当国家主席,那么接班人很可能就是江青、或者张春桥等人了。从周恩来 等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林彪接班,比江青他们接班,要好得多。

谁来当接班人,对于康生来说,也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如果毛泽东安排 林彪上台,完全没有必要把康生拿掉;而毛泽东安排江青或者张春桥上台的话, 那么康生的威信就显得"太高了"一点,毛泽东为了江青或者张春桥的顺利接班, 就有必要把康生拿掉。

尽管康生在历史上与林彪并无特殊关系,相反与江青倒是有特殊关系,可是 "九大"之后康生成了"闲人",此时他逐渐看出来,拥戴林彪,比拥戴江青集 团更有利于自己。此后,康生就慢慢"淡出"江青集团了。

因此,一贯支持毛泽东的康生,在国家主席问题上,却站在了林彪一边。直到 1970 年 8 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讲话之后,康生还是公开表示支持林彪。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记述: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最好的接

班人,讲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 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毛主席不当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 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

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 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至于陈伯达,早就跟着林彪走了,成为反江青集团的先锋。这样一来,五个 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个站在林彪一边,而周恩来的态度,虽说主要是中立,但还 是偏袒林彪的。

周恩来也希望毛泽东不要再换新的接班人,这样搞下去又是一场大的运动。 而且从周恩来看来,也是宁可林彪接班,不愿江青或张春桥接班。所以,毛泽东 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在政治局常委中就孤立起来了。

(22)

1970年4月25日,毛泽东的专列路过苏州,他与林彪直接见了面。这是 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之后,两个人第一次单独见面。 据邱会作回忆说:

【叶群告诉我们,林彪提出"三条意见"后,大概是 4 月 25 号,主席在路过苏州时,林彪和叶群还到专列上去看了主席,让主席在苏州住下,并给主席腾出了林彪住的南园宾馆的房子,主席说不住了。

他们交谈得很好,主席还对林彪说起黄、吴、李、邱,并大加赞扬说:"我就是信任这几个跟我南征北战的红小鬼。"

那天正好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叶群让主席听了人造卫星上的《东方红》

乐曲录音,毛主席很高兴。他们之间没有再提起有关"国家主席"的事。】

前面多次说过,毛泽东这个人的脾气,如果他"骂"你,就是对你还抱有希望,如果客客气气的,那就是不抱希望了。毛泽东的年龄比林彪大很多,又是林彪的老领导,本来毛泽东"骂"林彪几句也是可以的。据说 1966 年林彪拒绝当党的第二把手时,毛泽东曾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

这次毛泽东在苏州与林彪见面,对林彪客客气气,"国家主席"的事一概不 提,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已经是不抱希望了。

1970年4月底,毛泽东和林彪都回到了北京。毛泽东在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据邱会作回忆说:【时隔不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 主席还讲了一个典故,大意是: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 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主席讲完以后,大家都笑了。我当时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谦虚,二是主席虽然又上了"一线",但他还是不想当国家主席,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原因是不愿管具体事务,愿意多考虑重大问题,具体工作由林彪和总理担起来,一个当国家主席,一个当总理。现在想起来,我的看法真是幼稚可笑。】

毛泽东用曹操和孙权打比方,明确说希望你们不要当"孙权",基本上已经 把话"挑明"了。即使是到了这个程度,林彪仍继续坚持唱反调。据邱会作回忆 说:

【5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当提到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

说得非常中肯,他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但只能毛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 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顺嘛。"

我们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林彪立即说;"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我不能当这个主席,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我身体不好,出个门都要下好大的决心,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

(23)

当时我们几个人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根本没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主席的心思。我们感到谁当国家主席,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毛主席当很正常,毛主席不当,由林彪来当也很正常。因此,不管主席怎么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他的"谦虚"。

林彪则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主要 是不想让林彪当;不设国家主席的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在 1970 年 7 月,又发生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关于"缔造"和"指挥"的问题。当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为纪念解放军诞生 43 周年发表社论,这篇《社论》是张春桥起草的。《社论》第一句话就是: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会上陈伯达对张春桥起草的《社论》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沿用"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张春桥的新提法中,增加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改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康生也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说张春桥的新提法不易译成外文。而张春桥坚持

不改,态度十分坚决,在会上形成意见对峙和激烈争论。周恩来不好表态,因为 此事直接涉及到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最后决定: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是怎么来的呢?在林彪刚刚当上第二把手的 1966年8月,当时"两报一刊"的说法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直接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并没有提到林彪。"两报一刊"在提到林彪时说:"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榜样。"

但 1966 年 11 月之后,"两报一刊"就把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删去,只提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显然,"学生"比"战友"要低一个档次,而只提"亲密战友",就使人感到林彪有"平起平坐"的感觉。

1966年11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红卫兵代表时,提出新的说法: "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由林彪同志主持的人民解放军……"这样,林彪在解放军中的地位,首次与毛泽东并列在了一起。

1966年11月底,陈毅在接见军队造反派时,又进一步说:"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的。"

1967年2月,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再进一步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

(24)

1967年4月之后,"两报一刊"就形成一个习惯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据汪东兴回忆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

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 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

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 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

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 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

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

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 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 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

这次张春桥起草的《社论》,突然改动过去三年多来的一贯提法,显然不是偶然的,应该是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不过这次"缔造"和"指挥"的问题,毛泽东作了让步,删去"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了过去的说法。但"缔造"和"指挥"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九一三"事件前夕的 1971 年 8 月 27 日,毛泽东在"南巡"中,又重新提起"缔造"和"指挥"的问题,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现在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这是后话了。

1970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时,

特地删去了很多林彪特有的颂扬毛泽东的话,比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等。毛泽东还为此写下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毛泽东删掉的这些话,都是林彪的原话,可以算是间接地批评林彪吧。

(25)

毛泽东与林彪的最根本矛盾,其实并不是"设国家主席",而是"个人崇拜"的问题。关于"个人崇拜"的宣传,古今中外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造神",第二种方式是"歌功颂德"。

第一种方式的"造神",是封建帝王时代使用的古典方法,把封建帝王塑造成"现人神"。人民之所以要服从帝王的领导,是因为帝王已经超越了"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人民要服从帝王这个"神"的领导。封建帝王不仅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且说出来的话"句句是法律,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第二种方式的"歌功颂德",是近代发展出来的近代方式。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人民的醒觉,用"神"来蒙蔽人民的手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所以近代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普遍采用"歌功颂德"的方式。比如美国也搞个人崇拜,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等人,都修建有规模巨大的纪念碑、纪念堂等纪念性建筑,对这些伟人的历史功绩和功劳进行"歌功颂德"式的宣传,让人们崇拜这些伟人,敬仰这些伟人。毛泽东曾对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说:"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的话,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早在建国之前,中共就开始对毛泽东进行"个人崇拜"的宣传,但那时的宣传采用的是近代的"歌功颂德"方式。一方面是毛泽东确实立下了很大的历史功绩和功劳;另一方面,对毛泽东进行恰当的"歌功颂德"宣传,对于国家和民族也是有好处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一面旗帜,美国如果没有华盛顿、林肯这样的伟人旗帜,它就没有凝聚力,就很难把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更需要一个超越民族的伟人旗帜,增强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可是 1966 年 5 月 18 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著名"五一八讲话",这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第一个把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式宣传, 上升为"造神"宣传。这里再回顾一下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片段,林彪说:

【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 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 主席哪一点不同?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

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毛主席不但懂了, 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

(26)

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 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 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

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毛主席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林彪强调:毛泽东之所以和我们不一样,是因为毛泽东是"天才"。林彪这里所谓的"天才",其实就是不点名地说毛泽东是"神"。因此只有"神"才可以做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整篇讲话的意思是:我们是人,毛泽东是神。所以我们不服不行,必须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林彪说"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样的话,完全是臣子对封建帝王"表忠心"用的话,更是把毛泽东当作帝王对待了;对毛泽东喊"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也完全是封建帝王的待遇。

那么林彪心里真的认为毛泽东是"超天才",是"现人神","句句是真理"吗?显然不是。林彪早年就多次怀疑过毛泽东,甚至写信让毛泽东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彭德怀。革命胜利建国后,林彪也没有迷信毛泽东。1971 年林彪外逃之后,中央派人去林彪住的毛家湾,搜查林彪家里的罪证。从几万册图书中,发现林彪亲笔写的眉批,其中一些是针对毛泽东的。例如: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捏造是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从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些批语来看,他绝对不是真心地认为毛泽东"句句是真理"。既然林彪吹捧毛泽东"句句是真理"不是出于真心,那必然就是别有用心

了。接着问题就来了: 林彪的别有用心,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好意?还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恶意呢。

要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需要把林彪的言行,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林彪在 1966 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这时林彪还不是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他在党内的排名仅是第六位。

(27)

第二个阶段是林彪在 1966 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这时林彪一跃变成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人的地位变了,他的想法和做法跟着改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林彪做出著名"五一八"讲话的 1966 年 5 月 18 日,中央已经发出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这时林彪不得不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刘少奇,这点林彪已经看到,但单单为了打倒刘少奇,似乎不需要搞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运动。毛泽东的文革,除了打倒刘少奇之外,应该还有别的目的。那么毛泽东的这个别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林彪当时想来想去,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毛泽东想当皇帝。

在林彪还不是接班人的时候,林彪对毛泽东尽管不迷信,但对毛泽东还是充满感激的,毕竟林彪能有今天的一切,少了毛泽东的栽培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那时林彪的想法是:不管毛泽东想干什么事,他就要帮毛泽东去做这件事。后来从林彪家中抄出来的图书眉批,有叶群亲笔写的一条:【抓一号(毛泽东)的活思想,抓苗头,把他想办的事,列入议事日程上。】

叶群的这句话,应该也是林彪的意思,就是好好琢磨毛泽东想办什么事,提前主动帮毛泽东去做这件事。这时林彪琢磨出毛泽东"想当皇帝"之后,他就要帮忙让毛泽东实现"皇帝梦"。

林彪想:毛泽东要当皇帝,必须有人替他先行一步搞宣传。因此,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说毛泽东是"天才"、"句句是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完全是把毛泽东当作皇帝来进行宣传了,是一篇拥戴毛泽东当皇帝的"造神"讲话。

林彪本以为他这次琢磨出毛泽东的心思,主动帮毛泽东去实现"皇帝梦", 毛泽东一定会大为高兴。但林彪没有想到这次"拍马屁拍到马腿上",毛泽东不 仅没有夸奖他,反而写了一封间接批评他的《滴水洞家信》,让周恩来转给他看。

林彪看了《滴水洞家信》,马上明白毛泽东没有想当皇帝的意思。因为如果 毛泽东想当皇帝,那就应该继续鼓励林彪这么做,而不是反对林彪这么做。之后, 林彪沉寂下来,没有再发表拥戴毛泽东当皇帝的讲话。

毛泽东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知道时代发展到今天,再试图当皇帝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50多年前袁世凯试图当皇帝,搞得众叛亲离,最后不得不自己狼狈地宣布退位。毛泽东不会再犯袁世凯的错误,毛泽东不想当皇帝。

(28)

毛泽东其实并不反对进行适当的"个人崇拜"宣传,但毛泽东所希望的是近代的"歌功颂德"宣传,而不是林彪搞的古典"造神"宣传。毛泽东知道,在人们的思想觉悟已经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进行"造神"宣传,不但没有正面的效果,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造成负面的结果。

毛泽东希望林彪搞"歌功颂德"式的宣传,就像歌曲《东方红》里说的那样: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希望林彪宣传的时候,强调毛泽东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强调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了中国人民翻身当家作主而奋斗;强调人民拥戴毛泽东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样的宣传,才能拉近毛泽东与人民的距离,使人民真心地拥戴毛泽东。

而林彪搞的"造神"式的宣传,是反时代而行的。秦始皇时代,人们或许还会相信"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可是到了20世纪的今天,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怀疑这种"句句是真理"的造神宣传。"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话,人们尽管嘴上不敢提出异议,心中肯定是不相信的。因此,这样的"造神"宣传,不仅不能拉近毛泽东与人民的距离,反而引起人们的反感,疏远了毛泽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

毛泽东本来以为林彪看了他的《滴水洞家信》,会停止这种"造神"宣传,而林彪不但没有停,反而变本加厉,调子越来越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林彪的地位变了。林彪本来一度停止了"造神"宣传,可是他在1966年8月当上接班人之后,又重新开始了"造神"宣传。

林彪本来没想当接班人,可是一旦当上了,林彪就要当下去,这个原因前文中已经分析过。历史上的太子,往往是"大好"和"大坏"两种下场,因此林彪需要巩固他的太子地位。这时林彪发现,把毛泽东造成"神",对自己是有利的。

刘少奇曾是接班人,可是毛泽东找个借口就把刘少奇拿下来,因为那时毛泽东还不是"句句是真理"。如果毛泽东成为"句句是真理"的神,那么毛泽东说过的"林彪是接班人",也自然就上升为真理,谁也不能推翻,谁也不能怀疑。这样一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等于有了"皇帝钦定"的保险。

如果说在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前,他对毛泽东进行造神宣传,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好意";那么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对毛泽东进行的造神宣传,那主要就是为了林彪自己,而不是为了毛泽东了。在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进行造神宣传的代表作,就是《〈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29)

在林彪的主导下,军队中早在 1964 年就开始出版《毛主席语录》。不过早期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都是署名"总政治部",并无林彪个人的名字出现。1966 年 12 月 17 日,全国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这时林彪的名字就与《毛主席语录》挂靠在一起,成为不可分的一部分。人们学《毛主席语录》之前,先要学林彪的《再版前言》,在宣传毛泽东的同时,也在宣传林彪。

因为林彪的《再版前言》是造神运动的重要文献,这里全文引用。林彪在《再版前言》写道: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 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

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 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

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 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

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

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典型的"造神"宣传,而不是"歌功颂德"宣传。《再版前言》只字不提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和功绩,只字不提毛泽东为人民谋幸福的努力和奋斗,而是宣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天才"。

(30)

林彪号召人们要像读《圣经》那样,背诵毛泽东的话,并声称毛泽东的话,像《圣经》一样,具有"立竿见影"的"精神原子弹"威力。

林彪的《再版前言》发表于 1966 年 12 月,而林彪在 1966 年 7 月就看到 了毛泽东的《滴水洞家信》,因此,林彪应该已经知道毛泽东不喜欢这种"造神" 宣传。然而这时林彪却将错就错,继续进行"造神"宣传,应该主要是为了他自 己了。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林彪的《再版前言》最后一句话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个提法,与后来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差不多完全一致。1966年12月正是文革的高潮时期,林彪的《再版前言》在最后没有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提出了"四个现代化"。这样的思想,几乎就是后来被批判的"唯生产力论",也是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由此可见,林彪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是由来已久的。

毛泽东曾在一篇新华社电讯稿上,对当时的中宣部长陶铸批示道:"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的这些话,明显是针对林彪的语言。而陶铸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给 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关于今后 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作了讨论,大家肯 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这些话开始从解放军报宣传,以后逐渐成为 全国普遍运用的语言,非常深入人心。

主席指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但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因此,大家建议采取如下的步骤……"

陶铸反而赞成了林彪的造神宣传,认为毛泽东反对造神是"谦虚"。陶铸提出的"不宜突然停止使用这类语言",等于是抵制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对此也无可奈何。

在"造神"宣传问题上,毛泽东被绑上了林彪的战车,想下也下不来。这就像毛泽东在《滴水洞家信》中说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样的讲法过去没有过,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31)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上一次的三届人大是 1965 年召开的,按照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原则,四届人大应该在 1970 年召开。前面提到,在召开党代表大会前,事先要准备好两份重要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召开全国人大前,也要事先准备好两份重要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是由周恩来主持,因为政府一直是周恩来主管的;而修改宪法是大事,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林彪为副主任,但具体起草《修改宪法报告》,毛泽东则指定由康生主持,由张春桥主笔,这就让陈伯达很不高兴。因为新中国 1954 年制定的《宪法》,就是由陈伯达起草的,所以陈伯达认为他应该主持修改《宪法》。陈伯达不高兴,他就跟林彪跟得更紧了。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1970年夏天,毛家湾内显得异常忙碌。东院的庭院内,常常停放着一排客人坐乘的小轿车;西院的会客厅,常常坐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影"观众"。这些"观众"大半是毛家湾特别邀请来的,因为每一场电影只能容纳一、二十人,所映的影片,大部分是进口的外国片,也有一部分是文命前的国产片。这些"观众"难道没看过这些影片吗?倒也不一定。但不论主人

或客人都明白,有幸被毛家湾请去看一次电影,那个"政治含量"是不轻的。

1970年夏天,毛家湾的待客热有一个很窄的范围。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人,从陈伯达到黄、吴、李、邱,他们相聚的时间大都在晚上,力图避开钓鱼台方面的注意。例如陈伯达到毛家湾来,通常是从钓鱼台出发后,先在市内其他地方兜兜圈子,然后再转向毛家湾。再如,黄、吴、李、邱到毛家湾来"看电影",也是对钓鱼台严加保密的。】

1970年8月,修改宪法进入收尾阶段,8月13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这次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激烈争吵。对此吴法宪回忆说:

【由于我们军委办事组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来就分成两派,这个问题,也反映到宪法修改小组里来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两派,陈伯达、李作鹏和我是一边;康生、张春桥是另一边。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是放开讲话的,时常有些争论之词,有些争论还非常激烈。

(32)

8月13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天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我。李作鹏因为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去处理问题了,没来开会,纪登奎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来。

会议进行过程中,陈伯达出去打了几个电话,长时间不在会场。所以,这一 天实际上只有康生、张春桥和我在那里开会。

当讨论宪法中的国家机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 "再写上就重复了,毛主席也不同意写。" 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

我想这只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张春桥,你说这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 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

我追问他: "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

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想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

这时康生也很不冷静地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 为指针'就是了。"

我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

康生说:"对、对,写上、写上。"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几个文人,打倒了那么多的老同志,现在又公

开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气愤不过。林副主席有什么错,难道又要被打倒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是你张春桥之流能啃得动的吗?

(33)

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当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张春桥不满,积怨甚深,也就借题发挥,这样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记录。】

据吴法宪回忆,这次争论是张春桥引发的。本来吴法宪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并不算太大的问题,可是张春桥把话题引到了林彪身上,公然讽刺林彪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当然会引起林彪派系的吴法宪跳起来反对。

以张春桥的身份,如果背后没有人给他撑腰,肯定是不敢公然讽刺林彪的。如果是比较有政治头脑的高官,听到张春桥敢说这样的话,就会猜到张春桥背后有人,不但不会跟张春桥争吵,反而自己要好好思考一下,张春桥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

但头脑比较简单的吴法宪,没细想为什么张春桥会这么大胆,以为只是张春桥个人的"阴阳怪气",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跳起来跟张春桥争吵。林彪派系的军人,多半是吴法宪这样的有勇无谋之人。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后,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情况。我说:"老夫子,你这个人,讨论宪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里去了?"

陈伯达这时立即对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写上。"这样,陈伯达就公

开同我站在了一起。

散会以后,我和陈伯达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今天张春桥实在没有道理, 口口声声赫鲁晓夫,这明明是反对毛主席,讽刺林副主席嘛!"

陈伯达说:"走,先到我家去。"

我跟着陈伯达到他家后,他对我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总理和黄总长那里也反映一下。"】

吴法宪头脑的确简单,会后他还对陈伯达大骂张春桥,认为这件事只是张春桥个人的问题。虽说陈伯达是书生,但政治头脑还是比吴法宪强许多,立即察觉到"今天的事情不简单",让吴法宪把情况向林彪,周恩来、黄永胜汇报一下。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我按照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我把会议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我说:"关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他们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

(34)

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

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

周恩来还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赞成。"】

据吴法宪说, 周恩来对他的意见完全表示支持, 而且特别说到赞成设国家主

席。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好了,总理的意见有了,我就更有底了。这件事情我是第一个报告周恩来的,因为当时我们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亲密的。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黄永胜当然全力支持我,他还提出让李作鹏立即从青岛赶回来支持我,不然的话,我和陈伯达在宪法修改小组里比较孤立。黄永胜表示:"这两条意见,一是设国家主席,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定要坚持。"

当时我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第二 天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我把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告诉了她,并要她转报林彪。不 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 持这两条(设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指针),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 们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这个态度,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鹏、邱会作更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和黄永胜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斗争。这时,李作鹏也赶了回来,我和陈伯达、李作鹏各自查了些书和文件,准备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再同他们斗一斗。】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会后,吴法宪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听后对吴法宪的意见表示支持,周总理明确地说:他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讽刺"的话。周总理还说,他同意设国家主席。周总理关于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不止和我们说过一次。

关于这次会上的争论,吴法宪也报告了叶群,叶群很快就传回了林彪的话: "吴胖子说得好,他立了功,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

当然,张春桥会后立即报告了江青,江青又详报了毛主席。】

吴法宪和邱会作的回忆都说,林彪明确支持吴法宪,鼓励吴法宪跟张春桥斗。 对于这场斗争,林彪一点没有退却的意思,他让他的四大金刚以及陈伯达,在会上与张春桥等人好好斗一斗。

(35)

不过吴法宪等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要斗的对手,表面上是张春桥,实际上是毛泽东。这样,吴法宪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林彪的棋子,而张春桥是毛泽东的棋子。吴法宪和张春桥的斗争,其实就是林彪与毛泽东的代理斗争。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8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 主持,对《宪法草案》最后定稿。会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召回了在外地检查工作 的李作鹏,以加强战斗力量。叶群没有参加会议,她从北戴河打电话给陈伯达、 黄永胜等人,让他们准备好,在会上跟张春桥斗。

周总理估计会上要争斗起来,他也做了思想准备。周恩来是支持林彪,支持 军委办事组,支持吴法宪的。周总理的思想是,这些评价是正确的,写就写上嘛, 张春桥又在人为地添乱。周恩来最讨厌人为添乱,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

周总理在会上是很小心的,他拿着《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念一条讨论通过一条。念下面一条时,总理总是提醒大家:"听好啊!"

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当总理念到"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时,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根本没有争起来,他们表示同意。

总理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很恭敬地问江青:"江青同志的意见呢?" 没想到从来是颐指气使的江青,竟很和气地说:"大家讨论"。

这样带有"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方针"这些词句的宪法修改草

案,被顺利通过了。周恩来如释重负,终于松了一口气。

林彪知道会议的情况后,却紧抽了一口气。林彪太了解毛泽东了,会议出现这样的结果,肯定有人点拨张春桥、江青等人。林彪认为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8月23日召开)上,会有更大的斗争。】

林彪是很有眼力的,他看出张春桥、江青等人的突然让步,让《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其实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指点,是毛泽东让他们故意让步的。林彪不得不思考: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让步,是不是要麻痹和迷惑一下林彪?是不是毛泽东要在几天后的庐山会议上,发起什么重大的动作呢?

林彪一点也琢磨不透毛泽东的下一步棋是什么,这是最让林彪担心害怕的。因为毛泽东的战术,总是出人意料,防不胜防的。因此,林彪下了决心,他在庐山会议上,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才能避免被动挨打,才能避免他被毛泽东的战术打得措手不及。

(36)

1970年8月19日,毛泽东登上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三次上庐山。早在19世纪末,外国人看中了庐山这块避暑胜地,九江租界和汉口租界的外国人纷纷在此兴建别墅,后来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再此修建别墅。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共建成三百多幢别墅,最有名的当属蒋介石的"美庐别墅",另外还有汪精卫别墅等。

中共建国后,中央在庐山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是 1959 年 8 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次毛泽东下榻于庐山上蒋介石的美庐别墅,据说毛泽东进门时曾高喊:"蒋委员长,我来了!"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万言书》,出现一次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

1960年,在庐山上专门为毛泽东修建了一所别墅"芦林一号"。据说 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对陪同他的当地官员说:"这里的山好、水好、人也好。"却唯独没有提到"房子好"。于是聪明的官员就在庐山上专门为毛泽东修建了一幢别墅。

毛泽东第二次上庐山,是 1961 年 9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毛泽东入住为他专门修建的"芦林一号"。1970 年 8 月毛泽东第三次上庐山,也依旧入住"芦林一号"。而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聪明的官员也在庐山上,专门为林彪修建了一幢别墅。林彪别墅于 1969 年建成,所以 1970 年 8 月林彪上庐山时,就入住进了专门为他修建的别墅。而周恩来大概是为了拉开自己与毛泽东和林彪的距离,没有住进以前他曾经住过的马歇尔公馆,居然住进普通的楼房。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说:【这里都是一幢幢依山而筑的小洋房,大多是过去达官贵人以及外国人避暑的别墅,也有一些是解放后新建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开全会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是一人住一幢,中央委员是两人往一幢,候补委员是三人合住一幢。每幢别墅都配备了一名服务员,每两幢房子配备了专门的厨师。他们白天来,晚上去,负责整理房间,做清洁工作,打茶水和做饭。在房子外面的树林里,警卫战上们日夜站岗放哨。

周恩来总理是个大忙人,他住在大路旁小卖部附近的一幢普通楼房里,便于和各地的中央委员们接触。全会开始前的气氛是轻松的,这从周恩来的神态中也可以感觉到。会前,我们几个年轻的中央委员相约去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穿着一件白色的翻领两用衫,一条米色的长裤,足登一双半新的牛皮凉鞋,显得风度翩翩而又十分精神。

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全会的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

然后提交给四届人大正式通过后颁布,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等。周恩来说:"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

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惊呼起来:"啊,只有三、五天?"我们觉得会期太短,看 庐山都看不够。】

(37)

这次庐山会议之前,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官们,都没有闻出火药味。他们以为这次会议将是一次简单而轻松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也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这有点像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当时人们也以为那次会议是一次简单而轻松的会议,没想到会上彭德怀突然抛出《万言书》,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在毛泽东上庐山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据汪东兴回忆说:

【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在轰轰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

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

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 "命令是前天收到的。"

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快修好了。

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

程世清说:"那怎么办?"

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做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 了。

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

我说:"不知道。"

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

我打电话问周总理, 周总理说: "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总理说:"我问一下。"

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我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

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

黄永胜说:"我报告了林副主席。"

然后, 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说: "是林副主席批准的。"

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毛泽东对在他的住房周围大搞土木工事,是十分敏感的,因为刘少奇已经搞过一个"列车窃听案",把窃听器装到他的专列上。在毛泽东看来,这次林彪下令在"芦林一号"附近修飞机场,会不会趁着修飞机场的机会,派人在毛泽东的

住处悄悄安装窃听器,甚至安装炸弹呢?还有,在毛泽东别墅附近修了飞机场, 林彪就可以突然派出大量空降兵,突然从天而降,包围毛泽东的住所。

(38)

因为在毛泽东别墅附近修飞机场,连周恩来也不知道,这让毛泽东更加怀疑 里面"有鬼",所以毛泽东对此不能不防。后来在庐山会议最激烈的时候,毛泽 东曾一度搬出"芦林一号",住到了另外的别墅中。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 东还专门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就是暗指在他的别墅附近修飞机场这件事。

九届二中全会定于8月23日开幕,在前一天的8月22日,毛泽东事先召集五位政治局常委开会。据列席这次会议的汪东兴回忆说:

【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 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经济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 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一次会了,全国人 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从汪东兴的这段回忆,可见这次康生也跟毛泽东有点小小的"顶牛"。毛泽东说要讲"形势问题",康生却提出要讲"修改宪法",经毛泽东再次坚持,康生才作罢。不过在毛泽东让康生讲"修改宪法"时,康生又推辞让周恩来讲,于是毛泽东"看了康生一眼",表示不悦。

这次会上,周恩来和康生都有大会讲话,而林彪偏偏没有大会讲话,不免让 林彪觉得他被冷场了。按理说,周恩来已经准备好讲"经济计划问题",那么"形 势问题"就应该让林彪来讲。毛泽东不让林彪讲话,在林彪看来,那就是毛泽东 要有意对他"冷场",要慢慢降低林彪的威信。

本来毛泽东是不想让林彪在大会上讲话的,可是这次林彪却"非要"讲话。 在第二天开大会之前,林彪突然表示他要讲几句话,毛泽东也不好不让林彪讲, 于是林彪违反毛泽东的意愿,成了大会的第一个发言人,而且一讲就是一个半小 时,这就是林彪著名的"称天才"讲话。这是后话了,这里还是先看汪东兴回忆 8月2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

(39)

汪东兴回忆说:【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8月22日晚8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让我作了补充。】

汪东兴的回忆中,对这次政治局常委会的一些不太重要的话,讲了很多,而

把关键的"设国家主席"的一段话,却隐去了。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写道:

【1970年8月2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 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议程、分组及在京值班安排等。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

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 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 振奋和鼓舞。"

陈伯达讲后, 林彪也附和。

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毛泽东还强调:"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 裂的、失败的会。"】

《周恩来年谱》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可见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除毛泽东 外的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不 说是感到相当大的压力,甚至有点"逼宫"的味道。对这件事,邱会作回忆录中 也提到了,邱会作说:

【8月22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毛主席和各常委碰碰头,并确认一下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在常委会中,还讨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本次常委会最重要的内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主席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之首、国家主席。"

(40)

毛主席绝对没想到在全会还没有召开,四个常委的就一致提议设国家主席,与林副主席的提议是一致的。因此毛主席刚一上山,就气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甚为倚重的康生,也主张设国家主席。

毛主席在常委会上说:"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

毛主席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 失败的会。"

毛的弦外之音就是: 你们不听我的意见,就是破坏党的团结。

后来毛主席又说:"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可是,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一直没有讲,一直没有给大家最高指示和"谆谆教导"。】

邱会作的回忆,与《周恩来年谱》的记录大体一致。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当天晚上开政治局会议,主要是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政治局常委会的精神。我记得总理并没有说什么大的问题,总理在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传达常委会上,主席和四常委对"设国家主席"问题的态度。

总理说:"今天下午,在主席那里开了常委会。主席同林副主席说,他以前说过的那些问题(没有点明什么问题,后来汪东兴补充发言时给点出来了),这次好好说一下。明天下午三点是开幕式,会议从二十四日开始,主要是小组会。我们大家都要参加小组会议,身体不好的,还是以休息为主,其他人也不要放弃这次休息的好机会。"

吴法宪、李作鹏和我同时提出:"我们最希望总理能休息一下。"

总理讲完后,对汪东兴说:"你来做补充。"

汪东兴接着发了言,他说:"我首先声明,我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在会上谈的问题,我做点补充传达。主席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指5月17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的事)。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

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今天的确比较随意,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出江青的洋相。汪东兴在补充中说的内容,总理都没有讲到,汪东兴竟然敢"补充"出来。当时康生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

我看当时汪东兴样子,有些不以为然。后来,陈伯达下台之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兴。

汪东兴这个人,我跟他打交道较多,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对他也不很了解。 我认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装腔作势;二是肚子里事不少。至于他的 办事能力,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东兴还是有 能力的。】

(41)

自从毛泽东 1943 年成为中共第一把手以来,他的意见被所有的政治局常委 反对,这是第一次。在 1966 年 8 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是以政治局 常委中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了罢免刘少奇。这次毛泽东要对付的林彪,显然比 刘少奇难对付多了。

政治家的最主要能力之一,就是团结人的能力。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撼不动,就是得益于他超强的团结人的能力。看来林彪团结人的能力也是一流的,不仅把 毛泽东的笔杆子陈伯达拉了过去,这次连康生都被林彪团结过去了,这不能不让 毛泽东暗吸一口冷气。

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小看了林彪的政治能力,本以为林彪是彭德怀那样一介武 夫,没想林彪打政治仗的水平也是一流的。在平时百事不管的林彪,到了关键时 刻,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这就是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高手。

在政治局常委中遭遇"四比一"的绝对劣势,一般人就会屈服,但毛泽东却不会,如果屈服了也就不是毛泽东了。有人说:毛泽东不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个人独裁"的表现。

这种说法,是学者们喜欢翻弄的书本教条;而对于大腕级政治家来说,他们从来不把"少数服从多数"看作是一种需要遵循的原则,而仅仅看作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

"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因为真理在开始阶段,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如果在真理的开始阶段,就必须遵从"少数服从多数",那么真理就不会诞生了。

就拿毛泽东上井冈山为例,1927年中共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反对毛泽东上井冈山搞农村根据地,那时多数中央委员认为苏联模式的大城市暴动,才是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上井冈山,是违反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是违反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多数意见是错误的,而毛泽东的少数意见倒是正确的。

如果当年毛泽东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跟着搞大城市暴动,那么中共 今天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不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江山了。

再比如说 1976 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也是违反"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据参与此事的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42)

我们分析了当时中央委员的成员情况,我们认识到: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 "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回忆的情况,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政治家们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态度。 华国锋等人的看法是:如果能够在中央委员会取得多数,就用"少数服从多数" 的方法来罢免"四人帮";如果不能在中央委员会取得多数,就用"隔离审查"的方法抓捕"四人帮"。

很显然,他们把"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只不过是当作一个"工具"来用, 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不用,没有一个人主张要把"少数服从多数"当作必须遵循 的原则。

现在大部分人都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立了功,如果当时华国锋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四人帮"就很可能粉碎不了,后来的"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了。

因此,"少数服从多数"并不能教条地遵守,而是要看两个问题:第一,那个"多数派"是不是代表正确的道路,代表正确的发展方向;第二,那个"多数"人的意见是不是正确的。华国锋的立功,就是在于他没有教条地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因此被称为"英明果断"。

在毛泽东看来,尽管这次林彪为首的四个人的意见是多数意见,但这个意见 对不对呢?毛泽东认为他们的意见不对,更认为他们四人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因此,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是不应该遵从他们的多数意见的。不能简单地 把这个行为,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独裁",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当然,毛泽东要想反对掉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意见,肯定不能像华国锋那样派军队来解决问题,必须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了。毛泽东首先要搞定的人,当然还是周恩来。对付周恩来,毛泽东依旧是"一手硬,一手软"的老办法。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软"的办法,就是向周恩来示好,拉拢一下周恩来。 (43) 据邱会作的回忆,汪东兴向大家透露了一个消息,毛泽东曾在那次常委会上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

毛泽东说的事,是指 1970 年 5 月江青找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的人谈话,说 周恩来和陈伯达的坏话,试图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这次谈话,引起了周恩来对 毛泽东的怀疑。现在,毛泽东要团结周恩来,所以赶快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向周恩来示好。

毛泽东本来准备安排江青做一个检讨,向周恩来说明,这件事只是江青的个人行为,与毛泽东无关,以免周恩来怀疑毛泽东是江青的背后指使。所以毛泽东说:"这些事讲清楚,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只是因为后来林彪先发制人,先发表了"称天才"的讲话,改变了大会的议事日程,江青检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硬"的办法,还是过去"重上井冈山"的老办法。毛泽东再次放"狠话"说:"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的这些"狠话",对林彪无效,对周恩来还是很有效的。周恩来的哲学是"顾全大局",就怕党内大乱,天下大乱,一旦遇到毛泽东要"豁出去",周恩来就让步了。

1969年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25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在开幕之前,政治局的五位常委先在礼堂的小会议室碰头,最后确认一下情况。据汪东兴回忆说:

【开幕前,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 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和康生都说:"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 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 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44)

据汪东兴的回忆,本来没有林彪的讲话,而是林彪在开会前,突然提出"要讲点意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林彪讲话。另外由于林彪的地位高,所以周总理和康生都让给林彪先讲。可是另一位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又与汪东兴的有所不同。陈伯达回忆说:

【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着,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完后出来,大会开了。原定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突然抢先讲话,记得是讲关于宪法草案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林彪讲后,康生便要我也先讲,我没有讲。于是康生夹七夹八地讲了,并引用当时林彪的几句话。

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可是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就不去主动求见毛主席了。】

陈伯达的这段回忆,经常被人断章取义,用来证明毛泽东事先知道林彪的这

次讲话内容,这个问题放在后面专门介绍。

陈伯达提到,毛泽东和林彪在开会之前,曾经两个人单独谈了很长时间,他和周恩来、康生在外面等。这点与汪东兴的说法不一样,汪东兴说政治局常委五个人在一起谈话,而不是毛泽东和林彪单独讲话。

关于这个问题, 邱会作回忆中是这样说的:

【8月23日下午3时,全会在小礼堂开幕。但常委们一直没有出来,大约等了40分钟,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才走出来在台上就座。 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坐在台下前排。

全会由毛主席主持,主席宣布: "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幕!"

然后,毛主席左看右看地看了一下林彪、周恩来,之后即说:"请林彪同志 讲话。"

林总对毛主席笑笑地说:"好,我说几句。"

毛主席又接着说了一句:"现在,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平心而论,林彪的话讲得很一般,问题也不是 讲得很清楚,但事后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真是意料之外。】

(45)

另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宪法修改小组杨福云回忆说:

【8月23日下午3时前,我们早早到了会场,我们几个还未近距离见过毛主席,今天是难得的机会。我们早到会场,坐在前面。时间过了下午3时,中央常委还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直到3时45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才走上主席台,会场上爆发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正中间,他左边坐着林彪、陈伯达,右边坐着周恩来、康

生。他们一就座,记者一拥而上,拍电影、拍照。强光罩着毛泽东,很快他就不耐烦了,打手势,叫他们赶快离开。

周恩来马上示意记者,叫他们停止拍照,关灯。五位常委,都显得很严肃, 谁都没有笑容。我当时想,中央全会理该这么严肃。

毛泽东宣布全会开幕,然后说:"今天谁先说?恩来,你报告一下议程。"

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的意见。周恩来传达完后,毛泽东问:"还有谁讲?"

林彪说:"我讲几句。"

毛泽东看林彪一眼,没有说什么。】

另据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中说:【(《陈伯达传》提到毛泽东与林彪单独 谈话)但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书中没有提及。实际上,这是 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倒是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接受本书 作者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

不过,吴法宪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再向作者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 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

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

主席问:"讲什么?"

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此外,散会后,叶群也向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交待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不点名的点名,他在事前报告了毛主席。"

陈伯达为此在当晚还专门跑去问过林彪。林彪没有从正面回答,反而问他是 听谁说的。当陈伯达表示是听叶群讲的之后,林彪叮嘱道:"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关于上述几个人回忆的不同,以及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的话,我们将在下面 分析。

(46)

按照官方的见解,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称天才"讲话,是暴露林彪"篡党夺权"野心的最重要证据之一,是瞒着毛泽东和党中央搞的一次"突然袭击"。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也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中共高官在公开场合上讲话,一般来说,如果是短暂的讲话,讲话内容当然不必经过上级批准。但如果是长篇讲话,比如林彪"称天才"那样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长篇讲话,讲话内容就应该经过上级批准,或经过集体讨论。党员在公共场合擅自发表与中央精神不同的个人意见,要作为违纪论处。林彪这次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长篇讲话,事先没有经过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同意,也没有经过中央讨论,所以从党纪上来说,林彪的讲话是有违纪问题的。

然而,近年来一些试图为林彪"翻案"的人,试图"颠覆"过去官方的见解。 他们著书撰文,声称林彪的"称天才"讲话,事先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并反过 来说毛泽东的话"林彪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反而是不实之词。进一 步,他们又因此而推论出林彪被"冤枉"了,林彪事件要翻案。

这种"新见解"真的有道理吗?在这里特别进行一些分析。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林彪事先向毛泽东提交过"称天才"讲话的书面文稿,更没有毛泽东在林彪讲话稿上"画圈"同意的书面证据。所以持"新见解"的人,声称毛泽东在与林彪谈话的时候,"口头上"同意了林彪的讲话。那么林彪和毛泽东在什么时候进行过交谈呢?

毛泽东于 1970 年 8 月 19 日乘专列到九江,然后换汽车上庐山;林彪于 8 月 20 日乘飞机到九江机场,然后换汽车上庐山;周恩来也于 8 月 20 日晚到庐山。 九届二中全会 8 月 23 日开幕,在开会前的 8 月 20 日到 23 日的三天时间内, 毛泽东和林彪都在庐山上,可以说住得近在咫尺。在开会前的这三天时间内,毛 泽东与林彪见过面,谈过话吗?没有。毛泽东与林彪在这三天内,没有任何单独 接触。

这似乎不符合"亲密战友"应有的气氛,但事实却是这样。毛泽东肯定是没有召见林彪,那么林彪主动提出求见过毛泽东吗?也没有林彪主动求见求毛泽东的记载。甚至,连周恩来也没有主动求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也没有召见过周恩来单独谈话。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0年8月21日,(周恩来)就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等问题,书面报毛泽东、林彪。……,先后到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在8月21日这一天,周恩来把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等问题,只是用书面形式 呈报毛泽东和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相反,周恩来到林彪的住处,与林 彪进行过单独谈话。可见此时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温度,要高于他与毛泽东之间 的温度。

(47)

在周恩来与林彪单独谈话后的第二天 8 月 22 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这次会上四位常委向毛泽东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前面已经说过。

8月22日的常委碰头会,是林彪上庐山之后,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但在 这次会上,林彪并没有提出他在第二天的开幕式上要讲话。8月22日的常委会 之后,林彪和周恩来都没有与毛泽东单独谈过话。

在8月23日上午,林彪和毛泽东没有见面,只是到了8月23日下午3时前,林彪才与毛泽东见面,这时距离林彪发表他的"称天才"讲话,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

这次林彪与毛泽东的见面,是单独谈话呢?还是有其他人在场?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林彪与毛泽东不是单独谈话,而是五位常委在会前碰头时,林彪向毛泽东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

第一种说法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来自《汪东兴回忆录》。汪东兴说: 【开幕前,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和康生都说:"那好吧,你先讲。"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第一种说法的另一个根据,来自《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独家提供的吴法宪的回忆。在吴法宪自己的《吴法宪回忆》中,并无这样的内容。高文谦提供的

吴法宪回忆说:

【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 主席问:"讲什么?"

林说:"听吴法宪讲,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 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据汪东兴说: 林彪在开会前, 当着其他常委的面, 突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 毛泽东同意林彪讲话, 但毛泽东并不知道林彪要讲什么, 所以这不能算是毛泽东 "同意"了林彪的讲话内容。

再据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说:在开大会前,常委们在休息室里闲谈的时候,林彪突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这也就是说,林彪是在休息室里,当着其他常委的面,向毛泽东提出讲话的要求。

毛泽东问林彪要讲什么?林彪简单说讲张春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不是张春 桥的问题,而是江青搞鬼,并要林彪讲话时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

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有不少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一)张春桥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对于一个政治局委员,必须经过中央讨论 决议,才能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林彪无论如何不可能擅自点名批评张春桥,这根 本不需要毛泽东提醒林彪,这种常识林彪应该是有的。因此,毛泽东特别提醒林 彪"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反而显着很不自然。

(48)

(二)毛泽东说"江青在背后搞鬼"这样的口气,显然表现出毛泽东支持林彪,

而不支持江青或张春桥。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后来毛泽东的态度会发生一百 八十度的转变,又转而公开支持江青或张春桥呢?所以毛泽东在这里表示支持林 彪,是不合理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毛泽东后来的态度。

关于这次林彪与毛泽东见面的第二种说法,是来自陈伯达的回忆。陈伯达说: 【毛泽东和林彪在开会之前,曾经两个人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我和周恩来、康生 在外面等。】

陈伯达的第二种说法,有一个有力的旁证,就是大会原定下午3时开幕。 在3时前,所有中央委员,包括邱会作等政治局委员,都已经在座位上就座, 就等着五位政治局常委出来。可是五位政治局常委迟迟不出来,一直让众人等了 45分钟,五位常委才出来。

如果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林彪与毛泽东的谈话时间不到一分钟就完了,没必要让众人等 45 分钟;同样按照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林彪与毛泽东的谈话也不过几分钟就完了,也没必要让众人等 45 分钟。

怎样解释五位常委迟了 45 分钟才出来这个事实呢?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的说法是合乎逻辑。因此我们认为,毛泽东与林彪在会前曾经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单独谈话。

毛泽东与林彪单独谈话的内容,第三者无法知道,毛泽东和林彪后来也都没有提起过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因此,这次谈话内容就成为千古之谜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次谈话肯定是不愉快的,两个人的矛盾不但没有消解,反而激化了。在这次谈话之后,林彪马上发表了他的"称天才"讲话,使两人关系进入难于逆转的对立时期。

陈伯达还回忆说:【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

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

陈伯达的这段回忆,本意是说:陈伯达会后问林彪,林彪的讲话是否事先同 毛泽东谈过,林彪"骗"陈伯达说"我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陈伯达责备自 己,居然愚蠢地相信了林彪骗他的话。从陈伯达回忆的前后文来看,陈伯达的意 思很明显,他强调"毛泽东事先不知道林彪的讲话内容"。

不少为林彪翻案的人,在引用陈伯达的这段回忆时,删去了"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后半句话,只是断章取义地引用前半句话:"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

这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就根据这个断章取义的前半句话,撰文下结论说:"据 陈伯达回忆,毛泽东事先知道林彪的讲话内容。"这样的断章取义,完全违反了 陈伯达原话的本意。所以毛泽东事先知道林彪的讲话内容,是没有根据的。

综上所述,近年来为林彪翻案的这种"新见解",其实并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不过是一种炒作而已。在这一点上,还是官方的见解站得住脚,毛泽东说的"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也是站得住脚的。

(49)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之后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称天才"发言。林彪的这个发言,是会议日程中原来没有的,不过绝大部分参会人员,对此并没有在意,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林彪会"别有用心",更不可能怀疑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因此,林彪讲话时,众人依旧给予非常热烈的鼓掌欢迎。

林彪这个长篇讲话,大部分内容是他一贯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都是冠冕堂

皇的,不了解高层内情的一般中央委员,根本听不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异样。当时作为一般中央委员参会的吴德回忆说:"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层的政治局委员们,听了林彪这个所谓的"即兴讲话",就马上感觉到非同小可。林彪讲话的关键内容,夹杂在空话、套话之中,不知内情的人,一听而过毫无印象,而知道内情的人,就体会出林彪的讲话大有深意。

林彪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即宪法问题,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安排。】

林彪在讲话的开始,和往常一样,先说"我完全拥护主席……"之类的套话,然后又特别提到周恩来,说"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议程安排",林彪这里是对周恩来拉拢一下感情。

林彪继续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它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宪法》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

毛主席的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是大量的、 长时期的、重大的事实上所铁一般地证明了的事情。差不多可以说:我们的工作 是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 还是不巩固。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 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其例子是不 胜列举。】

(50)

林彪这些吹捧毛泽东的套话,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这么说了, 这时已没有新意。林彪接下去的话,才是他通篇讲话的关键。林彪说:

【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看法。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天才的。马克思讲了天才,列宁也讲了天才。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延安的"七大"就提出来了的。当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

不知道高层内情的人,对林彪的这些话感觉不到什么;可是知道高层内情的人,就明白林彪这样说,简直是对毛泽东"挑战"了。就在四个月前的 1970 年 4 月,毛泽东审阅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时,亲笔删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等几句话,并做批示说:"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毛泽东等于是用批示向林彪质

问说: "我已经讲过一百次了, 你为什么不听?你是什么动机?"

7月18日,周恩来在修改宪法小组会上说:【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一进北大厅,主席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据周恩来说,毛泽东是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话的,林彪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尽管林彪早已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但林彪在这里还是又搬出被毛泽东删掉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并说"我有一点看法"。林彪不仅不同意毛泽东的话,而且明确说"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等于是说毛泽东的意见"不妥",并公开坚持自己与毛泽东不同的观点。

(51)

林彪说的"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林彪的这句话,几乎就是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了。据参会的邱会作回忆说:"今天开会的座位,张春桥坐在我的左边,我们紧挨着。林总评论宪法时,张春桥总是张开口,无声笑着,一个字也没有记录。当林总讲到'同志们必须记住……'时,张春桥有些敏感,立即紧张起来,他越听越不是滋味,沉默起来,拼命做记录。林总讲完话之后,他掏出香烟,自己没有抽,第一支先给了我。他的手都有点发抖,拿着烟对我说:'老邱抽烟'。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递给我香烟。

我有点好笑,我和张春桥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这虽是小小的举动,但也可以 看出张春桥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做贼心虚。"

林彪继续讲话说:【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指毛泽东的三篇短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不起大的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现在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创造的。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

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创造的,毛主席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因为他们不能对于现在的新问题做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

这里,林彪再次强调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在前面一个问题上,林彪强调毛泽东是"天才",这两个问题加起来,就是强调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这句话正是林彪最具代表性的话。 林彪最后说:

【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林彪这里所谓的"深思",其实是暗示毛泽东要"深思"。林彪说"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如果不"深思",就"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一声号令发下去,那么整个事情就会"改变面貌",林彪一连重复说了三次"改变面貌"。改变什么面貌呢?这就是林彪强烈建议毛泽东"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认真思考一下。

毛泽东并未认真思考林彪"改变面貌"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果然一年之后, 使中国"改变面貌"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

林彪讲完话之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般中央委员,只是对林彪这位 "副统帅"进行礼仪性的热烈鼓掌,而知道内情的人,鼓掌的意义又另有不同。

据邱会作回忆说:【林彪结束的话声刚落,全场爆以热烈地掌声。坐在主席 台下第一排的许世友、陈锡联竟跑上前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这时叶 帅和陈老总也起身和林彪握手。林彪为了表示尊重,蹲在台子上和两个老帅说了 几句话。】

吴法宪也回忆说:【林彪讲完话,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 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 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 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 动。"】

开幕式的原定日程是: 周恩来做有关经济计划的讲话, 康生做有关修改宪法的讲话。插入了林彪的讲话之后, 接下来应该轮到周恩来讲话。但周恩来却说: "计划问题有本子, 材料都有, 我就不讲了。"

周恩来不讲话,就轮到康生讲话。关于康生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写道:【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康生说:"刚才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讲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康生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 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 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

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参会者进一步点明了 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主席去开会,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53)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林彪的这个讲话,事先对他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也保密。据邱会作回忆说:【林总的讲话,是批评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我们是完全拥护的。但这次林总讲话,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我和李作鹏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李作鹏问:"老邱怎么样呀?(指林总的讲话)"

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

李作鹏说:"是呀,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

晚饭后八时许,我同北京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拿起话筒就问:"山上的热闹,你知道了吗?"

黄永胜说:"刚才,吴胖子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说了, 真高兴啊!晚上还多吃了一碗饭。"我们在电话上谈笑了一阵,就挂电话了。】

在林彪的"四大金刚"中,黄永胜和吴法宪的地位比李作鹏和邱会作高,因为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是副组长,而李作鹏和邱会作只是组员。这次黄永胜在北京留守,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所以李作鹏和邱会作就怀疑,林彪的讲话事先通知了吴法宪,而没有通知他们两人,所以感到有被疏远的不满。

其实林彪也没有事先通知吴法宪。吴法宪三人上庐山之后,去林彪住处拜访一次,但林彪并没有亲自见他们。据邱会作回忆说:【8月21日,我们在山上住下之后,各方面都感到很舒适。晚上无事,我和李作鹏来到吴法宪的住处吹牛皮,我们三人吹了一会,就一起散步去看林总。我们是九点以后才去的,因为林总早休息了,就没有去打扰,叶群接待了我们。这次是礼节性拜访,我们在那里闲谈到次日一时左右回来的。

叶群和我们一起,在一个不大的客厅里谈起来了。叶群说:"我们 20 日从 北戴河来,比你们早一天到。从准备好的文件来看,这次会议没有什么重要的工 作要做。我们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下,要利用这个好机会,看一下庐山,我可以当 个导游。"

我们当场还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四点一起游仙人洞。临走时,在叶群的会客室里,叶、吴、李、邱挤在一个长沙发上,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后来也成

为罪证)】

(54)

另据吴法宪回忆说:【做完这一切工作,我又去看望了林彪。在林彪的住处, 我见到了林立果。叶群看我有点意外,便对我解释说:"孩子没来过庐山,上山 来看看。"

我当时对这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林彪的儿子到处跑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接着叶群又对我说:"这次开会还带来了一些书,如果他们还要争论,就到我这里来找语录。"

叶群还告诉我:"明天下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

我在林彪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据邱会作和吴法宪回忆,林彪在大会开幕之前,并未单独与他们见面。叶群与吴法宪等三人多次谈话,但从未谈到林彪要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之事。甚至在前一天,叶群还对吴法宪说:林彪不准备讲话了。

林彪之所以要对他的亲信"保密",是因为林彪要把这次讲话,作为一个"突然袭击",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林彪事先对吴法宪等人说他要讲话,而吴法宪等人的"嘴"也不是那么严,万一消息透露出去,毛泽东事先知道了林彪要讲话,那么毛泽东就会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这样一来,林彪的"突然袭击"就很可能失效或落空。因此,林彪为了真正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就连他最为信任的"四大金刚"也保密了。

另有一种说法,说林彪在讲话前一天的8月22日晚上,曾经与陈伯达谈过话。这种说法主要来自邱会作的回忆,但陈伯达本人否认。邱会作回忆说:【据陈伯达讲,8月22日晚,他到了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会上讲话。陈

伯达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国家长期处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极为不利的,会承受不起。陈伯达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

林彪没有对陈伯达表态,林彪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一下。"

实际上,我认为陈伯达还是把林彪说动了。事前,吴法宪向林彪报告了他与张春桥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争论,也是促使林彪要讲话的原因。】

此外,叶永烈写的《陈伯达传》中,也提到陈伯达与林彪在庐山上频繁接触。 《陈伯达传》写道:【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常委会,毛、林、 周、陈、康相聚。林彪又一次提出在宪法中要有国家主席的条文,遭到毛泽东当 面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没有表示要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讲话。

(55)

政治局常委会结束之后,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因为许多机密要事在电话中 谈甚为不便,陈伯达与林彪的私下接触变得异常频繁。九届二中全会定于23日 下午3时举行开幕式,23日上午,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

从各种情况来分析,我们认为陈伯达与林彪在庐山上进行频繁接触,并不符合常理。以前陈伯达去林彪处"看电影",还怕别人看见,悄悄地去。这次上庐山,陈伯达如果公开频繁去林彪那里,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特别是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这些是陈伯达要避开的。

再说,林彪也知道陈伯达是一个迂腐的"书生",在政治斗争方面,肯定不能指望陈伯达会有什么"高见"。因此,林彪与陈伯达在庐山上密谈和密谋,完

全就是毫无必要的。既然是毫无必要的事情, 林彪自然也就不会与陈伯达频繁来往, 引人注目, 授人口实。

那为什么邱会作声称"据陈伯达讲……"呢?大概他只是听到别人的传闻, 而非陈伯达亲口讲的。陈伯达本人回忆说:【叶群到我那里只一次,她说的话, 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意是:江青说过,毛主席还在,林彪如果当国家主席,也 不好。

有一回,周总理来电话说:"我还未见到毛主席。不过,有些人主张还要国家主席,你是否准备一个条文,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周总理给我打电话的事,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会上批我批得那样厉害,我一说,事情就会牵连到周总理。有许多事,我都是一个人吞下了。】

林彪这个"突然袭击"的讲话,果然让毛泽东始料未及,毛泽东一时间心情 很不好。林彪这时还要乘胜追击,再给毛泽东一个重手"追击",迫使毛泽东同 意"设国家主席"。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这也是 林彪的胜利。这次林彪发动"追击",就要动用他的亲信了。据吴法宪回忆说:

【8月23日下午,叶群又叫我、李作鹏和邱会作到她那里去,说要商量一下林彪讲话以后的事情。叶群提出:

第一、我们几个人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

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 文元也一律不点名。

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

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

第五、我们几个人都在各个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56)

那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 员以外,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按照惯例,毛泽东和 林彪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进行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决定一共分为六组,按地区划分, 政治局委员分别编入各组中。叶群、李作鹏被编入中南组,邱会作被编入西北组, 我则被编入了西南组。

编组问题决定以后,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 我刚说完,陈锡联马上第一个起来响应,说:"好哇,要讨论讨论!"

紧接着, 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 大家的情绪更高了。

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 毛主席报告。"

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 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这样一来,就一下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改为首先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对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晚上九时许,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今天会场的空气与往常不一样了。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后面了,不是同往常一样总是坐在前面;江青和康生虽然坐在前面,但江青也总是吊着一张脸不说话;康生翘着小胡子,不断地抽烟。陈伯达、吴法宪并没有什么具体事,他们却在会场上来回走动。两种不同心情的人,表现出两种情绪,显得格外分明。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明天开小组会的问题,没有别的议程。吴法宪提出: "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各小组应当好好学习讨论。"许世友、陈锡联等人随声附议。

总理说:"这个意见很好,请汪东兴同志报告主席。"

汪东兴接着提出:"各组反映,对林副主席的讲话,不少地方没有听清楚, 他的口音重,要求重放录音。"

总理同样简单地对汪东兴说:"此事,也请报告主席。"

总理对着张春桥说:"宪法草稿,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 张春桥急忙回答说:"现成的,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没有更多的内容,自然散得很早。散会后,我和李作鹏示意吴法宪到叶群那里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吴法宪又说请"老夫子"(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不久,陈伯达到了吴法宪的住处。我们听陈、吴谈话,主要是陈伯达谈话,一直谈到 24 日凌晨三时才散伙。】

(57)

8月24日上午,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改变会议的原定日程,在 庐山礼堂里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一连放了两遍。毛泽东同意改变会议的日程,专 门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吗?对此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周恩来直接做出的指示, 事后才向毛泽东汇报;第二种说法是周恩来事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同意 放林彪的录音。

支持第二种说法的,多半是泛泛地说"毛泽东同意放林彪的录音",但没有给出特别的证据。而支持第一种说法的证据较多,比如吴法宪回忆说:【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也显

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

汪东兴也回忆说:【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 24 日上午全体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

前面提到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杨福云也回忆说:【23 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我们都没有睡,等着作记录的李鑫回来。李鑫回得比较晚,他告诉我们:吴法宪提出明天上午要全体中央委员再听一次林彪讲话录音,进一步领会林彪讲话的精神,再进行讨论。主持会议的周总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好反对,就这样定了:明天上午听录音,下午开始讨论林彪讲话。】

《周恩来年谱》也记载:【8月23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吴 法宪提出:明天全会各小组要听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要学习讨论林彪讲 话。政治局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

上述材料,特别是严谨的《周恩来年谱》指出"政治局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 而没有说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8月24日上午全体委员听林彪讲话录 音,是周恩来在23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当场拍板决定的。这件事周恩来事 后才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做出的这个决定,直接影响了庐山会议的进程。

如果周恩来不附和吴法宪的建议,不改变会议日程去讨论林彪讲话,那么庐山会议将完全是另外一个结果。或者,周恩来当时不做决定,第二天向毛泽东汇报和商议怎样处理林彪的讲话,那么庐山会议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显然,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表现出举足轻重的角色。

周恩来对林彪8月23日讲话的意图,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周恩来明白林彪

这是向毛泽东挑战,不仅要当国家主席,而且还要拿掉张春桥,除去危及林彪接 班人地位的危险人物。

(58)

从周恩来的角度来看,林彪当国家主席,拿掉张春桥,对于周恩来这些老干部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所以周恩来在内心中应该是高兴林彪向毛泽东挑战的。

不过周恩来办事还是很沉稳,他在林彪讲话后,并没有发表大会讲话,更没有像康生那样在大会上公开支持林彪。最重要的是,周恩来要考虑到党的团结,他希望林彪与毛泽东"适当"地斗争一下,但又不能让这场斗争走得太远,特别是不能让斗争上升到危及党分裂的情况。因此,周恩来在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问题上,态度是"有喜有忧",徘徊不定。

尽管周恩来没有公开支持林彪,但他还是表现出对林彪的偏向性,在关键的时刻,做出决定在大会上学习和讨论林彪的讲话。关于放林彪录音的过程,汪东兴回忆说:【8月24日上午8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我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11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 就印发吧!"

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

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毛泽东之所以同意印发林彪的讲话,因为这是"先斩后奏",毛泽东没办法 再反对了。在此之前,林彪的讲话录音已经播放了多次,大家都说很好,毛泽东 也没有理由反对印发。如果毛泽东硬要反对印发林彪的讲话,那就是公开反对林 彪了,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要公开反对林彪,所以也就只能同意印发林彪的讲话 了。

林彪的讲话还没有印出来,在听完林彪讲话录音的当天下午,各大组就开始 讨论林彪的讲话了。这次庐山会议,按地区分为六大组,即华北组、东北组、华 东组、中南组、西北组、西南组,进行分组讨论。这里先介绍华东组的情况,据 参加这次会议的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说:

【8月24日上午,全体中央委员又集中到大礼堂,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 反复听了两遍。中央委员们觉得这个讲话既然如此重要,又朦朦胧胧觉得讲话内 容若有所指,份量很重。可是,讲话中没有点名,使大家疑惑丛生,说不清楚究 竞指的什么人。

(59)

连林彪在浙江和上海的心腹陈励耘和王维国,也吃不准林彪讲话具体指的是谁。他们去找吴法宪,吴法宪诡秘地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陈励転和王维国这才心领神会。可是,吴法宪关照说:"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说。叶群同志讲过:不能点名。只能不点名地点名。"

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这个组没有林彪的几员大将当"宣讲员",张春桥倒来参加了。张春桥换下从文革开始就穿着的军装,改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中山装,含笑和大家打招呼。大多数人因为不知道林彪讲话指的就是他,所以对他

很是客气。

许世友掌握的华东组讨论,比较平稳。一是因为华东组没有林彪的大将当"宣讲员",二是陈励耘和王维国虽然知道了底细也不敢轻举妄动,至于其它中央委员们都感到吃不准,只能泛泛而谈。

8月24日晚上,华东组讨论到一半的时候,江青来了。江青没有固定的小组,而是任她选择。许世友热情地招呼江青坐在前排沙发里,这时,这次庐山会议的主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开腔了,他当着江青的面,提出宪法里还是应该"设国家主席"。

这时,有一些人附和程世清的意见。许世友一向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也开口说:"我看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

江青看到有不少人要求设国家主席,就插话说:"我觉得,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是尊重主席的意见吧!"

浙江的陈励耘发言了:"不设国家主席,群众从感情上通不过。"

江青答:"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

程世清的讲话有些不太客气: "毛主席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嘛!"

江青扶了扶眼镜,朝会场四周看了一眼,慢条斯理向众人交底:"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主席不但高瞻远瞩,而且深谋远虑。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

听了江青的讲话,大多数人不说话了,有些人还在嘀咕。这时,江青侧过脸 去对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许世友说:"许师傅,你来帮帮我的忙嘛。" 江青称许世友为"许师傅",是因为许世友年轻时在少林寺当过和尚。许世友是个爽快人,有啥说啥,他看时间不早了,就宣布散会:"好了,好了,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别的事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件事情上我思想还是不通。"

张春桥在华东组的讨论会上,坐着静听,没有发言。整个华东组第一次讨论 的气氛,由于没有人煽风点火,比较平和,没有剑拔弩张的景象。】

(60)

接着介绍中南组的情况。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杨福云回忆说:【我分在中南组旁听。会议进行了一段时间,李作鹏、叶群进来了。他们坐下后,召集人请他们讲话。李作鹏一开口,就带着浓重的火药味。

李作鹏说:"宪法修改草案是经过斗争产生的,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

李作鹏一说这些,会场气氛马上变得紧张。我一时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 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正紧张思考的时候,李作鹏越说越言辞激烈,他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

我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第一次参加中央全会就面对这样尖锐的问题,确实有点紧张。李作鹏继续说:"有人连'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李作鹏发言完,叶群接着讲,她说:"宪法修改草案是经过吴法宪、李作鹏 同志与'他们'进行了长期斗争的结果。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 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

叶群引了许多条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称天才"的语录,称毛主席为天才是有根据的。叶群也用了林彪好几段讲天才的话,然后煽动说:"这些话全国、全世界都知道,现在有人反对,我们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叶群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 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 脖子上也不收回!"说着,叶群掉下了眼泪。

叶群又举了不少"事实",说明有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她说: "有人反对学习《老三篇》,有人下命令收回《毛主席语录》,有人反对举《毛主席语录》,有人反对挂《毛主席语录》,把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的《毛主席语录》都摘下来了。"

这时有人插话:"真是反革命!"

叶群讲这些"事实"时,是一条一条说明的,所以发言时间很长,讲了一个 多小时。叶群讲完,就散会,已过了吃晚饭时间。】

(61)

关于西北组的情况,邱会作回忆说:【我下午去参加西北组的小组会。开会前,吴法宪打来电话说:"姓汪的来电话说,他已经发言了,叫我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他军队同志发言。今天发言表示你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的发言很重要,要尽快发言。"

我说:"姓汪的都指挥到我们头上了。"

吴法宪说:"人家也是好心嘛!"

我说:"对对对,知道了。"

24 日下午,在西北小组会上,我第四个发言。我的发言主要是三个内容: 一是,热烈拥护林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二是,严厉谴责反毛主席的人;三是, 宣读了陈伯达搞的马列论天才的《语录》。

我发言的具体内容并不很多,时间也不长,我的发言主要是讲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我说:"林副主席说过'毛主席是天才,是全面继承,捍卫……'为什么在这次会上林副主席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要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利用毛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

我发言之后, 康生、董必武、粟裕、邓颖超等都做了发言。

康生说:"我同意邱副总长的发言,他用的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态度。这是很好的态度,对问题应当有研究的精神。我看他马列主义学得比较好。"

康生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三种人:一种是学习好、用得好,林副主席是榜样;一种是学习还可以,但用得不好,我就属于这种人;一种是不好好学习的,这种人不是个别人,但也不是多数人。"

康生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

邓颖超说:"我同邱会作同志长征就在一起,他是一个很使人喜爱的干部, 很多同志就很喜爱他。他刚才的发言,是很能启发人的。"

邓颖超在发言中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她还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邓颖超还争功似的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

大家差不多都发了言后,邓颖超说:"我们都发言了。现在我们再用全组通过的办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小组的态度就更加鲜明了。"

邓颖超提议后,立即一致通过。由邓颖超、粟裕牵头,集体通过了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意见。

(62)

晚饭后,政治局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我在会场的电话室门口与总理相遇, 总理笑着对我说:"你下午很有力量!"

我问:"你怎么知道?"

总理说:"跟你一组的人(指邓颖超)同我说的。她还问我说,邱的发言,很显然是话中还有话的,话并没有说完,是怎么一回事?我叫她独立思考。"

我说:"这次林总的讲话,我事先确实不知道,因此没有向总理汇报。我要有什么打算,肯定会事先向总理报告,并得到总理的指示。"

总理说:"这次发生的问题,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这点,我不会有任何怀疑的。现在事情才开始。"

我说:"我一定听总理的话!"

对林彪的讲话,我确实是不知原委的;在会前,连林彪要在全会上讲话,我也是不知道的。】

关于西南组的情况,吴法宪回忆说:【8月24日下午,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 参加这一组讨论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们都 坐在后面。

开始时,发言的同志只是一般地谈谈,我是第四个发言的。我在发言中首先

表示: "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 既讲了毛主席是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 中锻炼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念了一条陈伯达搞出来的马克思关于论天才的"语录",说明否认天才的存在是错误的。接下来我又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这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还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我说:"这个风不可刮,我们中央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要起示范作用。"

我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这时我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我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我不好说,只悄悄告诉了张国华和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并告诉他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后来李先念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了他。李先念听说是张春桥,就说:"噢, 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

以后大家继续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朱德和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下午小组会开得也一般,比较平静。

傍晚,我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 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 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这次会议上讨论最激烈的,是陈伯达所在的华北组。关于华北组的情况,下 面重点介绍。

(63)

陈伯达在8月24日的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拥护林彪的立场鲜明发言。 关于这件事,陈伯达本人回忆说:【我是属于华北组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我也预先简单写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样的句子不是我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这句话是汪东兴说的。】

陈伯达不愿意具体讲那次会议的情况, 汪东兴则回忆说:【8月24日下午3点钟, 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陈伯达到会场时, 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 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 请陈伯达先讲。

当时我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讲的—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的同志替他作翻译。陈伯达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

下面根据《九届二中全会简报》登载陈伯达的讲话,摘要陈伯达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 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 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 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陈伯达先吹捧一下林彪的讲话,陈伯达不仅吹捧林彪,还学着林彪讲话的口气说:"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陈伯达不愧是搞政治宣传的高手,懂得怎样抓住人的心,他在吹捧林彪之后, 马上把话题一转说:这次在宪法中肯定毛泽东的地位,是"经过很多斗争的结果"。 这样一来,就把众人的注意力吸引住了,人们开始纷纷猜想:这是和谁在斗争呢? 陈伯达留下这个让众人猜的谜语,继续说: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这里我引用林副主席以下三段话:

林副主席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 和毛泽东同志。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观一个。 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林副主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 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64)

陈伯达引用的林彪三段"称天才"讲话,都是文革以来中央党报经常发表, 大标语经常张贴的内容,大家对这些话都熟得不能再熟,已经被当作是经典语言 了。可是陈伯达又把话题一转,说:"现在居然有人反对林彪的这些经典语言"。 这样一来,人们就更吃惊了,纷纷猜想:是什么人这么大胆,竟敢反对林彪的经

典语言?

比起吴法宪等人的讲话,陈伯达讲话的条理性和逻辑性要清楚得多,宣传煽动力也大得多。陈伯达接着说:

【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是宣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竟有人说 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这里提出这个问题。】

陈伯达把问题更提升一步,林彪的这些经典语言,不仅是林彪个人的讲话,也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也就是说,林彪的经典语言代表了党中央的精神。 反对林彪的经典语言,不仅是反林彪,还是反党中央,而且进一步又提升到反对 文化大革命的高度。

从陈伯达"上纲上线"的能力可见,陈伯达写政治文章,攻击对手的能力是 很强的。陈伯达继续说:

【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

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一段话,证明毛泽东本人也承认天才。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做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陈伯达继续从"理论"上证明,林彪提出的"天才论"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甚至提出毛泽东本人,也是承认天才的。

(65)

这样一来,林彪的"天才论"就成了有理论依据的东西了。陈伯达说"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这句话甚至有影射毛泽东的味道。

陈伯达最后说:【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消。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 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陈伯达不愧为毛泽东看中的政治秘书,写政治檄文,搞政治宣传的能力超强。 尽管陈伯达是为林彪的"天才论"辩护,但他辩护的思路和脉络,则是陈伯达自 己独立思考出来的,是一篇很有宣传力和煽动性的演讲。以前陈伯达总是淹没在 毛泽东的强大光环之下,人们看不到陈伯达的真面目。陈伯达的庐山讲话,是陈 伯达唯一一次不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不经过毛泽东批准的"独立"讲话,也算是 陈伯达展露了一下他的"天才"吧。 陈伯达讲完之后,汪东兴接着讲话。这里摘要《九届二中全会简报》登载的 汪东兴讲话。汪东兴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是活学活 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 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 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汪东兴的讲话,不像陈伯达的讲话那么具有理论性,但他的立场和态度却是 非常鲜明的。汪东兴说:"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 他拼到底"这样的话,就挑明了林彪昨天的讲话,其实是代表着一场政治斗争。

汪东兴继续说:【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 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 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 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 影响是巨大的。

(66)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

装起来的人民, 可以识破这些坏蛋。

(伯达同志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了回来。这个权如果 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 席为副的党中央。】

汪东兴这些话,更加挑明这次斗争的性质,又是一次"夺权斗争"。汪东兴 挑明说:"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汪东兴这里已经不点名 地把张春桥说成是"坏蛋",并声称"我们不甘心权被张春桥夺走。"由此可见, 汪东兴反对张春桥和支持林彪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华北组的会场,被陈伯达和汪东兴两个人的讲话一煽动,人们情绪一下子就爆发起来。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德回忆说:【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还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

陈伯达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

当时的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样写道:

【华北组 24 日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 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马福全、钱学森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然有人妄图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

(67)

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 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 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 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

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毛主席才 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 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我们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在宪法上写上。】

由《第六号简报》可见,当时人们对陈伯达和汪东兴讲话的反响是非常大的,《简报》甚至提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等极端主张,这不仅给张春桥等人造成极大的压力,更给毛泽东造成巨大的压力。

汪东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汪东兴本人回忆说:【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 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 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

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汪东兴的解释,显然很难让人信服。关于汪东兴的为什么说这些话,我们放 在后面分析。

(68)

在华北组的讨论中,还有一个人的发言值得注意,他就是陈毅。本来陈毅在"九大"之后,基本上就坐冷板凳了。陈毅名义上还是外交部长,但实际上已经不管事,由副部长乔冠华代理外交部长。陈毅虽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但还是中央委员,所以也来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陈毅的政治嗅觉本来就是很敏感的,他听了林彪的大会讲话,再听陈伯达和 汪东兴在华北组的讲话,马上明白这次是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干将张春桥开炮。 在"九大"时,陈毅作为上海代表,被张春桥等上海帮整得够呛,现在看到林彪 集团要对张春桥开刀,自然是大为高兴。陈毅这个人的性格,在这种时刻是憋不 住的,马上跳出来发言,支持陈伯达和汪东兴。

陈毅听完陈伯达的发言后,说:"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我陈毅是有反 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他们是什 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 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陈毅还说:"我虽然身患重病,也要手扶肚子同他们斗争。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九大以后,我是被打进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当陈毅听完汪东兴的讲话后,又发言说:"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完全否认革命的历史,只有帝、修、反的走狗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

陈毅的发言,在华北组并不是最激烈的,但因为陈毅的身份特殊,所以后来被扣上"二陈合流"的帽子,又被批判了一次。

在庐山会议的六个组中,前面五个组的情况大致介绍了,还有一个组,就是

周恩来所在的东北组。一般周恩来坐镇的组,气氛都比较平静。不过周恩来在东北组的发言中,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表示同意林彪的"天才论"。不过周恩来的话说得很巧妙,他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不过周恩来又说:"过去犯过错误的不要再犯,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把经验教训告诉青年人。"这样一来,周恩来就表现出一种比较中立的姿态,而不是向林彪一边倒。

这次林彪"炮打"张春桥,不但得到周恩来派系的支持,就是军队中非林彪派系的将军,也支持"炮打"张春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这三位大军区的司令员,也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坚决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69)

许世友还直接地点了张春桥的名,并提议把张春桥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三年。 许世友这些军队高官,在文革夺权运动时,被造反派整的够呛,所以他们对张春 桥等造反派出身的人满腔怨恨。这次看到林彪带头整张春桥,当然是非常高兴, 立即响应。

邱会作回忆说:【8月29日上午,李作鹏和我在宿舍闲谈,叶群也来了。叶群说:她拾到了三个"险球"。这三个"险球"是指周总理转给叶群的三封信,并附有条子说:"此件存你处,不必再呈、转了。"

这三封信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写给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信的内容是打击张春桥的。许世友提出:要把张春桥下放农村改造三年;杨得志提出要公开批判张春桥;韩先楚原来没有写信,听许世友一讲,他立即响应,说:"我也给这个鳝鱼眼(指张春桥)补一枪。"

叶群对我们说:"与此事不搭杠的老同志,我一定要保他们。"

这样的信不转到毛主席那里去,不去火上加油,只有周总理能够做到,同时 也只有总理能够把事情向着好的方向解决处理。】

邱会作说周恩来的好话,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三封信是写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三人的,周恩来看过后,转送林彪;而林彪看过后,就应该转送毛泽东。可是在8月29日的时候,毛泽东保张春桥,明批陈伯达,暗批林彪的事情,已经很明确了。如果毛泽东看到林彪转来的三封信,而这三封信是支持林彪和反对张春桥的信,必然要使毛泽东生气,给毛泽东火上浇油,甚至有可能误认为林彪转来这些信的用意,是继续挑战。相反,如果林彪压下这三封信不转给毛泽东,又是违反纪律的,传出去的话,就更说不清了。

就在林彪左右为难的时候,周恩来帮林彪下台,主动提出这三封信不必再转给毛泽东了,存放在林彪那里就行。因为这三封信是写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三人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周恩来和林彪两人知道,只要周恩来不说,毛泽东就不会知道。所以周恩来巧妙地用这些信,向林彪示好,继续团结林彪。

8月25日上午,全会印发了华北组的发言简报,即《六号简报》,造成极大的反响。在此之前,其他分组的人隐约听说华北组有激烈的发言,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8月25日上午他们看到华北组的《六号简报》,火又进一步烧起来。据徐景贤回忆说:

【《六号简报》一出,天下果真大乱。8月25日清早,王洪文还没有起床, 我和马天水正在吃早餐,就收到了会议秘书组送来的两份《六号简报》。

我看了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大吃一惊,连早饭都无心吃了,马上拿了《六号简报》,奔到王洪文住的小别墅,把他叫醒。

(70)

看过《六号简报》,我们两个人议论开了。王洪文和我越谈越觉得无所适从, 疑窦丛生,上海小组该怎么表态才好呢?

我们想找张春桥,我拎起电话,要总机接到张春桥住的那幢别墅,接电话的是严秘书,他说张春桥还没有起床。我问他看到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没有,他说没有收到。我就在电话里把《六号简报》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严秘书,让他叫醒张春桥,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搁下电话,过了片刻,电话铃响了,还是严秘书打来的,他说已经报告了张春桥,张春桥要他马上来拿《简报》。电话挂断不久,严秘书就气喘吁吁地爬坡上山,把我手里的一份《六号简报》取走了。

王洪文和我商量,赶紧把上海的中央委员们全部找来,紧急讨论如何表态。 小组的成员们没有到齐,王洪文和我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朝坡下望去,只见张 春桥从他的住所急匆匆走出来,几乎是同时,左首别墅里的姚文元也出了他的屋 门,看来他们事先已经电话联系过了。他们两个人见了面,不说一句话,就一起 坐进了早已停在院子门外的一辆轿车里,轿车朝着江青的住所疾驰而去。

上海的中央委员们齐集在王洪文的住所,大家翻看着《六号简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家议论后认为,整个上海小组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态度。对于林彪的讲话,上海小组讨论后一致表态:应该坚决拥护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大家觉得还是应当听从毛主席的指示,以不设国家主席为准。至于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因为不了解情况,上海小组决定暂不表态。讨论的意见基本趋向一致以后,大家推举由我执笔起草一份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

下午,华东组的会场设在庐山图书馆旁边的一幢小楼里,场内的气氛异常。 其它省、市的中央委员们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一见上海小组的人员进场, 马上停止议论,用一种沉默的目光打量着上海的中央委员们。等到张春桥进场的 时候,会场里寂无声息,空气简直像冻结了似的。

张春桥还是像上次来华东组参加讨论时一样,面带微笑走进来,但这回根本 没有人招呼他,也没有人回他一个笑脸。张春桥显得十分尴尬,讪讪地找了一个 单人沙发坐下,连开水也没有人给他倒一杯。

8月25日下午两点,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宣布讨论开始。很多人的手里都拿着那份《六号简报》,王维国(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被认为是林彪死党)抢先第一个发言。王维国今天在发言中,先是大肆赞扬林彪的讲话如何重要,为全会指明了方向,接着声称"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在王维发言时,张春桥听得非常仔细,板着面孔不动声色。

(71)

王维国打了头阵,华东组发言的调子越来越高,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热情地讴歌"毛主席是天才",而激情地斥责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痛批"埋藏在中央的定时炸弹"妄图"篡党夺权","罪该万死",必须把他"揪出来"。有的人发言时拿着《六号简报》,直接引用陈伯达等人的讲话,可是所有的人发言时,都没有公开点名。

郭沫若副委员长作为中央委员,也被编入华东组参加讨论。郭老耳朵重听,带了一副助听器,困难地听着别人发言,听到一半,他也要求发言了:"我是一个懵懂派,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看了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又听了刚才几位的发言,才知道全会上出了大事……"其实郭沫若还是没有搞清楚究

竟出了什么事。

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被认为是林彪死党)座位的位置,正好在张春桥的左侧,两个人的座位是九十度直角形。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央委员在慷慨激昂地发言,说是"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陈励耘听到这里,马上打断那个人的发言,侧过脸去冲着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

全场为之震惊。张春桥的脸色非常难看,他过去总是"揪"别人的,现在轮到自己在中央全会上被别人"揪"了,心头该是什么滋味。但张春桥强作镇静,也不看陈励耘一眼,把眼光落在沙发前面的地毯上,只是猛吸香烟。

会场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浙江省的一个穿着海军军装的候补中央委员, 索性站了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全场随之高呼,声震屋宇,呼声一直传到外边的街道上去。】

这些批张春桥的中央委员们还不知道,就在这天上午,张春桥已经到毛泽东 那里去"告御状"了。

在8月24日这天,毛泽东没有出门,也没有参加会议,然而各种消息照样源源不断传到毛泽东那里。第一,毛泽东受到林彪的突然袭击,一时间还没有想好反击的办法;第二,毛泽东摸不清林彪下一步要干什么,所以索性就采用"静观其变"的态度。

8月25日这天,毛泽东本来还想继续"静观其变",可是张春桥等人坐不住了,8月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去毛泽东那里"告状"。

关于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告状之事, 汪东兴说:【8月25日吃中午饭时, 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 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

毛主席问我: "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 影响很大。"

(72)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我还派你回 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 国家主席。"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 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似乎是故意避开提及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告状之事。不过吴法宪的回忆中提及了此时,吴法宪说:【8月25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

主席单独见了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 '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

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说了些什么, 汪东兴不知道, 但汪东兴已把 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汪东兴给我打电话, 要我沉住气。

我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 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邱会作关于此事的回忆更详细一些。邱会作说:【汪东兴这个人,"九大"以后经常给军委办事组打电话,跟叶群就更紧密了。上了庐山以后,他天天给吴法宪打电话,甚至一天不止一次,一般情况下由吴法宪再转告我们。

汪东兴告诉我们说: "看到全会上各组的气氛,他们真害怕了。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毛主席的住处,她是带着张、姚去向毛主席告状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了她的车,江青说: '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和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 '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他们表面上是对着春桥,实际上是对着你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

汪东兴接着幸灾乐祸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毛主席对他们说:'对开会的事,中央就要开常委会讨论了。'"

(73)

汪东兴还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开会,也是主席让大家给他们一条生路。"

汪东兴还专门说:"主席已采取措施,今后我们暂停电话联系。你们之间也少打电话,有话当面说。"

汪东兴还说:"许世定要我担任国家主席?我的手都是冰冷的(伸出手去给许摸),我每天能睡着觉的时间很少,我不能担任国家主席那个职务。国家主席由老年人、年轻人担任都可以,你许世友也可以,你许世友担任国家主席就足足有余。'

许世友说:'我听毛主席的话,我再不提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了。'

主席笑着说: '有希望!只要对你许世友的工作做通了,其余的人就没有不通的。'"】

对张春桥他们告状这件事,陈伯达回忆说:【江青、张春桥见了《六号简报》, 开始似乎有点恐慌,因为他们惯于"揪人",现在却有人也想把他们"揪出来"。 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我的记忆中,江、张都未到,因为他们先向毛主席告状, 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而那位提出"揪出来"的人(汪东兴),也没有事。 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参加过毛主席那里的会。

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我去见过周恩来同志,记得他说:"江青、张春桥是 先到我这里要谈话的,还没有见面,他们却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关于这个情节,江青却有不同说法,她说:【25日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 找我,他带来那份《六号简报》。我这里倒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呐。看 完《六号简报》,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 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据《毛泽东传》记述:【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

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下午,毛泽 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先分 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

随后,毛泽东向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毛泽东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来他这里告状之后,马上公开表明支持张春桥,是 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下面将重点分析这个问题。

(74)

这次带头反张春桥的林彪、陈伯达、汪东兴,本来都是毛泽东派系的人。林 彪是毛泽东的爱将,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笔杆子,汪东兴更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他 们都是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的人。为了表述方便,这里且称他们为"旧党";文革 开始后,毛泽东身边又异军突起一批新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 组的人,这里称他们为"新党"。

毛泽东对"新党"的热情,明显高于对"旧党"的热情,这就让"旧党"们感到被冷落,不再被重视,用过去的老话,这种情况叫做"失宠"。因此,"旧党"就自然而然地对"新党"非常不满,想要把"新党"排挤出去。比如陈伯达,以前毛泽东的重要文件都由他来起草,可是张春桥来了之后,毛泽东就把重要文件交给张春桥起草了,这使陈伯达不免感到"失宠",有机会就攻击张春桥。

据邱会作回忆说:【8月23日晚,吴法宪请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我们 听陈伯达和吴法宪谈话,主要是陈伯达谈的。从陈伯达谈话的内容和口气来看, 陈伯达对张春桥不仅是贬低,简直是到了鄙视的地步,可见陈伯达对张春桥的仇 恨是很深的。

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文章也不行。自己不行,还好表现自己。如果他写了一篇什么东西,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一通。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在上海请人搞的,在上海那个地方搞文字吃饭的人有的是。张春桥参加'九大'修改党章,就到处吹嘘自己。我写的文章很多,我从来都不说。"

此外,陈伯达还讲了张春桥的许多坏话,有的我就记不起来了。我们大家在 一起听陈伯达讲到 24 日早上 3 时,吃了夜餐。】

林彪对张春桥的戒心,倒不是陈伯达那种"同行是冤家"的心态,而是出于对毛泽东要"换接班人"的担心。很多严肃的研究者,都提到毛泽东跟林彪谈起让张春桥接班的事情,一些人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这个问题。比如《吴法宪回忆》中就说:【8月29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根据吴法宪的说法,毛泽东对林彪说"对张春桥再观察两年,不行的话把他拿掉",可是如果毛泽东观察了张春桥两年之后,觉得张春桥"行"的话,那会怎么样?那就是毛泽东要交班给张春桥,而不是交班给林彪了。林彪能甘愿屈居于张春桥之下,甘愿接受张春桥的领导吗?

(75)

其实林彪为什么要"造反"的心态,在后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倒是讲得很明白。《五七一纪要》中这样写道:【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夺权正在进行,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

《五七一纪要》明确说"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这里的"对方",当然就 是毛泽东了。这也就是明确指出毛泽东要改变接班人,这是林彪"造反"的关键。

《五七一纪要》还写道:【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五七一纪要》明确说"毛泽东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所谓"安排后事",就是更换接班人。《五七一纪要》又说"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这里的"革命领导权",就是指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地位。也就是说,只要保住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地位,就等于保住了未来的政权。

《五七一纪要》又写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这里所谓的"他们",是指江青集团。也就是说,只要张春桥等江青集团上台,林彪集团就要下台,就要进监狱。因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是势不两立的,不是林彪集团把江青集团吃掉,就是江青集团把林彪集团吃掉。

至于林彪集团的战术,《五七一纪要》中也明确写道:【打着 B-52 的旗号打击 B-52 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先斩 B-52 的局部爪牙,先和 B-52 既成事实,逼迫 B-52 就范,逼宫形式。】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采取的,正式《五七一纪要》中说的这种战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打击毛泽东的力量",先斩张春桥这个"爪牙",逼迫毛泽东就范。

《五七一纪要》又指出他们为什么急于"抢班夺权",《五七一纪要》写道: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了多久,政局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76)

后来林彪的行动,大致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这里所谓的"笔杆子"是指江青集团,而"枪杆子"则是指林彪集团。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来看庐山会议。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论,是因为他看出政局朝着有利于江青集团,而不利于林彪集团的方向发展。关于这点,在庐山会议上,汪东兴发表了一篇明显支持林彪的讲话之后,有人问汪东兴:反对毛主席的人是谁? 汪东兴说:"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压得很厉害呀!"

林彪看来,毛泽东已经是铁了心要换接班人,让张春桥或者其他人接班,政局朝着不利于林彪集团的方向发展。因此林彪越早出手,主动权就越大。林彪认为,如果等到毛泽东一切布置就绪的时候,那就太晚了,只有束手就擒了。在林彪看来,刘少奇的教训就是因为等到毛泽东部署好了之后,不得不束手就擒。所以,林彪要抢在毛泽东还没有布置好之前,抢先下手,打乱毛泽东的部署,争取主动权。这可以说就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的原因。

至于汪东兴,他的动机说与林彪和陈伯达又有不同。1970年汪东兴只有54岁,比陈伯达和林彪的年龄小很多,只比张春桥大一岁。由于汪东兴比毛泽东年轻23岁,尽管他现在是全身心地为毛泽东服务,但汪东兴也不得不考虑,自己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将遇到什么样的局面和结局。所以,毛泽东的接班人是谁,对于汪东兴来说,绝不是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而是关系到自己将来命运和前途的大事。

过去封建王朝的人都知道,储君是不能得罪的。如果得罪了储君,虽说现在 有老皇帝"保"着,还可以平安无事,可是一旦老皇帝过世,新皇帝上台,得罪 了储君的人就必然遭到报复。这样的事情历史上数不胜数,比如在秦国搞变法的 商鞅,老皇帝过世,新皇帝上台,很快就遭到车裂之刑的报复。

汪东兴从近侧看毛泽东,当然能看出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将用江青集团取代林彪集团,这使汪东兴自然产生一种危机感。因为汪东兴与江青的关系一直不好,而与林彪的关系较好。因此,如果是江青集团的张春桥等人接班,那么对于得罪了江青的汪东兴来说,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相反,如果林彪接班的话,汪东兴的下场就好得多。

这样一来, 汪东兴出于对自己的未来命运考虑, 也要尽可能阻止江青集团接班, 这个动机与林彪是一致的。因此, 汪东兴不顾毛泽东的指示, 力助林彪当国家主席, 力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说到底, 还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后路。

(77)

汪东兴本来与张春桥并无个人恩怨,但出于自己将来后路的考虑,汪东兴也 要帮林彪打倒张春桥。

据邱会作回忆说:【汪东兴对我们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主席。张春桥既滑头又胆小,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和伯达他们指挥的。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小组了,不过张春桥、江青还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小组。如果张春桥靠边站了,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毛泽东当然看得出来,汪东兴并不是林彪集团的人,他支持林彪的动机,只不过是出于为自己将来的考虑。毛泽东早就不信任汪东兴了,在"九大"上汪东兴没有进入政治局,就是明显的表现。但毛泽东要撤汪东兴的职,却又是"投鼠忌器"。虽说撤汪东兴的职很简单,但汪东兴兼任着两个至关重要的职务: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如果撤了汪东兴,那么让谁来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呢?

汪东兴在庐山上犯错误之后,毛泽东一度让汪东兴停职反省,当时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暂时接管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暂时接管中央警卫局。杨德中是周恩来的亲信,王良恩则被认为与林彪有说不清的关系。如果汪东兴被正式撤职,那么中央办公厅将由王良恩接管,而中央警卫局则将由杨德中接管。

对于中央办公厅,毛泽东可以让张春桥等人当主任,还能应付过去。而张春桥等文人,因为在军队中没有资历,没有威信,让张春桥接管中央警卫局,肯定是接管不了的。这样的话,打倒汪东兴的代价,就是中央警卫局被杨德中接管,也就是中央警卫局将被周恩来完全控制了。

谁都知道,中央警卫局是"重中之重",汪东兴尽管不让毛泽东满意,但汪东兴至少不是周恩来的人。留着汪东兴,毛泽东还能控制中央警卫局;而打倒汪东兴,毛泽东就将失去对中央警卫局的控制。对于毛泽东来说,从全局的利弊来考虑,显然是保留汪东兴,要比打倒汪东兴好得多。所以,尽管汪东兴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毛泽东还是保留了他。

毛泽东保留汪东兴,并不等于信任汪东兴,更不等于欣赏汪东兴这个人。后 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被打成林彪集团的人,王良恩自杀了,据说王良恩的 死与汪东兴有关。据邱会作回忆说:【我放出来以后,1989年到北京,我的一个知己来看我。他说听吴旭君同志说:"王良恩被逼死后,汪东兴去给毛主席报告,汪东兴离开时,毛主席指着汪东兴的背影说:'这家伙又要了人家一条人命!'"】 (78)

毛泽东上庐山之后,并没有召见任何人。据汪东兴回忆说: "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也就是说,毛泽东在独自一人思考问题。每次毛泽东在大战之前,似乎都要一个人独自思考一番。比如在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独自一人在滴水洞思考了11天之后,才最后做出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所以这次毛泽东在庐山上独自思考了3天,毛泽东冥思苦想的应该是林彪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和林彪因为"设国家主席"的争执,已经使两人的 关系相当紧张了,毛泽东必须把解决林彪问题提到当务之急的议事日程上来。从 毛泽东一贯的作风来看,毛泽东这次在庐山会议上,一定会对林彪有所行动的。 即使是林彪不发表讲话,不揪张春桥,毛泽东也照样会做出一些打击和削弱林彪 势力的动作。

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对林彪有动作了。庐山会议9天前的8月14日,张春桥在修宪小组会上,对着林彪的亲信吴法宪公然说:"天才地······ 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种讽刺。"

"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是林彪写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上的原话,是最为人熟知的林彪语录之一。因此,张春桥说"天才地……是一种讽刺",是非常明显地在讽刺林彪本人。所以吴法宪听到这句话之后,马上跳起来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指谁说的?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

张春桥把这句话说给林彪的亲信吴法宪听,就是要吴法宪把这句话转告到林彪那里。林彪知道,张春桥本人肯定是不敢讽刺自己的,一定是得到毛泽东的授意。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让张春桥讽刺林彪呢?林彪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林彪认为,毛泽东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很可能会利用某种时机,亲自说出"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种讽刺"这样的话。

如果毛泽东亲口说出这样的话,毛泽东的干将们再跟着宣嚷,那么林彪一点 儿反击的余地都没有了,只有认栽。因此,林彪要先发制人,打乱毛泽东的部署, 先攻击张春桥。

林彪明白张春桥说"天才地……是一种讽刺",是代表毛泽东说的,这是毛泽东借张春桥的嘴指桑骂槐地讽刺自己。因此,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也同样是指桑骂槐地批评毛泽东。

对于张春桥来说,一旦他说了"天才地……是一种讽刺"这种讽刺林彪的话,那肯定把林彪彻底得罪了。但张春桥仗着有毛泽东撑腰,以为林彪不敢把自己怎么样。然而,当林彪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时,张春桥有点害怕了。据坐在张春桥身边的邱会作说,张春桥居然神情失措地请他抽烟。

(79)

张春桥的害怕是有道理的。如果林彪要逼毛泽东做出选择:是选择林彪?还是选择张春桥?这时毛泽东有可能选林彪,而抛弃张春桥。这样的事,已经有过王力、关锋等的前车之鉴。在一般人看来,林彪是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战友,而张春桥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如果毛泽东"二选一"的话,肯定要选择林彪的。

基于这样的想法,吴法宪等林彪的亲信,以为张春桥肯定要完蛋。吴法宪回忆说:"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

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对于毛泽东支持张春桥,邱会作也想不通,他说:"毛主席为了一个造反派 张春桥(林彪称之为小记者),竟然打击了跟随他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 身战功、一身枪伤的林彪,究竟是为了什么?"

因此,邱会作甚至怀疑这里面有什么内幕,林彪没有告诉他。邱会作回忆说:

【我从西北小组会场回来后,对庐山会议二十多个小时以来,发生的两次突然变化,完全想不通。我和李作鹏商量,必须再次严肃问一下吴胖子,问他究竟知不知道林总要在开幕式上讲话。如果他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要讲话,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就可能有什么新的内幕。那样,叶群、汪东兴、吴法宪他们就是一伙了,我们就不是林总最信任的人了。

晚上,我和李作鹏一起到吴法宪住处去。对上述问题,我们直截了当地问了吴法宪,他有点莫名其妙。吴法宪说:"我真不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提出张春桥的问题。要是我知道林总要反张春桥,不跟你们说,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我可以给你们立个字据,连我的人格、老婆孩子都列入担保之内。"

吴法宪说得很诚恳,我们认为吴法宪的话是诚实的,我们相信了他的话,也 就放心了。】

一般人都认为毛泽东会舍弃张春桥而要林彪,张春桥当然就更担心了。而且, 毛泽东上庐山后一直独自一人思考,没有召见过江青、张春桥等人,这就更让张 春桥担心了。8月25日张春桥看到《六号简报》之后,感到大事不好,但毛泽 东还是没有召见他们的意思。因此,张春桥就请江青带着他们,作为不速之客, 硬闯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与其说是告状,其实是向毛泽东求救。 张春桥也知道,按照规矩,见毛泽东一定要事先向他的秘书申请,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才能去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非常讨厌别人不请自来,所以硬闯毛泽东那里去告状,弄不好要惹得毛泽东大怒一场,情况可能搞得更糟。

(80)

这样一想,张春桥他们就计划先到周恩来那里去说,再由周恩来把这件事转告毛泽东,这样就可以避免硬闯告状,惹毛泽东生气的危险性。据周恩来说:江青、张春桥已经到了他那里,周恩来还没来得及出来见他们,他们又走了,直接去找毛泽东了。

这可能是江青、张春桥到了周恩来住处之后,再仔细一想,这件事如果先跟周恩来说,很可能反而会弄巧成拙,所以他们又急忙从周恩来那里出来。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江青、张春桥紧急离开周恩来去见毛泽东,的确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他们自己。关于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据汪东兴说:【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了毛主席的住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了她的车。江青说:'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

为什么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闯"毛泽东的住处呢?肯定是他们先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求见毛泽东,而毛泽东的秘书推说毛泽东要休息了,不见江青他们。所以江青迫不得已,才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硬闯"进来。徐景贤回忆了江青向他们得意地说起"硬闯"这件事,徐景贤说:

【8月25日晚上,约摸九点钟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 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请你们去一次,车已经派来了。"

哪一位首长?王洪文和我不便多问,只是紧随着那人走下坡去,一起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在一个大院子的门外停了下来。穿军装的人把我们引上高高的 合阶,走入房屋。这时,只见江青的警卫员大周迎了出来,原来是江青接见。

我们走进客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 松快多了,他主动招呼我们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并说:"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 你们。"

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一头乌黑的头髮齐耳根剪短,朝后梳着,看得出还吹过风,有一点暗波浪。江青里面穿着白衬衣,外面罩一身浅灰色的毛料服装。 江青热情地伸出手来握手,接着轻松而随便地往身后的长沙发上一靠,边坐边说: "今天找你们两位来,是想听听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我听春桥说,你们华东组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很凶呀。"

张春桥微微一笑,坐在一旁的姚文元却接口说:"其实各个组都差不多,我 这次参加西北组,也有'宣讲员'。"

(81)

江青打断了姚文元的话,自顾自地说下去:"今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六号简报》。看完《六号简报》,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

江青用手势比划着说:"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吃吃地笑起来说:"我赶紧给主席报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华北组出了《六号简报》。"

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以显示她说的这番话十分秘密和重要:"他们要陈老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条枪杆子每人发一份, 24日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个组去宣讲。所以,各个组都闹得很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会。"

王洪文把憋在肚子里好久的问题,当面向江青提出来说:"那么,东兴同志 为什么要那样发言?他可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江青说:"老汪吗?他也收到一份语录材料,不过他事先不知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

江青又说:"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 谈话,进行批评了。你们要相信,不管任何情况,主席总是有办法处理的。"

江青说完这一番话,用手背掩着嘴打了一个哈欠,张春桥及时提醒说:"请 江青同志早点休息吧。"

王洪文和我站起来告辞,江青就在沙发前握手告别,一边握手,一边用左手 食指点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很大的!"

江青在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希望。在"九大"期间,毛泽东曾几次接见王洪文,并要他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大会上发言。王洪文很快反应过来,流利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负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

王洪文和我受到江青秘密接见以后,受宠若惊,回到住处,三脚两步跨上台阶,雀跃不已。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洪文从别墅的酒柜里取出喝剩下的半瓶茅台,一饮而尽。】

林彪早在8月23日第一天的开幕式上,就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毛泽东 当场听了林彪的这个讲话。所以林彪发动一批人攻击张春桥,对于毛泽东来说, 完全不是意外的事情。

毛泽东知道林彪下一步要攻击张春桥了,但毛泽东在8月24日,却没有做出任何措施来阻止林彪攻击张春桥;到了8月25日,毛泽东仍然照常睡觉,并没有准备"救"张春桥的意思。只是在江青带着张春桥不请自来,张春桥抱着毛泽东的大腿大哭了之后,毛泽东才决定出手"救"张春桥。

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82)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林彪没有看清毛泽东的意图,在庐山会议上向 张春桥发难,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行动。结果张春桥去毛泽东 那里求救,抱着毛泽东的腿大哭,于是毛泽东就出手"救"张春桥,从而林彪大 败亏输,但林彪又不肯检讨,因此一年后导致了"九一三"事件。

这种看法的典型说法,就如某"林彪问题专家"说的那样:【林彪至少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轻视了"江青问题",以为把"接班人"写进党章,事情就会当真,犹如他的前任刘少奇一样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二是林彪不是用"团结"的方法,"韬晦"的谋略,而是极力压制文革派,想尽快把自己的政治对手逐出政坛,太露锋芒。历史证明,像叶剑英、邓小平那样韬光养晦,把事情放到毛泽东身后去办才是大谋略的政治家。】

上述这种看法,可以说完全误解了林彪问题。这样的看法会把林彪问题引入 迷途,让人越看越糊涂。我们认为,研究林彪问题,首先要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 林彪问题的本质,而不是去"抠"各种微观的细节。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有几个 实质性的大问题需要阐明。

第一个大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让林彪当接班人?

从历史来看,中共的高层领导可以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所谓"四巨头",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是中共公认的掌舵人;第二梯队也是四个 人:彭德怀、高岗、邓小平、林彪,这四个人虽说无法与"四巨头"相比,但与 其他中共高官相比,他们又显得非常突出。

特别是后面三人的年龄都比毛泽东小十几岁,高岗 1905 年生,邓小平 1904年生,林彪 1907年生,因此这三人被视为中共的"第二梯队"接班人,他们也具有接班人所需要的才能和威望。

第二梯队中的高岗首先在 1954 年倒台,彭德怀在 1959 年倒台,邓小平在 1966 年倒台,剩下的就是林彪一个人了。从才能和威望来看,林彪接毛泽东的 班,应该是可以接下来的。

政府和政党的第二把手就是接班人,这是废除皇子继位的帝制之后,人们所公认的基本原则。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把一切全权交给了刘少奇,万一毛泽东出事,就由刘少奇接班。所以当年毛泽东让刘少奇当接班人,曾经是真心想让刘少奇接班的。

(83)

但后来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个接班人不满了,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革,亲手 拿掉了刘少奇这个接班人。然而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的同时,也拿掉了中共的接 班人,所以必须有一个人来填补党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接班人的空缺。

按照惯例,第二把手的空缺应该由第三把手的周恩来填补,但这又是毛泽东不想看到的。当年毛泽东让刘少奇任第二把手,就是要挡住周恩来。毛泽东不想让周恩来当接班人,表现得非常明显,对此人们没有任何异议。

既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又不想让周恩来当接班人,必须就有一个人来"占" 住接班人的位置。1966年8月初拿掉刘少奇的时候,造反夺权还没有开始,还 没有涌现出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所以接替刘少奇的人,只能从党内高官中选。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合适的候选人显然只有林彪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人。因此, 毛泽东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让林彪当接班人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一些人误以为林彪是在 1969 年的"九大"上成为接班人的,这是一种误解。林彪早在 1966 年 8 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已经明文规定成为党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九大"上只是把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林彪接班人地位,再次写入《党章》而已。

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又产生了第二个大问题: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吗? 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的动机来看,无非是两种:第一种动机是真的让林 彪接班,真的要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林彪;第二种动机是并不想让林彪接班。毛 泽东在 1966 年让林彪当接班人,是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只好让林彪 暂时当接班人,因为林彪不占住接班人的位子,周恩来就要上来。

如果说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让林彪和林彪派系的老干部,打倒刘少奇和刘少奇派系的老干部,然后林彪派系取代刘少奇派系接班掌权。从整个文革的发展过程来看,完全看不出毛泽东有想让林彪接班掌权的举措。毛泽东在文革中大力扶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等新兴造反派,

而不是林彪和林彪派系的老干部。所以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这点也 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84)

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这又产生了第三个大问题:毛泽东怎么处置林彪呢?

毛泽东不想让林彪接班,可是林彪因为历史的原因,又占据了接班人的位子。 因此,毛泽东要想让年轻的造反派接班,就必须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拿下来, 否则别人也没办法接班。

林彪从接班人的位子上下来,也无非有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毛泽东"强行"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拿下来;第二种办法是林彪"自愿"把接班人的位子让出来;第三种办法是"半强行半自愿",林彪虽不自愿交出接班人的位子,但在毛泽东的压力之下,迫不得已交出接班人的位子。后面两种办法是和平地解决林彪问题,前一种方法则是用"打倒"来解决林彪问题。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肯定是倾向于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林彪问题,而不是"打倒"。毛泽东发起一场"打倒林彪"的运动,对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和目标,显然是弊远大于利。因此,毛泽东在尽可能用和平的手段解决林彪问题的前提下,又必须拿掉林彪的接班人位子。

毛泽东必须要拿掉林彪的接班人位子,这又产生了第四个大问题:毛泽东什么时候拿掉林彪呢?

在 1967 年到 1968 年的夺权高潮中,因为局势非常混乱,毛泽东暂时无暇顾及林彪问题;1969 年的"九大"时,因为要处理的文革遗留问题太多,而且当时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到了战争的边缘,所以毛泽东仍然无暇顾及林彪问题;

到了 1970 年,国内的政治局势平稳下来,国际形势也缓和下来,这时候毛泽东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林彪问题了。因此在 1970 年,毛泽东就开始对林彪有所动作,削弱林彪派系的力量。

从毛泽东的计划来看,他应该是考虑在 1971 年左右拿掉林彪,最晚不应晚于 1972 年。毛泽东拿掉林彪之后,就马上把自己的新接班人推上来,作为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毛泽东拿掉林彪的时间,绝不能太晚,因为毛泽东本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把时间拖得太久。

综合上述,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林彪事件,可以得出四大结论: (一)毛泽东 让林彪当接班人,动机是让林彪暂时占住刘少奇空缺下来的接班位子;(二)林彪不 是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拿掉林彪只是早晚的事;(三)毛泽东尽可能用和平的方式 拿掉林彪,实在不行,只好"打倒";(四)拿掉林彪的时间应该在1971年左右, 不应晚于1972年。

(85)

上述分析是从毛泽东的角度看问题,对于林彪来说,他看问题当然又是另外一个角度。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是不是真的要让他接班?

林彪刚开始就对毛泽东让他当接班人的动机十分疑惑,林彪越来越看出,毛泽东并不是真的想让他接班,他只是一个暂时替别人占位子的角色。然而,林彪既然上了接班人的位子,他也不会甘心再下来。而且,林彪要想从接班人的位子上,不失面子地体面地全身而退,也是很难的。

当时的中共并无退休制度,像朱德等八十多岁的人,照样担任现役公职。所以那时中共高官退下来,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犯错误降职,情况严重的被打倒。这样退下来的高官,在文革 时非常多。

第二种形式是坐冷板凳,表面上没有降职,但失去实权,失去参加高层会议的资格。朱德、陈云就是这样的例子,陈云曾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因为从1964年开始,刘少奇就不再通知陈云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了。

第三种形式是"退居二线",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一般是因病或者其他原因, 暂时退出高层领导,但随时又可以回到高层领导来。

林彪在 1959 年接替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以前,曾一度是"退居二线"的状态,最著名的当然是毛泽东曾经退居二线。

林彪以"退居二线"的方式让出接班人的位子,毛泽东恐怕不容易接受。如果林彪以"退居二线"的方式把接班人交给张春桥,林彪的威信毫无损失,但因为林彪比张春桥的威望高出很多,只要毛泽东不在了,林彪随时可以从"二线"回到"一线",张春桥根本挡不住林彪。这就像毛泽东从"二线"回到"一线",刘少奇根本挡不住一样。

从毛泽东看来,林彪应该以"不可逆"的方式让出接班人的位子。这样就要 找出林彪犯了错误,让林彪的威信失落,把林彪赶到冷板凳上,逐步淡出政局。 如果林彪不肯坐冷板凳,那就只能打倒了。

林彪是一个荣辱感非常强的人,让林彪做冷板凳,他肯定是难于接受的。林彪不甘心毛泽东给他安排的命运,他要奋起抗争,这就必然要与毛泽东发生一场冲突了。1970年3月,毛泽东传来指示"不设国家主席",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此举正是冲着林彪来的,这是把林彪赶上冷板凳的第一步。

一些人以为国家主席不过是一个名誉头衔, 林彪没有必要去争, 甚至有人说 林彪的身体不行, 他根本就不想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因为它无法 解释最基本的事实。

毛泽东六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而林彪六次坚持设国家主席。如果林彪真的不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正好可以满足林彪不当国家主席的愿望,那林彪为什么还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呢?

又有人说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是误解了毛泽东意思,这更说不过去。林彪 跟随毛泽东几十年,在这种重大问题上,怎么会误解毛泽东呢?再说,第一次、 第二次还可以用"误解"解释过去,毛泽东都说了六次了,再用"误解"来解释, 就说不过去了。

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呢?据叶群(或者汪东兴)说: "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林彪的"接班人",只是象征性的虚职,不是具体的实职。林彪担任的唯一具体的实职,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上,所以林彪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肯定是不行了。

那么林彪辞去国务院副总理,只担任国防部长行吗?也不行。因为国防部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国防部长自然就是国务院总理的下级。林彪再担任国防部长,就成了周恩来的下级,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林彪要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时,也同时要辞去国防部长,这才能"名正言顺"。可是林彪辞去他这个唯一的实职国防部长,那不是正好符合毛泽东让林彪淡出政局的意思吗?

林彪不甘心这么淡出政局,他要"争一争"。林彪继续"名正言顺"地担任

国防部长的唯一办法,就是林彪任国家主席或国家副主席。因为国家主席或国家副主席,地位是高于国务院总理的。据中国宪法规定:【国务院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投票通过,再由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任命。】因此,国家主席或副主席,名义上的地位都在国务院总理之上。周恩来也说过:"我这个总理还是少奇同志任命的。"

林彪当国家主席,或者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林彪就可以 以国家主席或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防部长,既"名正言顺"在周恩来之上, 又保住了国防部长这个实职。

(87)

本来在刘少奇时代,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的机构。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地位比国防部长地位高,与国务院总理地位一样。在刘少奇时代,国防委员会主席是由国家主席兼任的,因此刘少奇从 1959 年开始一直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如果毛泽东让林彪当"国防委员会主席",林彪是可以不争国家主席的。但 毛泽东既然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当然就更不会设"国防委员会主席"了。

这样分析下来,就可以看出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内在动机了。 尽管"国家主席"是一个虚职,但林彪不当上这个虚职,就无法保住国防部长的 实职。

因此,只要设"国家主席",不管林彪当国家主席还是副主席,都能"名正言顺"地继续兼任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而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实质的问题 其实是逼林彪辞去国防部长,否则林彪就陷入"名不正、言不顺"尴尬境地。

因此, 林彪在庐山上向毛泽东发起突然袭击, 试图依靠众人对毛泽东的崇拜

心理,把毛泽东硬推上国家主席,这样林彪也可以顺势当上国家副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让给林彪当国家主席,那当然是更加理想。于是这一场"强烈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风潮,就被林彪集团掀起来了,甚至连康生、许世友等毛泽东派系的人,也都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林彪认为毛泽东有可能拗不过众人,最后不得已当上国家主席。当然毛泽东 也有可能硬是不当国家主席,这种结局林彪也想到了,不过林彪认为还是值得争 取一下。即使这次争取不成功,自己也不会有重大损失,这样的冒险值得试一试。 最后让林彪阴沟翻船的,并不是"设国家主席"问题,而是"称天才"问题。关 于这点将在后面分析。

8月25日上午言辞激烈的华北组《六号简报》出来之后,对人们的震动很大。据杨福云回忆说:【25日上午,中南组继续开会讨论林彪讲话。从会上的反映看,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六号简报》。中南组上午的发言,主要对"那几个人"(一些发言者对被攻者的代称)展开了批判,有的发言目标明确,有的随大流,一般性地谴责。比昨天更深入一层的是,有的人提出要把"那几个人"揪出来,至少要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88)

25 目下午,大概是中午人们看了华北组《六号简报》,下午,一些人的情绪 又上来了,一些发言很激烈,对"那几个人"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会议开到后半 段,在一些人的提议下,中南组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项是要求在新宪法中 写上"国家主席"一节,大家鼓掌通过;第二项是要揪人,大意是:要求中央把 "犯错误的人"调离中央,交全会批判,下放劳动。大家鼓掌通过。】

在会议形势向林彪一边倒的情况下,毛泽东再不出手是不行了。8月25日

下午,毛泽东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福云回忆说:【就在中南组的中央委员们鼓掌通过两项"决议"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此时毛泽东正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五位常委外,还有各大组组长,会议在毛泽东住的楼下召开。毛泽东从楼上下来,一边走一边斥责汪东兴:"汪东兴,你不是要设国家主席吗?你去当好了。"

毛泽东在会议室对大家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 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这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二) 收回华北组 2 号简报;(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会议情况之所以发生逆转,是因为毛泽东的处理比较高明。首先,毛泽东在 开常委扩大会议之前,先分别找其他四位常委单独谈话。关于这点,《汪东兴回 忆录》中也说:【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 3 时到毛主席办 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 办公厅负责通知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 话。】

前面提到,因为四位常委一致同意"设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不能直接召开常委会,否则毛泽东将面临人数劣势。因此毛泽东转而采用个别谈话的形式,因为个别谈话场合下的人数比是"一对一",毛泽东就不会处于人数劣势了,他要一个一个地把常委争取过来。

(89)

第一个争取过来的是康生。本来康生以为林彪和张春桥发生冲突时,毛泽东肯定是舍林彪而抛弃张春桥,没想到这次毛泽东却横下心来舍弃林彪。当康生明白毛泽东决定舍弃林彪时,马上转变过来,支持毛泽东而反对林彪了。

毛泽东第二个争取过来的是周恩来,在周恩来面前挑明,不惜一切代价舍弃 林彪。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为了顾全大局,也就不再偏袒林彪,以避免刺激毛 泽东干出"出格"的事情。

争取到康生和周恩来,毛泽东在常委中的人数比已经是"五比二"了,剩下的两个人是林彪和陈伯达。这样毛泽东在人数上已经有优势,就不怕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了。

即使是对陈伯达,毛泽东暂时也要争取和团结一下,据陈伯达回忆说:【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是我最后见毛主席。见面握手以后,毛主席说:"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了。"

毛主席这句话,对我来说,含有一段很难过的历史。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违反了以前多年的习惯。解放初,最早我住党校,随后毛主席要我住中南海,因为打电话到党校找我来一趟,至少要半个钟头,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后,见面倒是很方便,而且我总是随叫随到。

但是文革后,江青干涉我见毛主席的事,江青于是就对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江青下令把我赶出中南海,自此以后,要见毛主席,总要先打电话向秘书(主要是徐业夫)打听,主席起床没有,有没客人……等等。几次打电话,我听得很不愉快,有时秘书就干脆说:"我要回家了。"

于是,我感觉要见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渐渐地不单独求见毛主席了。

这件事首先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说清楚的。当然,对党来说,远不过是极微小的事,但毛主席这时见面劈头一句话就提"两年不见"的问题,可见江青的挑拨离间手段所起的作用。

毛主席谈话简短,他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毛主席的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毛泽东给陈伯达的暗示是,只要他离开林彪,还是给他出路的,还是要团结他的。因此陈伯达在关键时刻,又放弃了对林彪的支持。陈伯达的背离,使林彪面临极为被动的境地,这是庐山会议上林彪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90)

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上的冲突,主要是"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两件事。如果说"设国家主席"这件事是林彪挑起来的,那么"天才论"这件事则是毛泽东挑起来的。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早在 1966 年毛泽东就在《滴水洞家信》中对林彪的"天才论"表示过不满,但毛泽东公开表示反对"天才论",则是在 1969 年"九大"的时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形容毛泽东的副词,是林彪写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上的话,后来变成了林彪的象征。否认"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就等于是否认林彪。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对外宾说"天才地"等三个副词"是个讽刺",这句话明显是讽刺林彪的。因此林彪也要在大会上,借着批张春桥来捍卫自己,这是回应毛泽东挑起的批评"天才论"。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却重点讲了"天才论",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但林彪这次疏忽大意了,没有注意到早在 1969 年的"九大"《政治报告》 和《党章》中,毛泽东就已经删掉了林彪的这三个副词。

在"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初稿中,都写着"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这是对林彪的肯定。可是最后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时,毛泽东把它们划掉了,所以《政治报告》和《党章》正式出版印刷的时候,这三个副词都没有了。

这本来是一件大事,可不知为什么,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人没有注意到,甚至连周恩来也没有注意到。这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没有特别提起这件事,而周恩来等人都很忙,他们只看了初稿,以为最后的印刷稿不会有大的变化,也就没有专门再花时间去看印刷稿。

据吴法宪回忆说:【8月27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党章》,说是林彪叫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去谈话时,我带上了这本党章。 我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 翻给周恩来看,然后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周恩来不清楚"九大"《党章》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

(91)

林彪不知道"九大"《党章》中毛泽东已经删掉了这三个副词,所以他看到 吴法宪和张春桥因为这三个副词发生争吵,以为这次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 了打倒张春桥的突破口,所以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在这三个副词上大做文 章,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如果林彪事先知道毛泽东已经删了这三个副词,他应 该不会揪住这三个副词来批张春桥。后来毛泽东批评他们说:"那几个副词,是 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这让林彪等 人无话可说。

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张春桥他们告状之后,并没有立即做出结论,只是临时决定暂停小组讨论,休会两天。此时众人已经感觉到风云有变,但具体的形势还不明朗,大家还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据邱会作回忆说:【8月25日下午5时,西北组的召集人冼恒汉,参加了中央常委会回来说:"毛主席决定小组会暂停,以后怎么开会,待通知。"

各组都宣布暂停开小组会,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大家都不清楚。这对 全会的极大多数人是一瓢凉水,浇得大家昏头转向,可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兴奋 极了。

25 日晚上,政治局开扩大会议,会议由总理主持,这时江青、张春桥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劲头又来了。因为毛主席的决心还不知道,尤其是主席对林彪的态度还不知道,我当时就隐隐感觉到,主席的屁股可能坐到江青那边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主席在山上和下山后的一切都是对着林彪来的。

总理在会上说:"会议的日程做一些调整,根据主席的指示,休会两天,大家休息休息。很多人还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去游一游,换换空气。"

散会以后,吴法宪要到林总那去,我们劝他不要去,他还是坚持要去。为了

等消息方便,我们就坐在吴胖子住处等,不久他就回来了。吴法宪说:"我去时,林总刚从主席那里回来,主席召集开常委会,各大组的负责人也到了,林总说主席对会议不高兴,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起哄,并说以后不要再提'天才'了。林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我回到住处,总理给我来了电话,他对我说:"主席说庐山问题还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你没有什么大事,但要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你究竟有没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

总理的话,都说到这种程度,我仍然没感到自己会有什么事,只是我感到陈伯达可能要倒霉了。可是为什么要搞到陈伯达头上,我真是搞不清楚。】

(92)

吴法宪也回忆这件事说:【8月25日下午4点多钟,召集人张国华回来了,他说:"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

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几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

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 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

林彪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 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 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 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

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能沉得住气。但林彪担心的是,吴法宪等人沉不住气,所以特别安慰他们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但后来的事情,应验了林彪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吴法宪沉不住气崩溃了,给林彪造成极大的被动。

毛泽东休会两天,第一个目的是感到当时人们揪张春桥的情绪很热烈,所以要休会两天,让人们头脑冷静下来;第二个目的是毛泽东要进行水面下的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重新整顿自己的队伍。《毛泽东传》写道:【从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

吴法宪也回忆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 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 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 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可我们哪里有这份心情呢?】 (93)

毛泽东不停地找人谈话,主要是团结和整顿自己的队伍,把大家模糊不清的 思想扭转过来。毛泽东特别注意江青、张春桥等人,要与其他人搞好团结。毛泽 东对张春桥成为众矢之的是有些意外的,他必须做一些挽回和补救工作。关于这 点,徐景贤回忆了张春桥请许世友吃饭之事,徐景贤说:

【毛泽东先后找有关人员作个别谈话,做做工作。他找了许世友,又找了张 春桥,他特意叮嘱张春桥,要请许司令吃一次饭。

毛泽东知道许世友和张春桥不和,早在文革初期,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支持造南京军区的反,许世友当然不高兴。 这一回在庐山,由于陈伯达和几条枪杆子的发难,毛泽东觉得许世友和张春桥更 有加强团结的必要,所以他亲自出马做调节关系的工作。

张春桥在庐山自己住的别墅里,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让厨师做了十几个菜,厨师还别出心裁地烹调了庐山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鸡、石鱼和石耳。石鸡是一种长在山间石罅洞穴里的蛙类;石鱼是在山涧清溪里的鱼,肉质特别细嫩肥美;石耳是生长在庐山岩缝里的一种菌类,很难采集到。"三石"俱全,这桌筵席就真正地上档次了。

张春桥郑重其事地向许世友发出邀请,许世友也知道这次请客是毛泽东的意思,所以欣然应邀赴宴。这桌筵席就两个人吃,没有陪客,两个人又都善饮。许世友喝茅台量大是有名的,张春桥呢,别看他文绉绉的,喝起茅台来却很凶。这一次在庐山,许、张两人第一次开怀畅饮,喝得痛快,把张春桥餐厅里玻璃柜子里的存酒,喝了个精光。

会议快结束之前,各分组分别搞一次会餐。华东组的会餐地点设在山坡上的 一幢俱乐部里,许世友特意把张春桥也请来了,作为对张春桥设宴的回请。张春 桥和许世友坐在一桌,举杯对饮,我们作陪。

饭吃到一半,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手里举着一杯茅台酒,走到张春桥身边。 就是他在8月25日华东组会议上冲着张春桥大吼:"站出来嘛!"

现在,陈励耘那股有恃无恐的气势半点也没有了,他脸上露着不自然的笑容, 谦恭地说:"春桥同志,对不起,多多冒犯,请允许我敬你一杯!"

张春桥把眉毛一扬,嘴角略带微笑回答:"我不在乎。"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 把不是滋味的酒喝干了。】

(94)

毛泽东在休会的这两天里,通过谈话等各种方式,把重要人物都团结到了自己一边。这时,毛泽东才正式亮出他的牌:打倒陈伯达。据邱会作回忆说:

【8月27日下午4点左右,陈伯达叫吴法宪、李作鹏和我到他的住处去谈话,对此我们有点犹豫。吴法宪说:陈伯达告诉他。主席叫他找我们的。

我们到陈伯达的住处时,我们看到陈伯达精神十分紧张,很沮丧。大家坐下之后,喝了一点热茶,陈伯达精神的紧张程度稍微纾缓一点,他说:"我叫你们来是经过主席批准的。主席叫我去谈了一下,对我有批评,对你们也有批评,主席要我找你们几位谈一下。"

陈伯达颠三倒四地说了不少话,在谈话的时候,吴法宪拼命记录,我也帮他 记了一些要点。

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 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 陈伯达说:"毛主席指责我参加了'军事俱乐部',说我背叛了中央文革小组,要我到江青、康生那里去承认错误,争取他们的原谅,搞好团结。康生指责我把林副主席绑上了战车,甘愿当叛徒,投靠了军委办事组。"

陈伯达说:"毛主席一出此言,我脑子就懵了。'军事俱乐部'是 1959 年毛主席讲彭德怀的话,怎么在十年以后又拿同样的话,讲起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来了? 我是罪孽呀,怎么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线了。"

临走时,陈伯达向吴法宪宣布:"我犯了错误,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

这几句话,把当时发生的问题的性质都点明了。例如"军事俱乐部"一词, 是上次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用语,康生的话是再明显不过了,我们问题的性质和 彭德怀是一样的。

我们三人都认为,问题一下就严重了,就决定到林彪那里去一下。准备走时, 吴法宪说给叶群打个电话,陈伯达听见后像吓丢了魂似的,恳求吴胖子千万不要 在他的住处打电话,我们就离开陈伯达的住处。

吴法宪说:"我们就直接去林彪的住处,如他不肯见就回来。"

李作鹏说:"如果不见,那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到了林彪的住处,叶群依旧很热情,说:"快来,快来。"

林彪也亲自出来了,我们把陈伯达的话讲了一遍,林彪还是很镇静,好像对这些是是非非的话有反感,林总只说了一句:"那是讲陈伯达。"

对于毛主席同陈伯达的谈话,我又专门打电话向总理汇报。总理听到后也非 常吃惊,他认为主席把问题搞严重了。

(95)

周总理真是不辞辛苦,立即找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谈话。总理说:"主席的话分量是相当严重的,要超过'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对陈伯达说的,与对你们说,是有区别的。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向你们打招呼的。但你们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

我们对总理都存有感激之心。因为最高层搞的这些名堂,我们的确一窍不通。】 由邱会作的回忆可知,毛泽东做出"打倒陈伯达"的决定,事先既没有与周 恩来商量,更没有与林彪商量。1969年的"九大"号称是"团结的大会,胜利 的大会",人们普遍认为,"九大"象征着这场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央将进入 安定团结的时代,再不会发生"打倒某某人"的事情了。事实上,从1969年4 月的"九大"到这次庐山会议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央高层的确没有出现过某人被 打倒的事情。

陈伯达是中共最高层的五名政治局常委之一,"打倒陈伯达"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必将是非常大的。所以周恩来听到毛泽东准备打倒陈伯达的消息,感到非常吃惊,认为毛泽东把问题搞严重了,中央好不容易出现的安定团结局面,又要结束了。

林彪虽说表现出镇定的样子,内心中应该也是震惊的,他也没想到毛泽东下 决心打倒陈伯达,更没想到毛泽东还提出"军事俱乐部",这就是准备要把林彪 打成第二个彭德怀。不过林彪也认为,毛泽东现在还不到和自己摊牌的时候,因 为此时摊牌,对毛泽东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林彪暂时还不会有危险,但以后就 不好说了。

毛泽东之所以让陈伯达与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私下谈话,目的还是想"拉" 这三个人。如果吴、李、邱三人听懂了"军事俱乐部"含义,马上求见毛泽东, 表示与林彪划清界限,洗心革面重新跟随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不仅可以放过这三个人,还分化了林彪的队伍。

邱会作说他们对"最高层搞的名堂一窍不通",这也是实话。陈伯达明明告诉他们三人:是毛泽东指示陈伯达与他们谈话的。按照道理,既然是毛泽东派陈伯达跟他们三人谈话,那么在谈话之后,他们三人就应该给毛泽东的一个回话。而吴、李、邱三人,似乎根本没有理解毛泽东指派陈伯达与他们谈话,是给他们一个改换门庭的机会。他们三人没有去找毛泽东,没有给毛泽东回话,反而去找林彪,又告诉了周恩来,这就枉费了毛泽东的一场安排,于是毛泽东只得拿掉这三个人了。

(96)

陈伯达被打倒的性质,与林彪完全不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林彪是妨碍他把 文革搞到底的绊脚石,不拿掉林彪,文革就要半途而废。而陈伯达不过是一介书 生,没有多大能量,毛泽东本来是没有必要打倒他的。

虽说毛泽东早就对陈伯达有看法了,自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之后, 毛泽东就不用陈伯达了,也不见陈伯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想要打倒陈伯达。

如果陈伯达发现毛泽东疏远他之后,自甘寂寞,称病休养,就不会有后来被打倒的悲剧。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胡乔木,与毛泽东发生矛盾之后,很快就称病了。胡乔木于 1961 年 8 月 17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声称自己因病需要请长期病假。

毛泽东给胡乔木回信说:【乔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 甚念。你须长期休养, 不计时日, 以愈为度。曹操诗云: 盈缩之期, 不独在天。养怡之福, 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 随气候转移, 从事游山玩水, 专看闲书,

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

毛泽东当然知道胡乔木有病只是借口,真意是退出政坛。毛泽东已经不想再用胡乔木了,可是怎么处置胡乔木,却有一点麻烦。现在胡乔木主动提出因病休养,省去了毛泽东处置胡乔木的麻烦,所以毛泽东也很高兴,建议胡乔木"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安心长期休养。

毛泽东信中还特别提到陈云、林彪、康生三人"长期休养"之事,这三个人的病,明显地带有"政治病"的色彩。林彪和康生的病到文革就好了,陈云的病到毛泽东去世后就好了,胡乔木本人的病在毛泽东去世后也好了。

如果陈伯达学胡乔木,向毛泽东提出"长期休养",毛泽东肯定会欣然同意。 这样一来,陈伯达就很可能保持政治局委员的地位在家休养,一直休养到毛泽东 去世后再复出,重登政坛。那样的话,陈伯达的一生就可以说是十分圆满了。

(97)

可惜的是,陈伯达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毛泽东冷落他之后,又去靠近林彪,大概陈伯达天生是个闲不住的人,非要尝到监狱的滋味才罢休。所以说陈伯达被打倒,很大程度是他自己造成的,只要陈伯达不介入林彪集团,毛泽东是不会打倒陈伯达的。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陈伯达投靠林彪本身就是"老鼠搬家"的行为,这次 陈伯达在庐山上又跳出来向张春桥进攻,从侧面向毛泽东发难,更是典型的"背 叛"行为。所以毛泽东打倒陈伯达,一方面是严惩"叛徒",另一方面是对林彪 "敲山震虎",从侧面打击林彪。

陈伯达没想到毛泽东会用这么严厉的方式处置他,在毛泽东咄咄逼人的进攻 面前,陈伯达慌了手脚,对应失措,失去了挽回败局的机会,不仅造成他个人的 悲剧,也使林彪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从陈伯达的角度来看,虽说他不可能全部 挽回败局,但仍有可能挽回一定的败局,使自己的下场不至于那么遭。

陈伯达可挽回败局的第一件事,是坚持"天才论"没有错。

当时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任何"右"的言论已经没有存身之地,所以 林彪集团只有打出比江青集团"更左"的言行和旗号,才能反对江青集团,这就 是所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陈伯达这次借着对毛泽东"称天才"来打击张春 桥,就是要表现得比张春桥"更左"。这样一来,因为陈伯达的言论比张春桥"更 左",所以要想从陈伯达的言论中揪出错误来,反而很不容易。

只要陈伯达坚持自己认为毛泽东是"天才"的看法没有错,要想给陈伯达扣一个帽子,倒也很难。即使"毛主席是天才"的这种看法有错,但这也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并不是陈伯达做了什么错事。既然陈伯达没有做错事,只是对"天才"的看法错了,那么这种错误就不可能上升到被"打倒"的地步。

可是陈伯达自己却认错了。陈伯达自己一旦认了错,别人就救不了他了,只能被打倒了。更有甚者,因为陈伯达说的"天才论",其实是林彪的观点,陈伯达承认自己错了,也就等于承认林彪的"天才论"错了,就使林彪陷入非常被动的地步。

如果陈伯达坚持"天才论"没有错,林彪也配合说"天才论"是合理的,毛 泽东处理起来就会很棘手,总不能把林彪和陈伯达认为"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 作为一种反动的观点。

(98)

陈伯达可挽回败局的第二件事,是坚持认为张春桥有错,坚持自己对张春桥 的批评是合理的。

林彪集团早就在收集江青集团的"黑材料"了,张春桥的黑材料当然也收集了不少。邱会作回忆说:【上海解放军二医大革命组织"红旗",搞到了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好像也有张春桥的老婆历史问题的材料,同时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材料。我拿到这些材料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不仅是江青的红人,也是毛主席器重的人。

有一次我利用开会的机会,给总理嘀咕了几句,总理很慎重地说:"这个材料你不要转给我。"

稍等片刻总理又说:"群众来信我是可以收到的。"

总理的话提醒了我,二医大革命组织,把张春桥叛徒的材料,直接寄给了总理,但事后一点动静也没有。

早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有一次黄永胜在办事组说:"搞不清张春桥、姚 文元是怎么回事,说多了主席肯定不高兴,但抓住'眼镜'(指张春桥)就是毛泽 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九大"期间,好像是进入选举程序的时候,黄永胜悄悄告诉我:"告诉你,眼镜(指张春桥)是个叛徒,材料转到主席那里去了。"

毛主席好像并不重视这些材料,因为在选举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时,张春 桥仍然榜上有名。】

张春桥本来在中央里就不得人心, 再加上林彪集团的人, 早就把张春桥各种

各样的问题,在私下悄悄传开了。他们散布消息说,已经找到张春桥是叛徒的证据,可是张春桥的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没有处理。所以众人对张春桥很有看法,只要陈伯达坚持认为张春桥有错,毛泽东也很难说服众人说张春桥没有错。这样一来,陈伯达还能在大部分高官中间赢得一个好名声。

可是陈伯达自己却认错了,陈伯达一旦自己认了错,就等于承认张春桥没有错,也就把张春桥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关于张春桥有错的问题,黄永胜就敢于坚持。黄永胜没有参加前期的庐山会议,直到陈伯达的事情出来之后,黄永胜才赶来庐山。

黄永胜上山后毛泽东找他谈话,毛泽东说:"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 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说:"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

(99)

毛泽东说:"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说:"几十年来的枪林弹雨,艰苦岁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 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为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 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毛泽东说:"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说:"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

如果陈伯达能像黄永胜这样,坚持张春桥有错,那么情况反而对陈伯达有利。 可是陈伯达这样的书生胆子小,一看毛泽东要打倒他,就彻底崩溃了,把什么错 误都承认下来。 陈伯达可挽回败局的第三件事,是把林彪集团牵扯进去。

陈伯达出事后,陈伯达怕连累林彪和林彪集团,就把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 承担下来,声称所有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与林彪和林彪集团无关。陈伯达这 样做,或许是出于好心,不牵连别人。如果在一般情况下,陈伯达这么做或许是 对的,但在庐山会议这个特殊的情况下,陈伯达这么做反而弄巧成拙。

本来,陈伯达与林彪和林彪集团的确是有"勾结"的,如果陈伯达坦诚地承认,这件事与吴法宪、邱会作等人有关,甚至承认这件事与林彪和叶群有关,那么毛泽东反而不好处理陈伯达。

毛泽东的拿手好戏是"各个击破",如果陈伯达声明这件事是他和林彪以及 林彪集团的人一起策划的,那么毛泽东要处理陈伯达,就不得不连林彪和林彪集 团的人一起处理,这样就不是"各个击破",而是"一网打尽"了。可是对于毛 泽东来说,目前显然不是"一网打尽"的时机。如果毛泽东硬搞"一网打尽", 在庐山上把林彪和林彪集团揪出来,那么局势对毛泽东反而不利。

对于毛泽东来说,打倒林彪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打倒林彪之后,林彪的 党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位子,就必须有人来填补。毛泽东本来想培养张春桥几年, 等张春桥的威信建立起来之后,在拿掉林彪让张春桥接班。这次毛泽东因为保张 春桥而打倒陈伯达,已经引起众人的不满,如果再为了张春桥而打倒林彪,那么 人们的不满就更大了。因为张春桥已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所以毛泽东再想让张 春桥当接班人就不行了,江青更不行。

(100)

因此,如果毛泽东此时打倒林彪,张春桥又不能接班,那么林彪倒台后空出来的党第二把手的位子,只能让周恩来接替。毛泽东费了半天力气,打倒了林彪,

结果却让周恩来接班,那么毛泽东岂不是白费力气为他人做嫁衣裳?

所以毛泽东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还不能打倒林彪,还不能把林彪端出来, 这点林彪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毛泽东不会在现在跟他摊牌。如果陈伯达把林彪牵 扯进来,声称自己和林彪是一伙的,毛泽东为了避免与林彪摊牌,反而要从轻处 理陈伯达。

林彪并不怕陈伯达把他牵连进来,倒是怕陈伯达一个人把事情承担下来,声称此事与林彪无关,反而使毛泽东可以对他们"各个击破",使林彪更加被动。 后来吴法宪要检讨,试图替林彪责任承担,保护林彪,林彪却反对吴法宪这么做。 据吴法宪回忆说:

【我向林彪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

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 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

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

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后来,林立果来到我这里,对我说: "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

我再一次作了解释,说是周恩来要我作的检讨,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彪。这个时候,林立果不高兴了。】

林彪知道吴法宪一旦检讨了,吴法宪自己都认错了,林彪就无法再保吴法宪了,就中了毛泽东"各个击破"的战术。如果吴法宪坚持不检讨,林彪集团以及陈伯达死死抱成一团,要不然就全部揪出来,要不然一个也揪不出来,这样毛泽

东反而不好办,反而会从轻处置他们。只是吴法宪不懂林彪的意思,又抱着检讨 之后就能"过关"的侥幸心理,违背林彪的指示作了检讨,结果使林彪更加被动 了。

综上所述,陈伯达被打倒,应该说他自己的责任很大。陈伯达要不然就不要 卷入林彪集团,要卷进去,就干脆和林彪死死卷到一起。如果陈伯达一方面不认 错,另一方面公开承认自己与林彪是一伙的,这样毛泽东反而会从轻处置陈伯达。 陈伯达选择的对应方式,应该说是最"糟"的一种,不但"害"了自己,也"害" 了林彪。陈伯达这样的书生,本来不应该卷入政治斗争。

(101)

毛泽东的拿手战术是"各个击破",这次只拿掉陈伯达一个人,对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则采用"恩威并重"的战术,一方面让他们感觉到压力,感觉到再继续跟着林彪是没有出路的;另一方面又让他们感觉到希望,感觉到毛泽东给他们出路,促使他们投靠到毛泽东这边来。

毛泽东对林彪集团成员第一步施加的压力是"调查情况"。这种"调查情况" 是表示上级已经对你有怀疑了,但还没有认定你有罪。这时候头脑"灵活"的人,就会赶紧"弃暗投明"。关于这次的"调查情况",邱会作回忆说:

【8月26日下午,吴法宪通知我到总理的住处开会,这个会除吴法宪、李作鹏和我之外,还有康生、汪东兴参加。总理说:"按主席指示,召集你们来谈一谈,把有些情况搞搞清楚。"】

周恩来明确说,他和康生是奉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来"把情况搞清楚"。叫吴、李、邱三人来,显然就是挑明了毛泽东怀疑吴、李、邱这三个林彪的亲信。

陈伯达没有被叫来,因为陈伯达已不是嫌疑犯,已经被"定罪"了。这样毛泽东就把吴、李、邱三人与陈伯达分离开,让三人感到他们只是被怀疑,还有挽回的希望。

这次毛泽东让汪东兴也去,应该说是让汪东兴作为"弃暗投明"的榜样,让 吴、李、邱三人看到汪东兴认真检讨,"弃暗投明"之后,就可以重新做人,不 但不被处理,还可以保住高官的位子。

关于此事,吴法宪也回忆说:【8月26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他和康生要找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我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康生已经在座,汪东兴也在那里。这次谈话,主要是追查我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事情。

康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

康生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周恩来只问了问会议的情况,没有加任何评论。听到康生讲这些话,周恩来也一声不吭。我们说:"康生同志,你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早了点吧?"

总理趁势说: "今天就到这里,明天上午接着谈。" 总理又强调: "主要是把情况搞搞清楚。"】

(102)

吴、李、邱三人在这个时候,不但没有理解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康生"调查情况"的用意,还跟康生争辩,这样就失去"弃暗投明"的出路。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吃过晚饭,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 向他汇报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正好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 他告诉我们:"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 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 也不要当'。"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我们也告诉了林彪下午周恩来和康生追查我们的事情,林彪没有说什么,只是听,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吴法宪说:在毛泽东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应该说林彪对"设国家主席"问题,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并没有想一定会成功,所以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并没有失算,不成功也是意料中的结果。林彪是在"天才论"的问题上失算栽了跟头。

吴、李、邱三人向林彪汇报了周恩来和康生"追查"他们,林彪懂得毛泽东的用意,所以林彪要表现出镇静自若的满不在乎态度,说"让他们去讲吧",这样才能稳住吴、李、邱三人。

吴法宪继续回忆说:【8月27日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这天上午,我们又被追查了三个小时。康生一上来就要我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事,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

我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这是中央定的吗?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

我说得有一点激动,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

这时,邱会作也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 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

听了这话康生脸都红了, 忙说: "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 (103)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李作鹏对付康生是有办法的,以前的政治局会议上,一有机会李作鹏就挖苦康生。李作鹏说:"康老呀,我记得在'九大'时,主席说陈毅是'右'的代表,现在怎么成了反革命了?这是创造性的,还是讽刺呀?"

我们三个人把康生收拾了一顿,康生那个嚣张劲头才下来。不过我们也只是嘴上痛快,因为康生不是代表他自己来的,他是代表毛主席来的,我们这些人不谙世故。总理说话一直没有倾向性,总是说:"平心静气,平心静气,主要是把情况搞清楚。"】

邱会作在事后才感叹他们"不谙世故",因为康生是代表毛泽东来找他们"了解情况"的。毛泽东如果真的想要了解什么情况,应该找其他人去了解,那样才能了解到真正的情况。毛泽东是借口"了解情况",向他们施加压力,促使他们改变立场。然而吴、李、邱三人却不懂,还反过来把康生"收拾"一顿,可见这三人是"无药可救"了。因此,第二天毛泽东就发出让吴法宪写检查的指示。

据吴法宪回忆说:【8月28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

周恩来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恩来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我向林彪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

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 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

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看得出, 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104)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叶群对我们说:"林总的态度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理。'"从此他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叶群还说: "林总说,吴法宪提出检讨,这是他的权利。如果他要问我(林),我就说检讨是因为有错误,你吴法宪没有错,你检讨什么?"】

林彪明白,吴法宪这时是不能检讨的,因为检讨就是承认自己"有错误"。 吴法宪说的话都是根据林彪讲话的精神,一旦吴法宪有"错误",那就意味着林 彪的讲话有错误。吴法宪解释他的检讨可以保护林彪,实际上相反,吴法宪不检 讨,那样才能保护林彪。不过在这个时候,林彪也不能强行命令吴法宪不做检讨, 这样"逼"吴法宪,反而会把吴法宪"逼"到毛泽东那边去。所以林彪对吴法宪 的检讨, 只好听之任之了。

另外,让吴法宪检讨,虽然是出自周恩来之口,但实际上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吴法宪的检讨是写给毛泽东看的,而不是写给周恩来看的。吴法宪接着回忆说: 【在当时,我很清楚林彪不愿意我写检讨,可又觉得也不好违背周恩来的好意。前思后想,我感到这个检讨还是要写。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提纲,一共是两条:(一)讨论林彪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二)我对林彪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我拿着这个提纲,又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们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这样,我的这个检讨,一共只写了几百个字。】

吴法宪之所以违背林彪的意愿写检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吴法宪想保住自己现有的地位。此时毛泽东在"九大"上让吴法宪等人"一步到头"进入政治局的布局,发生了作用。因为吴法宪当时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他马上想到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吴法宪看到汪东兴检讨后就过关了,所以他也试图通过检讨来过关。吴法宪一写检讨,林彪就很被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当时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青、张春桥他们把前一段在北京讨论宪法时,做记录的人找来写了一个材料,又把这个材料捅到主席那里去了,并大肆宣扬说:"吴法宪造谣,说假话"。吴法宪当时已经"溃不成军"了,他没有和我们商量,竟承认自己说了假话。这件事引起了林总、周总理的极大注意,我和李作鹏对吴法宪则极为不满。

(105)

林总在吴法宪困难的时候,真是帮他。林总认为吴法宪不会说假话,并为吴 法宪专门说了一段话,林总还叫把他的话传出去。 林总说:"吴法宪没有说假话的问题。吴法宪跟我几十年,我就没有听他说过假话,也没有听别人说过吴法宪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吴法宪对毛主席、对党都是忠诚老实的,是不会说假话的人。"

林总还说:"在宪法小组,对运用毛泽东思想编写宪法,确实有过争论,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我们决不能说,提出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假话,这样就不是以理服人。"

同时,总理在东北小组也做了文章。虽然总理没有像林总那样直截了当地说 "吴法宪是不会说假话的人",但他说的话是很有分量的。总理说:"吴法宪是一 个很诚实的人,对争论的不同意见,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说假话。"

懂得内幕的人,对总理的话是完全理解的。吴法宪说假话风波到此就平息下去了。】

吴法宪的"溃不成军",其实还是私心作怪,想保自己的地位。吴法宪以为顺着上面的意思说话,就能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说了一些对林彪以及林彪集团不利的假话。后来吴法宪和邱会作关在一个监狱里,据邱会作回忆他们的监狱生活说:【一天,我们在一起闲谈,我说起了"8月8日"在叶群家谈话的问题。吴立宪立即紧张起来,并一下拥到我的肩上,流着眼泪说:"老邱!对不起你,我说了假话,可能对你有连累。我交代过,8月8日,在毛家湾叶群和我们说的主要是'要准备政变的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要说这样天大的假话?你不只是连累我,你还连累了黄永胜和李作鹏,连累了解放军!你给江青(没敢说主席)帮了大忙。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得起对不起都没用了。我不怪你,你放心好了!"

我这么说后,吴法宪哭得更伤心,他说:"是他们逼我说的。他们说:这是

给我提出了找出路的方法。我就是照着他们的需要说的和写的,结果什么也没搞到,还是关监狱关到现在。"】

林彪没想到,他最为信任的吴法宪,居然在关键时候掉链子。这场"天才论"的争论,表面上是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背后则是林彪与毛泽东的争论。林彪之所以敢支持吴法宪继续争论下去,是林彪相信吴法宪在关键时刻能顶得住。如果林彪事先知道吴法宪是个私心重,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他绝不会让吴法宪去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吴法宪像黄永胜那样,在关键时刻顶得住,林彪也不会输得那么惨。

(106)

文人与武将的性格差异,往往要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才能表现出来。面临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态度,陈伯达和林彪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陈伯达马上就屈服求饶,请毛泽东宽大处理。陈伯达回忆说:

【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 是最后得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我说:"我愿做自我检讨。"

毛主席说:"这样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一下子又说不了很多话。告别时,毛主席同我亲切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随后,由周总理、康生帮助我做检查。康生提的意见多,我都记下来了,不管康生自己的存意怎样,我当时都接受了,便算是我的。但检讨提到陈毅同志,这的确完全不是我的意思,当时我勉强记下来,我认为那些话是应该删去的。】

由陈伯达的回忆可见,他不仅主动检讨,而且把康生说的所有事情都认了。 即使是陈毅与他"二陈合流"的事情,陈伯达的回忆中说"我勉强记下来",可 见陈伯达连"二陈合流"这种根本没有的事情也认了下来,这就给陈毅带来了麻烦,使陈毅又遭到一次批判。好在陈毅也挨批挨惯了,并不在意。

陈伯达继续回忆说:【回到北京家中,想再三求毛主席和党中央宽大一些。 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到毛主席那里,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 回电话说:"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

以后我又打过几次电话,徐业夫不是说毛主席有事,就是说毛主席已经休息, 总之是不能见。我也就不好再求了。

我因觉得康生和毛主席关系比较好,又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康生,想请他帮疏通一下。康生不接电话,我要曹轶欧(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当我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儿,恩来同志来接电话了。他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以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

恩来同志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使我终生难忘。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陈伯达说:他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他;他请康生在毛泽东面前"疏通",康生不理他;他又打电话给周恩来……。总而言之,是陈伯达单方面求见,而毛泽东不理他,这点与刘少奇有些相似。刘少奇下台后也多次求见毛泽东,多次给毛泽东写信,但毛泽东都不理他。

(107)

林彪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除了毛泽东召他去开会外,从 来没有求见过毛泽东,也没有给毛泽东写过信。不仅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是庐山 会议之后,直到 1971 年 9 月林彪外逃,林彪也没有求见过毛泽东一次,也没有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林彪的态度是不屈服,不求饶,不检讨。新中国成立后, 党内高官对毛泽东态度如此强硬的,大概只有林彪一个人。

一般人看来,林彪态度这么强硬,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了。事实上林彪还是给自己留后路的,这就是"外逃"。当然林彪的这个后路,不是向毛泽东屈服的后路。一些人也认为林彪的悲剧是因为他个人的脾气太倔,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检讨一下,认个错,毛泽东念及他们几十年老战友的旧情,应该就会原谅林彪的。

这种看法是按照一般市井百姓的心态去理解毛泽东,而林彪却很清楚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是一个不讲私情的人,试图用几十年老战友的旧情来打动毛泽东,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另一种"铁面无私"之人,他不是在"法律"面前不讲私情,而是在"主义"面前不讲私情。

中国人一般是很重视私情的,某个人曾经帮过我,我就要回报他,不管他是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还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我只是回报他这个人,而不管他信奉什么主义。而毛泽东这样的人,却不讲这种私情。毛泽东的看法是:只要你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了,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我就要打倒你,不管我们过去曾经有过多少交情。

毛泽东与张春桥,可以说没有多少私交,而与林彪则是几十年一起出生入死 过的老战友。从私情来说,毛泽东与林彪的私情,远远大于张春桥,但毛泽东却 不是以私情为标准来考虑问题的。在毛泽东看来,张春桥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 的人,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人;而林彪走社会主义道路则不坚定,更不想继续革命。 因此,毛泽东在张春桥和林彪两人之间,取张春桥而舍林彪,并不是因为他特别 喜欢张春桥,只是他认为张春桥是坚定要继续革命的人。

另外,毛泽东支持张春桥,也关系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海是文革搞得比较好的代表性地区,如果张春桥被打倒了,那就是对上海这个文革典型的否定,也是对文革中产生出来的一批靠造反起家的人的否定,也就是对整个文革的否定。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发动文革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他是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文革的。

(108)

所谓"敌人"有两种:"公敌"与"私敌"。"私敌"是起因于个人恩怨,而"公敌"则起因于主义、路线、宗教等非个人恩怨的东西。比如士兵在战场上与敌方的士兵作战,敌方士兵与自己从未见过面,毫无个人恩怨,这样的敌人就是"公敌",而不是"私敌"。在解放战争期间,有一个常用词"人民公敌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公敌",而不是"私敌"。

对于毛泽东这样不讲私情的人来说,他的敌人基本上都是"公敌"。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的"公敌",现在毛泽东又把林彪看成是自己的"公敌"。毛泽东要打倒林彪,并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为了他的主义、他的理想。既然毛泽东把林彪看成是"公敌",而毛泽东又是不讲私情的人,那么林彪就不能指望毛泽东念及他们老战友的旧情和私谊,而与他重归于好。

这样一来,林彪就没有必要去向毛泽东求饶了。因为既然是"公敌"关系, 求饶不求饶,下场都一样,刘少奇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林彪就干脆强硬到底。

从另一方面来看,林彪也确是有胆量的人。像陈伯达这样的人,不要说不敢 对毛泽东造反,根本就连想也不敢想。而林彪不仅敢想,而且敢干。在林彪看来, 毛泽东既然要张春桥而不要他,既然毛泽东对他不讲私情,那么林彪也没有必要 对毛泽东讲私情,没有必要再念及毛泽东对他的恩情了。此时,林彪开始策划对毛泽东"造反"了。

以前林彪还只是想怎么逼毛泽东让步,还没有想过暗杀等手段,现在林彪与 毛泽东恩断情绝,就开始对毛泽东动起了"杀机"。当然暗杀毛泽东的事,是绝 对不能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讲的,所以林彪就出奇兵,让不引人注目的林立果 担当这个重任,这些是后话了。

邱会作回忆说:【8月2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常委会是否照常开会我不知道,但周总理、康生则每天晚饭后都要到毛主席的住处去。以我所知,林总一次也没有去过。事实上,这时候林总就已经被排除在中央常委领导之外了。】

毛泽东从庐山会议开始,就把林彪排出最高决策层了。但林彪毕竟占据着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位子,如果林彪对打倒陈伯达的事情不表态,就会在众人面前暴露出党内最高层的分歧,这点是毛泽东不希望的。于是毛泽东就想出一个办法,让林彪主持批陈伯达的会,逼林彪表态。据邱会作回忆说:

【主席还想了一个方法,叫林彪给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汪东兴开会,说我们犯了错误,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也 就解决了。

(109)

林彪是不愿意出面开这个会的,但主席发了话,林彪也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从8月28日开始,林彪就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他的住处开过三次会。每次会从9时开始,11时结束,每次会约两小时。

第一次会议开始时,林总说:"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我 们的会要开两三次,每次会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口头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 报告了。"

林总当面批评了陈伯达说:"你的书生气太重了,考虑的太多。主席批评我能不能再看张春桥两年,主席说得对。我们部队的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就是这些嘛。"

到会的人都说了话,说的内容都是有关团结的问题。当时,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还没有印发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有批判"天才论"的问题。大家的话都说得很简单,实质性的话一句也没有,这种会是纯粹做样子的。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林彪有些调侃地说(我从没有见到过林彪开玩笑,林说话向来认认真真): "你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你们为什么在同一时间,讲了同样的话?"

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对于让林彪主持这样的会,后来林彪说主席在"耍"他,他也只有应付差事。】

毛泽东希望林彪跳出来批陈伯达来保自己,就像当年刘少奇批彭真保自己一样,可是林彪并没有轻易上钩,他基本上没有批陈伯达,这就让毛泽东的计划落空了。

8月30日,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上庐山参加会议。,因为黄永胜在此之前没有直接卷入这件事,还可以说是"清白"的,因此毛泽东趁着黄永胜尚"清白"的时候,试图把黄永胜拉过来。邱会作回忆说:

【黄永胜一上山就被叫到毛主席住处,我们一直在吴法宪的住处等他。黄永胜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看林彪,半夜了黄永胜才回来,而且是和叶群一起来的。 黄永胜只简单地讲了一下毛主席和他谈话的情况,有些情况没有多讲,尤其是主席拉他和批评吴法宪的话。 黄永胜说,谈话一开始主席就问:"到庐山来紧张吗?"

黄永胜:"我刚到,就来主席这里。"

毛主席:"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一听说的是张春桥,也直言回答道:"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他特别倚重江青同志,我认为有些事是给主席脸上抹黑。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过去,没有向主席报告清楚,我应当负责!"(110)

毛主席:"你当然要负责,你是一个头。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有什么用?"

黄永胜: "江青自以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张牌嘛!她总认为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她总认为自己会赢。"

毛主席:"大王出过了,小王就当家了。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嘛,人不多喽。为什么连你都不向我报告江青的情况?"

黄永胜是个政治上挺成熟的人,因此他没有顺着毛主席的思路往下说,黄永 胜说:"我们不想干扰主席。"

毛主席:"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 "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来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为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毛主席:"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

毛主席:"现在把问题都解决了,不把问题带下山去。大家都要执行九大路线,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黄永胜:"我听主席的话,在主席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搞好团结。" 不过,黄永胜的态度,也决定了事后毛主席对林彪,黄、吴、李、邱的取舍。 毛主席当时已经很清楚了:要林彪、黄、吴、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 住,他们骨子里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拿掉林 彪,有没有以后的"九一三事件"都是一样。

黄永胜强调说:"老夫子(陈伯达)也是手无寸铁。"我现在想起这些往事,仍然认为黄永胜的思想水平是高的,人品是很可贵的。如果黄永胜被毛主席拉过去,问题就复杂了,毛主席就可能提前把林彪端出来。】

分化瓦解林彪集团,一直是毛泽东处理林彪问题的重点。如果毛泽东把掌握 重权的黄永胜等几个林彪的亲信拉过来,再处理林彪就好办多了。因此,毛泽东 一再向林彪的四大金刚招手,可他们就是不上毛泽东的这条船,最后毛泽东只好 向他们挑明说话。

据原军委办事组的李德生回忆说:【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可见,毛泽东几乎用明话对他们说:"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但这四个人仍然是"执迷不悟"。

(111)

8月29日,毛泽东让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做了检讨。毛泽东希望这次会上林彪出来表态,批评陈伯达和吴法宪,这样就表现出党内高层"团结一致"的象征。可是林彪却没有发表讲话,由周恩来和康生传达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精神。

周恩来说:【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 8月25日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停止了小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

周恩来代表毛泽东,解释这几天停开小组会的原因,是因为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错误发言",把会议"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可是陈伯达和吴法宪错在哪里呢?周恩来却没有解释。因为周恩来无法说清"称毛泽东天才"为什么是错的,也无法说清"设国家主席"为什么是错的。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意思,对犯了错误的人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所谓"允许改正错误"的内涵是很深的,首先要理解"改正错误"不是一句空话, 而是要做出一些实际的具体行动。对于吴法宪来说,他要想"改正错误",就要 有实际的行动,例如表示要脱离林彪集团,积极检举揭发林彪集团等等。当然毛 泽东也理解吴法宪等人这样做,是需要下决心的,决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毛泽 东也说"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不能着急。"

周恩来讲话之后,陈伯达和吴法宪作了检讨。关于吴法宪作检讨的事,邱会作回忆说:【8月28日上午,总理给我来电话说:"我已通知吴法宪写个检讨,这样争取主动,主席对于肯做检讨的人,一般是原谅的。我看吴法宪的精神有些

紧张,恐怕他写不好,你和李作鹏都去帮他起草一个稿子,拿给我看看。"

我说:"我马上照办。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吴法宪写检讨一事,是否要报告林副主席?吴法宪一旦检讨,势必影响到叶群,也就等于影响到林副主席。"

总理说:"你考虑得周到。但检讨还是要写的,不然主席那里不好交待,两 边都要兼顾到。关键是检讨怎么个写法,所以我才叫你和李作鹏去嘛。"

(112)

我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讲明情况,吴法宪表示感谢,说他自己先搞。吴 法宪的思想压力大,自己搞不深透,秘书搞,吴法宪又不满意,主要是怎么说林 彪,拿不定主意。

晚上我和李作鹏到了吴法宪的住处,共同商量检讨稿怎么写,大家商量了一个框架。吴法宪当时精力消耗太大,有些力不从心,我就执笔给他写了一个稿子,吴法宪认可了。

吴法宪向总理交了卷后,总理又把我们三个人叫去亲自谈,亲自动笔修改后才定稿的。总理还说:"你们几个人政治上一直都很顺利嘛,要经得起挫折。"

吴法宪的检讨稿很简单,第一点是说对林彪的讲话,自己理解上有偏差,因此在发言中有错误,自己发言中的错误自己承担。总理说:"这个提法好,要自己承担,保护副帅(指林彪,这是总理的专用语)"。第二点是说讨论林彪的讲话是吴法宪提出来的,他的提议干扰了大会的议程。这个提法就等于替总理开脱了,因为此事江青抓住不放,讨论林彪的讲话和听录音毕竟是总理同意的。总理对这一条特别满意。】

吴法宪的检讨内容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的态度。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如果吴法宪替林彪承担错误,保护林彪,那么吴法宪的检讨就是"不深刻",因为

吴法宪还不肯脱离林彪集团;相反,如果吴法宪在检讨中不替林彪承担错误,表 现出要脱离林彪集团的意思,那么吴法宪的检讨就"深刻"了,就可以过关了。

吴法宪在讲话中,替林彪承担错误,说自己错误地理解了林彪的讲话,错误 地提议干扰了大会的议程。吴法宪这样的检讨,林彪不满意,毛泽也不满意,只 是周恩来比较满意。吴法宪要让林彪满意,就坚持不检讨;吴法宪要让毛泽东满 意,就不替林彪承担错误。吴法宪这样的检讨是两头不讨好。

这次会上陈伯达也做了检讨,陈伯达在检讨中对自己的错误总结说: (一)不 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二)歪曲了林彪的讲话,乱讲"天才"问题, 引起大家的思想混乱;(三)作了煽动性发言,提出要"揪人"。

陈伯达检讨的内容倒是中肯的,不过他是这次事件的主犯,和吴法宪这样的 从犯不同。因此陈伯达再怎么深刻检讨,也是不可能过关的。

林彪在这次会上没有表态。据说周恩来在会上曾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 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却始终没有说 任何话。因为林彪不表态,毛泽东不得不采取另外的行动。

(113)

8月31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这是毛泽东即兴写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页边空白处,这与1966年他写《我的一张大字报》非常相似,同时,两者的内容也十分相似。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这样写道: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

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

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 '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篇约七百字的短文,可以算是毛泽东晚年亲笔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写完这篇文章后,先打电话让周恩来和康生过来看,这点与毛泽东当年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先让周恩来过来看的情况也类似。周恩来后来在会上对《我的

一点意见》做了一些说明,他说:【《我的一点意见》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考虑三天时间写《我的一点意见》呢?这将在后面分析。 (114)

毛泽东 1966 年写《我的一张大字报》,对象是刘少奇这个超重量级人物,而这次毛泽东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我的一点意见》,表面上是针对陈伯达,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

因为陈伯达这种轻量级人物,根本不值得毛泽东专花三天来给他写"意见"。 只有林彪这样超重量级的人物,才值得毛泽东这么做。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着眼点有以下三点:

第一个着眼点是向众人解释陈伯达说的"天才论"为什么是错的。在这之前, 毛泽东主要批评陈伯达在华北组"起哄"要揪张春桥,并没有涉及陈伯达说的"天 才论"。显然,要批评"天才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没 有什么辫子可揪,所以毛泽东需要想三天,才想出突破口。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这个材料(陈伯达搞的恩格斯等论天才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

首先毛泽东点了陈伯达的名字,在党内被点名批评是十分严重的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刘少奇是没有点名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称"陈伯达同志",这算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意思。

毛泽东指出陈伯达搞的"称天才"语录有三点问题,并声称他用这三点欺骗 不少同志。然后毛泽东借着列宁的称天才语录,把话锋一转,用列宁的话来批评 陈伯达。

毛泽东写道:【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说:列宁指出领袖要相互配合,可是陈伯达与他在三十多年中,在重 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这里毛泽东是言过了,陈伯达与毛泽东过去还是配合 的,不配合只是最近的事情。

毛泽东这样说,是意在把陈伯达的问题扩大到历史上,因为如果陈伯达单单 只是一个天才论问题,那么打倒陈伯达的理由还是不够充分的。

(115)

对此陈伯达回忆说:【这时我已不能参加任何大会小会,但简报还看得见。 有些关于我的事,是从简报上看到的。在一个会上,有人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 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 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还举例说,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就配合了。在那样 条件下,周恩来同志还能维护我,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

周恩来在会上为陈伯达稍做辩解,是因为他看到这是毛泽东的软肋。毛泽东 说陈伯达三十多年不配合,显然大家心中不服气。周恩来正面是为陈伯达说话, 侧面则是树立了自己对事对人的公正形象。有人说毛泽东这么批陈伯达不明智, 有损于自己在党内高官中间的形象,其实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 题的。 如果毛泽东要想树立自己在党内高官中间的形象,他最好是打倒张春桥,拿掉江青,这样党内高官会一致拥护毛泽东英明伟大。毛泽东搞文革,并不是为了提高他在党内高官中的威信,因为发动文革本身就不是为了党内高官们的利益来考虑的。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继续批陈伯达说:【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 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 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我的一点意见》的第二个着眼点,这是要告诫林彪,你的野心得逞不了。毛泽东明着指责陈伯达"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些话实际上是说林彪的。毛泽东还推测陈伯达搞突然袭击的动机说: "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

这里毛泽东明显说的是反话,如果陈伯达搞突然袭击是出于"良心"而不是 "野心",那么陈伯达这件事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因此,毛泽东其实是说陈伯达搞 突然袭击的目的,是出于"野心"而不是"良心"。可是陈伯达又有什么野心可 言呢?其实陈伯达这样的人,还够不上有野心,所以毛泽东这里说的"野心",指 的是林彪,毛泽东其实是暗指林彪发起这次突然袭击,是出于"野心"。

(116)

毛泽东继续写道:【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毛泽东这是用暗语告诫林彪: 庐山是炸不平的, 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不会乱的,

你林彪的野心是得逞不了的。

毛泽东这里又把话题一转,写道:【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我的一点意见》的第三个着眼点,这是制造一个党内 高层团结一致的形象。因为林彪对陈伯达的问题不表态,众高官就会认为林彪有 不同的看法,就会怀疑党内高层出现了分裂。此时毛泽东还不想把他与林彪的分 歧向众人暴露出来,因为现在还不是时机,大家的思想转不过弯来。

因此,毛泽东写道"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 这里,毛泽东代替林彪对陈伯达的问题表态了,这个"一致"是毛泽东强加给林 彪的。这样一来,众人就认为林彪和毛泽东的意见一致,就解决了林彪不肯表态 的难题。

毛泽东还说:天才论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而不是"唯物论的反映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奴隶创造历史,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这样就批驳了陈伯达说的"天才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时我们两人(林彪)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最后说:希望众人与他和林彪的态度一样,不要上当,不要相信"天

才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林彪本人是坚持"天才论"的,毛泽东巧妙地用《我的一点意见》,把林彪的观点改为了反对"天才论",这样林彪就与毛泽东的观点一致了。毛泽东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使林彪无法反驳,让林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17)

9月1日,九届二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全会转为学习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对此邱会作回忆说:

【在政治局讨论《我的一点意见》时,江、张、姚高兴得不得了,姚文元说: "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暗指林彪),我们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 文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 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

吴法宪、李李作鹏和我除了表态拥护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带着讽刺口吻说了一句:"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

我也说了一句:"表态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态度。"

周总理怕吵起来,就用其他的话把问题引开了。

分组讨论会恢复后,张春桥擅自参加了各个小组的会议,他的举动没有别的,就是要大家看看,"副统帅亲自上阵也没有把我张春桥打倒,还有什么人可以把我打倒吗?"

周恩来知道会场被他们搞乱了,非常生气,他告诉张春桥:"回到华东组去。" 张春桥对总理不屑一顾。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哈哈大笑。 江青的表演就更使人恶心了,她每天上午都到一个小组(不固定)的会场上去。 她到西北组的时候,一进门就笑起来,表示非常高兴的样子。江青坐下之后,她 说:"我来晚了,是有原因的。我要协助毛主席处理会务的许多问题之后,才能 出门。我是来看看大家的,毛主席睡觉很好!"

康生在西北组除了把我讽刺了一顿之外,还以"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为 题讲了大约两小时。】

众高官都知道,陈伯达在他的"称天才"发言中,点名赞扬过吴法宪,所以 批判陈伯达,吴法宪也有问题。一些头脑灵活的人,闻出了政治气味,开始转向 批吴法宪了。据吴法宪回忆说:

【全会开始批判陈伯达,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 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

小组会开始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

(118)

我当时真是忍了又忍,心想:反正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就由她去说吧。曹轶 欧说完,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和外贸部部长李某等都跟着来指责我,对这些,我 也是硬着头皮听着,不吭声。

散会以后,我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 是批判吴法宪了。"

叶群对我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问我: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把西南的情况说了说,周恩来考虑了一下,说:"下午我来。"

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西南组坐镇来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听了一段,就说: "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

周恩来这样一插话,会议的气氛就又变了,我很感谢周总理当时对我的保护。

西南组还有朱德、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不但没有批我,连陈伯达也没有批。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这些老同志,他们不仅斗争经验丰富,城府也很深。】

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林彪集团困难的时候,还是帮林彪的,周恩来并不希望 林彪倒台。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人,也没有跟着批陈伯达,他们的"斗争经 验丰富",看出批陈伯达的水很深。

吴法宪接着回忆说:【陈伯达的问题批了两天,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9月2日晚,毛泽东通知开中央常委会,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碰头。

我们见到了叶群,她告诉我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毛泽东还提出:"9月6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

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

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是决定,9月6日全会结束,发公报。这样毛主席给了康生一记闷棍,因为康生很狂,这次会上,除了毛主席就是他了,林彪、周恩来都没有讲话。】

毛泽东批陈伯达,本来只是造一个声势,因为除了江青等造反派之外,大部分高官对批陈伯达是有抵触的,是想不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知道越批陈伯达,大家的抵触情绪越大,所以很快就停止批陈伯达。而康生却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以为毛泽东痛恨陈伯达背叛了他,一定要把陈伯达这个"叛徒"彻底批臭才罢休,所以提议继续批陈伯达,结果反而惹毛泽东生气了。

(119)

毛泽东停止批陈伯达之后,从9月3日起,庐山的"战火"暂时平息,九届二中全会转回到原来的议题,就是审议《宪法草案》和《经济计划报告》。众人被这次会上的风云突变搞得很紧张,对这两个报告也没有心思讨论,很快就通过了,全会于9月6日闭幕。在闭幕式上,陈伯达在主席台上的座位没有了。对此邱会作回忆说:

【9月4日,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到会的陈伯达说: "闭幕式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如果参加,别人会把你从主席台上撵下来。"

主席说完话,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他低着头坐在那里不动。这时总理走过去,给陈伯达咬了咬耳朵,陈伯达站起来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了。

陈伯达走了以后,主席又接着说:"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我在这里向中央揭发陈伯达,陈伯达是个托派、叛徒。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伯达有变节行为,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一贯追随王明……"。主席还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由林副主席主持。这是毛主席特意要林总主持会议的,毛主席说:"你要不主持会议,大家会有很多想法的。"】

据邱会作回忆说,毛泽东提出陈伯达不要出席闭幕式,陈伯达非常窘迫。因

为陈伯达如果听了毛泽东的话,立即起身退出会场,会被认为是对毛泽东不满,愤然退场,所以陈伯达不敢走。可是陈伯达不走,大家继续要讨论闭幕式的事情,陈伯达加在中间非常尴尬。所以此时周恩来就及时地出面,让陈伯达退场。这样一来,陈伯达就是被命令退场,而不是自己主动愤然退场,这样就为陈伯达解了围,也为毛泽东解了围。

陈伯达走后,毛泽东才谈陈伯达的问题,毛泽东亲自揭发陈伯达有历史问题。 前面提到过,要打倒陈伯达,仅仅是"称天才"这点小错误是不够的,必须加上 历史问题才行。一般来说,嫌疑人的历史问题都是别人来揭发的,可是众高官经 过庐山会议上的风云突变,大家都变得谨小慎微,生怕说错了话,所以最好是不 说话。

同时,由于陈伯达是毛泽东几十年来的秘书,所以没有人敢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因为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就避免不了要牵扯到毛泽东。假如有人揭发毛泽东的秘书是叛徒,那么毛泽东重用一个叛徒当了几十年的秘书,这岂不是让毛泽东很尴尬,并且暗示毛泽东用人很糊涂。

(120)

因为陈伯达的历史与毛泽东牵连得太深,没有人愿意自找麻烦去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更没有人敢说毛泽东的秘书是托派和叛徒。因此,毛泽东就不得不亲自来揭发陈伯达的历史问题,亲自给陈伯达扣上有变节行为的帽子。按照惯例,一个人一旦有了历史问题,就需要成立专案组来调查。9月9日,陈伯达专案组成立,周恩来负责,成员有康生和李德生。

另外,毛泽东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毛泽东 这里的意思,是看陈伯达今后的表现,如果表现好,可以给陈伯达当一个中央委 员。

对于陈伯达来说,怎样才算是表现好呢?因为毛泽东今后要展开一场对林彪的斗争,如果陈伯达能够积极配合毛泽东,揭发林彪的问题,那么还是有可能当一个坐冷板凳的中央委员。不过后来陈伯达并没有检举揭发林彪的问题,这样陈伯达也就面临彻底打倒的命运了。

9月6日的闭幕式上,周恩来首先发言。周恩来没有谈具体的事,只是说: 【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加强团结。要 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不能让步。这次庐山发生的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处理得很好。主席再三说对庐山会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要搞好读书学习,应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最后周恩来向众人宣布:他代表毛泽东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周恩来发言之后,康生做了长篇讲话,从理论上批判了"天才论"。不过这次林彪没有发言,这与他在开幕式上作长篇讲话形成鲜明对比。相反,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没有讲话,但在闭幕式上却做了较长时间的讲话。

毛泽东说:【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指陈伯达编辑的《称天才语录》中所收恩格斯的德文第三版序言),就照着吹。那末,你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

毛泽东首先指责陈伯达仗着读书多,欺骗了大家,所以号召大家多读几本书,才会不上当。毛泽东这里说的"黑秀才"当然是指陈伯达,而"红秀才"则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

(121)

毛泽东接着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我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这里是不点名地批评林彪等人劝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理由,声称"当国家主席是尊重人民的意愿"。所以毛泽东说,他在1959年就不当国家主席了,如果根据这个道理,那么毛泽东在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

毛泽东还特别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这句话显然是指林彪的,因为林彪六次提出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说:我就是不干,你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继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毛泽东这段话,指的是林彪在开幕式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陈伯达又进一步把林彪对张春桥的批评扩大化,发展到"揪人"。毛泽东这里说"不讲团结",主要是指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毛泽东批评林彪发起对张春桥的进攻,是破坏了党的团结。

关于毛泽东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的讲话总是旁征博引、议论风生的。毛泽东说他自己不是天才,即使马克思的著作也不都是天才著作。毛泽东援引了马克思的一封信,说明当时马克思的经济很困难,生活很窘迫,因此在应美国的一份刊物约稿时,故意把文章写得很长,为了

多得稿费。

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句话使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这第一个"陈"指的是陈伯达;第二个"陈"指的陈毅。因为陈毅也跟着发言,说自己是有反党经验的人,就是有人在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等等。毛泽东听说了陈毅的这一番发言,就在闭幕会上提出"二陈合流"的说法。

其实,毛泽东此话是错怪陈毅了。陈毅在会上最多也属于上当受骗之列,根本谈不上和陈伯达"合流"。后来,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病榻上的陈毅立即投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和林彪、陈伯达之流毫无瓜葛。】

(122)

毛泽东其实并没有误认为陈毅与陈伯达是一伙的,只是因为陈毅在历史上多次反对过毛泽东,这次又趁着机会向毛泽东发难,所以毛泽东要再次批陈毅一下,不能让他"旧病复发"。毛泽东说:【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此种人不可少,我说还可以允许。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

毛泽东批评陈毅"历史上历来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但毛泽东又说可以允许陈毅这样"反对派"存在,所以他说:"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毛泽东这里所谓的"一分为二",指的是有陈毅这样的反对派存在,也不一定是坏事,也可能有好的一面,所以称"一分为二"。

闭幕式结束时, 林彪因为是主持人, 不得不说几句, 于是林彪简单地说: 【这

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 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林彪不仅没有批评陈伯达,甚至闭口不谈毛泽东写的重要文献《我的一点意见》。林彪只是泛泛地说经过毛泽东的指导,这次会议的问题顺利解决了。众人 们都能从林彪的简单讲话中,看出林彪对陈伯达问题的温度差。

对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众高官来说,大部分人应该对陈伯达是同情的,对毛泽东袒护张春桥等人是不满的。据邱会作说:【全会闭幕了,服务员在打扫会场的卫生时,竟然从地上拾到一张条子,写上面着:"打倒张春桥——几个中央委员"。周恩来看到条子后,非常感慨。我想主席看到条子后,一定也非常吃惊。】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林彪就下庐山回北戴河休养了。林彪并没有直接向毛泽东辞行,而是带着叶群去江青那里,算是间接向毛泽东辞行。据吴法宪回忆说:【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破裂了。

(123)

林彪回来以后,叶群又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上去比较吃力,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进门后, 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 一见面就说: "你们不听我的话,

所以犯了错误。"

当时我心想: 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

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

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了。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巴,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 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

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 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 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

我说:"我检讨只涉及自己,和你们没有联系。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允许 改嘛。"

黄永胜他们几个都安慰我说:"不要再检讨了,再检讨也是一样。"

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 林彪下山的时候,周恩来去送行。据邱会作回忆说:【9月7日,林彪下山 了。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握双手,面面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和我,下山到九江机场向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留念。(以 后见到有关材料说我们这张照片是"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林总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 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

从此以后林彪就很少和我们联系了。】

林彪在离开庐山之后,基本上不再与他的"四大金刚"联系了。林彪知道,这时候如果他继续与"四大金刚"联系,继续向他们发出指示,反而给"四大金刚"惹麻烦,反而让他们为难,所以林彪干脆就不再与"四大金刚"联系了。

林彪把"四大金刚"托付给了周恩来,说"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 话外之音就是:我不再管你们了,也管不了你们了,你们就投奔周恩来吧。

然而,林彪并没有就此放弃斗争,束手认输。从此以后,林彪悄悄开始了他的另一场与毛泽东的斗争。

(124)

在毛泽东的文革中,出现林彪事件,好像是战略部署之外的一个意外。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战略部署是很清楚的,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我的一张大字报》,到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都是一步一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的。

可是在林彪问题上,就看不出毛泽东拿掉林彪清晰的战略部署,因此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毛泽东是准备让林彪接班的,并没有想过主动拿掉林彪;第二种看法是毛泽东是不准备让林彪接班的,早计划好了要拿掉林彪。

毛泽东真的准备让林彪接班的第一种看法,由于对后来发生的各种事件无法 自圆其说,所以现在的主流看法是认为毛泽东早计划好要拿掉林彪。其中代表性 的说法有《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说:

【毛主席还有一个苦涩,就是文革的问题。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的讲话,

讲张春桥的话是含含糊糊的,而且也没有点名。所以听林彪讲录音,讨论林彪的 讲话,毛主席都同意了,总理也非常积极。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在讨论林彪讲话 的时候,对张春桥形成了讨伐。而且,几乎全体的中央委员都拥护林彪的讲话, 几乎是一呼百应,这种号召力毛主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没有"设国家主席",没有林彪坚持"天才的观点",没有陈伯达搞"称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吗?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讲的,搞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否定了文革,基本上等于也否定了他。毛主席认为林彪不是对着张春桥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着文化革命来的。

林彪经过庐山会议的折磨,并没有什么损失,地位和威望并无损失,反而提高了。大家本来就对江青、张春桥十分怨恨,庐山会议上的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心里也明白,主席心里也明白,以陈伯达换张春桥本来就有些不值,保护张春桥伤害林彪就更不值。主席不停地张罗,收效甚微,大家口服心不服,反而同情林彪。主席会想:这样的林彪能够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吗?

毛主席借"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为由,把林彪和黄、吴、李、邱画在一个圈子里,先扣上帽子,然后进行削弱和打击。这种削弱和打击不是在 庐山偶然形成的,而是九大以后毛主席对林彪就不感冒了,他是要找机会削弱和 打击林彪的,在庐山正是机会。

九大以后,主席开始挖苦林彪(四个伟大讨嫌啦,缔造不能指挥啦,三个副词啦,等等),然后是国家主席问题,然后是九届二中全会,然后是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然后是华北会议,然后是批陈整风汇报会,给黄、吴、李、邱戴上紧箍咒,然后是南巡讲话,点了林彪的名,准备在九届三中全会拿下林彪,然后是"九一三"事件。】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毛泽东其实也是有一步步的战略部署拿掉林彪的,只是 因为拿掉林彪的战略部署,不像拿掉刘少奇时那样是透明的,在新闻报纸上广为 宣传,搞得众人皆知。毛泽东拿掉林彪的战略部署是不透明的,只有在中央最高 层的圈子里才能感觉到,一般中央委员都感觉不到,普通老百姓就更蒙在鼓里了。

毛泽东准备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拿掉林彪,准备在那时把林彪的问题向全党公开,进而向全国公开。可是林彪却提前动手了,在毛泽东没有来得及公开林彪问题之前,他先"叛逃"了。这样一来,因为新闻报纸上长时间对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大作宣传,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林彪这样的亲密战友也会"叛逃",感到非常震惊,进而对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产生怀疑,因为毛泽东居然看不出来,他的亲密战友原来是一个想要暗杀他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当时新闻报纸在吹捧毛泽东的同时,也在吹捧林彪;在祝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同时,也祝林彪身体健康;在歌颂毛泽东缔造解放军的同时,也说林彪指挥解放军。当时还有一种"三大助手"的说法,声称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因为马、恩、列、斯是并列的,如果把林彪说成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那么林彪也可以和毛泽东并列了,形成新的"马、恩、列、斯、毛、林"六大伟人。黄永胜等人就多次说:"林副主席是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的最光辉的助手。没有林副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军队,就没有我们的国家"。

毛泽东当然察觉出新闻报纸在吹捧他的同时,也在吹捧林彪。毛泽东准备要 拿掉林彪,就首先要停止新闻报纸对林彪的宣传和吹捧。毛泽东直接下令新闻报 纸停止宣传吹捧林彪,显然是很难的。因为林彪是接班人,毛泽东找不出理由停 止对接班人的宣传。

因此,毛泽东就下令停止对他本人的吹捧,新闻报纸停止了对毛泽东的吹捧,同时也就停止了对林彪的吹捧。由于毛泽东的威信已经很高,停止对毛泽东的宣传,对毛泽东不会造成什么损失;相反林彪的威信还不够高,停止对林彪的宣传,对林彪的损失就比较大了。所以,毛泽东批评林彪的"天才论",停止新闻报纸对毛泽东的吹捧,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停止了对林彪的吹捧。

后来 1971 年 8 月毛泽东在南巡讲话时,把这个问题挑明了。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 现在我已经树得不得了嘛。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126)

毛泽东这里明确指出,所谓"大树特树"的宣传,其实并不是在树毛泽东,而是在树林彪。因为毛泽东本人已经"树得不得了",还需要林彪再来树吗?然而,林彪的威信还没有到"树得不得了"的程度,还有必要继续宣传。因此毛泽东停止"大树特树"的宣传,实际上是停止了宣传林彪。

有人对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理解,认为国家主席不过是一个名誉头衔,给林彪当了也不要紧。这种看法,是建立在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接班的前提下。如果毛泽东真要让林彪接班,给林彪当一个国家主席,当然也没什么问题。但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毛泽东并没有准备让林彪接班,而是准备拿掉林彪。在拿掉林彪的前提下,毛泽东当然就不能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了,因为这样会增加毛泽东拿掉林彪的困难。

另外,毛泽东本人当国家主席,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本来在1959

年就主动辞去了国家主席,那么这次毛泽东为什么又要重新出来当国家主席呢? 人们就会想: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就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甚至联想到毛泽东 搞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回国家主席的大权,因为当时的外电就是这么评论的。 毛泽东再次当国家主席,不仅对毛泽东本人的名誉不利,连文革运动也会被披上 "权力斗争"的色彩,所以毛泽东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一年后的南巡讲话中,对庐山会议的性质分析说:【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否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

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意味着 林彪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一样。既然林彪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一样,那 么林彪就不仅仅是拿下的问题,而是要打倒的问题。

不过这次毛泽东打击林彪时,基本上没有让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插手,都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面。毛泽东这么做,也是看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中央的"民愤"太大,如果再让江青、张春桥充当打手去打倒林彪,那么江青、张春桥等人会引来更大的"民愤",他们在中央就呆不下去了。所以毛泽东这次要保护一下江青、张春桥等人,自己亲自出面打击林彪,使得江青和张春桥可以少得罪人。

(127)

毛泽东要拿掉林彪,这点林彪本人是最清楚的。为此,林彪建立了两只亲信队伍,一明一暗。"明"的地上队伍是"黄、吴、李、邱"四大金刚,掌握着总参谋部等军队主要指挥系统的权力;"暗"的地下队伍也称"小舰队",是通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拉起来的一只队伍。关于林立果的个人材料,现在透露出来的不多,但毫无疑问,林立果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才干的人。

作为林立果政治才干的证明,就是林立果建立起来的"小舰队"。这个小舰队从事暗杀毛泽东的事情,每个成员都知道干这样的事情是有杀身之祸的,可是这些人却没有一个人为了保自己的性命而去告密。在林彪外逃后,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周宇驰等,劫持一架直升飞机,向外蒙古方向逃跑,结果没有跑成,周宇驰等人开枪自尽。

虽说林立果可以仗着林彪的地位,用高官厚禄来收买人,但那些冲着高官厚禄而来的投机分子,在关键时刻肯定是要自保的,绝不会为了林立果而牺牲自己的性命。林立果有能力组织起一只愿意为自己效死力的队伍,周宇驰等人愿意为了林立果去死,可见林立果的组织能力非同小可。

林立果的"小舰队"中,没有一个在关键时刻告密的投机分子,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林立果有眼力识别出哪些人是投机分子,哪些人是忠诚可靠的,这样才只把忠诚可靠的人吸收进来。考虑到林立果组建小舰队时,才25岁,似乎真有林彪"少年将军"的遗传。

有人说林彪要搞政变的话,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林立果这样的毛头年轻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种看法的错误之处,就是教条地认为:年轻人一定不如年老人,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交给年老的人去办,这样才稳妥。

林彪 21 岁当师长, 23 岁当军长, 到 25 岁的年龄, 林彪已经当军团长了。

毛泽东说过:"在井冈山时代,我们的敌人都比我们年纪大,比我们有经验,比我们成熟,但胜利的还是我们。"因此,认为年轻人不能担当重任,是教条主义的看法。

林彪从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来看,25岁的林立果已经不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毛孩子,而已是可以充当天下重任的大将了。林彪的眼力也非同小可,看出了林立果的才干,敢放手让林立果去干。

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林彪这样的百胜将军,如果要搞政变的话,他应该依靠"黄、吴、李、邱"等老将,而不是依靠林立果的"小舰队"。以此推论,因为林彪没有通过"黄、吴、李、邱"搞政变,所以林彪就没有搞政变的阴谋。

(128)

持这种论调的典型是《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说:【事实已经证明,黄、吴、李、邱是没有搞政变的,没有参与"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军舰,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这就是不合情理。】

邱会作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建立在年轻人一定不如年老人的教条主义上。 从各种事实来看,林立果的水平是高于"黄、吴、李、邱"等人的。在"九一三" 事件后,从林立果住房中搜查出一张林立果亲笔写的谈话要点。1970年8月的 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谈话说: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

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林立果说"黄、吴、李、邱的政治水平低,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这个看法是中肯的。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在回忆录中都承认,自己"不懂中央政治"。周恩来为此教育他们,他们也还是不懂。

林立果特别说"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林立果这里提到的"我们",就是林彪的地下部队。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发现黄、吴、李、邱等人搞政治斗争根本不行,所以林彪放弃依靠"四大金刚",转而依靠林立果这只暗中的地下部队。

有人说林彪搞暗杀,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推论林彪不会干这样的"傻事"。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理解所谓的"英雄",就是敢想敢干一般人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如果按照上述的看法,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是干"傻事",因为他们推翻秦王朝的可能性太小了,倒是被秦王朝的军队消灭掉的可能性很大;毛泽东上井冈山也是干"傻事",因为他们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可能性太小了,倒是被蒋介石军队消灭掉的可能性很大。

其实林彪也知道,林立果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最多也就是百分之一。 不过作为一个敢想敢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说,百分之一的取胜机会,就很值得 去争取了。我们返回头来看,当年毛泽东上井冈山,打败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可 能性有多大?恐怕千分之一也没有吧。林彪搞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远大于毛 泽东上井冈山时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林彪是值得一试的。况且,即使是失败,林 彪还有外逃的退路。因此,林彪下决心试试自己的运气。

(129)

在分析林彪后续的所作所为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关于林彪事件的定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很多对林彪事件的翻案性研究,这些研究大大推翻了官方说法,提出各种崭新的论点,但也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

关于林彪事件的定性,最关键的是三条:(一)林彪为什么要外逃;(二)有没有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三)林彪是否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林彪为什么要外逃

关于林彪为什么要外逃的官方解释,最早是 1971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该文件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 林彪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 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 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 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林彪的妻子叶群、 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

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另一架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字驰、于新野开枪打死驾驶员,然后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 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 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林彪反党到底,跟着他投敌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和死党几个人,而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彪的女儿林立 衡。这就说明:即使像林彪这样名声很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旦背叛革命,是 多么孤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跟着林彪走 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 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130)

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这份中央文件是在林彪9月13日外逃5天后发出的最早第一手资料。发出这份文件的时候,中央还没有发现《五七一工程纪要》,所以该文件中只是说林彪外逃是为了投降苏联,而没有提到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九一三"事件的大致情况是: 林彪私自调他的专机(三叉戟型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在关键时刻向中央揭发了林彪私调飞机之事。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开枪打伤警卫人员后,紧急登上三叉戟型飞机,飞机于9月13日零时30分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飞入外蒙古后,因燃油不足迫降失败,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9月13日3时15分,林彪死党周宇驰等人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一架直五

型直升机,周宇驰等人用手枪逼飞行员向境外飞。飞行员骗过周宇驰等人,将飞机飞回北京并迫降在怀柔县境内。周宇驰开枪打死飞行员,然后周宇驰等两人开枪自杀,另一人被活捉。

"九一三"事件,并不是林彪的一架飞机外逃,而是两架飞机试图外逃,只是后一架飞机没有外逃成功。搞清楚"九一三"事件是两架飞机外逃,对理解林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林彪为什么外逃问题,有很多翻案性的研究,比如"导弹击毁说"、"西山镇压说"、"绑架出逃说"、"替身代死说"、"软禁老死说"等,这些观点过于荒谬,这里只讨论一下最具有代表性的"避祸说"。

"避祸说"认为林彪并无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也不存在《五七一工程计划》, 林彪外逃的原因,只是为了躲避毛泽东准备打倒他。林彪担心自己遭到刘少奇的 下场,就带着老婆、儿子逃亡苏联,试图"避祸"。这种说法还宣称林彪外逃是 毛泽东"逼"的,"九一三"事件是被逼出来的。

"避祸说"乍看上去似乎颇有道理,但它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无法解释第二架直升飞机为什么要外逃。如果说林彪外逃还有"避祸"的理由,劫持直升飞机的"主犯"周宇驰,不过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小小芝麻官一个,他有什么理由要"避祸"呢?

周宇驰如果不是干了《五七一工程计划》那样的事,他为什么要劫持直升飞机外逃?为什么要枪杀飞行员?为什么要自杀?所以说,"避祸"只能解释第一架三叉戟的外逃,却完全无法解释第二件直升机的外逃。因此,"避祸说"是经不起逻辑推理和无法自圆其说的。

(131)

几乎所有的关于林彪的翻案性研究,都用了一个"小花招",就是略去第二架外逃直升飞机的存在,把整个"九一三"事件,描述为仅仅是林彪一架三叉戟在外逃,这样他们的论点才能成立。而一旦引入第二架外逃直升飞机,他们的论点就不成立了。

因为"九一三"事件中,存在两架飞机外逃的事实,所以不管任何观点,必须同时解释这两架飞机同时外逃的原因。目前只有官方的说法,只有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样的东西,才可以同时解释这两架飞机外逃的原因。而各种对林彪的翻案性研究,都无法同时解释这两架飞机外逃的原因。尽管官方的说法有很多时代的政治色彩,但仔细推敲下来,还是官方的说法比较合理。因此,我们认为官方的说法大体上是真实的,当然在一些细节上有商榷的余地。

(二)有没有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些研究者否认《五七一工程纪要》,说这是官方伪造的。可是这些人的论证,也都避开第二架外逃直升飞机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周宇驰等人没有干《五七一工程纪要》那种泄露出来要杀头的事情,他们何必要劫持直升飞机外逃呢?又何必要枪杀飞行员和自杀呢?

那些否认《五七一工程纪要》存在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清楚,如果没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第二架直升飞机为什么要外逃。因此,否定《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论点也是经不起逻辑推理和无法自圆其说的。

(三)林彪是否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些研究者承认有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存在,却又说这只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单独搞的,林彪并不知情。然而这种说法也是有违常理的。

第一,因为暗杀毛泽东是风险极大、孤注一掷的行为,林立果怎么可能不经

过林彪的同意,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的性命去冒这样的巨大风险呢?

第二,林立果策划暗杀毛泽东的时候,必须想好一个退路,就是暗杀失败怎么办?显然,林立果暗杀失败的退路,就是乘林彪的专机外逃。而乘林彪专机外逃还要有一个准备工作,就是事先必须做好飞行员的工作。如果飞行员不配合,林彪的飞机根本起飞不了,更谈不上外逃了。

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可能调动林彪的专机?如果没有林彪事先做工作,飞行员怎么可能配合林彪外逃?

因此,林彪是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而且他就是幕后总指挥,这样才能解释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132)

写林彪的"地上部队"相对比较容易,因为相关的史料较多,而写林彪的"地下部队"就比较困难,因为相关的史料很少。人们对林彪的"地下部队"知道得很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这是一支搞暗杀等秘密活动的队伍,他们对外一切都是保密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详细知道他们的内幕。

有人说:因为没有发现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的确凿证据,所以就做出结论说林彪没有参与这件事。这样的结论是过于轻率了,因为找不到林彪的确凿证据,是理所当然的事。林彪试图要搞暗杀,他的一切行动必然是极其秘密的,自然不会留下明确的证据。虽说林彪与此事有关的确凿证据找不到,但蛛丝马迹还是有的,我们还是可以推证出林彪是真正的幕后老板。

对于史料来说,可以分为三种:一级史料;二级史料和三级史料。一级史料 是档案,文件,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二级史料是研究论文,人物传记,历 史著书等;三级史料是文学野史、传闻轶事等。 一级史料是未经过加工处理的原始材料,二级史料是经过作者加工、整理、 裁剪的东西。然而作者在加工、整理、裁剪的时候,难免会混入一些自己的主观 看法;三级史料的文学野史,主要是为了娱乐,并不注重历史真实性,但有的也 夹杂一些对当事人的采访,其史料价值要认真考辨。

真正搞历史研究,一定要基于一级史料,因此我们在文章中基本上都采用一级史料。可是写林彪的"地下部队"时,因为一级史料太少,只好也选用一些二级史料。关于林彪地下部队的一级史料,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原文,当事人李伟信、江腾蛟等人的交代材料,当事人周宇驰的女儿、妻子的回忆等。比如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的一篇回忆文章《现代荆轲:回忆我的父亲周宇驰》,承认她父亲确是要去暗杀毛泽东,所以称她父亲为"现代荆轲"。周向红的文章虽说没有直接涉及《五七一工程》,但还是从侧面提供不少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关于林彪"地下部队"的活动细节,最主要的文章是《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写的《"联合舰队"的覆没》以及《林彪出逃真相》,当时在《解放军报》连载(1985年),曾经轰动一时。但邵一海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的,对文中的资料并没有给出出处。后来文革史专学王年一等人写的《大动乱年代》、《文革十年史》等书,在讲到林彪的"地下部队"时,也是转引用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等文章。因为王年一等人在引用资料时,毕竟做过一些考证,所以我们这一部分转引一些《大动乱年代》、《文革十年史》等书中提供的史料。

(133)

1966年文革开始时,林立果 21岁,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读书。在学校停课闹革命之后,林立果没有像很多高干子弟那样,积极投身文革参加红卫兵

和造反派,而是采取观潮派的态度,因此林立果没有参加过造反派。林立果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意思。在那时,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和侄儿毛远新,都是造反派的头头。1967年3月,就在全国大夺权的高潮中,林立果离开北大,当兵入伍,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

关于林立果到空军的事,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个大、中学校便很快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学校停课以后,书读不成了,叶群又不愿意林立果到处去串联。当时,叶群认为参军是一个好出路,把林立果放到军队里控制起来,比让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

由于空军是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很多高级干部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空军里来。比如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安排在空军一个导弹部队当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又根据周恩来和汪东兴的意见,保送毛远新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很快成了该校造反派的头头。以后,毛远新又相继成了中央文革驻东北地区的联络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等职务。

另外,还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 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杨德中等许多人的子女和亲属,都先后 来到了空军,空军云集了许多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子弟。

1967年初的一天,叶群问我:"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当个参谋是不是可以?"

我说:"放到北京军区空军,还不如直接放到空军司令部。林立衡(林彪女儿) 现在空军政治部,如果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就比他姐姐低了一个档次, 他能愿意吗?不如就放在空军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顾。"

听了我的话,叶群很高兴,说:"那好,就放在空军司令部。可是干什么好呢?"

我说:"当个参谋也可以,当秘书也可以,当秘书可以放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叶群说:"那还是当个秘书吧。但是立果不熟悉业务,不会做工作怎么办?"我说:"那好办。'党办'有老秘书,我可以指定一、两个人来专门培养立果。"(134)

我们就这样商定了。我万万不会想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样严重的后果。

不久,林立果来到空军,我把他安排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并且指定"党办" 一个名叫周宇驰的科长来负责帮助林立果。以后,帮助林立果的人又加上了一个 刘沛丰。

周宇驰原来是哈尔滨第一航校的一个宣传科长,后来给刘亚楼(原空军司令) 当了秘书。一次,因为他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部队去锻炼。由于周宇驰的写作水 平不错,1966年冬天,我们又把他调回"党办"当了科长。周宇驰和林立果相 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林立果的信任,他们俩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林立果的表现还不错。过了半年以后,叶群就提出:"立果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能不能培养他入党?"

我说:"可以,周宇驰是一个老党员,就要他培养林立果入党好了。"

接着,叶群又要我给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飞作一个交代,要王飞多关照一下林立果。所以我又告诉王飞:"要多照顾和锻炼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独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

才。"

不久,周宇驰向我汇报说:"可以发展林立果入党了。"

周宇驰认为,林立果在各方面都够条件,没有问题。他还提出:"由首长你和我两个人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

我表示说: "只要他够条件, 我就可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亲自参加了通过林立果入党的支部大会。我还在 这次会上讲了话,我说:"林立果到空军以后,有不小的进步,工作表现很好, 介绍他入党是应该的。希望林立果同志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 员。"

林立果发言表态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力争从政治上、业务上很好地提高自己,决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到底。"

最后,支部大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了林立果的入党申请。林立果入了党,叶群非常高兴,她对我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很正确的。"叶群还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

在对待林立衡和林立果的问题上,叶群的态度有些不太一样。从 1965 年林立衡来到《空军报》社工作以后,叶群对林立衡在空军的情况,一般不予过问,更不加干涉。我对林立衡也没有给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只是在后来把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党办副主任的同时,也将林立衡任命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135)

林立衡为空军办了好几件实事,例如毛泽东为《空军报》的题词,就是我通过她去办的。当时我对她说:"你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能不能请毛主席为《空

军报》写个报头?"

结果林立衡很快就办成了,毛泽东还在题词上特别写道:"送林彪同志的女 儿林豆豆。"

毛泽东还很欣赏林立衡写的一篇题为《三访九厂》的通讯,他曾经当面对我说:"林立衡的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林立果来到空军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

据《文革十年史》记述:【林彪时刻不忘记按自己的意图关心林立果的成长。 其实几年前,林立果刚 20 岁时,林彪就让他看发给自己的所有机密文件和各种 资料,还有意让林立果参与许多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许多重大问题,林彪都求 过林立果的意见,甚至还让林立果参加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林彪在某次军以上 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是林立果参与起草的。由于林立果已经开始帮助起草文件, 在叶群"老虎(林立果的小名)不是孩子了"这句话的关照下,林立果从此可以"合 法"地从秘书那里看阅一些发给党副主席的文件了。

对林彪来说,最重要的是提携他的"龙子"。1969年,林立果到空军大约两年了。为此,林彪在1969年2月26日,亲笔写信给空军的周宇驰和刘沛丰,说:"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过了半年,1969年10月2日林彪在北京住地召见吴法宪。根据后来吴法宪的供词,摘录一段他们的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事。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研究空军的问题。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汇报情况,这也是帮助你们搞好空军建设。"

吴:"是的,是的。有林立果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 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 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136)

然而后来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又推翻了当时的供词。吴法宪回忆说:【1969年 10月的一天,叶群对我说:"'101(林彪)'的意见,立果除了负担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和技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101'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由于叶群是打着林彪的名义,她提出来这个问题以后,我想应该考虑一下。 在叶群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中央已经任命毛远新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 讷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我想:叶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 能与毛远新和李纳的任职有关。这样,我考虑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是不是也可 以在空军任一个差不多的,但要比毛远新和李纳级别低一些的职务。

我同空军党委的同志一起作了研究,我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

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

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 部长。

林立果出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任职命令公布后不久,王飞、周宇驰带着林立果来看我。林立果说:"谢谢吴司令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我说:"是你自己的努力。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的问题,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感到有一点冒失,但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话的 意思,是因为林立果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 假思索地冲口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被王飞和周宇驰有意加以利用和扩散。周宇驰 在党委办公会议上说:"吴司令对林立果评价很高,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 切,调动一切。"

这次党委办公会议我没有参加,但周宇驰说的这番话,事后我知道了。我很想出面加以说明或进行制止,但还是害怕得罪林彪,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当时我是应该出面制止周宇驰等人把我在私下场合说的话,当作指示来任意扩散。现在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

但后来说我的这句话,就是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见最高法院的 判决书),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 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

(137)

彪平时最注意自己生活的空间就是温度,日常穿衣多少要根据温度来定,这

是 1950 年代北京医院的专家给他定的,以温度 30 度来增减衣服。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呢,我就用温度计测定。如果超过 30 度,林彪穿衬人们对林彪的误解,很多来自对林彪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以及性格的误解。一般人的印象中,林彪身体非常虚弱,怕光、怕风,对室温、食物等要求很严,并认为林彪的性格冷漠,喜怒不形于色。有人说林彪是一个每天坐在不见阳光黑屋子里的怪人,失去行动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并由此推论说,林彪这样的身体状况是不可能知道叶群和林立果的活动,进一步推论说林彪是被"劫持"上飞机的。

搞清林彪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性格,对理解林彪事件是很重要的。近年来发表了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和内勤刘文儒等对林彪的回忆,他们披露了比较真实的林彪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性格等。因此这里根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回忆,澄清一些人们对林彪在这方面的误解。

过去对林彪身体和性格的"标准"描述,具有代表性的是文革史专家王年一著《大动乱年代》。该书写道:【正如林彪自己讲的,他"身体不好",他"神经不好",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冷、怕出汗。林彪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 21 度相差不能超过半度。他要求在室内的各个部位都放着温度计,以便随时查看。

林彪不能读文件,需要秘书"讲"给他听.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里的文件,经过秘书选择和概括,讲给林彪听,讲的时间限制在30分钟内。一天只许讲一次,有一段时间准许讲两次。讲文件的秘书,必须离他几米远,因为他害怕翻动文件时有风。

林彪在生活上有不少独特的习惯。他不吃鱼肉,不吃大米,喜欢喝麦片糊糊, 喜欢吃炒了的黄豆。偶尔吃一点肉饼。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热量和温度。林 彪睡觉时从不盖棉被而盖毛巾被,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盖几条;冬天从不穿棉衣而 穿单衣,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穿几件。

林彪沉默寡言,几乎从不与别人闲聊,他除"转车(坐在车上出去转悠)"外, 常常坐着不动,有时在室内背手踱步。林彪冷漠而极少发脾气,喜怒不形之于色。 他孤独、超脱、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和内勤刘文儒等对林彪的回忆,推翻了过去人们对林彪身 体和性格的典型看法。这里从几个方面来介绍。

(一)林彪要求住房的室温恒定 21 度吗?

李文普回忆说:【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出汗就容易感冒,我们和医生、专家商量,注意控制室内温度,及时增减衣服。夏天温度高些,冬天温度低些,他并没有规定一年到头室温非保持21度不可。他没有盖棉被,只盖毛巾被。北京医院院长研究告诉我们:盖一幅毛巾被可增加4度,穿一件华达呢中山服也可增加4度,我们大体上按这个要求掌握。】

(138)

刘文儒回忆说:【林衣就够了,如温度在 28 度,就给他加一件布料的。夏 天一般没事,他穿一件衬衣就够了,秋天和冬天就不行,我得个把小时要看一次 温度表,他自己也看,温度低了就主动找我给他加衣服。每天看温度计成了他的 常态,走廊、厕所、会客室到处都为他安放有温度计。

最初给林彪加衣服,套三件身上就拥挤的难受了,他要我把领子给拆掉,穿上身脖子好受些,他又发现口袋堵胸,我又给他把口袋拆掉。他从不穿棉毛衫,背心也没有,冬天不穿棉。林彪穿衣服不讲究,只要合适温度就行。林彪的换洗

衣服有七八件,都是旧的。】

《大动乱年代》说林彪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度相差不能超过半度。这样就给人一种感觉,林彪对居住环境要求非常苛刻。可是林彪身边工作的李文普和刘文儒都说,林彪并没有规定室温非保持21度不可,对室温并无特别要求,林彪只是根据室温不同,穿衣服的数量和厚薄不同而已。林彪在室内的各个部位放温度计,只是为了根据室温增减衣服,而不是查看室温是不是保持在21度。

另外,林彪的衣服也不是特制的,只是一般的衣服拆掉领子,拆掉口袋。从 这些情况来看,林彪对居住环境和衣物并无特殊的要求。只是林彪因为身体较弱, 怕出汗而引起感冒,比较注意及时增减衣服而已。

(二)林彪自己不能看文件,坐着不动吗?

刘文儒回忆说:【林彪身体好的时候就 6 点起床,看一阵文件,早上 7 点半吃饭。他吃完早饭总是在走廊里转,走廊一头有个沙发,转累了就往那儿一坐,这时秘书就开始给他念文件了,下午通常重复上午的活动。林彪吃完晚饭,也要到院子里走走,有时候叶群陪他,豆豆或老虎在家也陪着转,没人陪他就自己转,转到晚上 9 点多钟回来就睡觉。】

《大动乱年代》说"林彪不能读文件",而根据刘文儒回忆,林彪在身体好的时候,早上起来是自己看文件的,然后再听秘书念文件。可见林彪的身体并没有到不能看文件的地步。

《大动乱年代》说"林彪除转车外,常常坐着不动",还有一些书把林彪描写为每天枯坐在不见阳光的黑屋子里,这样一来,林彪就变成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怪人了。而根据刘文儒回忆,林彪不但不是"常常坐着不动",而是每天在走廊里走动,还要到院子里走动,走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睡觉。根据刘文儒的

描述,林彪的行为是通常的老人行动,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正常的地方。

(三)林彪吃饭讲究,不洗澡吗?

刘文儒回忆说:【林彪吃的比较简单,比如洋白菜、菜花、空心菜、胖头鱼 他都吃,他吃的菜都是煮的,他拒绝吃炒的菜,说吃了上火。长期素食,营养很 差,林彪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林彪也吃零嘴,他只吃花生糖,他想吃的时候, 不言语,对我只伸两根手指,表示吃两块。

林彪外出不让带自己的炊事他确实是人们说的轻车简从。林彪外出的时候就 带个菜谱,我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把菜谱和制作方法交给那里的厨师。】员。司 机也不带,就带秘书,内勤。

(139)

刘文儒还回忆说:【早先林彪不愿洗澡了,后来林彪到庐山,有人告诉林彪说:蒋介石的睡眠好,就是经常洗澡。林彪从那儿开始天天洗浴,下山后还能做到十天半月洗一次。

林彪要洗澡我帮他弄好水,还要拿温度计量,温度要求调到37度,他自己洗,洗的时候水里要放点醋精,用药皂,红颜色的那种。林彪洗澡很快,在水里糊弄几下就上来了。】

据刘文儒的描述,林彪吃饭并不讲究,外出时不带自己的厨师,比较随便。 林彪后来也洗澡,这与一般人差异也不大。

(四)林彪不与别人闲聊,性格冷漠吗?

刘文儒回忆说:【林彪神经一直是衰弱的,经常失眠,睡不着就叫我:"到我这儿坐一会儿吧!"我就坐到床跟前的沙发上跟他聊。林彪发困了,就说:"你看到我要睡着了你就走。"有时长时间睡不着,他就说:"别管我了,你去睡觉吧。"】

据刘文儒的描述,林彪并不是不与别人闲聊。林彪在睡不着觉的时候,经常与他聊。

李文普回忆说:【有时,林彪和叶群吵嘴打架(几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气,不愿见到叶群,就叫我转告叶群,不叫她,不准过去进他的房间,我也只好对叶群注意观察,提前通报。林彪气消了,叶群去和林彪谈事,我自然不敢参预。】

据李文普的描述,林彪并不是性格冷漠,也不是喜怒不形于色。林彪不时与叶群吵嘴,不时因生气而不理叶群,这是一般夫妇之间常见的。由此可见,林彪的脾气并非特别冷漠孤僻,与一般人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五)林彪吸毒, 打兴奋针剂吗?

李文普回忆说:【关于外界传的林彪吸毒问题,言过其实。从 1964 年我回到他身边,从没有见他吸食毒品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尽管林彪肠胃不好,休息不行,但绝没有像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

刘文儒回忆说:【报刊上时不时说林彪吸毒,还有个摄影记者说他在天安门上还闻到林彪的身上有鸦片烟味。我一天 24 小时都在林彪身边,林彪干了这种事,我能不报告?什么渠道提供的烟土?谁参与?说得出来吗?

有人说林彪上天安门要靠打强心针支持,还经常给他注射改变思维、改变意 志和记忆的针剂。这全是胡说八道,给林彪打针,都是我打的,注射的都是维生 素,根本不是什么剧毒药品。】

由此可见,关于林彪吸毒,打兴奋针剂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林彪的身体固然 不好,但绝没有到靠毒品或药剂维持的地步。

从近年来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披露出来的林彪生活细节来看,林彪并不是特

别异常的怪人,他和一般人也差不多,只是身体比较虚弱而已。而且,从林彪身 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来看,林彪的性格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林彪也是有正常喜怒 哀乐的人,并非传闻的"喜怒不形于色,孤独、高傲"。

对林彪的身体和性格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有助于理解林彪的所作所为,有助于理解林彪事件。

(140)

前面对林彪的身体状况做了较多分析,这是因为不少人认为林彪的身体已经到了"风一吹就倒",不能公开露面的严重地步。如果林彪的身体真的到了那样的状况,那么他争当国家主席之类的事情,显然就没有必要了。事实上,林彪的身体还是可以凑合的,当然在健壮方面不能与毛泽东相比。像毛泽东 70 多岁还能畅游长江的老人,的确是超出常人了。

从 1966 年开始,每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林彪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国庆讲话。1970 年 8 月的庐山会议之后,1970 年 10 月 1 日的国庆节,林彪依旧登上天安门城楼,并发表了国庆讲话。只是 1971 年 10 月 1 日,取消了在天安门前举行国庆游行,因为在十几天前的 9 月 13 日,林彪"不辞而别"了。

林彪 1970 年 10 月 1 日的国庆讲话,讲话稿是张春桥等人准备的,林彪只是念念稿子。这次的国庆讲话基本上还是套话,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林彪的国庆讲话中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在前一年的 1969 年 10 月 1 日,林彪在国庆讲话中提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这次林彪的国庆讲话中,居然没有一次提到"文化大革命",反而讲了不少发展生产的话。

林彪在 1970 年国庆讲话中说:【在庆祝七十年代第一个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继续推向前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打好第四个五年计划基础而努力奋斗。我们要用各条战线上的新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林彪的国庆讲话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应该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后来 揭批林彪的时候,没有揭发林彪国庆讲话中不提"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 为什么在 1970 年不提"文化大革命"了?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分析。

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上进行了一些交谈,从两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来看,当时两人的关系在表面上看还是可以的。然而到了1971年5月1日五一节,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的关系,在表面上看都不可以了。一贯提前几分钟迎接毛泽东的林彪,这次却比毛泽东晚到,并且勉强在天安门上坐了几分钟,就不辞而别了,与毛泽东没有说一句话。

(141)

1971年5月1日的劳动节,既是林彪最后一次上天安门,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从此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了。因此,林彪在"九一三"完蛋了,但毛泽东也不是胜利者,林彪外逃使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出了一个"洋相",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了。

在 1970 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在表面上还过得去;到 1971 年的五一节,两人在表面上都过不去了。在这段时间内,必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先

看毛泽东方面。

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一直在庐山上住到9月9日,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庐山的。离开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再到武汉。 汪东兴回忆说: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

- (一)在华北组陈伯达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
- (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
- (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检讨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

(142)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检查是比较满意的,主要是汪东兴的检查,不仅仅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更积极揭发陈伯达,这就表现出他与陈伯达彻底划清界限的态度。相反后来吴法宪、叶群等人的检查,都是只说自己的错误,不揭发别人。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检讨是没有诚意的。因为不揭发别人,就没有戴罪立功的表示,那就是不准备上毛泽东的这条船。

汪东兴继续回忆说:【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丰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检讨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 《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改过,由总理、康生和你一 起查实为好。"

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陈伯达的语录,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他们在北京是否和陈伯达处商量过?"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检讨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信,或找我来谈。"】

毛泽东与汪东兴的谈话,表现出毛泽东要对庐山会议的事追查到底。同时, 毛泽东的意思也很明确,他把汪东兴的检讨信作为"样板",希望黄永胜、吴法 宪等人看到汪东兴的检讨信,也给毛泽东写检讨信,或者亲自找毛泽东谈话。这 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与林彪划清界限,投靠到毛泽东这边来,所以毛泽东 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信,或找我来谈。"

林彪的"四大金刚"看到汪东兴的检讨信,反应如何呢?据邱会作回忆说:

【庐山会议之后,大概在9月中旬,汪东兴又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他的检讨报告很短,内容也很简单,只说了上了陈伯达的当,受了骗。主席对汪 东兴的检讨报告除批了"政治局传阅"外,还授意总理和康生拿着汪东兴的检讨 信到毛家湾给林彪看,并提议黄、吴、李、邱"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写检讨"。

(143)

总理已经把话说开了:"虽然主席说等你们想通了再写检讨,实际上主席希望看到你们的检讨,这也是我们亲自登门的目的。"林总也只能同意周、康的意见,并顺手推给总理和康生跟我们几个谈。

周总理和康生按照毛主席的交待,与我们几个谈话,总理说:"汪东兴做了

两次检讨,这很好。你们几个应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个检讨,希望你们尽快拿出 行动来。"

总理的谈话是诚恳的,但黄永胜坚决不检讨,他认为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而没有犯错误。更重要的是黄永胜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会因我们检讨而幸灾乐祸,为此更不能检讨。

我和李作鹏心里也不服气,认为我们在庐山不是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在发言,而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发言。我们的调子并不算高,至少比汪东兴、许世友等低多了,我们也没有表示要写检讨报告。

李作鹏还说:"这不是检讨,是给别人送把柄。"

总理和康生把我们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几个人没有想通,也不急于写检讨,他们与陈伯达的问题性质不同。"

听到主席的话我们很高兴(事后主席是言行不一的),我们一无所悟,思想很麻痹大意。

但吴法宪在汪东兴得到"解放"的启示下,9月底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这是他的权利。如果我们阻止他写检讨报告的话传到主席那里,问题就了不得了。吴法宪写检讨之前并未同大家商量过,写好之后也没有给大家看过,就送上去了。】

这样看来,毛泽东送去的汪东兴检讨信,还是产生了示范作用。尽管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坚持不检讨,但吴法宪却"动了心",不与"大家"商量,就自己写了检讨送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显然,如果吴法宪也坚持不检讨,那么情况就不一样。可是一旦吴法宪检讨了,他又是引发庐山"战火"的关键人物,这样林彪就陷入被动了。

吴法宪写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吴法宪在检讨中,并没有像汪东兴那就检举揭发别人,只是讲自己错误。这样的检讨,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是没有诚意的,吴法宪只是想两头讨好,蒙混过关,并不想与林彪划清界限。

(144)

现在知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就抓住这件事不放,对林彪步步紧逼。按照毛泽东的话,他对林彪施展的政治战术叫"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这是毛泽东自己承认的政治权谋。不少人对"权谋"持否定态度,认为政治家应该光明磊落,不应该使用权谋。这种观点表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至上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因为使用权谋,长期成为坏人的形象。

然而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是一样的。大家都承认军队打仗需要计谋,不用计谋就无法取胜,像"宋襄公之仁"是愚蠢而不可取的。政治斗争同样也需要权谋,不用权谋就无法取胜,这个道理完全是一样的。毛泽东不用"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等政治权谋,他就战胜不了林彪,。所以不应用儒家说教和"书生之见"来评论政治权谋。

有人以为毛泽东靠着一个"党中央主席"的头衔,就能掌握大权,就能指挥 一切;也有人以为林彪靠着一个"接班人"的头衔,就能保证接班,这样的看法 是把严酷的政治战场"书本化"了。如果用"头衔"来衡量一个人权力的大小,新中国以来权力最大的是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可谓一个人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力,这是毛泽东也没有做到的事情。

但在实际上,华国锋根本不要说指挥一切,就连说话也不算数,给华国锋再多的"头衔",他也掌不了权。因此,在中国能不能掌权,不是看一个人的头衔,而是看一个人的威信。毛泽东从高手如云的政治家中间拿到第一把手的大权,除了靠正确的战略远见和政策之外,高明的政治权谋也是毛泽东建立起他在党内威信的重要支撑。

毛泽东对付林彪的第一步是"挖墙角",首先是把林彪的黄永胜等"四大金刚"挖过来。即使不能挖过来,也要让"四大金刚"对林彪的忠诚度有所下降。尽管"四大金刚"不接毛泽东抛过来的橄榄枝,毛泽东仍然没有轻易放弃拉拢"四大金刚",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毛泽东之所以不断拉"四大金刚",是因为毛泽东对他们"不薄"。虽说"四大金刚"是靠林彪进入中央的,但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他们是不可能进政治局的。本来林彪的意思是让黄永胜当"代总参谋长",而毛泽东去掉"代"字,直接让他当总参谋长。毛泽东对这四个人也是"有恩"的,这是毛泽东拉他们四人的基本前提。

(145)

林彪当然看出来毛泽东对他实施"挖墙角", 拉拢他的"四大金刚"。林彪也

清楚,"四大金刚"对毛泽东并无怨恨,因为过去毛泽东对他们也很不错,他们内心对毛泽东是有感谢之意的。因此,让"四大金刚"帮助林彪当国家主席,帮助扳倒张春桥,这还问题不大;让他们去干暗杀毛泽东的事情,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毛泽东从未亏待过他们。毛泽东过去对"四大金刚"的重用和优待,其实也是对林彪的另外一种看不见的"挖墙角"。

因此,林彪建立另一支地下队伍的成员,物色的标准有两个:第一,对毛泽东有怨恨的人;第二,从来没有受过毛泽东恩惠,只受过林彪恩惠的人。

第一种人的代表人物是江腾蛟。江腾蚊 1919 年生,1930 年 11 岁时参加 红军,1937 年入党,在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典型的红小鬼出身老干部。 1964 年叶群在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的时候,认识了当时在上海任 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很快江腾蛟与叶群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1965 年,叶 群把女儿林立衡送到上海,请江腾蛟照顾她治病;1966 年 11 月林彪和叶群又把 儿子林立果送到上海委托江腾蛟照顾,以免林立果留在北京参与造反派的活动。

1967年2月,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7年春节,叶群邀请江腾蛟到家里过春节,林彪亲自接见了江腾蛟,此后江腾蛟就成为林彪"四大金刚"之外的新亲信。1967年11月,林立果对江腾蛟说:"有个重要情况给你透露一下,如果吴法宪当了总政治部主任,空军司令员的人选有个考虑,想要你当。"

后来吴法宪没有当上总政治部主任,江腾蛟也就没有当上空军司令。不过此后江腾蛟开始交厄运了,他带领南京军区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公开支持对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造反,把许世友逼到大别山老家躲起来了。许世友重回南京军区主持工作后,向毛泽东告江腾蛟的状,毛泽东支持许世友,于是在1968年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江腾蛟被免职后,林彪想把江腾蛟调到北京任空军政治部主任,却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说:"此人不能重用。"这样一来,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断绝了江腾蛟的政治生命。因此,江腾蛟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怨恨。据邵一海写的《联合舰队的覆没》写道:

【1968年,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职务。 林彪、吴法宪要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 彪、叶群、林立果对江腾蛟表示关怀,江腾蛟在1968年以后,给林彪一家先后 写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 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 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

(146)

第二种人的代表人物是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林立果身边的人,这些人是 毛泽东根本不知道他们存在的小人物,他们当然只知道林彪对他们的恩惠。据《联 合舰队的覆没》写道: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做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影片,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这些受到接见的人: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老奸巨猾的林彪,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周宇驰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

天 5 月 3 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 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周宇驰说:"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 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 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实际上,也 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 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 林立果还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彪知道,因为他本人的目标太大,如果他亲自出面的话,这支地下部队就要暴露了。所以地下部队必须让一个绝对信得过的人来指挥,这当然就是他的儿子林立果。为此,林彪要扶林立果树立起他的威信。

《文革十年史》写道:【林彪早就有将他从事的政治斗争的领导权,移交给林立果的打算。1970年11月,林彪对通过《讲用报告》在军内已大出风头的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的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为此,林立果在军内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在军内的地位也提高了。】

关于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吴法宪回忆说:【林立果当年还曾经做了一件在 空军大有影响的事情,这就是他作的《讲用报告》。这种"讲用报告"是当时全 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形式,是当时的一种时髦。 (147)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最初曾经在"林办"讲过一次。叶群告诉我: "'林办'的人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反映强烈,都认为讲得不错。

我说:"林立果是空军的干部,既然'林办'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军的干部会上也讲一次吧。"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很长,差不多讲了整整一天。林立果作《讲用报告》的时候,我不在场,事后调来录音听了一遍。从录音上听,这个报告大致上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听完以后,我感觉林立果讲话的口气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显得太过了。

过后,我打电话给叶群,跟她说:"林立果的这个报告讲得很好,是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叶群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都是吴司令你的培养。今后对立果还要严格要求,让他不要翘尾巴。"

当时空军正在召开"三代会(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作报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三代会"。我起初不想播放这个录音,代表们出于对林彪的敬仰,在代表们的一再要求下,我也就同意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播放以后,代表们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印发这个报告。王辉球又把代表们的这个意见反映给了我。

我不同意印发,对他说:"林立果的报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要推敲。 这个报告现在不能印发,如果印发了,反而会给林副主席帮倒忙。" 但是,林立果和空军机关及下面的一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在 王飞、周宇驰等人的蓄意谋划和推波助澜下,在空军内部泛滥开来,让我怎么挡 也挡不住。后来,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不仅在空军中广为传播,而且还传向了 全军,传向了全国。

当"三代会"的各个代表团知道我不同意印发林立果的报告,就纷纷动手自己印。一时间,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门,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报一样。讨论的时候,也就没边没沿了,什么"天才"呀、"超天才"呀,说什么的都有。

我在前面说过,空军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 军内部大肆宣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首先,周恩来对我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

毛主席办公室的人也对我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 这样宣传不好吧。"

当时我正因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很紧张,听到了这些,便立即同叶群联系。 我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

(148)

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你是不 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我当时就打电话给陈绥圻(吴法宪妻子),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去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统统洗掉。陈绥圻接到电话以后,便找各个代表团的负责人,要求

协助收回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样,一共收回了 2000 多份"讲用报告"和 三盘转录的磁带。回来以后,就用我家里烧热水的锅炉,把收回来的《讲用报告》 烧掉,一直把炉子都烧红了。

说实在的,由于林立果的上面有林彪和叶群,我对他是不敢得罪的。不过,我也做过一些制止的工作。有些事情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比如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后来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

他们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立果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

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据吴法宪的回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最初是在林彪办公室内部讲的,所以林彪应该是听过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之后,叶群又向吴法宪推荐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然后吴法宪再安排林立果在空军干部会上讲。这样看来,林立果在空军做《讲用报告》,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意思。

有人说林立果做《讲用报告》完全是个人行为,林彪不知道,这种说法不正确。这就像吴法宪说的:"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林立果如果没有林彪的首肯,他是不敢大张旗鼓地搞这种个人宣传的。

林彪为什么要大肆宣扬林立果呢?这是因为林彪准备要让林立果出头从政了。 一个人搞政治,首先要有名气,让别人知道你。一个人的知名度越高,说话就越 有份量。所以林彪首先要提高林立果知名度,而做《讲用报告》,就是提高知名度的好办法。

尽管吴法宪的说法有想推脱责任的部分,其实他还是帮助宣传林立果的最主要干将之一。林立果经过《讲用报告》之后,他的名字在军队内广为传播,人们知道了林彪有个儿子叫林立果。这样,宣传林立果的第一步就达到目的了。

(149)

尽管林彪曾经是中国无人不知的第二号人物,可是说到林彪的"思想",人们又很不清楚。这一方面是因为林彪的公开讲话很少,而且这些公开讲话中,绝大部分是歌颂毛泽东,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反映出林彪个人的政治思想。最初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可能反映了林彪的一些政治思想,可是这份《"九大"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决了,现在我们看不到陈伯达起草的那份被否决的《"九大"政治报告》,只知道一个题目《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长达7个小时,3万多字,而且口气非常大,很多地方用国家领导人的口气说话。按理说,林立果这样身份的人,不应该用国家领导人的口气说话,所以林立果《讲用报告》中,很多应该是来自林彪的看法,也可以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一份反映"林彪思想"的材料。现在的林彪问题研究者们,大多数忽视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应该把这份《讲用报告》与林彪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

文革中为了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各单位都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在这种"讲用会"上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被称之为"讲用报告"。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本来应该全盘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可是林立 果的主要讲话内容并不是这样。

林立果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二)中国一定要强盛;(三)学习毛泽东思想。前两个问题与"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并无直接关系,可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前两个问题占了三分之二的内容,而且是先讲前两个问题,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了最后。

在林立果《讲用报告》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所占的篇幅最大。一般认为林彪只重视政治,不重视生产,可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却再三强调生产的重要性。林立果说:

【在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有这么几种倾向。一种是只要经济不要政治; 另一种是空谈政治不要经济,这是极左的,形左实右的,实际上他不要经济,也 就破坏了无产阶级政治。

用主席思想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要哪一种做法呢?我们是既要政治又要经济,以政治为主,以政治统帅经济,用抓革命来促生产。

衡量社会主义企业(也包括农业),我们体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经济标准。要以政治标准为主,但经济标准也是不能少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主席这个话有普遍意义,不仅对文艺领域适用,对其它业务部门也都适用。】

(150)

林立果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说了很多发展生产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突破。这说明林彪的政治思想,还是重视发展生产的,甚至可以说有很大的"唯生产力论"倾向。由此看来,如果林彪真的接班上台,他是不会继续革

命的,而是会走上以发展生产为主的富国强兵道路。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林彪是"不合格接班人",也是有道理的。

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中国一定要强盛"所占的篇幅第二多。林立 果说:

【当前,世界斗争很激烈,各种政治势力很复杂,要承认这个差别,讲究策略。我们既不搞刘少奇"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也不搞王、关、戚那一套形左实右,破坏统一战线的东西。

列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其中讲到为完成任务,要利用各种力量,其中包括"暂时的同盟者,有觉悟的朋友和不自觉的助手"。像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他们和我们有多少共同语言?他们就是同苏修有点矛盾,他们不自觉地帮了我们的忙,是"不自觉的助手"。在某一个问题上或者在某一个时期,他们和我们暂时的同盟,是不自觉的。有自觉的当然更好,不自觉的也能帮助我们。

马克思也讲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要肯定的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让魔鬼领着你走。"关键在于我们搞反帝反修的统一战线,领导权必须在我们手里头,而不是像王明那样,把领导权交出去,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林立果的"中国一定要强盛"话题中,外交问题占了相当的篇幅。林立果主 张的外交路线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势力,包括"不自觉的助手",甚至包括"魔 鬼"。文革开始后,中国的外交因为被"宁左勿右"的思想统治,变得非常僵硬, 因而引发"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重大外交纠纷。林立果提出的这种"可以同魔鬼 结成联盟"的灵活外交,也是后来中美建交的思想,这也反映出林彪的外交思想。 如果林彪当政的话,他也会搞灵活外交,不会持续文革中形成的"宁左勿右"僵硬外交。

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所占的篇幅不多,内容空洞,而且举了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空军某医院用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创造了奇迹。最近三年多来,治好了三百九十五名精神病患者。"

本来毛泽东思想"创造奇迹"的好例子有很多,林立果偏偏举出"毛泽东思想治精神病"这种极端的例子,这就像"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一样,不但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正面意义,反而有嘲弄毛泽东的感觉,这大约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一种手段。

(151)

因为这时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已经相当不好了,毛泽东当众讽刺林彪提出的 "四个伟大",而林立果也借着"毛泽东思想治精神病"来反讽刺毛泽东。

虽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全文很冗长,中间夹了很多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但在文革那个时代,林立果能讲出这样的话,的确是让人耳目一新,至少有开眼界的感觉。由此看来,林立果这个人是有头脑的,特别是在当时的高干子弟中,应该说是出类拔萃的。

林立果的另一份"杰作"就是大名鼎鼎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出笼时间,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1年3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李后主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周恩来年谱》没有直接提到这个记载的资料来源,但应该是来自李伟信的

交代材料。乘第二架直升机外逃的三人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活捉。后来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幕,主要是来自李伟信的交代材料,因为李伟信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唯一知情人。

当然,交代材料与回忆录不同。回忆录是在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作者没有压力,可以写得比较真实。而交代材料是在非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作者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往往不敢实话实说,所以对交代材料的真实性要打折扣。

不过现在主流的历史学者,都认为李伟信交代的这些材料虽然是"孤证",但还是有相当的合理性,所以《晚年周恩来》等书都采用《周恩来年谱》的这个记载,认为林彪是在1971年3月初授意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纪要》的。

据文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1971年2月, 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 伟信,从3月21日至24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文革十年史》写道:【1971年2月12日,林彪、叶群携林立果到苏州别墅,具体布置林立果进行秘密串联,建立反革命政变基地的步骤。3月18日,林立果、于新野、周宇驰、李伟信等人汇聚在上海,3月21日,他们遵照叶群说的"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的指示,在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的密室里召开秘密会议。

(152)

他们分析形势说:"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 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是林彪"和平接班"。

周宇驰说:"(林彪)再过五、六年就差不多可以接班了,也可能更短。"

林立果说:"(林彪)再过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

二是林彪"被人抢班"。

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

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 台。

三是林彪"提前抢班"。

林立果说: "办法是搞掉 B-52(他们称毛泽东的代号)。"

慑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他们对这手着实有点心虚。周宇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

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目前,主要有两件事要做:一件事是要成立"教导队";另一件事便是要根据林彪的意思,制定武装政变的计划。林立果说:"我看就叫'五七一',这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他们决定把武装政变计划定名为"五七一工程",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局势,首长叫先搞一个计划。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文革十年史》提供的细节,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他们分析了林彪接班问题的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毛泽东的威信高,只要毛泽东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他们认为林彪的地位是非常不稳和脆弱的;(二)他们的计划

是两手准备,一方面争取"和平过渡",另一方面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三)林立果说:是林彪让他们搞一个计划;林立果还说,他已经把他们研究的情况跟叶群说过。这也就是说,林彪和叶群都是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

林彪在 1971 年 3 月初下决心,搞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前面我们提到,在 1970 年 10 月国庆节的时候,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还过得去,那时林彪还没有想到搞"武装起义"。显然,在 1970 年 10 月到 1971 年 2 月这四个月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促使林彪下决心搞"武装起义"的计划。因此,这四个月中发生的事情,就是促成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索。关于这四个月的事情,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153)

1970年10月到1971年2月这四个月内,有几件事让林彪对毛泽东产生忿怨。第一件事是毛泽东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叶群为什么写检讨信呢?这要回溯一下毛泽东对林彪亲信"四大金刚"的处理。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处理"四大金刚"的第一件事,是让周恩来和康生出面,代表中央找黄、吴、李、邱谈话,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给四人施加压力。据吴法宪回忆说:【早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就给我们打过招呼,下山以后要继续找我们谈话。果然,9月9日晚上,周恩来和康生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让我先谈,于是我就又把8月13日修宪小组会上与张春桥争吵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然后我说:"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听了我的话, 康生鼓着眼睛盯着我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

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

周恩来也说:"你在8月13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

我回答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

我这一说,周恩来很不高兴,同时也很紧张。这时康生插话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康生讲话的态度比周恩来凶得多。

接着就是李作鹏讲,李作鹏说得很简单,他说:"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修宪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

邱会作也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黄永胜则说:"这件事我是 8 月 13 日号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那天晚上一共谈了四个小时,由于我们四个人的口径一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9月12日晚,周恩来和康生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找我们谈话。周恩来说: "上次我和康生找你们谈话的情况,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 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 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154)

周恩来说了以后,大家都不吭声。周恩来就点了黄永胜的名,说:"永胜同

志,请你先谈。"

黄永胜说:"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

康生插话问:"你负什么责任?"

黄永胜回答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 康生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

黄永胜也很不客气地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这个时候,谈话的气氛有些 紧张了。

我就对周恩来说: "8月13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我说到这里,周恩来脸色沉了下来,他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事情就这样搁了起来。】

周恩来的这两次谈话,是奉毛泽东的指示找他们"谈话"的,所以当吴法宪等人把怨气发在周恩来身上时,周恩来不高兴地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

当时被中央领导叫去"谈话",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事情,而且周恩来又传达 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们四人相互揭发,"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 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这样一来,四人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毛泽东希望这四个人在压力之下,出于"自保"的心理而相互揭发,来保住自己。可是这四个人顶住了压力,在9月9日和12日的两次"谈话"中,都没有相互揭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能转用新的方式,"逼"这四个人写书面检讨。

在当时,口头检讨是比较轻的,意味着只是犯了比较轻的错误;而书面检讨则要重得多,就是意味着犯了严重的错误。吴法宪在庐山会议后期做过三次口头检讨,但没有做过书面检讨。9月16日,毛泽东把汪东兴的检讨信批"政治局传阅",还让周恩来和康生拿着汪东兴的检讨信去给林彪看。周恩来明确告诉林彪,毛泽东希望看到"黄、吴、李、邱"和汪东兴一样,写检讨信,做书面检讨。(155)

毛泽东让周恩来直接找林彪谈,也是给林彪施加压力,他希望林彪为了"自保",顺着毛泽东的话,亲自发话让"黄、吴、李、邱"做检讨。因为"黄、吴、李、邱"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是按照林彪的意思去做的。如果林彪亲自让他们做检讨的话,"黄、吴、李、邱"就会有被抛弃的感觉,毛泽东就可以把林彪与"黄、吴、李、邱"的联盟关系瓦解掉。

然而林彪没有"中计",他没有出面与"黄、吴、李、邱"谈话,而是请周恩来去找"黄、吴、李、邱"谈话。周恩来找"黄、吴、李、邱"谈话,希望他们写个检讨。黄永胜坚决不肯检讨,李作鹏和邱会作也表示不检讨,只是吴法宪松动了。吴法宪在未与黄、李、邱等人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写了检讨书,于9月29日送交毛泽东。

据汪东兴回忆说:【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

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 10 月 14 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

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叶群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但叶群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说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也作了批示,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吴法宪的报告,送上去有十多天都不见批回来。吴法宪很着急,又去鼓动叶群给主席写检讨报告,以起到提醒毛主席注意吴法宪报告的作用。叶群回京参加国庆节,在天安门她找主席谈话,因为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所以她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叶群给毛主席的检讨报告,确实起到了"提醒毛主席批示"的作用。10月 14日和15日,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的报告批下来了,毛主席对他们两个人 的检讨报告批得很严厉,劈头盖脑地打下来。】

(156)

据邱会作的回忆,叶群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这大概是毛泽东向叶群表示,只要写个检讨,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于是叶群回来后写了一份书面检讨,10月12日交了上去。叶群写书面检讨,林彪应该是首肯的,因为这么大的事,叶群不与林彪商量是说不过去的。然而叶群没想到的是,毛泽东看了她的检讨信,不但没有表示宽恕,反而在她的检讨信上做出严厉的批语。

吴法宪对此事回忆说:【我不用秘书,自己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个两千 多字的检讨,送上去了,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我当时心里想,不管批得好, 批得坏,总算是有了一个回音。哪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条:

毛泽东批示的第一条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 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

毛泽东批示的第二条不只是批我了:"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 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毛泽东批示的第三条是批我说的"毛主席伟大谦虚",他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对毛泽东的这些批示,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什么叫光明正大?当时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讲的,怎么就不是光明正大?说我们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都是那么好骗的吗?人家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点吗?一个人站错了队,反正是"错也是错,对也是错"。看来,这次庐山会议得罪了他老人家,我是死活过不了关了。】

我把毛泽东的批示拿给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看, 黄永胜看完若无其事, 李作

鹏则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关于毛泽东给叶群检讨信的批示,汪东兴回忆说:【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 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 不起风浪。"

(157)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叶群还说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吴法宪对此事回忆说:【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我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比较一下。他们都说,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邱会作有回忆说:【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信,毛主席都批给政治局阅。江青他们看到了毛主席对吴法宪和叶群的批示,如同在庐山看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是一样的高兴,对他们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张春桥在会上就叫服务员给他拿茅台酒喝,十分嚣张;姚文元也举杯向江青说;"我们向江青同志祝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

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检讨信的批示,尤其对叶群检讨报告的批示不给面子,实际上就是不给林彪面子,这对黄永胜震动很大,对黄、吴、李、邱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时我们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自欺欺人地告慰自己:"毛主席整个批示,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还没有提到敌我问题。"想起来当时我们也太天真了,毛主席连林彪都不想要了,我们还有什么举足轻重之处呢!】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叶群的检讨信上做出严厉批示,不给林彪面子呢?我们将 在后面分析。

(158)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信的第一条批语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 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对毛泽东的这句批语,吴法宪感到不服气。其实毛泽东 表面上是对着吴法宪说,实际上是对着林彪说的。

差不多一年后的 1971 年 8 月,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把这件事挑明了。毛泽东说:【1970 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

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毛泽东的意思,是责问林彪"来了个突然袭击",肯定是有目的,肯定心里有鬼。林彪的目的是什么?"鬼"是什么?毛泽东大致是清楚的,而吴法宪等人则不一定清楚。吴法宪等人只是按照林彪的意思去做,并没有想过林彪的动机问题。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信的第二条批语是:"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毛泽东的意思,是责备吴法宪等人把"天才"问题,作为一个搞倒张春桥的 "借口"。9月19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他让纪登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去等他,他要和 这几个人谈话。这几个人毛泽东是比较信任的人,毛泽东和他们谈话,其实是向 他们"交底"。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病重住院,所以毛泽东没有叫谢富 治。

据吴德回忆说:【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毛主席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三个副词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 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泽东之所以要对吴德等人"交底",是因为有些人本来是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比如庐山会议上许世友等人跟着林彪集团揪张春桥和推举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毛泽东的底牌,反而站错了队,帮了林彪。

(159)

所以毛泽东这次要先向吴德等人交底,也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三点:

- (一)张春桥说的话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
- (二)林彪提出的三个副词是毛泽东亲自删掉的;
- (三)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

这样一来,这些人就知道应该怎么去拥护毛泽东了,这就是:(一)支持张春桥;(二)反对三个副词;(三)反对设国家主席。

在一年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亲自揭开了为什么找吴德等人谈话的"谜底"。 毛泽东说:【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一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军长)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就不服,六十六军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泽东一到北京就找吴德等人谈话,是因为谢富治、吴德、吴忠等人不听"他们那一套",这里的"他们",显然是指林彪集团。毛泽东先向吴德等人"交底",就是要事先把"不听他们那一套"的吴德、吴忠等人,完全彻底地团结到自己这一边。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信的第三条批语,是:"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

流。"

毛泽东这话其实是针对林彪说的。林彪以为在众人一致推举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因为不好意思薄众人的面子,只好违心地当国家主席。 而毛泽东却是敢"反潮流"的人,敢于"一意孤行"违背多数人的意见。在众人 一致推举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情况下,他也不干。

至于叶群写检讨信,我们前面提到过,是因为叶群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 "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林彪本来是不肯检讨的,因为这有 前车之鉴。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比较喜欢让别人检讨的。有人说毛泽东让别人检讨,是为了"捉弄人",这种看法是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儿戏化"了。毛泽东并不是心胸狭窄的人,没必要搞"捉弄人"的报复。

(160)

因为政治家搞"捉弄人"的报复,只会降低自己的威信,对毛泽东本人毫无益处可言。毛泽东让别人检讨的目的,其实是出于维护自己威信的目的。

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法院起诉一个嫌疑人,而嫌疑人坚决不认罪。当然法 院可以硬判嫌疑人有罪,但由于嫌疑人不认罪,不少人就会认为嫌疑人是被冤枉 的,转而同情嫌疑人,甚至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公正。这样一来,法院在人们心中 的威信就会有降低。

相反,如果嫌疑人自己认罪了,这时法院再判嫌疑人有罪,就不会有人同情嫌疑人,因为他自己都认罪了。在嫌疑人自己认罪的情况下,人们就认为法院对该人判罪是没有错的,法院的威信就不会有损失。

毛泽东要处分一个人, 如果该人坚决不认错, 虽说毛泽东可以依仗自己的权

力,硬对该人进行处分。但这样的话,不少人就会认为该人被冤枉了,不仅同情该人,甚至还可能认为毛泽东的处分不公正。这样一来,毛泽东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就会有所降低。

相反,如果该人检讨了,自己认错了,这时毛泽东再处分该人,就不会有人同情该人,因为他自己都认错了。在该人自己认错的情况下,人们就会认为毛泽东对该人的处分是正确的,这样毛泽东的威信就不会有损失。

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彭德怀和刘少奇。彭德怀坚持不检讨,不认错,因此有很多人同情彭德怀,认为毛泽东对彭德怀处理错了,党内为彭德怀翻案的呼声一直不断。而刘少奇则检讨了,认错了,把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他的指责,全部承认下来。刘少奇检讨书,一直下发到县团级,后来又向群众公布了。人们看到刘少奇的认错检讨书,自然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没有错,因为刘少奇本人也都认错了。这样一来,就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处理错了,毛泽东的威信得到了维护。

毛泽东在处理彭德怀问题上,威信是受了损失的;而在处理刘少奇问题上,威信没有受损失,这与彭德怀和刘少奇两人的态度有关。彭德怀坚持不检讨,不认错,反而使他在党内和群众中,间接地树立起他的威信。如果刘少奇也向彭德怀那样,坚持不检讨不认错,刘少奇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不一样。而且毛泽东在刘少奇坚持不认错的情况下,硬打倒刘少奇,自己的威信也会受到不小的损失。

(161)

当然嫌疑人都是不肯轻易认错的,所以这时候就要进行"引导",让嫌疑人感到只要认错了,就能得到宽大处理,这时候嫌疑人就会为了得到宽大处理,而

主动认错,这就是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因此,在林彪问题上,毛泽东也希望林彪像刘少奇那样,自己认错,写检讨书,那么毛泽东处理林彪就会好办得多。可是林彪看到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坚持不认错,不肯检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叶群做了检讨,也是对毛泽东的一大帮助,所以毛泽东要引导叶群写检讨信。但是叶群的检讨信毛泽东不满意,因为她没有实质性地承认错误,所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信上写了不少严厉的批语。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一条批语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也就是说,叶群的思想政治路线不正确,这就决定了她的检讨不能过 关。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二条批语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这是批评叶群的人品性格,是很重的话。因为毛泽东把叶群的检讨信和他的批语 发给政治局的众人传阅,人们看到毛泽东批评叶群的人品,就会使叶群在人们中 间的威信大损,这也引发了林彪对毛泽东产生忿怨。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三条批语是:"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这是间接地讽刺林彪。因为林彪集团在"九大"上大获全胜,叶群和"四大金刚"都进入了政治局。所以毛泽东讽刺林彪在"九大"以后认为自己"不得了了,要上天了"。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四条批语是:"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 又向马列求救?"因为林彪在文革中曾多次说:"马列的书不一定读,只要读好毛 主席著作就行。"因此毛泽东这里讽刺林彪是"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五条批语是:"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毛泽东这里也是间接批评林彪,因为林彪说马列

的书不一定要读。

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信的末尾写道:"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毛泽东说这句话,意思是林彪、叶群、还有黄、吴、李、邱等人,只要认错检讨,还是有出路的。希望他们赶紧检讨,争取宽大处理。

(162)

毛泽东自己说,他对付林彪的三项办法是"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时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毛泽东在吴法宪、叶群这些人的书面检查上加上严厉批评的批语,这就叫做"甩石头"。"甩石头"是为了打压对方的政治空间。以当时毛泽东的威信,被毛泽东严厉批评的人,其他人就会自动疏远该人,甚至会主动检举揭发该人的问题,这样一来,该人在政治上就会被逐步孤立起来。

毛泽东对林彪的第二次"甩石头",是 1970 年 12 月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间接地批评了林彪,所以这也是一次对林彪的"甩石头"。经毛泽东本人批准,中共中央把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也就是说,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石头",甩到了全体党员中间。

毛泽东与斯诺这次谈话时间较长,内容也很广泛,比如谈到了计划生育问题。

从毛泽东的谈话来看,他是说赞成搞计划生育的。下面摘录这段谈话如下: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 现在有些进步了, 但还很落后, 识字的人还不多, 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 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 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 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 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 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 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 你要完全平等, 现在不可能。】

毛泽东的第二个话题,是尼克松访华的问题,这个话题当时没有传达下去, 我们放在后面分析。毛泽东的第三个话题,是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下面摘录这 段谈话如下: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163)

毛: 那就早啦,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的时候。《二十三条》中的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刘少奇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国民党,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是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 那末, 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 嗯。1965年10月就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十六条》 搞出来了。

斯: 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 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 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 就是那张。

斯: 刘少奇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 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 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

毛泽东这里说明文革初期要搞个人崇拜的原因,他指出:"那时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权,我也管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赞成搞个人崇拜的原因,是为了夺权,也就是夺"党权"、"宣传权"以及"地方行政高官的权"。而现在这些大权,毛泽东基本上夺过来了,因此也就不在需要再搞个人崇拜了。

毛泽东继续说:【比如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GreatTeacher , GreatLeader , GreatSupremeCommander , GreatHelmsman", 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 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 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 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 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 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 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 不怎么样。

斯: 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 (164)

这里毛泽东明确地说"四个伟大"讨嫌,甚至说"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四个伟大"。斯诺不一定清楚"四个伟大"的含义,但只要是对政治敏感的中国人都清楚,"四个伟大"是林彪的象征。说"四个伟大"讨嫌,就是影射林彪讨嫌;

说总有一天要去掉"四个伟大",也就意味着总有一天要去掉林彪。毛泽东还说 "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毛泽东这里说的"那一套",显然是 指林彪的那一套。林彪听到毛泽东在外国人面前这么绕着弯子奚落他,还把这些 话大张旗鼓地传达到全体党员,不可能不产生忿怨。

毛泽东把这次与斯诺的谈话传达到基层,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要让大家的思想转弯,给大家说明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人们有个朴素的疑问:在文革初期大张旗鼓地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不反对,为什么这时候又开始反对了?

因此毛泽东在谈话中解释说,他当初赞成搞个人崇拜的原因,是"为了反对刘少奇"。毛泽东并且说,过去为了反对蒋介石,中共树立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他们不但不行,反而成了革命的阻力,所以毛泽东说"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

这样一来,毛泽东借着这次谈话,把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传达给全体党员。 这就是文革初期为了打倒刘少奇,搞个人崇拜是有必要的;现在刘少奇已经打倒 了,所以个人崇拜也就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毛泽东这次借着与外国人谈话,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全体党员,也是高明的一招。如果毛泽东专门在大会上做一次 讲话,来解释自己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反而很不自然。

最后斯诺问毛泽东"党现在怎么样?",毛泽东坦诚地说:"不怎么样。"毛泽 东对当前党的状况,是相当不满意的,这也是毛泽东要把文革继续搞下去的原因。

毛泽东对付林彪的第二项办法是"掺沙子",首先是在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中,掺入非林彪派系的人。本来中央军委办事组,是由叶群和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五人组成的,这时林彪可以完全控制军委办事组。在"九大"后,毛泽东向军委办事组掺入谢富治和李德生两个人,不过此时林彪也还可

以掌控军委办事组。之后毛泽东继续向军委办事组"掺沙子",1971年4月, 纪登奎和张才千参加了军委办事组,之后毛泽东还准备让李先念也参加军委办事 组,只是由于"九一三"事件而作罢。

"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0月3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此后叶剑英代替了林彪,成为除毛泽东之外,军队中权力最大的人。

再者,毛泽东对林彪的"挖墙角",也并不是一次性的。1970年12月,毛泽东又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对林彪进行二轮"挖墙角"。

(165)

毛泽东要对林彪动手,就事先不得不做出各种防范,包括防范林彪集团搞政变。毛泽东要防范第一个重点是政治中心北京。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之前,先拿掉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罗瑞卿,再拿掉独霸一方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再改组北京军区。

文革前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杨勇,政委为廖汉生。杨勇与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因此,毛泽东以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为由,1966年5月成立叶剑英、杨成武、谢富治等人组成的首都工作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北京卫戍区。同时,毛泽东还通过林彪,对北京周边的军队进行了调配,防止刘少奇的死党铤而走险。

林彪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的著名《五一八讲话》中,专门提到这件事说: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 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毛泽 东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

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在 1966 年 5 月做好军事部署之后,1966 年 8 月亲自写《我的一张 大字报》,一举拿掉刘少奇。毛泽东在拿掉毫无兵权的刘少奇之前,还要对北京 地区进行防范性的军事部署,那么毛泽东这次拿掉对军队有很大影响力的林彪, 在此之前肯定要进行一些预防措施。

1970年12月,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将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撤职,换上毛泽东信任的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掌管北京军区。

林彪从上次毛泽东拿掉刘少奇之事得到了经验,认为毛泽东这次改组北京军区,就是针对他林彪来的,这也就是毛泽东要对他动手的前兆。因此,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加剧了林彪的危机感,促使他做出制定暗杀毛泽东《五七一工程》的决定。

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也是用"甩石头"的办法,第一步是制造石头。1970年11月16日,中央做出《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该指示说:"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

毛泽东通过中央文件,号召高官们对陈伯达"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 妥送中央"。这样对陈伯达的揭发材料,就成为毛泽东进行"甩石头"的石头。 果然,该中央文件发下去不久,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就送上来一份揭发陈伯达反 党罪行的报告。

(166)

该报告说:【据我们知道,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 乱军、夺权。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据我们所知,北京军 区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到场讲话。有的人把陈伯达当成"精神支柱",把他的讲话当"圣经",北京军区负责人纵容陈伯达在这里乱跑乱说,使他成了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三十八军的这份揭发报告,正是毛泽东想要的。于是 1970 年 12 月 16 日, 毛泽东抓住这块石头甩出去,在这份揭发报告上批示说: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北京军区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这里提到林彪对陈伯达"有意见",这应该是强加给林彪的。毛泽东这么说,是要把林彪和陈伯达分开来处理,这是毛泽东常用的"各个击破"手法。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借着三十八军的揭发报告,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 对林彪实施第二步的"挖墙脚"。

据邱会作回忆说:【华北会议是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毛主席称之为"挖墙脚"。会议表面上是解决庐山问题的主要当事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是对着林彪的。其实,北京军区并不是林总的"地盘",他也从没有安插过干部。主席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主要是为了北京的"安全",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这个"安全"是高过一切的。】

邱会作这里也说,毛泽东召开华北会议,是针对林彪的,改组北京军区,是 为了北京的安全。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 对批判陈伯达的指示。其内容大致是:对庐山发生的问题,是陈伯达兴风作浪捣的鬼。他不仅是一个政治骗子,在历史上也还有不清楚的问题。陈伯达的问题讲清楚,这样,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就有出路了。

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政治局会议的会场上,立即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绪。军委办事组几个人一句话不说,这时江青来劲了,她说:"以牙还牙,过去他们怎样整我的,我就怎么还击,我是不管他姓什么。陈伯达在庐山那样的表现是仗势欺人,他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批判陈伯达的幕后人和轿夫。"

江青的话很显然是指批判林总和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等人。

周总理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立即带有情绪的口吻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

黄永胜毫不含糊地立即表态说:"我们拥护毛主席批判陈伯达的指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则。"他说话的音量相当大,也略有点神气。

(167)

周总理看到会议难以继续开下去,于是就采取老办法:"今天的会到此为止。" 一边说一边起身就走了。

过了两天,周总理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指示,要召开华北地区 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会议。"这就是华北会议的由来。

华北会议表面上是解决陈伯达对华北的影响,实际上是为了夺北京军区的权。 人们都称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是华北三巨头,主席对他们不信任不放心了, 换上主席信任的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去掌管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他们, 经过华北会议之后都下台了。】

从邱会作的回忆来看, 江青提出要批判陈伯达的"幕后人和轿夫", "幕后人"

显然就是林彪,而"轿夫"显然就是黄、吴、李、邱等人。此时周恩来没有支持 江青,而是用毛泽东的话来压江青。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 因为毛泽东的指示中,只有批陈伯达,并没有批"幕后人和轿夫"。周恩来这里 偏袒了林彪。

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回忆说:【1970年12月,召开了华北会议。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闹大了。

华北会议上说李雪峰与陈伯达有关系。根据当时情况,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有特殊关系。李雪峰后来被撤销了职务,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后来又被开除了党籍,整得很惨。郑维山也被免职了。粉碎"四人帮"后,李雪峰的党籍也恢复了,先任政协委员,后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委员。】

其实李雪峰和郑维山,并非林彪死党,但由于李雪峰与陈伯达有一些关系,而且在庐山会议时,李雪峰是华北组的组长,李雪峰没有反对陈伯达的发言。据吴德回忆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为什么你们华北组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怎么回事?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李雪峰的这种态度,当然被毛泽东怀疑是陈伯达的重要支持者。

另外,被说成是"反革命简报"的华北组《六号简报》,又是李雪峰的秘书起草的,这些事都让毛泽东对李雪峰产生怀疑。至于李雪峰派秘书去烧文件,这就更让人怀疑了。因此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后,李雪峰被打成林彪死党,开除了党籍。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认定李雪峰与林彪无关,给他平反,恢复党籍,并安排了工作。

(168)

关于华北会议,李作鹏也回忆说:【1970年12月,根据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这个会议的起由,是三十八军的《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引起的。华北会议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并指定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和我负责会议的日常具体工作。

黄永胜看到毛主席亲笔排列上述四人的先后次序(依次为李德生、纪登奎、 黄永胜、李作鹏),征求我的意见:"工作怎么搞法?"

我说:"最好由李、纪牵头,我们协助。如果他俩不愿牵头,那你就应多尊 重他俩的意见,挺身而出,大胆工作,绝对不可采取消极观望态度。"

黄永胜说:"难哪!"

我又说:"遇事多向总理请示。"黄永胜表示同意。

华北会议采取小组会议、中型会议、全体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是批 判李雪峰、郑维山等人的错误。毛主席决定李雪峰、郑维山隔离审查,北京军区 由李德生、纪登奎领导。】

据李作鹏回忆,在华北会议上,黄永胜排名已经在李德生和纪登奎之后了。 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而李德生只是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 的组员,毛泽东把黄永胜排在李德生之后,意味着黄永胜的地位已经下降了。 对此,吴法宪也回忆说:【接着就轮到黄永胜了。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再像在庐山那样,一下飞机就拉去彻夜长谈,拼命地拉黄永胜了。毛泽东看看黄永胜实在拉不过来,也就批开了。11月13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就批评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关于华北会议的情况,邱会作还回忆说:【华北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做了总结,并宣布了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毛主席称赞华北会议开得好,解决了主要问题。按照主席的要求,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华北会议,江青在会议上表现得非常不像话,动辄训人,甚至骂人。揭发出来的问题也无非是一些是是非非的问题,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的问题也要撤销职务,是不妥的。当然,毛主席是要把北京军区和北京地区握在自己手中,冤枉李雪峰、郑维山就不重要了。】

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在文革后期是一个得到毛泽东信任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是怎么看上李德生的呢?

(169)

《李德生回忆录》说:【毛泽东选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也不是单从李德生在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成绩,不是单看文字报告就确定的。毛泽东从许多方面调查情况,多次当面考察,毛泽东后来亲自对李德生讲过:"我不是只从南京军区,而是从多方面了解你的。"

在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以前,毛泽东两次当面考察李德生的情况。第一次是 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周恩来宣布出席会议人员 的编组名单,当他念到华东组列席的李德生时,毛泽东突然打断周恩来的话,问道:"哪个叫李德生?"

毛泽东虽然在多次文字报告中,熟悉了李德生领导的十二军在安徽"三支两军"的情况,却未见其人。周恩来当即介绍说:"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

周恩来随即向李德生招招手,说:"李德生同志,请你站起来一下。"李德生 从列席人员的位置站起来。

参加会议的人也有点奇怪,毛泽东为什么对一位列席人员、一位军长感兴趣, 不由得回过头来看李德生是个什么模样。

毛泽东当着众多参会人员,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

毛泽东确实不认识李德生,而李德生当然认识毛泽东。他对于毛泽东的点名, 也感到有点意外。

毛泽东再次发问:"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啊?"

李德生大声回答:"我是河南省新县人。"

毛泽东接着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李德生回答: "52岁。"

两个月前,毛泽东亲自决定转发十二军制止武斗的经验,现在他还要直接听 听李德生的看法,又问李德生: "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人们掉转目光,准备听李德生介绍经验,不料李德生只说了一句话:"就是 大造舆论!"

大家以为只是开场白,静了一会,却听不见下文。这才明白李德生已经讲完了,隔了片刻,引起一阵笑声。

毛泽东也笑了,他肯定李德生的经验,并且把这一话题引导到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在宣布编组名单的时候,出现毛泽东同列席人员这样大段对话,是很少有的 事啊。】

毛泽东提拔李德生,并不是因为他是毛泽东的老部下,甚至毛泽东一直不认识他。李德生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人,历史上与毛泽东没有特殊关系。作为一个领导人,提拔重用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担当至关重要的职务,这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可见毛泽东是胆大的人。

(170)

《李德生回忆录》说:【毛泽东同李德生的第二次谈话,是在 1969 年 4 月, 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宣布选举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结果,在念 到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李德生习惯地戴好军帽,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周恩来 笑着说:"德生同志,请你把军帽摘下来吧。"

李德生摘下军帽,露出一头浓密乌黑的寸发,宽宽的额头,微微谢顶。他端 庄地面向主席台,十分精神。毛泽东看到这位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负过 6 次伤的老红军战士,正值壮年,体魄 魁梧,红光满面,风华正茂,当时年已 76 岁的毛泽东不禁再次问道:"你今年 多大年纪了?"

李德生答道:"我53岁了。"

比李德生年长23岁的毛泽东,接连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

毛泽东在两次与李德生见面之后,就决定重用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这次改组北京军区时,毛泽东又大胆地启用李德生担当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 令。对此《李德生回忆录》说:【1970年12月19日,李德生突然接到中央办 公厅的通知,请他立刻回北京,说是主席有事情找他。第二天,12月20日, 就乘空军派来的专机赶回北京。李德生下了飞机,没有停留,直接到中南海游泳 池毛泽东的住地。

毛泽东见了李德生,显得很高兴,问道:"你回来了,你们安徽形势怎么样啊?"

李德生不知道毛泽东特地把他叫回来,要谈什么事情,显然不是谈安徽的情况。 况吧。他简要地汇报了一下安徽的情况。

果然,毛泽东没有接着问下去,而是郑重地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

李德生毫无思想准备。他一直感到职务太多,担子太重了。李德生向毛泽东建议:"主席,北京军区的工作任务很重,我努力去做好。总政治部的事还管不管?"

李德生想:如果不管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也就少兼一个职务了。

不料毛泽东回答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总政治部还有副主任嘛。"】

据李德生回忆,毛泽东亲口对他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这也就是说,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没有和林彪商量过,毛泽东只和周恩来商量过,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戒心已经很重。

林彪得知毛泽东不跟自己商量,就任命李德生为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 这当然让林彪非常不满。因为林彪名义上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负责人,任命北 京军区司令员,居然不通过林彪,可见林彪的实权已经被剥夺了。这也是促使林 彪下决定制定《五七一工程》的原因。

(171)

自从毛泽东发起"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北京军区等军队下层已经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可是中央军委还没有动静,这是因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没有做出搞"批陈整风"的指示,林彪这是明显地抵制毛泽东的"批陈整风"运动。林彪抵制"批陈整风",这就让他的亲信"四大金刚"为难了。

这时候,林彪采取了"超然"的做法,就是不对"四大金刚"做指示,让他们凭自己的想法去自行其事。林彪这种"超然"的做法也是高明的,如果此时林彪继续给"四大金刚"做指示,一来正好给别人抓住把柄,说他们搞小集团,二来也让"四大金刚"为难。

如果林彪指示"四大金刚"不搞"批陈整风",显然与毛泽东的指示相抵触。如果"四大金刚"不执行林彪的指示,那是不给林彪面子;执行林彪的指示,又要得罪毛泽东,所以他们将非常为难。所以林彪这时不做指示,任凭"四大金刚"自己行事,反而给"四大金刚"减少了让他们为难的事情。

在"批陈整风"的问题上,"四大金刚"也很知趣,也不去向林彪请示,这样双方都可以避免尴尬和为难。不过"四大金刚"与林彪不同,他们并不想彻底得罪毛泽东,还想给自己留后路,所以就不得不搞一些象征性的"批陈整风",以便向毛泽东那边交差。

为此,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考虑召集军队高官开一次"批陈整风"的军

委座谈会,做出一个"批陈整风"的样子,企图以此向毛泽东交差,"蒙混过关"。 因为此时林彪已不对他们做指示,黄永胜就与其他几个"金刚"商量。

据邱会作回忆说:【我是坚决反对仓促开会的,我曾对黄永胜直言不讳地说: "军委座谈会要开失败了,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们会错上加错,他们(江青一伙)会喜上加喜,这一错一喜就有埋葬我们的可能。"

我认为随便召开一次影响全军的高干会,就有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危险。 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都是庐山问题的当事人,毛主席现在究竟信任我们, 还是不信任我们?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军高干 会,能行吗?说话能有人听吗?

黄、吴他们说:"你对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对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估计的太多了。这样也未必能正确处理问题。"

由于军委办事组的多数人都同意召开军委座谈会,开会的日期就定下来了。 1971年1月9日至2月14日,军委座谈会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为:各 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军区的首长和负责人,近一百五十人参加。军委座 谈会开幕的前一天,黄永胜在开幕式上讲什么话,又是一场争论。

(172)

我说:"黄总长明天说什么好,关键是会议怎么开,我看这是大问题。我主张,在庐山会议犯了错误的人,首先要做检讨,我的理由如下:我们批评陈伯达就是包含自我批评,我们没有自我批评,就不算批判陈伯达。现在毛主席把我们算成陈伯达'一伙'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我批评才能同陈伯达划清界限,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黄永胜对我的意见,则用另一种说法表示他不同意。他说:"我们几个人做

检讨是大局,需要请示报告。"

我对黄永胜的话是明白的,他说的"大局"就是指林彪反对江青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是同意黄永胜的观点的,不应该把林彪和江青的矛盾摆到毛主席面前去,这样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黄永胜还说:"自我批评只能说自己,不能涉及别人。"他的意思我也明白。 我说:"在批陈的同时,军委办事组不做检讨,能够叫做批陈吗?"

我说出这句话后,大家都瞪着我。发言后,我自己很后悔,但又觉得自己的话是应该说的。】

据邱会作回忆,此时四大金刚内部已经出现意见分歧,邱会作认为他们几个人应该赶紧做自我批评,与陈伯达划清界限,自己"解放"自己,可是黄永胜等人不同意。黄永胜是坚定支持林彪的,坚持要顾全"大局",也就是不能只顾自己"解放"自己,而背叛林彪。黄永胜还说"自我批评不能涉及别人",这里的别人,指的就是林彪和叶群。因为黄永胜的意见占上风,邱会作只得"少数服从多数"。

邱会作还回忆说:【就庐山问题来说,我始终是心情沉重的。因为庐山的问题,是不能简单了事的。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军队反江青一伙的斗争,由于林总不点名地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对庐山问题的处理,关键是毛主席对林总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样说一句话的问题,林总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里提着的,这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对主席解决庐山问题的打算,黄、吴、李、邱是非常关心的,因为这是关系 到我们政治命运的问题。但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是:如果问题升级涉及到林总, 就是党内大局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结局,会不会出现?】 邱会作这里说"由于林总不点名地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纵观林彪的历史,他是很少主动整人的,极少不点名地批评别人,因此大家都对他口碑不错。林彪批判彭德怀和刘少奇,那是为了拥戴毛泽东,并不算林彪主动要整彭德怀和刘少奇。

(173)

如果林彪是康生那样喜欢整人的性格,那么林彪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毛泽东还不会太在意。而有"不整人"口碑的林彪,这次却一反常态地主动批评张春桥,就让毛泽东感到不寻常,以至于认为"有鬼"。

邱会作说"林彪的政治生命就取决于毛泽东的一句话",这话也不对。林彪的斗争技术大大高于邱会作这些人,毛泽东不可能一句话决定林彪的政治命运,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双方都有胜负的可能。毛泽东如果把林彪搞成"彭德怀第二",毛泽东也不算胜利,因为打倒彭德怀使毛泽东的威信受到相当的损失。毛泽东并不希望用自己损失很大威信的代价,来换取打倒林彪。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军委座谈会 2 月 15 日就结束了。会后,黄永胜还是不肯检讨,他的主要理由是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此没有错误。公道地说黄永胜说得对,但主席那里不这么认为。总理叫我给黄永胜做工作,我也没有做通。

我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就把问题的实质给点穿了。总理对我说:"什么在会上没有发言,发言不发言,在主席那里都是一样的,主席要打你们的宗派主义。"

我一字一句地把总理的话传达给黄永胜,黄永胜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 检讨吧。我不检讨,你和李瞎子也不便检讨,把你们憋得够呛吧?"

接着黄永胜又说:"我们不是宗派主义,他们才是宗派主义呢。"看来黄永胜还是没有想通。不过,这时黄永胜肯写检讨了,我和李作鹏也前后写了检讨。】

据邱会作回忆,"四大金刚"在讨论是不是检讨的问题时,完全没有向林彪请示汇报,也没有跟叶群商量。"四大金刚"不向林彪请示汇报,他们少为难,林彪也少为难,双方心照不宣。"四大金刚"只是跟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说服了黄永胜做检讨,于是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就可以一起跟着做检讨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1971年4月19日,毛主席在周总理有关计划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这个批示像晴天霹雳一样,把军委办事组多数人的脑袋都打昏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不批陈"的批评,是庐山会议以后最严厉的批评,这一批评对军委办事组极为不利。黄永胜急得嘴唇也抖动了,他说:"你说问题在哪里?"

我说:"散会再说。"

散会后,我到了黄永胜的房子里,黄永胜很沮丧地坐在沙发里。我说:"我们的会开了这么久,都是按照中央提供的陈伯达的材料批判陈伯达,我们自己没有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揭发陈伯达,也没有检讨自己。"

我说:"我想在主席看来,军委办事组是否批判了陈伯达,唯一的标准是我们这些人是否有自我批评。我们犯了错误的人不进行自我批评,就是不批判陈伯达,我们的座谈会,是开了一个太失败的会。"

(174)

主席的批示对大家震动很大,我们给主席写检讨,不但势在必行,而且要加快步伐了,2月20日,我们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毛主席当天就做了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毛主席在批示中,强调让我们作检讨,又表示让我们过关,毛主席还批道: "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 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由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 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我们当时的思想是:有抵触情绪,又认真作检讨;想不通,又对毛主席感激万分。】

前面邱会作提到,他和黄永胜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是:"1959 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结局,会不会出现?"黄永胜他们吃不准毛泽东对林彪的最后态度,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对林彪的处分,无非是两种:第一种是像处理刘少奇那样,彻底打倒;第二种是像 1958 年处理周恩来那样,在一段时间内把周恩来整得够呛,但最后又让周恩来过关了,周恩来又官复原职,重新掌权了。

如果是彻底打倒林彪的第一种情况,黄永胜他们跳出来揭发林彪,与林彪彻底决裂,反戈一击,就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但如果是林彪最后过关的第二种情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黄永胜他们跳出来揭发林彪,那就要彻底得罪林彪。 等以后林彪官复原职,重新掌权,林彪能放过他们几个吗?那时候林彪肯定会像整倒杨成武那样,把他们几个全整倒,而毛泽东也不会救他们。

因此,黄永胜他们跳出来揭发林彪,既可能是一步好棋,也可能是一步臭棋,这全取决于毛泽东最后将怎么处置林彪。黄永胜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毛泽东尽管对林彪不满,要整一整林彪,但最后还是要让林彪过关的,毕竟他们是"亲密战友"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林彪的结局将是第二种的"最后过关"。当年高岗试图扳倒刘少奇,也是没有看出毛泽东只是对刘少奇不满,在那时只是想把刘少奇整一下,最后还是要让刘少奇过关的。

黄永胜等人基于林彪将"最后过关"的假设,那么他们现在的明智做法,就是尽可能不要得罪林彪。所以黄永胜等人,就想在军委座谈会象征性地批一下陈伯达,向毛泽东"交个差",试图蒙混过关。因为他们做检查将要牵扯到林彪,既然他们认为毛泽东最后是要让林彪过关的,那么毛泽东就会让他们也过关。可以没想到毛泽东根本不让他们过关,这似乎也就是不想让林彪过关了。

这下黄永胜等人着急了,赶紧准备做检讨,写检查。因为毛泽东表示要给他 们出路,他们还很感激毛泽东。

(175)

邱会作回忆说:【当时军委座谈会已经结束,大多数的人还没有走,经我们商量后,军委办公厅又通知各地军队领导干部来开会,因为我们对主席的批示要做检讨,没有人听也不行呀。军委办事组成员,按排名顺序做了"检讨"。会后,黄永胜又报告总理,请总理安排我们几个人在一定的范围作检讨。总理考虑后说:"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检讨吧。"

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于 1971 年 2 月间在人大会堂举行,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总理在会上说:"今晚的会议,同时还要传达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问题的指示,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有批评的批示,我看现在请黄永胜同志先发言。"

黄永胜事先有准备,他代表军委办事组首先发言,他的发言是经过军委办事组讨论的。在黄永胜发言之后,以江青一伙为主对黄、吴、李、邱进行了猛烈攻击,总之,要给军委办事组一个下马威。要是意志软弱一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被吓倒的。

张春桥发言说:"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当他知道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

的批评后,表示非常关心。他要我为他带三句话到今晚会议上来。这三句话是: 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谅;陈伯达跟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定要搞清楚;对军队往何处去,不能等闲视之。"

张春桥接着说:"我认为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为什么对陈伯达连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我看就是向你们提出了希望。你们同陈伯达不一样,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们自己不要硬往陈伯达那里钻。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接着,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发言,他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可能是不伤同类吧?现在来看庐山的问题就更清楚不过了。庐山没有被炸平,是陈伯达动手太早了,你们内部也协调不好。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

毛远新又说:"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把刘少奇司令部打垮了。那么,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像对待刘少奇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我劝你们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于一切的。"

毛远新的发言,影响是很大的,他似乎等于是毛主席的代言人,我认为毛远 新的重头话是不敢乱说的。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黄永胜即席做了很简短的发言。从总理的眼神看有些吃惊和担心,我真是手心里捏出汗来。黄永胜说:"今天的会议活像造反派的斗争会,连说话的语言都是造反派惯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挂牌子了。现在,我倒是要问:毛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我是坚定不移的拥护毛主席的,有错误我们会诚恳向毛主席检讨。所以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关键时刻黄永胜还真扛得住。

最后,周总理说了几句话,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也不能有任何改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即最高指示为准。"】

(176)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四人的检讨,是林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毛泽东只是批评吴、李、邱等人在庐山会议上配合陈伯达"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错误,因为黄永胜前期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没有发言,所以 黄永胜对"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这两个问题是没有错误的。也因为如此, 黄永胜不肯检讨。因为黄永胜一检讨,错误的性质就变了,就不单纯是庐山会议 上的问题了。

这时周恩来把问题的实质"点穿了",周恩来说:"在会上有没有发言,发言不发言,在主席那里都是一样的,主席要打你们的宗派主义。"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批评的已经不单单是"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扩大为是"宗派主义"的问题。黄永胜听到周恩来这么说,只得检讨了。所谓"宗派主义",用古代的话就是"结党营私",搞小集团帮派活动。因此,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四人检讨时,江青集团的人就不再批他们"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是把问题转为批判他们的小集团帮派活动。

康生还算是就事论事地说:"陈伯达同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 张春桥就开始上纲说:"军委办事组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毛远新更是 扣大帽子说:"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

这次会上毛远新的发言是耐人寻味的。邱会作说:"我认为毛远新的重头话 是不敢乱说的,他似乎等于是毛主席的代言人。"这个看法是合理的,因为"未 遂政变"这么重的话,毛远新如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或暗示,是不敢随便说的。特别是毛远新说:"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要用对待刘少奇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这句话,几乎是说林彪是另外一个司令部,要像打倒刘少奇那样把林彪打倒。

毛远新的话,意在威吓"四大金刚",让他们知道如果再继续留在林彪的司令部,就要重蹈刘少奇的下场。张春桥也说:"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然而黄、吴、李、邱四人并没有被吓住,黄永胜反驳说:"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 黄永胜这么说,是因为毛泽东的公开讲话,还是"批陈整风",并提到过"未遂政变"和"另一个司令部"的问题。

这时周恩来出面替林彪集团打圆场,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为准。"周恩来的话,婉言否定了毛远新说的"未遂政变"和"另一个司令部"的提法,因为这并不符合毛泽东的公开讲话。

(177)

虽说黄永胜在这次会上还表现出"扛得住"的样子,但他们四人的心中越来越慌张和动摇起来。据邱会作回忆说:【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受到了庐山会议以后最为严重的打击。在会后清晨4时回到京西宾馆,我们几个人议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将情况向林总汇报(叶群未参加会);二是,我们要从被动争取主动,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发表意见说:"当前即使请林总出来讲话,对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利,反而

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提议,请周总理同我们谈一次话,主要是接受总理对我们的批评。"

这个提议,大家同意了。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商定,军委办事组一面进行整 风学习,同时要尽快向毛主席写检讨。我们争取主动的唯一办法就是"自我批评", 只要有比较好的自我批评,并获得了毛主席的基本同意,我们就主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四大金刚"在这次会后曾想向林彪汇报,但邱会作反对说 "向林总汇报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其他人也同意了邱会作的看法,于 是他们就没有去向林彪汇报,而是请周恩来跟他们谈话,向周恩来求援。有人说 林彪搞政变,应该动用他的"四大金刚",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当时 "四大金刚"都已经"躲着"林彪了,他们在会上挨批,毛远新说出"另一个司 令部"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也不去向林彪汇报,甚至连叶群都不通知。在这样 的情况下,林彪怎么能动用"四大金刚"呢?因此,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在事 实上已经无法再用"四大金刚"了。

邱会作四人统一认识之后,黄永胜在会上作了一次检讨,他主要说: (一)承认他们与陈伯达"有一些关系";(二)承认在庐山会议上,陈、吴、李、邱在一起,长时间谈论过张春桥的问题;(三)承认开幕式上林彪讲话之后,叶群和他们谈过"陆定一式人物"的问题。

这是"四大金刚"在检讨中,第一次提到叶群。这次提到叶群,下一次就有可能提到林彪了,这也是"四大金刚"动摇的表现。据邱会作回忆说:

【在我们整风的基础之上,周总理同军委办事组谈了一次话。总理首先说: "我看到永胜同志发言的记录稿,这是一篇很好的讲话。在这个记录稿的基础上,可以写一篇较好的检讨报告,你们应立即向毛主席写个报告。" 总理说:"主席对你们仍然是很关心的,我刚才就是从主席那里来。主席交 代我说:'你告诉他们,要犯得起错误,要做得起检讨。'有了这两条,你们还有 什么顾虑?"

总理接着说:"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要有自我批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应当看到主席对你们抓得很紧,你们应当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主席的精神。"

(178)

根据周总理的谈话精神,我们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紧接着,我们几个就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开了数次会议,黄永胜说了不少话,但中心是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口径"的三个统一。

对"三个统一"的前两个,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对"统一口径"的意见就不一致了。黄、吴、李、邱几个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庐山会议以来办事组第一次这样激烈的争论。

李作鹏说:"统一口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黄永胜说: "只说自己,不涉及别人。"

李作鹏说:"不涉及别人,我同老邱就不需要写报告。我们的事是从你们正、 副组长那里来的。"

黄永胜说:"我说的不涉及别人的意思,你们会理解的。除了林总这个大局之外,其余的人无论怎么说都可以。"

黄永胜怕吵起来,就说:"今天不谈了。"

过了几天,大家又在一块谈,这次主要是谈吴法宪新写的检讨稿。吴法宪向 大家读了一遍,然后黄永胜让我们发言。我说:"稿子写得很'文气'。" 李作鹏很生气地说:"什么'文气',应当是'憋气',这是什么检讨稿?" 黄永胜赶紧说好话,他说:"我们好好商量,互相帮助。老吴的稿子是一定 会写好的。"

吴法宪听了李作鹏的话,手拿着他的稿子,抱着一个皮包,起来就走了。吴 法宪边走边说:"我的稿子好坏,我自己负责。你们不要为我操心了。"

吴法宪走了,我们也就没有谈下去了。黄永胜最后说:"看来在一起要谈得好,是不可能的了。在一起不仅谈不好,还容易伤和气。"

从此以后我们四人,就没有再在一起谈检讨报告的事了。】

据邱会作回忆,"四大金刚"之间的团结从此也开始瓦解了,他们开始自己写自己的检讨,不再相互商量了。而且,指导他们写检讨的是周恩来,他们写的检讨事先送给周恩来看,周恩来说可以之后,才送到毛泽东那里。他们四人写的检讨,事先都没有给林彪看过,他们也不敢给林彪看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黄永胜、李作鹏和我,在3月中下旬都分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我的检查报告写好后,于1971年3月中旬就送给周总理。总理看到报告之后,认为写得不错,他很高兴,转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收到黄永胜、李作鹏和我的检讨报告,很快就批了下来,主席的批示是:"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很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检讨写得一般,但满足了毛主席的心愿。1971年3月24日下午3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和周总理、康生接见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

(179)

毛主席是在他的卧室接见我们六个人的,主席坐在沙发上,向我们进去的人微笑招手。我们进去的人都先向主席敬礼、握手,然后在两旁坐下。我们坐好之后,毛主席说:"早就要请你们几位来谈谈,今天才实现。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礼多人不怪,有礼不怕迟。"】

原来坚持不肯写书面检讨的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这次也写了书面检讨, 也就是向毛泽东这边靠拢了,毛泽东比较满意,因为这是孤立林彪的第一步。于 是毛泽东趁热打铁,亲自召见"四大金刚",进一步拉他们一下。

据邱会作回忆说:【毛主席说:"中央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讲批陈整风问题。你们之中的一些同志也发言做点自我批评,名义上讨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给你们做点自我批评创造条件,这样做好不好?"

黄永胜立即说:"我们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我们犯了错误,应该进行自我批评。"

周总理说:"我们要发扬延安整风精神,用自我批评和批评的武器来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党快五十年的历史了,但对待犯错误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的队伍内,作为犯错误的来源,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贪生怕死,贪污公款等,为个人利益犯错误;另一个是思想问题,为革命犯错误。"

毛主席说:"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我是赞成不怕犯错误的,一个人要工作就要不怕犯错误,怕这怕那还做什么工作?当年,我们上井冈山,黄永胜也是跟着上去的一个,就没有事先考虑错误与正确的问题,是逼上山的。如果事先去考虑会犯错误,还能上井冈山?"

毛泽东这里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央准备开会一次会,要让黄永胜等人

在会上作自我批评,黄永胜答应了这个条件。林彪是黄永胜等人的直接领导人,按照一般的惯例,自己的部下犯了错误,领导人也应该做相应的自我批评。黄永胜等人一旦在中央会议上公开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那么他们的上司林彪不做自我批评,就说不过去了。因此,黄永胜等人做检讨,就是"逼"林彪做检讨的第一步。

另外,毛泽东还安慰这几个人说,犯了错误也不要怕。毛泽东说到犯错误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为自己"犯错误,第二个是"为革命"犯错误。所谓"为革命"犯错误,就是好心办坏事。毛泽东说一个人不应该怕犯错误,否则就会畏缩不敢工作。毛泽东还用自己的例子证明,如果当年他们害怕犯错误,也就不可能上井冈山了。

(180)

关于毛泽东在召见他们时所说的话,邱会作接着回忆说:【接着,毛主席手 持报告,对着我说:"这个报告(指我的检讨报告)是你自己写的吗?"

我立即回答:"是我自己写的。"

对我的回答, 毛主席既不认可,也不否定,好像还要说别的什么似的。

周总理接着说:"是他自己写的,他是可以写一些东西的。"

毛主席说:"是呀,此人的文化是背识字牌背出来的。他还很年青的时候, 在长征的路上我们就熟悉了。"

周总理说:"我是在瑞金就同他熟悉的。在长征的路上,他是我们的青年小科长。"

毛主席说:"啊,不简单,报告写得不错,你的字也写得不错嘛。我死后你可以来这里当中央委员会主席!"

主席的突而其来之语,全场都震惊了,我反应还算快,立即站起来大喊一声: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周总理对我非常满意,大家也发出了笑声,全场的气氛很活跃。

毛主席说:"我提议,恩来同志带你们几个人(黄、吴、李、邱、纪、李、汪) 到北戴河去一趟,去同林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的问题。林彪同志这个人,想问题 常常比我们想得都深刻,对开会的问题,先征求他的意见再做决定,是很必要的。"】

关于毛泽东召见的事,吴法宪也回忆说:【我们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了 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坐在前排,我们在后面坐着。毛泽东说: "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吴法 宪和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

谈话中,毛泽东问邱会作说:"你的检讨是秘书写的,还是自己写的?" 邱会作回答说是自己写的。接着,毛泽东又问黄永胜和李作鹏,他们俩也都 说是自己写的。

毛泽东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去当主席。" 邱会作反应很快,赶紧站起来说:"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次谈话不到一个小时,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有讲话。 毛泽东讲完以后,就叫我们走。临走时,毛泽东对我说:"吴法宪,你再写一个 检讨,我是保你的。"

听见毛泽东这样说,我动了感情,说:"主席保重,我谢谢主席!" 毛泽东接着说:"你走吧,你要知道,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 我说:"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表示出对"四大金刚"相当友好的态度,甚至开玩笑

说"邱会作的字写得好,我死后你可以当主席"。这个玩笑就使紧张的气氛活跃起来,让他们感到一种在自己人圈子里谈话的轻松气氛。毛泽东要让"四大金刚"感到,毛泽东对他们是很好的,只要他们离开林彪,毛泽东是不会亏待他们的。

(181)

毛泽东召见"四大金刚"的中心目的,是让周恩来带着"四大金刚"去北戴河见林彪。这一方面是向林彪"示威",意思是:你看,你的四大金刚已经答应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检讨了,他们已经站到我这边来了。这自然会让林彪感到空前的孤立;另一方面是向林彪"施压",毛泽东希望林彪在这样的压力下投降,也答应在中央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只要林彪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毛泽东的下一步棋就好走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1971年3月29日,周总理领黄、吴、李、邱、纪、李等六人,由北京乘专列火车到北戴河去了。我们到北戴河,得到最为热情的接待。叶群亲自到北戴河车站去迎接周总理,生活也安排得很好。周总理、黄永胜各单独住一栋楼,吴、李、邱、李、纪等五人,住在空军疗养院。晚上,黄、吴同叶群谈话去了,其余的人都同总理一起,在他的住处看电影。

4月1日下午3时,林总主持了在他的住处举行的汇报会议。那天的天气还是相当的冷,但我们到达时,林总和叶群在门口等待周总理。总理到了之后,林、周进房子,还互让了一会。林要周总理走在前,总理让林走在前,正在相让时,还是叶群说:"我走前面给总理引路。"

在叶群引导之下,林、周才并排走进去,互相之间十分亲切。

林总主持了汇报会,他简单干脆地说:"欢迎总理讲话。"

会议开始时,叶群还在走来走去,林副主席用严肃的口吻说:"叶群,你坐

下来听总理讲话。"

周总理说:"毛主席要我领他们几位,到这里来向林副主席汇报和请示中央要召集一次会议的问题。主席说,庐山会议的问题到现在都有半年多了,本来问题已经处理了,但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还需要做一次处理。"

另外,总理还谈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周总理说完之后, 他要黄永胜简要说一下战备工作方面的问题。黄永胜说完之后,李德生和纪登奎 也作了汇报,周总理又要我简要说一下国防工业的问题。

最后,林总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庐山会议后半年多来,批陈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完全赞同。国内的工作很有成绩,国际活动打开了新的局面,都是很好的,战备工作有成绩,国防工业生产情况良好,都是好事。全党、全国、全军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可以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前进。"

林总还说:同意毛主席对黄、李、邱的批示,对三人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 法宪、叶群重写一次检讨。林总说:"他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绝没有想到陈 伯达的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

在林总住处开完会之后,我们即上原来的专列火车回北京,叶群到车站欢送 周总理。

毛主席派中央常委、政府总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去外地向自己的副主 席汇报和商量问题,这即便不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非常罕有的。】

(182)

关于这次北戴河之行,吴法宪也回忆说:【在毛泽东那里谈话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通知我们,要我们晚上 10 点钟在北京车站上车,准备去北戴河向林彪汇

报。

晚上,我准时到达北京火车站贵宾候车室。上站台后见到一列专列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列,我坐这样的专列还是头一次。周恩来除了有专列以外,在我们空军和民航还各有一架专机。

上了火车,夜已深了,各自就都休息了。我心中不安,从走廊里过去见周恩来,见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总理剪指甲,我过去坐了一会儿。周恩来问我: "你睡不着觉啊?"

我说:"我是在想我的检讨怎么写,我想请示一下总理,有一个问题我吃不准,就是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个问题写不写?这个问题主席提出过批评。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周恩来很耐心地告诉我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 涉的面太宽了。"

我当时非常感谢周恩来对我是一片好心,周恩来又说:"你写好以后,先送给我看,我再送给毛主席。你不要有压力。"

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8时到了北戴河。汪东兴安排前期工作,已提前到了这里,他把周恩来安排在原来毛泽东住的小楼,把黄永胜安排在另一座楼里,我们几个则住在一个招待所里。

上午休息,当天下午,我们一起见了林彪。首先由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这件事情毛主席说要他来请示和征求一下林彪的意见,还要向林彪汇报一下近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工作。

周恩来说完,便由黄永胜汇报战备工作情况;李德生汇报华北会议情况;纪登

奎汇报国务院的工作情况;最后再由周恩来谈外交情况;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

听汇报时,林彪没有说什么话。最后,林彪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以及对黄、李、邱检讨的批示。关于我们的问题,林彪只说了"无心插柳柳成行"这样一句话,就是这么一句话,也没有批评我们的意思。 林彪再没有多说什么,一共讲了三分钟。

当天晚上,叶群以怎么写检讨为名,把黄永胜和我两个人叫到她那里去。我 把自己的检讨稿给她看了,黄永胜对她的检讨提了一些意见,我没有说什么。当 晚,我们没有见到林彪。

第二天下午2时,我们从北戴河返回北京。这一次,不像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在火车上我和邱会作两个人在周恩来的车厢聊天,天南地北,晚上10点钟,到了北京,各自回家。】

周恩来这次带着"四大金刚"去北戴河见林彪,是林彪事件中的一场重头戏, 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183)

周恩来带着黄、吴、李、邱等人的北戴河之行,前面摘录了当事人邱会作和 吴法宪的回忆,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在毛泽东接见吴法宪等人时,临别之际毛泽东对吴法宪说:"我是保你的, 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吴法宪回答:"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

毛泽东让吴法宪当面向林彪认错,这是让林彪难堪的事。因为林彪反张春桥 的讲话,就是根据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论来的。如果吴法宪本人认错了,那么林 彪的那个讲话,自然也就是错了,这就是所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 林彪的讲话是"毛",吴法宪的争论是"皮"。

可是吴法宪到了林彪面前,却又没有向林彪认错,这样就避免了林彪的一次 难堪,算是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没有对林彪反戈一击。可是吴法宪答应过毛泽东"我 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样一来,他就对毛泽东失言了。对于吴法宪这种半路出 家搞政治的人来说,夹在两位政治巨人之间的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二)吴法宪没有兑现他对毛泽东的许诺,周恩来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吴法宪回忆说,他在列车上和周恩来谈话时,对他的检查上写要不要写林立果《讲用报告》的问题,向周恩来请教。吴法宪说:"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吴法宪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写了林立果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满意,林彪不满意;不写林立果的问题,就是林彪满意,毛泽东不满意。吴法宪请教周恩来:我是应该站在毛泽东一边,写呢?还是应该站在林彪一边,不写?

这时周恩来立即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周恩来劝吴法宪做出"让林彪满意而毛泽东不满意"的选择。吴法宪信任周恩来,就按照周恩来的话去做了,检讨报告上没有写林立果的问题。同时,吴法宪在向林彪当面认错的问题上,也根据周恩来的启发,做出了"让林彪满意而毛泽东不满意"的选择,也就是没有认错。

周恩来显然是偏袒林彪的,如果他怂恿吴法宪在检讨报告上揭发林立果的问题,把林彪的问题扩大到庐山会议之外,就会进一步把林彪推入窘境,林彪事件的发展也会大不一样。周恩来对他的偏袒,林彪也是心知肚明的,他暗暗感谢周恩来。

(三)林彪对周恩来的感谢之情,外人也能看得出来。邱会作说:"那天相当冷,

但我们到达时,林总和叶群在门口等待周总理。林、周进房子,还互让了一会儿。 林要总理走在前,总理让林走在前,正在相让时,还是叶群说:'我走前面给总理引路。'在叶群引导下,林、周才并排走进去,互相之间十分亲切。"

(184)

林彪知道,周恩来虽说是中立态度,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是站在林彪的一边。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林彪一定要与周恩来搞好关系,于是有上述的一幕。 跻身政治局的高官们都已经看出,这次毛泽东要"整"林彪,很多人都不敢和林彪来往了,连"四大金刚"都躲着林彪。此时,周恩来表现出与林彪"关系亲切",那就是对一种林彪无声的支援。

(四)林彪只是泛泛地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决定,既没有自我批评说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有错,也没有批评吴法宪等人。林彪只是说吴法宪等人"无心插柳柳成行,绝没有想到陈伯达的问题那样严重"。这其实是为吴法宪等人辩解,根本算不上批评。

(五)林彪没表示参加将要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对"批陈整风"运动更没有任何表示,这等于是对毛泽东的无声抵制。

(六)林彪没有召见"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也没有提出要见林彪,双方都在"避嫌"。吴法宪说:"这一次不像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

邱会作说:"毛主席派总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去外地向林彪汇报和商量问题,这即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非常罕有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据另一位当事人李德生回忆说:【在华北会议基础

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带着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一个台阶下。

到北戴河见了林彪以后,林彪只是表面上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据李德生说,周恩来带他们去见林彪,主要是两个目的:第一是让林彪表态 认错,第二是让林彪出席会议。可是林彪既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因此 毛泽东的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周恩来一行人从林彪那里回来之后,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邱会作回忆说: 【1971年4月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里,又一次接见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是周总理领黄永胜等到北戴河去同林彪商谈后的接见,陪同接见的有周总理、康生。

(185)

我们走进毛主席住处时,主席正坐在沙发上看黄、李、邱写的检讨报告。我们坐好之后,静候毛主席说话。毛主席首先说:"在北戴河挨骂了吧?"(指在北戴河受到了林总批评之意)

黄永胜很聪明,脑子反应很快,按照主席的思路,为取悦主席,黄永胜立即回答说:"受了批评舒服。"总理如释重负地向他点头。

毛主席说:"批评也是武器,同枪炮是一样的。前者用来打错误的东西,是思想武器;后者用来打敌人,是战斗武器。枪炮可以打敌人,也可以打伤自己的人;批评也是一样的,可以用来打错误的东西,也可以伤自己人。"

接着毛主席的谈话进入了正题,一口气说了三个问题:第一点说的是路线问

题,第二点说的是批陈整风问题,第三点说的是陈伯达问题。然后主席说:"你们几个人的报告(黄、李、邱)我都看了,报告写得都好。我批的是(手拿黄的报告,照念的):报告写得都好,我都同意。今后就是实践自己的申明了。"

毛主席念完批示之后,又说:"你们几个人(指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

周总理说:"完全拥护主席对黄永胜等五位同志的报告的批示,这是毛主席 的重大决策。"

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见,黄、吴、李、邱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可以说是真正放下了思想包袱。从庐山会议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在此期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坐卧不安,矮人一等"。今天毛主席同我们谈了之后,问题解决了,哪有不高兴之理?】

这次毛泽东召见,主要是想了解黄、吴、李、邱到北戴河的情况。毛泽东首 先问: "在北戴河挨(林彪的)骂了吧?"如果林彪骂他的"四大金刚",那就是林 彪投降了,可是林彪并没有骂他的"四大金刚"。如果把此事如实说了,毛泽东 肯定不高兴。此时黄永胜巧妙地回答说"受了批评舒服",就让毛泽东误以为林 彪批评他们了,因此"总理如释重负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这就让黄、吴、李、邱大为高兴,以为他们已经过关了,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其实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是当时被黄永胜忽悠了,误以为林彪骂了他的"四大金刚",这就说明林彪已经投降了,所以毛泽东也就放过黄、吴、李、邱了。可是很快毛泽东就知道了实情,林彪并没有骂"四大金刚",这就是说林彪还没有投降,"四大金刚"当然也就不能放过了。

(186)

前面提到,毛泽东说"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很好',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不够,要再补写一个。"因此吴法宪在毛泽东接见他们之后,马上赶写检讨报告。对此吴法宪回忆说:

【当天晚上,我加了一夜的班,把检讨写了出来。第二天,我把这个检讨带 到军委办事组,请黄、李、邱一起研究,他们三人都认为,我不应该对张春桥说 道歉的话。

我问他们:"不道歉能行吗?"

李作鹏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向张春桥道歉。"

邱会作也说:"道歉有什么用?"

黄永胜则说:"你这样写,别人一看就会说,你没有诚意检讨。有意见先吞下去,以后再说。"

听了他们的意见,回到家里,我又用了三个小时,把检讨稿重新写了一遍。 写完,反复校对,最后用个大信封,自己亲自装好密封,写上"送呈毛主席亲收", 通过机要部门速送周恩来。

检讨送上去以后,两天都没有回音,我心里又是紧张不安。终于到了第三天晚上,邱会作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说,他和周恩来一起开会,周恩来要他打电话告诉我,我写的检讨毛泽东已经批了。毛泽东的批示说:我和叶群的检讨"可以了"。

说到这里,邱会作还补充了一句告诉我,周恩来说"可以了"(指毛泽东对我和叶群检讨的批示)和"很好"(指毛泽东对黄、李、邱的批示)是一样的,让我不要有什么想法。

我想,毛主席现在对我们已经是"区别对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勉强过关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安慰我说:"我们几个人是分不开的,今后也一样同呼吸、共命运。'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

李作鹏的话说得好:"'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我写的检讨稿子,一直没有退回,就直接交给中央办公厅排印了。等我和叶 群的检讨一印好,就立即通知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据吴法宪回忆,他在最后一次写检讨的时候,曾经写了向张春桥道歉的话, 这样就是完全认错,完全认输了。然而其他几个"金刚",不同意吴法宪向张春 桥道歉,最后吴法宪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删去了对张春桥道歉的话。吴法宪听从 了其他三人的话,这就意味着他陷入林彪集团拔不出来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吴法宪在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亲收",可是却通过机要部门先送到周恩来那里,这就体现了他对周恩来的信任。吴法宪请周恩来看过之后再转呈毛泽东,如果有问题可以及时得到周恩来指点。

(187)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对吴法宪的批示之后,也立即让邱会作打电话通知吴法宪,并安慰他"不要有想法"。这样一来,吴法宪就更加信任周恩来了。"四大金刚"从林彪门下,转到了周恩来的门下。

1971年4月15日,"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举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军队各总部大军区负责人,共99人参加了会议。据邱会 作回忆说:

【这次会议名义上是"批陈整风",实际上是和江青一伙的较量,因此整个 会议过程都斗争得很激烈。 4月14日晚上,政治局检查"批陈整风"会议的准备情况时,发现已经印发的文件,只有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报告,"批陈整风"的文件一份也没有印发。这样,会议很自然就会从批"黄、吴、叶、李、邱"开始,而不会从批陈伯达开始了,会议批判的目标变了。

周总理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着急了。总理问张春桥说:"为什么不先印发批陈的文件,而只印发他们的检讨报告?现在立即赶印批陈文件,并通知各小组照原定计划办。各小组只能批陈,不能随便批判别的什么人。"

"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主要形式是小组会,因此控制小组会的导向成了主要斗争场所。第二天的小组会上,出现了一个异常情况,江青一伙的姚文元、毛远新、徐景贤等人,窜到各小组发言,他们说:"这次会议不是'批准'检讨,而是'听取'检讨。要是前者就不用开会了,印发他们的检讨就行了。"

他们一个劲煽动,要大家逼着黄、吴、叶、李、邱在大会上做检讨。他们认为陈伯达已经打倒了,继续批判毫无意思。姚文元到我所在的西北组来游说了半天,姚文元讲话之后,胡炜等热烈响应他的讲话。然后,粟裕、邓颖超先后发言: "主席的批示(对黄永胜检讨报告'很好'的批示),就是我们会议的指导思想,另外提出任何问题都是不合适的。"

胡炜说:"在小组会发言,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的话。每个人都说一样的话 是不可能的。"

粟裕说: "我们的小组会,可以与毛主席的指示对立起来吗?这是不可想象的。"

邓颖超说:"我们不应当接受与毛主席批示相违背的任何东西!" 气氛紧张了,小组会开不下去了。小组召集人冼恒汉只好宣布:停会看文件。

我把小组会情况,特别把姚、粟、邓、胡等人的发言情况,立即向周总理报告了。4月17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明确了如下两点:(一)会议只能提批陈。(二)从庐山会议以来,毛主席没有说过的话,不要说。

(188)

我所在的西北小组,在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极大多数人都同意总理的指示,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总理的指示。在小组会上,姚文元向我挑战说:"邱副总长,你是不是也像在庐山会议开始时那样,同我们说点内情嘛。"

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抽烟、喝茶,我在小组会上"泰然自若"。姚文元又 逼着我发言,我就是不开口,会议已形成了僵局。

这时邓颖超走出会场去叫总理,总理来后,简明扼要地说:"我们要批陈, 这是首要的!会上可以进行同志式的批评,不是批判。"

总理说完就走了。姚文元看总理动真格的了,他也不说话了。】

据邱会作回忆,会议开始时,只印发了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报告,"批陈整风"的文件一份也没有。如果这样开会,这次会议就变成对黄、吴、叶、李、邱的批判会了。这时是周恩来挽回了局面,赶印出"批陈整风"文件,并作出明确指示:"各小组只能批陈,不能随便批判别的什么人。"

另外在邱会作遭到姚文元等人攻击时,周恩来亲自出面支持邱会作,扭转了 局面,控制了会议的大方向。

吴法宪也回忆说:【会议开始后,各组便开始讨论我们的检讨。我们这个组 里还有朱德、李先念、聂荣臻等老同志,当时,让我感动的是这几位老同志,他 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批判我。他们多年了解中央斗争的情况,政治经验比较丰富。 与他们相反,下面来的一些新同志发言比较激烈。也难怪,他们刚刚到中央,积 极性正高,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嘛。

康生这次会议以后就称病了,从此以后基本上不出来活动,这也是一个办法。 总之这样的党内斗争,让人人都有自危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灾难会落到自己 头上。只是一些下面来的新人,积极性蛮高。

会议开始以后,天天出简报。政治局开会研究情况,把我们都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是批斗对象。周恩来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林彪和叶群在北戴河没有回来,也是在有意回避会议的意思。周恩来指定黄永胜和我每天打电话给叶群,这是周恩来直接安排的,他的用意很妙,这样他可以双方都不得罪。我们只是把《简报》的情况及时向叶群汇报,再由叶群转报林彪,林彪和叶群对会议的问题没有任何表示。

到了会议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编在东北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出我 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串联,要他们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要他们攻击张春桥、姚文 元。这一下子,东北组哄起来了。

(189)

周恩来本希望调节毛泽东和林彪双方讲和,可是毛、林谁都不肯让步,这样周恩来的斡旋也就失败了。紧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庐山上是否有这回事情?"

我说:"是有这回事情。我要他们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 不过,后来我又要他们不要讲了。"

周恩来说:"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情况,黄永胜在当天晚上告诉了叶群,叶群又报告了林彪。不久,叶群 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准备飞机,说林彪要回北京。

我想: 林彪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一是让叶群参加会议,因为这个会也有她的检讨,不参加不好;二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

周恩来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把王辉球、王秉璋揭发我搞串联的这个事情压下去,没有再继续追查。周恩来为此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

第二天中午,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叶群直接来参加了会议,林彪一直在家里。由于事情已经被周恩来压了下去,看看没有什么情况,林彪也就一直没有到会。

大概是毛泽东的意思,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话,作个检讨,因为整个庐山会议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讲话引起的。可林彪坚持不讲话,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在会上露面。周恩来曾向我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这件事邱会作也回忆说:【林总得知吴法宪被迫害的消息,就由北戴河回到 北京了。叶群由西郊机场直接到了人民大会堂,并且游走了两、三个小组。叶群 在各小组都说:"毛主席要林彪同志回来加强对会议的领导,我们都回来了。"林 总回京后,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周总理知道林总回到北京,很高兴。周总理很希望主席、林彪能在会议期间 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使会议开成一个真正团结的会,说穿了 就是调节好主席和林彪的关系。 为此,24 日总理将会议情况报告送呈主席、林彪。但毛主席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林总也表示不参加会议。这样,总理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他也只有按毛主席的心愿了结这次会议。】

(190)

据吴法宪和邱会作回忆,林彪本来是不准备参加这次会议的。可是当林彪听说会上有人要揪吴法宪时,他立即赶回北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亲自出面支持吴法宪。因为吴法宪一旦倒台崩溃,那么林彪也就差不多了。由于揪吴法宪的事情被周恩来压下去了,所以林彪也就没有出面。

关于这次会议以后的事,吴法宪回忆说:【会议的后期,周恩来把斗争的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了,会议又批了陈伯达一个星期。对于我们来说, 这样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4月29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在闭幕会议之前,周恩来要我们几个每人表一个态。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在闭幕会上每人都说了几句。最后由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

周恩来念完总结,是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董必武是党内 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这一带头,大家就都跟着鼓起掌来,一下子会议的气氛变 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同我们几个人紧紧握手, 表示团结。

"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林彪就要回北戴河,我去机场送林彪,向他汇报 空军训练的情况,但他一言不发。我心里想,林彪怎么变了呢?是避嫌?还是因为 其它?

但是有一点, 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 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 我没有听到林

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 其它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林彪。从那一次机场送别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对此邱会作也回忆说:【林总对主席是深知的,不但对主席的思想、意志了解,对主席的个性也了解。我们则一无所知,总把主席当成神圣的领袖。庐山的事,林总对主席远了,其实对我们也远了。林总深知只要把问题摊开了,在毛、林之间,不论谁是谁非,我们肯定会选择毛。所以林总对我们也不说话了,不向我们提任何建议。

"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总理来到京西宾馆,深情地对我们说:"还是要振作精神,我还指望你们一起工作呢。没有你们我是寸步难行呀!"

因为我们同总理熟悉,我就更熟悉一点,我说:"他们在会上的做法,比庐山厉害得多,我们反他们的宗派没反成,反而把宗派的帽子扣到我们头上。我们今后怎么工作?"

我说了"我们今后怎么工作"时,黄永胜坐在沙发里伤心得落了泪,他这天还正好发烧,带病去挨"板子"。总理看见黄永胜那么难过,就过去拉黄永胜说: "开饭的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其实,总理是眼见肚明的。】

(191)

本来毛泽东安排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是由林彪主持的,这就像当年刘少 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批判他手下的大将彭真一样。可是这次林彪不肯出席会议, 所以只得由周恩来主持了。不过周恩来利用自己主持会议的特权,在这次会上保 护了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把斗争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 "四大金刚"要不是周恩来的出手庇护,当场就被众人哄倒了。 周恩来在会议最后代表中央作总结讲话时,一方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黄、吴、李、邱点名批评,也对叶群点名批评了。但周恩来批评的调子是缓和的,只是说他们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周恩来特别提到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检讨的批示:"我认为写得很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同时周恩来也婉言为林彪说话,他谈到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时, 说:"林副主席听了毛主席的话,并没有在报告里再强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还 提到了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跟着毛主席就胜利,不听毛主席的话就犯错误。"

周恩来还为林彪的"天才论"做开脱,说:"林副主席在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为反对刘少奇的不提和对抗毛泽东思想,用'最高最活'的提法,有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心,打击刘少奇反动气焰的必要。"

林彪的"四大金刚"也把周恩来当成自己人了,据邱会作回忆,他们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公然在周恩来面前抱怨江青等人,黄永胜还在周恩来面前 委屈地落泪。他们之间如果不是特别信任的关系,是不敢这么说话的。

黄永胜等人感到委屈,是因为他们夹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很难受。整个庐山会议的问题,都是由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引起的。因为林彪不检讨不认错,毛泽东只好把黄永胜等人当成"李代桃僵"。黄永胜等人再检讨,而林彪不认错不检讨,这件事情也结束不了。因此,黄永胜等人就想劝说林彪做个检讨,把这件事情结束了。

邱会作回忆说:【针对当时的情况,我同黄永胜交换过一次意见。我说:"我看现在的温度比庐山上还高了。"

黄永胜说:"对我们抓住不放,同在庐山上是差不多的。"

我说:"以你的看法,毛主席在抓什么?"

黄永胜说:"要我们做自我批评。"

我说:"我们的自我批评是需要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主要是要有副帅的态度。我看,林总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黄永胜说:"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谁能开这个口呢?"

我说:"我看你就能开口。为慎重起见,可以先向叶群说,如果说得下去, 再向林本人说。"

黄永胜当时情绪还好,他同意了我的意见。过了大约三天,黄永胜主动对我 说:"北戴河回话了。"

叶群传达了林总对黄永胜建议的回答。

林总说: "(一)自我批评本来是我们党的正常生活,只要有错误就应当进行批评。但对庐山的问题我是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全会开幕上我的讲话,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讲话的要点毛主席是知道的。

(192)

(二)他们妄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在庐山兴师动众闹了几天,还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前者是老得掉牙的问题。我是提过坚持天才的观点,难道我连提个人观点的权利都没有了?

(三)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

最后,林总还说了几句:"告诉他们,要是晚上睡不着,可以加点安眠药。" 黄永胜要我去把林总的话,向周总理汇报。我把黄永胜的建议和林总回答, 都向总理汇报了。周总理只说了一句话:"林总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其余 什么也没有说。】

邱会作等人希望林彪做一个自我检讨,认个错,这样就可以减去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可是林彪却不肯检讨认错。林彪说了他的理由:(一)林彪认为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没有什么可自责的",还说毛泽东同意并且知道他的讲话要点;(二)林彪认为,"他们"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三)林彪认为,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

第一点林彪似乎是说,他的讲话是得到毛泽东批准的。这里林彪有点强词夺理了。如果林彪要征求毛泽东的批准,就要事先给毛泽东看他的讲话稿。因为这种长篇讲话,只看"要点",是看不出来问题的。只有毛泽东看了林彪的讲话稿,才存在批准或不批准的问题。林彪事前并没有给毛泽东看讲话稿,毛泽东不知道他要讲什么话,怎么能谈得上批准或不批准呢?

第二点林彪说的"他们",显然就是指毛泽东了。林彪看出毛泽东想要从"我们"的检讨中,得到什么东西。林彪不便把这个"什么东西"点破,他让黄永胜等人自己去猜,可是黄永胜等人不但没有去猜,甚至没有细想这个问题。林彪认为,毛泽东让他们检讨,就是在为他们下台铺垫道路。因此林彪想说的是,做检讨就是等于自己给自己挖坟墓。

第三点林彪说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这点林彪是看破毛泽 东的这盘棋,林彪看出来庐山问题,其实是联系到毛泽东要解决的接班人问题。 不把他林彪搬掉,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就解决不了。可是黄永胜等人还以为林彪 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根本没有想到林彪并不是毛泽东理想的接班人。比如邱会 作说:"我们认为,如果说林彪在庐山的讲话不适合,甚至讲错了,希望毛、林 之间谈一谈,消除误会就成了,他们当然还是'亲密战友'。"

邱会作等人没有怀疑过毛、林之间的'亲密战友'关系。因此,他们还把林彪对他们的谈话,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也可见林彪的"四大金刚"对周恩来是完全信任的,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周总理听了邱会作的汇报,当然不好说什么,因为这种事情不能明说,只有自己去体会。

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结束之后,一直到1971年8月的近五个月时间里,一直太平无事,黄、吴、李、邱等人以为这场风波总算是过去了。而他们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段时间里,林彪开始启动他的地下部队,准备实施"五七一工程"了。

(193)

林彪知道毛泽东不是心胸狭隘的人,他看出来毛泽东要拿掉他,并不是源自个人恩怨,也不是因为林彪做了什么错事得罪了毛泽东。如果真是因为毛泽东怪罪林彪做了什么错事,那么林彪向毛泽东好好检讨一番,或者来个负荆请罪,凭着他们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关系,毛泽东肯定会原谅他的。

林彪对毛泽东是了解的,他意识到毛泽东与他的矛盾,是因为不能完成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想,甚者可以说林彪是毛泽东实现他理想和抱负的障碍。毛泽东要完成文化大革命,要把继续革命坚持下去,林彪就必须拿掉,这是一场路线斗争。毛泽东决心发动文革的时候,就下决心与他的老战友们决裂,当然也包括亲密战友林彪。

现在有不少令人思想混乱的观点,有人说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解决个人恩怨问题,甚至有人说毛泽东是那种对人"不得罪则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这些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说毛泽东"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

那么怎么来解释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呢?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显然不符合 "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

因此,从毛泽东发起文革,到林彪事件这一连串的事情,都不应用"个人恩怨"的观点来理解。从历史上来看,林彪对毛泽东的贡献和帮助都很大,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毛泽东的事,林彪与毛泽东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的问题。如果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理解林彪事件,就会越想越糊涂。只有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才能把毛、林斗争的实质看清楚。

关于林彪事件,还有一些令人思想混乱的观点,比如认为《五七一工程纪要》 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林彪不知道这件事。这种观点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是 凭想象。他们按照常理来推证,认为这么重大的事情,林彪应该亲自指挥才对, 而不是交给林立果这样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去指挥。林彪没有亲自指挥这件事,所 以就推论林彪不知情。

按照一般的常理,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林彪"能不能"亲自指挥。如果林彪"不能"亲自指挥,那么他就理所当然地不得不把这个重任交给林立果。这里分析一下林彪"能不能"亲自指挥的问题。

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并不是林彪自己招募的亲兵,而是中央办公厅下属的中央警卫团,也就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部分官兵。中共高官没有自己的亲兵或保镖,安全工作一律由中央警卫团负责,这是中共的特点。这样一来,中央警卫团派去的警卫官兵,就有特殊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保卫高官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可以监视高官的行动。

(194)

在正常的时候,警卫官兵当然是保卫高官的安全,可是当该高官出了"问题"后,那么中央警卫团就会对该高官身边的警卫官兵进行"换人"。换人之后的警卫官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监视该高官,一旦发现该高官有异常情况或异常活动,就立即向上级报告。

林彪身边的警卫官兵,显然是进行过"换人"的。在林彪出逃的时候,他身边的警卫官兵不仅阻止林彪的坐车,甚至向林彪的坐车开枪。可想而知,此时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已经成为监视他的人了。

现在尚不清楚林彪身边的警卫官兵是什么时候"换人"的,推测大概是在 1971年初改组北京军区的前后。林彪当然知道他身边的警卫官兵被"换人"了, 所以林彪也就清楚,自己已经被二十四小时监视了。

再看一下"指挥"的问题。一个将军要进行指挥,他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得到情报,然后根据情报做出指示;第二个条件是把指示下达到执行部队,部队按照将军的指示行动。所以林彪要亲自指挥,他也必须要有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的途径。

那么林彪怎么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呢?第一种方式是用秘密电台,林彪当然不可能自己架设电台;第二种方式是用电话。

林彪身边的警卫官兵都被"换人"了,那么林彪的电话肯定也被监听了,所以林彪要是用电话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那就等于是找死,因此电话是不能用的;第三种方式是最原始的办法,就是直接通过人来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如果有人频繁地来找林彪密谈,这个情况马上会被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报告上去,这个人一出门就会被盯上,林彪的计划很快就会暴露。

由上所述,林彪既不能用电台和电话联系,也不能使用一般的人来进行联系。

唯一可以与林彪频繁接触,而又不会引起别人怀疑的人,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因此,林彪把"五七一工程"交给林立果,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这也体现了林彪的智慧,他居然在二十四小时被监视的情况下,实施自己的计划。

另外,如果林立果没有特别的公事,而到全国各地频繁走动,也会被人怀疑, 所以必须给林立果四处活动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这就是为林立果"选妃子"。

(195)

"选妃子"这个借口也是非常高明的,一来显得林立果这个人胸无大志,不过是个好色之徒,也就不会有人特别注意他了;二来"选妃子"是要保密的,所以林立果神神秘秘的活动,被人们认为是为了"选妃子",也就不会引起怀疑了。

当然,林立果这场"选妃子"的幌子,也必须有个结果,所以林立果最后还真的选了一个"妃子"。但林立果对这个"妃子"并不感兴趣,没跟她说过几句话,更没有把她带走。还有,林立果外出的时候,经常身边带一、两个年轻女兵,这样就让别人感到林立果不过是个胸无大志好色之徒,不会把他与搞暗杀这样的事情联系起来。

还有人说,林彪如果搞政变,应该动用掌握兵权的"四大金刚",这样才符合常理。但这里的常理,又忽略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四大金刚"并不想跟林彪造反,他们早就躲着林彪了,这点前面提到过;第二件事是"四大金刚"已经被盯死了,毛泽东早就开始防备林彪动用"四大金刚"搞政变了。毛泽东在 1971 年 8 月的南巡讲话中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谁听你的?"

毛泽东在那次南巡时,还亲自召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谈话。广州军区

是黄永胜的老巢,也是林彪唯一有可能染指的大军区。毛泽东对丁盛说:"黄永胜要是打倒了,你们怎样办?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好,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啊?"

丁盛立即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红心",表示坚决跟着毛泽东走。"九一三" 事件后,丁盛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更没有被认为是林彪死党,他依旧得到毛泽 东的信任。

综上所述,林彪既不可能亲自指挥搞暗杀,也不可能动用"四大金刚"搞政变,唯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动用不被人们注意的林立果来实施这件事。林立果这支出其不意的奇兵,谁也没想到,包括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林彪敢于重用林立果出奇兵,可见林彪打仗确是有一套的。

1971年3月22日~24日,林立果等人在上海秘密起草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个文件也可以看成是林彪武装起义的行动纲领。因为《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较长,我们放在附录里。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分析,将在后面进行。

(196)

附录: 林立果 《五七一工程纪要》 全文(1971 年 3 月 22 日~24 日)

全文共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9.2(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

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
- (2)夺权正在进行。
-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 (6)他们"故伎重演"。
-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 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 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 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B—52 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 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 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 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 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 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 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197)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 ◇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
-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 羊
 -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
 -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於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林彪)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於撤退。

◇困难

-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 △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 B-52 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 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

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 在我手中, 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 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 先和 B-52 既成事实, 逼迫 B-52 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 游击小分队。

(198)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 的空四军,空五军)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黄永胜)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对内: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

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对外: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 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1)计划

(2)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南京军区空军)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

陈)

- ——扩大舰队
- ——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
- (3)物质准备

武器: 领、自造。通讯器材。车辆。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奇袭式

-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 一定要把张(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待续】

(199)

-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 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 △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运
-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 B-52 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 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 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 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

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 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 B-52 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 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 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 B-52 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 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附录完】

(200)

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伪造的,并对它的来历、笔迹等提出疑问。这里先看一下《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来历。

197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 其中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文影印件,并说:【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 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已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经 参与政变的李伟信、刘世英、程洪珍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 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原文见影印件。】 据发现《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当事人王兰义(原空军学院军事教员)回忆说: 【1971年4月初,原空军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刘宝文,交给我一项秘密任务, 对林立果在我们院内的黑窝(俗称"小楼")的卫生打扫和生活保障照管,名曰"接 待小组",由我带头。

1971年4月至8月底,我们对林立果一伙进行过三次接待,每次都有一周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接待期间,他们每晚经常10点以后来,住到次日上午10点以前走。

乘他们不在的时机,我们就进入小楼打扫卫生,消毒茶具餐具,通风放热。 白天他们在时,偶尔也要我们准备饭菜给他们吃,饭菜都是由我和王治松、高文 勇三个人在食堂监厨,做好后,由我们三人亲自送进小楼。

8月底至9月12日,这一次接待,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陈伦和("联合舰队"成员)当面给我讲:"里面的卫生你们不要来打扫了,有事会找你们。送东西来,你们放在门口就行了。"

所以,我每天晚上送报纸,都是放在门口台阶上,用石头压住就离开。每次送饭都是先打电话送到门口,有几个女的在门口接住拿进去。这次接待期间,小楼里的人特别多,9月12日这一天,我亲眼看到的就达11个人,常住的有3个女的。车辆进进出出,比较频繁,好像很紧张。

9月12日是个星期天,院内停水停电。陈伦和出来,要我准备11个人的午餐,说是3个给首长吃,送进小楼来,8个放在食堂里吃。下午3点10分,我见小楼东边开出一辆伏尔加小车,车里面坐的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表情都紧张。周宇驰还探头叫了我一声"老王"。

(201)

9月13日白天没人找,下班时我把报纸送到小楼门口,用一块石头压住。 9月14日晚上,我提前去送报纸,看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放着。9月15日晚, 我又提前去小楼送报纸,到了那里一看,一切都与昨天一样。我产生了很大疑惑, 就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屋内乱七八糟,臭气熏天。

餐桌上杂乱放著本子、书报和汽水瓶,有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红色拉链本。只有红色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在另一个屋子的锅台上,还烧了一堆纸灰。我匆忙地看了一遍,总的印象就是弄得很乱,走得很急。

我赶快回到办公室,向王治松报告了上述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九一三事件"。9月16日凌晨4点,王治松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去小楼恢复原状,把那两个本子拿出来。10月4日,我怕本子丢失,就拿回家里锁进皮箱。10月6日晚,我听了总政李主任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揭开了林彪的本来面目,我豁然醒悟,那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的,就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黑纲领,我要向党交出这个本子。午夜两点,我把本子亲手交给了殷政委。】

王兰义上交的红色拉链笔记本,就是写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件。从王 兰义回忆的情况来看,中央当初以为林立果只是作为家属跟随林彪外逃,并没有 想到林立果在暗地里搞"五七一工程",所以也没有对林立果的"据点"进行搜 查。王兰义在听到林彪事件的传达之后,主动把笔记本交上去,这才发现了林立 果以及《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过程是自然的,并无造假 的迹象。

还有人怀疑《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笔迹不是于新野的,等等。其实判断《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伪,关键不在于笔迹等枝节问题,而是在它的内容这个根本

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大篇幅的攻击和谩骂毛泽东的内容,如果是造假,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造假人肯定不敢这么放肆地骂毛泽东,除非是毛泽东下令自己骂自己。毛泽东为什么要自己骂自己?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因此《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伪造说是不合理的。

(202)

尽管《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整理成文,只是一些条文的罗列,显得零乱,但在整体上,《五七一工程纪要》条理非常清楚,这是林彪的特征,周恩来就说: "林总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

要搞一场政变,首先要对一些最基本问题,有一个清楚和清醒的认识。这几个最基本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都提到了,这就是:(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上述几个基本问题,都做出了比较清楚和清醒的分析。 下面就看一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对这几个问题的分析。

(一)关于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即"武装起义"有没有可能?

《纪要》提出武装起义是有可能的,其可能性就在于群众的不满。《纪要》 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 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纪要》还提出各类人的具体不满:

- (1)高级干部的不满:文革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不满,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不满。
 - (2)农民的不满: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 (3)知青的不满: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 (4)原红卫兵的不满: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
- (5)一般干部的不满: 机关干部被精简, 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 (6)工人的不满: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纪要》分析说,几乎所有的人对文革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都有不满。把 民众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作为武装起义和否定毛泽东的群众基础,这点是看 得准的。

(二)关于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即"武装起义"有没有必要?

《纪要》说: "B-52 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纪要》提出他们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对林彪不放心,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这里的"后事",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因此《纪要》说:"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203)

《纪要》这里说话的口气,显然是林彪的口气,所以说"对我们不放心"。 毛泽东对林立果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对林彪才会"不放心"。

对林彪的前途,《纪要》也分析得很清楚:要不然选择束手被擒,要不然选择破釜沉舟。《纪要》说"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也就是他们选择了破釜沉舟的道路,这也符合林彪的性格。

(三)关于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即搞"武装起义"有没有条件?

《纪要》说:"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

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纪要》分析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搞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并认为可以与列宁当年搞城市暴动相比。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纪要》中说"经过几年准备"。可见这个"五七一工程"不是临时想起来的,而是在几年前就开始设想和准备了,所以才有"经过几年准备"之说。

(四)关于武装起义的"时机",即在什么时候发起"武装起义"?

《纪要》说:"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 破釜沉舟。"

《纪要》分析认为:发起武装起义的"时机",第一种是我方准备好了,这 是主动发起;第二种是我方还没有准备好,但对方却要动手了。这时不管是否准 备好,都要"破釜沉舟"地发起武装起义,这是被动发起。

后来的"九一三"事件,显然是属于"破釜沉舟"的第二种被动发起情况, 因此有人说"九一三"事件是"被逼"的。然而根据《纪要》,他们并不是单纯 被动地等着挨打,而是他们也在准备主动发起武装起义。只是由于他们还没有来 得及准备好之前,毛泽东那边先动手了,所以才被动应战。

(五)关于武装起义的"力量",即"武装起义"依靠什么力量?

《纪要》中分析了武装起义可以利用的各种力量。第一种是"基本力量",如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等人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等;第二种是"借用力量",如黄永胜的军委办事处,二十军、三十八军等。

这里应该注意,《纪要》中把黄永胜等"四大金刚"的军委办事处,只是作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见搞"五七一工程"之初,原本就不准备依靠黄永胜等"四大金刚"。

(204)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他们提到国外的借用力量是苏联,《纪要》说:"我们的行动会得到苏联的支持。"《纪要》中的这句话,与后来林彪外逃苏联,是相吻合的。

(六)关于武装起义的"口号和纲领",这个放在后面重点说明。

(七)关于武装起义的"实施要点",即"武装起义"怎样实施?

《纪要》把"武装起义"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巩固扩大阶段。至于具体的实施方案,《纪要》分析了一些可能的方案,如"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逼宫形式"、"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在后来的《纪要》实施过程中,他们最后用的是"特种手段"中的暗杀手段。

《纪要》还提出把张春桥作为最主要的攻击对象之一,说:"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由此可见,林彪集团把张春桥视为他们的重大威胁。

(八)关于武装起义的"口号和纲领",这个放在后面重点说明。

(九)关于武装起义的"保密和纪律",即"武装起义"怎样保密和严守纪律? 《纪要》说:"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由此可见,《纪要》中也提出,他们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即"不成功便成仁"。

后来周宇驰等人还真的发扬了"江田岛"精神,成仁了。

综上所述,《纪要》对武装起义搞政变,进行了条理很清楚的分析,所以制定《纪要》的人,头脑是相当清醒的。特别是他们提出了"五七一工程"的困难,《纪要》举出三点主要困难:(一)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二)由于 B-52 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三)B-52 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

《纪要》分析的三个主要困难,是比较准确的。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因此,要实施"五七一工程",就要打破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而要打掉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对毛泽东"抹黑"。

所以,《纪要》的另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对毛泽东的攻击和抹黑。《纪要》的"抹黑"水平是很高的,后来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各种"抹黑",大致上都是来自《纪要》的思路。这些我们将在后面专门分析。

(205)

要理解《五七一工程纪要》,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起草这个《纪要》? 现在的普遍说法认为《纪要》是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如果林彪或者是林立果仅仅是为了暗杀毛泽东,那么他们不应该写下和留下这种 文字的证据。

因为暗杀总不是光彩的事情,古今中外搞暗杀,暗杀的"首谋"为了"避嫌",都极力避免留下文字性的证据,在暗杀过程中,策划和命令都是口授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多次暗杀事件,比如宋教仁暗杀,廖仲恺暗杀等,都看不到任何文字性的证据。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林彪搞暗杀而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种文字证据,不管他的暗杀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如果暗杀失败了,林彪将背上一个搞暗杀的不光彩罪名;如果暗杀成功了,林彪登基接班,那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成为威胁林彪的一个黑材料,因为林彪无法保证《纪要》一定不会泄露出去。

从搞暗杀的角度来看,留下《纪要》这样的文字材料,不管暗杀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所以林彪如果单纯是搞暗杀的话,最好不搞《纪要》这种文字性的东西。

有人说《纪要》是林立果搞的,林彪不知道,那么林立果就更没有必要搞《纪要》了。因为对于策划暗杀毛泽东来说,《纪要》这种文字性的东西,不但没有作用,反而是一个累赘。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纪要》不是为了暗杀毛泽东而搞的,它是为了政变而搞的,《纪要》是为了搞政变而做的舆论准备。《纪要》提出 搞政变的概念是很明确的,暗杀只是政变的一个手段。

《纪要》中提出的政变方式有: (一) "B-52 在我手中, 敌主力舰(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二) "先斩局部爪牙, 先和 B-52 既成事实, 逼迫 B-52 就范, 逼宫形式";(三)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由《纪要》可见,他们提出的政变方式,第一种是利用高层开会时,隐蔽在周围的"联合舰队"成员突然冲入会场,将毛泽东等人控制住,一网打尽;第二种是先抓住江青、张春桥等人当人质,然后与毛泽东讲条件谈判,逼毛泽东就范;第三种才是搞暗杀等"特种手段"。

(206)

搞政变就必须要做舆论,而做舆论就要有文字性的东西,因此《纪要》就是为了政变而准备的纲领性文件。如果是搞单纯的暗杀,还可以勉强说林立果背着林彪,私下搞暗杀活动;如果是搞政变,那么林立果是不可能背着林彪搞政变的。因此,说《纪要》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就像不少书讲文革的事情,说一切都是江青背着毛泽东搞的,毛泽东完全不知情。这样的书看起来,总让人感到牵强附会。同样说林彪事件的一切都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林彪不知情,也是非常牵强附会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政变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反映在"(六)口号和纲领"以及"(八)政策和策略"两个部分中,《纪要》在这里提出他们搞政变的"合理性"。《纪要》说: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搞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搞社会主义才是正义的。因此《纪要》也煞有介事地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这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说反对刘少奇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理由是刘少奇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而这里林彪也说反对毛泽东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林彪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一套。

毛泽东说刘少奇是假马克思主义者, 林彪也说毛泽东是假马克思主义者, 并

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就是声称毛泽东是"托派",并把毛泽东麾下的江青集团,称为"笔杆子托派集团"。《纪要》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纪要》提出他们要推翻毛泽东的理由,是因为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一套, 甚至说毛泽东就是当代的秦始皇。

(207)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纪要》说毛泽东"行孔孟之道",也就是指责毛泽东 搞封建主义的孔孟之道那一套。而后来毛泽东批判林彪的时候,也把林彪与孔子 联系起来"批林批孔",又反过来指责林彪搞孔孟之道。

《纪要》还提出他们的口号: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 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的"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纪要》给毛泽东扣了一个大帽子"社会封建主义",这也是模仿毛泽东给 刘少奇扣一个"修正主义",给苏联扣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

然而,林彪在过去曾经大肆吹捧过毛泽东,为此《纪要》解释说:【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

面。】

这里《纪要》承认毛泽东的历史作用,从而把过去林彪吹捧毛泽东,解释为 "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支持"。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纪要》提出的这些口号,可以说有一些号召力,但要 凭这些推翻毛泽东,显然是不够的。不过《纪要》把毛泽东说成是"封建暴君", 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发明"。直到今天,大部分"抹黑"毛泽东的文章,都是按 照"封建暴君"这个思路和理论体系,以至于有人把《纪要》说成是反毛的思想 纲领。毛泽东真的是"封建暴君"吗?这个问题我们放到文章的最后再谈。

仅仅说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是不够的,还需要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于是《纪要》也列举了一些"证据",说:【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 (208)

【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 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单纯从表面现象来看,《纪要》列出的有些"证据"是存在的,但问题是《纪要》在这里有意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的动机。毛泽东为什么要"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为什么要"今天拉这个,明天打那个"?毛泽

东做这些事的动机何在?

评价一件事,只看表面现象,不提背后的动机,肯定是不客观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何在?难道搞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显然,《纪要》只提现象不提动机的做法,是抹黑毛泽东的高级手段,直到现在,这也是"黑毛"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纪要》还说:【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纪要》这里进一步上升到贬损毛泽东的人品,说他是"怀疑狂、虐待狂",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成为失去理智,以整人"取乐"的狂人。直到现在,还有人袭用这种贬损毛泽东的人品"黑毛"手段。

综上所述,《纪要》并不是一份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书,而是一份声讨毛泽东的政治檄文,是一个搞政变的政治宣传品。不少人说当时看到《纪要》,都感到非常震惊。人们感到震惊的地方,并不是暗杀,而是《纪要》对毛泽东的评价。

据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以后才发现的,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检起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他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自己还是很自信的,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会被林彪制造的 反毛舆论所蒙蔽,所以坚持把《五七一工程纪要》公开出来。 (209)

林立果等人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活动,当然这些秘密活动巧妙地打着"选妃子"的旗号,起到很好的烟幕弹作用。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了林立果在上海的"选妃"活动,他说:【林立果在上海"空四军"内物色人员,建立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开始时选了最贴心的八名核心人员,所以叫"八人小组",后来又扩大成员,由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

林立果当时的身份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为"上海小组"题了字,制作了精致的组标,还亲自来上海主持授枪仪式,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凡是参加"上海小组"的人,都要举行宣誓,宣誓的内容除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忠于林副部长"。

上海小组的成员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都会打枪,会摄影,会驾驶汽车。每个人配备了一辆苏联造的伏尔加小轿车。上海小组为林立果"选美"的行动,对外当然是绝对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连"空四军"的有些领导也不了解这个小组的内情。

林立果每次到上海活动,都住在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大院内一幢独立的花园 洋房里。这里原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文革开始后被占用了。 花园洋房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汽车从巨鹿路穿过一条长弄堂,可以驶进大铁门 一直开到客厅前面的草坪旁边另一扇小铁门,又可以直通空四军招待所大院。这 个地点既隐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这里直接指挥上海小组"选美"。】

据徐景贤回忆,林立果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号称是为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林立果还给上海小组的成员发枪,而且小组成员都会打枪,会驾驶汽车等,参加上海小组的人还要宣誓效忠林立果。显然,如

果真的是为了"选妃子",小组成员根本没必要会打枪,会驾驶汽车,更没有必要进行效忠宣誓。因此林立果组建的上海小组,完全是一支进行特务活动的特种部队。这个特种部队的用途,当然应该是为了配合林立果搞政变活动。

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林立果地下部队活动的资料很少,据《文革十年史》说: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210)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林立果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1971年4月3日,林立果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同月,王维国在林立果指使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新华一村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和驾驶车辆等的特种训练。教导队由王维国、 江腾蛟直接领导。用林立果的话讲,教导队"是我们的警卫处",装备都是按警卫处的规格配备:每人一支长枪(冲锋枪或步枪),一支手枪,每班—支班用机枪。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

恐。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林彪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从于新野记载的这次黑会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们在会上讨论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关于这个问题,吴法宪回忆说:【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

(211)

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1970年11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说:"我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 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以后 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

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 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 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 军学院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 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关于林立果等人的活动,《文革十年史》还说:【林立果等人还四处活动,为 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对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 "那些庞然大物没什么可怕的。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吓 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

6月中旬,刘世英又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和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是争夺接班人的问题。"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散布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中央在9月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摘根据地。"

为了给林彪寻找后路,7月下旬,林立果还与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一起到广东省深圳、沙头角一带活动,用飞机察看当地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不久,林立果又来到北戴河学

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备急用。】

(212)

从 1970 年 8 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到 1971 年 8 月毛泽东南巡,相差一年时间。本来在 1970 年 8 月九届二中全会就着手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是因为庐山会议上的风波,召开四届人大的事情被推后了。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召开四届人大之事,决定在 1971 年国庆节之后召开四届人大,在国庆节前后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为召开四届人大做准备。

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对黄、吴、李、邱、叶五人做了结论,庐山会议这件事似乎已经解决了。从1971年4月到8月这五个月期间,一切风平浪静,毛泽东没有再提起庐山会议之事。当1971年10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消息传来之后,林彪集团认为毛泽东不会在这次会上对林彪动手了,因此也就放松了警惕。

邱会作回忆说:【从 1971 年 4 月底到 8 月下旬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中央太平无事,大家都在自己份内认真工作。至于周总理,他对军队的关系还是同过去一样的密切。

这时,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也在正常进行。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吴、李、邱都有所安排,黄永胜为第一副总理,李作鹏和邱会作为副总理,吴法宪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且,在总理给主席的报告中,还专门讲了"请林副主席在国庆节和四届人大上讲话",看来一切都很正常。】

据邱会作的回忆,在毛泽东南巡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当时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永胜为第一副总理,李作鹏和邱会作为副总理,吴法宪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对他们是很大的麻痹,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事了。就在这个时

候,8月15日,毛泽东突然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史称"南巡"。毛泽东在这次"南巡"中,突然对林彪提出点名批评,同时也严厉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等人,可以说是给了林彪集团一个突然袭击。

对于毛泽东这次南巡,吴法宪也回忆说:【正当我们如坠五里烟雾里,认为 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结束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了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 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 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飞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 客人。这些派飞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 来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的。

(213)

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 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 措施。毛泽东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 的封锁。

正好9月上旬,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朝鲜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朝鲜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但没有告诉我和邱会作。邱会作比较机灵,宴会以后,就坐进了李作鹏的车子,追问他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李作鹏也就将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唯独对我,他们是滴水不漏,说我的嘴不紧。

一直到 1981 年我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

谈话内容。看过毛泽东的"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 被打倒的。直到看到这个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 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就是在 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邱会作也回忆说:【毛主席外出巡视,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是常事。那时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总参谋部、空军、海军主要负责首长都是知道的,因为军队对毛主席负有相应的保证安全的责任。

这次则很特别,毛主席外出后,周总理只说过一句话:"毛主席外出了,现 在武昌,要华国锋到武昌去。"

毛主席离开北京时,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过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谈话, 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都是及时传达的,这次则没有做一个字的传达。

九届三中全会临近,主席也走得匆忙,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毛主席为什么南巡?目的是什么?南巡的导火线是什么?我当时和现在都不清楚,但从他在各地的讲话来看,也就很清楚了。南巡就是发动"群众",要大家站在他一边,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开始重新处理林彪的问题。

林彪是与毛主席一起在战壕里成长的,不论是艰苦岁月还是枪林弹雨,不论是挫折还是胜利。林彪一生中功绩很大,没有什么"污点"。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台",毛主席对这样一个人,是不能不慎之又慎的。想把林总拉下来,在党内是要有基础的,尤其是军队。因此主席出去游说是必要的。】

(214)

毛泽东为什么在 1971 年 4 月到 8 月的五个月风平浪静之后,突然发起旨在拿掉林彪的南巡呢?对此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毛泽东本来就要搞一次突然袭击,这是对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突然袭击的"以牙还牙"。因此,毛泽东一直等到九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一个月前,才突然提出林彪问题,让林彪集团来不及防范,慌了手脚,一败涂地。林彪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时,剩下的时间只有半个月了,因为林彪集团的行动非常匆忙慌乱。如果林彪提前几个月知道毛泽东要在 1971 年 9 月底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把他拿掉,林彪事件的发展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关于毛泽东南巡理由的第二种看法,是认为毛泽东发现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是"假的",因此才发起南巡,拿掉林彪。关于第二种看法,原国务院总理助理 熊向晖有比较详细的回忆。熊向晖回忆说: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周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第一轮会谈,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第一天的会谈以后,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给毛主席。 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过去,还让熊向晖也去。"

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

毛主席说:"我不困。"

熊向晖跟着握住毛主席伸出的手,说:"主席好!"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周总理准备汇报基辛格的问题,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毛主席转向熊向晖, 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 唐闻生帮他点燃, 主席深深吸了一口, 仍然满面笑容地问: "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谋部二部当副部长?"

熊向晖回答:"是。"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215)

熊向晖回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同他"漫谈"。主席问:"在总参谋部'批陈整风'小结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说:"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 '我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 主席指出来,我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 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 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多份。"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216)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 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 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他与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关于这件事,《周恩来年谱》也记载道:【7月10日,到毛泽东处汇报与基辛格前两轮会谈情况。谈话中,毛泽东向陪同周恩来前来汇报的熊向晖,了解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传达"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后,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对毛泽东南巡的第二种看法,就是一些人根据熊向晖的回忆,认为毛泽东在 1971 年 7 月 10 日以前,还没有准备拿掉林彪,只是在与熊向晖的谈话中,"偶然"发现了黄永胜没有在总参谋部传达他们犯了错误。毛泽东是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才突然决定拿掉林彪和林彪集团的。因此毛泽东在一个月之后的 1971 年 8 月 15 日离开北京南巡,开始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工作。

上述的第一种看法和第二种看法,哪一种看法合理呢?我们认为第一种看法 比较合理。根据熊向晖的回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看似"偶然的寒暄和漫谈", 实际上是毛泽东引导的。毛泽东这场谈话就是要这么一个结论,即"他们的检讨 是假的,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首先据熊向晖回忆说,是毛泽东主动点名让他和周恩来一起去汇报工作的。 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先问熊向晖说:"你在总参谋部二部当副部长?"可见毛 泽东召熊向晖过来之前,就知道他是总参谋部二部的副部长。 毛泽东又追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毛泽东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就知道熊向晖的回答了。因为黄永胜肯定是不会讲自己和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上"搞鬼"。如果黄永胜自己承认他们在庐山上"搞鬼"了,那么黄永胜就必须下台。哪有自己承认自己"搞鬼"的人,还可以不下台的先例呢?

因此熊向晖听到毛泽东的问话,理所当然地回答说:"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这是毛泽东早就料到的回答。

毛泽东又问熊向晖,看到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报告没有?熊向晖的回答毛泽东也早就料到了。因为检讨报告是写给上级看的,而不是写给下级看的。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报告是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的,也可以给平级的政治局委员看,但不能给熊向晖这样的下级看。如果黄永胜给下级看自己的检讨报告,向下级宣读自己的检讨报告,那就意味着黄永胜准备辞职了。

(217)

因为黄永胜想要在总参谋部继续当总长,所以就要维护自己的威信,不把自己的检讨报告下发给熊向晖等下级看。对下级隐瞒自己犯了错误,这是人之常情,应该算不上什么"搞鬼"。然而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做出一个很严重的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这里说的"后台",明显就是指林彪了。

前面提过,林彪自从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再对黄永胜等人做指示了。黄永胜 在总参谋部没有传达他们的检讨报告,这件事与林彪应该是无关的。而毛泽东这 里提出要查"后台",当然就是要查林彪,把这件事作为查林彪问题的一个突破 口。因此,毛泽东事先已经物色好把熊向晖作为查处林彪问题的突破口了。

毛泽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毛泽东已经在黄、李、邱三人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很好",在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可以了",并且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公开说黄永胜等人的问题是"人们内部矛盾",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已经完了,对庐山会议的处理也应告一段落了。

现在毛泽东要推翻自己的批示,要重新处理庐山会议的问题,就必须有一个理由作为突破口。于是熊向晖的回答就给了毛泽东这个理由,毛泽东因此得出结论说:"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这个结论时,马上替黄永胜等人说好话。周恩来说:"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并没有接受周恩来说的好话,要把这件事继续揪下去。此时,周恩来已经意识到,毛泽东很可能是下决心要拿掉林彪了。因此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毛泽东7月10日这次对熊向晖的谈话,其实也是向周恩来暗示自己准备要 拿掉林彪,周恩来当然也就要暗暗留意这件事。

(218)

8月9日到8月12日,周恩来在广州开会。据《周恩来年谱》记载:【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

周恩来这里所谓的"急事",当然就是与林彪相关的事情。在周恩来8月12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则于8月15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各省"南巡"。然而

周恩来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巡的第二天,亲自带着张春桥、黄永胜等人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一般相关的书籍文章都很少提到周恩来这次北戴河之行。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1971年8月12日,到毛泽东处汇报广州之行,请示四届人大召开时间。 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 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的意见。会议一致同意会期安排在国庆节后,并拟定 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还同意于近期内,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李先念、纪登奎五人去 北戴河林彪处作一次工作汇报。8月16日,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 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主要谈国际形势问题。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 谈了宣传、党务、生产、军事等工作情况。汇报结束时,周恩来说:"根据毛主 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 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年谱》说周恩来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并不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是周恩来在自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参会的人也都同意了。试想,早在7月10日,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提出"黄永胜他们有后台",其实很明确地暗示了要"揪"林彪这个后台。周恩来在知道毛泽东的心思之后,不但没有与林彪疏远,还找理由去北戴河面见林彪,可见周恩来试图"保"林彪的态度是明显的。

《周恩来年谱》没有披露周恩来与林彪的这次谈话内容。是不是周恩来借着 这次机会向林彪暗示,毛泽东已经准备拿掉他了?这些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219)

毛泽东的南巡从 1971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12 日,在这期间毛泽东找来一些大军区负责人、省市负责人谈话,跟他们"交底",为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拿下林彪,做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关于毛泽东这次南巡和讲话,《汪东兴回忆录》中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只分析一些提纲性的问题。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想告诉高官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林彪问题的定性。 毛泽东知道,众高官都认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毛泽东给林彪问题定 性的调子比较低,大家就会认为毛泽东只是批评林彪一下而已,不会触动林彪的 地位,所以就不敢得罪林彪。不敢得罪林彪的直接结果,就是高官们在会上不敢 揭发批判林彪,这样毛泽东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拿掉林彪,就得不到足够的响应。

毛泽东为了鼓励高官们敢于站出来揭批林彪,就必须给林彪问题做一个很严重的定性,让众人知道这次毛泽东真的要与林彪彻底决裂了,这样人们才敢出来拥护毛泽东,才敢与林彪划清界线。因此,毛泽东把林彪问题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即"路线斗争"。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特别列举了党的"十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一次)。1927 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 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分裂我们党,没有搞 成。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二次)。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

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第三次)。他搞了个"立三路线",主张打大城市。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第四次)。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第五次)。王明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从 1931年到 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 1 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220)

在长征的路上,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第六次)。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七次)。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 跳出来反党(第八次)。他们搞军事俱乐部,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 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第九次)。

再就是 1970 年庐山会议的斗争(第十次)。1970 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

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 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 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1959 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 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不少人以为"第十次路线斗争"是在林彪外逃之后,毛泽东才给他扣上的帽子。其实不然,在林彪外逃之前,毛泽东就把 1970 年庐山会议的斗争,定性为"第十次路线斗争"。虽说毛泽东这里没有点林彪的名,毛泽东说的"他们",谁都猜得出来是指林彪。

毛泽东又说"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纲领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试图"篡党夺权"。林彪的"篡党夺权"罪名,其实在他外逃之前,毛泽东就已经给他准备好了。而且,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上升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就意味要按照处理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方式,来处理林彪了。

(221)

毛泽东又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人会议(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总理作的总结。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你们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

"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风"的这些。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的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风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

毛泽东这里说明,他说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还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还没有做结论。同时毛泽东在这次南巡讲话中,直接点名批评了林彪。毛泽东说: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 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 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 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 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 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 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 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张国焘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

裂,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林彪的"天才论"、"大树特树"、"缔造和指挥"等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然后毛泽东又不点名地批评林彪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毛泽东说: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

(222)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 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林立果),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 际上是害了他。】

另外,毛泽东还向高官们解释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参 会人员对张春桥群起攻击,说明众人对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意见很大,毛泽东有 必要做一些说明工作。对此李作鹏回忆说:

【毛泽东的方针很明显,步步升级,步步紧逼,实际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么态度。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投降就让你灭亡。刘少奇"投降"了,作了检讨,也未能挽救自己的灭亡。我看林彪不屈从、不检讨、不发言的态度是对的,反正检讨不检讨结果是一样,黄、吴、叶、李、邱检讨了多次,最后怎么样?结果不还是统统被打倒了吗?

毛泽东在沿途各地的秘密讲话中,除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外,据知情者说还有这样一些内容。在讲路线斗争时表扬了江青,批评了许世友。毛主席说:"江青直接参与了两次路线斗争,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林彪)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

国外,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江青这个人头脑清醒,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毛主席又说:"我承认江青有她的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察觉到的。这一点我应向她学习,你们也应向她学呢。"

这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江青的高度评价。很明显,毛泽东把江青进一步推向政治前台的目的,一方面把江青树立成为文革的"光辉形象",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文革成果,推动文革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是表示出毛泽东是江青的后台,谁再胆敢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泽东,下场如同林彪以及黄、吴、叶、李、邱。

同时,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时说:"张国焘搞伪中央,你许世友是清楚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是缔造者、指挥者。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搞分裂,那样不好嘛。长征时你许世友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张国焘打电报命令你们返回去,后来你们还是回去了。你许世友同张国焘一样是不对的,要接受这个教训。现在你对我们的感情不如过去,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批评许世友呢?因为许世友在庐山会议华东小组会议上, 坚决拥护林彪讲话,对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表示出极大的反感,以后又给林彪写 了一封表态信。毛主席借许世友的脑袋,又敲打了一大批心中有想法的老干部。】 (223)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最著名的话,就是"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后来这个"三要三不要"被定为党内的三项基本原则。毛泽东的原话是:【近一个时

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的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叫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泽东说"三要三不要",旨在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因为林彪是搞暗的, 毛泽东是搞明的,在道德上来讲,当然是毛泽东占上风,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点。

不过"三要三不要"旨在争取人心的宣传,对实际上的政治家来说,他们的 定律只有一条,就是"不惜任何手段去争取胜利"。这就像打仗一样,打仗的目 的就是胜利,为了胜利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才有"兵不厌诈"的说法。

毛泽东是强者,林彪是弱者,强者都希望光明正大地正面战斗,而弱者就害怕正面战斗。比如毛泽东等人在红军时期是弱者,对付国民党的办法就是"游击战"和"地下党",不能跟国民党正面较量;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已经足够强大了,这时候毛泽东也就不用游击战了,而是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阵地战,光明正大地较量。林彪作为弱者,他要想打败毛泽东,正面较量肯定是不行,所以他就要想"诡计"了。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还特别告诉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他本人要出来主持军队事务了。毛泽东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队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

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以后就是林彪管了。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 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224)

毛泽东说他要出来主管军队,也是有用意的。因为当时林彪主管军队,林彪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的顶头上司,常言道"不怕县官,就怕现管",各大军区负责人揭发自己的顶头上司,肯定是很为难的。所以毛泽东告诉他们,以后不用担心林彪了,因为他要亲自管军队了,毛泽东将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新顶头上司了。

毛泽东又特别提出军队"造反"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因为空军才能炸平。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谁听你的?】

由毛泽东的话可见,他早就想到林彪有可能动用军队"造反",所以毛泽东 说"我不相信军队造反",其实毛泽东不是不相信,而是做好了防范,所以才说 出这样自信的话。

毛泽东最后更加明确了林彪的问题,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

【对林还是要保。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 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

没有?没有改。】

毛泽东这里挑明说"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虽然他也说"对林还是要保",但又说"犯了大的原则错误,为首的,改也难。陈独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毛泽东的言外之意,就是林彪也不会改。这样一来,打倒林彪就变成必须的了。

毛泽东这次南巡没有到广州,而是把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召到长沙谈话。 因为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之后四野司令部就在广州组 建了广州军区。由于广州军区是原四野司令部的班底,所以作为四野司令员的林 彪,在广州军区的威信又与其他军区不同,广州军区可以说是林彪的"老巢"。 关于毛泽东召见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邱会作回忆说:

(225)

【毛主席是8月27日到长沙的。在长沙和当地的军政主要领导人谈了话, 参加谈话的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还有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 等人。从主席的谈话来看,矛头已明显指向林彪,指向黄永胜,指向军委办事组。

这些情况我当时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后来出狱到西安以后,卜占亚同志给我讲过毛主席在长沙谈话的情况。毛主席点名说了黄永胜,说:"黄永胜调动军队造反,各军区都听你的?我就不相信。"主席还对着丁盛说:"黄永胜要是打倒了,你们怎样办?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好,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啊?"

毛主席还说:"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党委之 间吹吹风。"

卜占亚说:"主席谈完话,大家回到宾馆,我问丁盛:'主席问你:黄永胜打倒了怎么办?你就说:跟着主席干革命嘛。怎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丁盛说: '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主席对我们是进行路线教育,怎么突然说打倒黄永胜?'

我对丁盛说:'黄永胜只是个代名词,你自己去琢磨吧。'"

卜占亚还说:"接下来我们几个就开会,研究主席的谈话。主席说:'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党委之间吹吹风。'主席究竟是希望我们传达,还是不希望传达呢?

大家一致认为主席是希望传达的,我们应该传达。于是广州军区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主席跟我们谈话的内容。"】

丁盛他们对毛泽东的心理猜测是对的,他们认定毛泽东希望传达,所以就召 开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林彪 外逃后,丁盛没有受到牵连。因为丁盛传达了不利于林彪的毛泽东南巡讲话,就 意味着他站到毛泽东的一边了。

丁盛在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上的传达,规定了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外传,不准向北京报告。这时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 9月5日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给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报告了毛泽东南巡讲话 的大致内容,后来顾同舟又整理出一份文字材料,让自己妻子坐飞机送到北京。

(226)

因此,林彪的"小舰队"是在9月5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而林彪的 "四大金刚"则是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了南巡讲话。据李作鹏回忆:【1971年8 月,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我陪同朝鲜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9月5日 由长沙到达武昌,武汉军区组织隆重的夹道欢迎。在将客人安排休息后,武汉军 区政委刘丰到驻地看望我,见面闲谈中,刘丰谈到毛主席在武汉的重要讲话。刘 丰谈话中我没有任何插话,谈完之后我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刘丰坐了不久,他 就走了。

刘丰走后,我独坐思考了一会儿,心情愈来愈紧张,愈来愈不安。9月6日上午,陪同朝鲜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下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和我,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朝鲜代表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我把黄永胜拉在会谈桌的西北角,悄悄地把刘丰同我谈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我还特别提醒黄永胜不要把刘丰谈的内容告诉叶群和吴法宪。接着我们一起去参加朝鲜使馆宴会,邱会作想了解我在外地知道的消息,向我说:"我们共坐一个车行不行?"

我说:"可以。"我们俩上车后,邱会作说:"有什么消息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

我就把车内保密玻璃摇上,然后将刘丰谈的主要情况告诉了他,并警告他说: "无论如何不要告诉吴法宪"。】

据邱会作回忆说:【毛主席8月下旬南巡期间,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去武汉、湖南参观,9月5日下午回到北京,9月6日下午军委办事组有关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朝鲜代表团。我走进北京厅就看到黄永胜、李作鹏两人在西南角上谈话,外宾将要来之前,黄、李各自归位了,李作鹏同我挨着坐在一起。我问李作鹏:"你们刚才在谈什么?"

李作鹏说:"你要知道了,准会把你吓死!"

我说:"你知道了都没有吓死,为什么我知道了就要吓死?"

李作鹏说:"我可以跟你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给北戴河(指叶群) 打电话;二是,不准跟胖子(吴法宪)说。要不遵守这两条,我一句也不讲。"

我说:"可以。"

在去朝鲜使馆的路上,我上了李作鹏的车,在车上他跟我谈了在武汉刘丰同他谈的毛主席谈话内容。我完全遵守李作鹏提出的"条件",他跟我说的话,我不仅没有给北戴河打电话,也没有跟吴法宪说,更没有跟别的任何人说。】

(227)

据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回忆,"四大金刚"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首先想到的是不告诉叶群,也就是不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是关系到林彪前途命运的重要情报,如此重要情报"四大金刚"居然不向林彪汇报,可见此时"四大金刚"已经不是林彪的亲信了,他们想的是如何自保,已经不想去救林彪了。从"四大金刚"对林彪瞒着毛泽东南巡讲话这件事来看,林彪不指望"四大金刚"帮他搞"政变",也是很有远见的。

关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前面的武汉"七二零"事件是提到,他本是武汉空军政委,因为在"七二零"事件中立了功,升为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是林彪线上的人。据邱会作回忆说:【1990年我和老伴到武汉去看女儿,见到刘丰。刘丰的境况非常糟糕,他的老伴又得了不治之症,生活上很困难。刘丰提起往事说:8月16日、17日,毛主席两次找他们谈话。

刘丰对主席说:"我们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 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认为,如果因林副主席的讲话影响了主席 的健康,我建议林副主席在适当的小范围内,向主席做个检讨。"

听了刘丰的讲话,毛主席立即兴奋起来,拍着自己的大腿说:"你说得好! 这个意见在北京是没有人提的,黄永胜是不会提的。你的态度很好!在九届三中 全会上,就由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你实践自己的申明,表里一致应当是一 切共产党员的态度,但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贯做到。" 刘丰说到这里非常激动,他说:"我是在劫难逃啊。如果没有'九一三',我也自身难保。想想看,主席让我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彪的问题提出来,这不是找死吗?我提吧,林不会放过我;我不提吧,主席更不会放过我。"】

作为另一个重要人物周恩来,据《周恩来年谱》记载,【9月3日,在南方 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将经毛泽东阅改过的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稿,专送周 恩来处。次日,周恩来收到此件。】

可见周恩来是在9月4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当然周恩来也不便把这件事透露给林彪。不过有一点周恩来是清楚的,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交底",然后才跟下面"吹风";而这次对于林彪问题,毛泽东事先并没有跟周恩来"交底",而是把这件事直接先向下面"吹风"之后,再反过来告诉他。可见,在处理林彪问题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是有限的。

(228)

林彪、林立果在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之后,马上启动实施"五七一工程"。 关于林立果实施"五七一工程"的细节,现在依然不清楚。这倒不是因为情报太少,而是因为情报太"多",而且相互矛盾,让人越看越糊涂。

自从 1981 年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社会上出现大量描写林彪、 江青集团的所谓"纪实文学",特别是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暗杀毛泽东一节, 各种说法都有,真假难辨。为此在 1985 年 10 月,文化部发出《揭露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读物应切实注意社会效果》的通知。

该《通知》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区的报刊,尤其是新创办的一些小报,刊载了不少所谓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荒诞离奇,格调低下,多系望风捕影,甚至任意虚构,然而其人物都以反革命

集团成员的真实姓名出现。这些东西迷惑了不少好奇的读者,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必然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出书质量,请出版社不要把报刊上刊载的这类作品编辑成书。出版社如组织此类稿件亦望慎重对待,十分注意政治上的严肃性。】

由于"联合舰队"暗杀毛泽东相关资料过多,我们处理这一部分,采用对官方正式资料和来源可靠的当事人回忆录进行对比分析的办法。

官方正式资料最详细的是江腾蛟在法庭上的供词。在《江腾蛟供词》之前, 先简单说一下背景。根据法庭调查,1971年9月5日到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 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决定发动武装政变,准备将毛泽东杀害于南方 巡视途中;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9月8 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 八日。"

1972年中共中央公布的林彪反党集团揭发材料中,有林彪这份手令的影印件。

《江腾蛟供词》摘录如下:【1980年11月25日,法庭第一次审问江腾蛟。 江腾蛟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到1971年9 月8日晚上,李伟信才给我解释《五七一工程纪要》。"

(229)

1980年11月26日,法庭第二次审问江腾蛟。

审判员问:"1971年9月7日周宇驰到过你家吗?"

江腾蛟答:"到过。"

审判员问:"他到你家干什么?"

江腾蛟答:"到我家是送毛泽东主席南巡谈话记录给我看,看了以后,他就讲了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计划。"

审判员问:"周宇驰怎么说的?"

江腾蛟答: "周宇驰说,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周宇驰说,现在他(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可以在上海动手。"

审判员问:"他叫谁干?"

江腾蛟答:"他当时没有讲叫谁干,意思就是叫我去。我说:'那好,那只有我去吧。'"

审判员问:"要你去干什么?"

江腾蛟答:"就是去指挥那个谋杀活动,谋杀毛泽东主席那个活动。"

审判员问: "1971年9月8日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林立果?"

江腾蛟答: "在西郊机场, 当时还有周宇驰、李伟信。"

审判员问:"林立果给你看林彪手令没有?"

江腾蛟答: "看了,用红色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

审判员问:"你看了手令后怎么表态的?"

江腾蛟答:"我讲了三句话:'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法庭宣读了李伟信 1980 年 8 月 31 日供词(节录):

"1971年9月8日夜11时多,周宇驰来电话要我立即去空军学院,顺道 先接江腾蛟到西郊机场。林立果和江腾蛟密谈,我听到林立果说:'现在形势很 紧张,直接对着首长(林彪),所以要搞'五七一',现在首长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

"接着,林立果又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江腾蛟看。事后,到了空军学院,林立 果又将此纸条给刘世英、刘沛丰、程洪珍和我看,我才知道就是林彪写的反革命 手令。林立果还对江腾蛟说:'现在请你作东南总指挥,此任很重,老政委呀, 一定要搞好。'江腾蛟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

宣读完李伟信的供词后,审判员问江腾蛟:"你9月9日在什么地方?又进行过什么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 "9月9日上午在西郊机场,有王飞、林立果、周宇驰和我4个人参加,因为8日晚上策划到上海去谋杀毛主席,意见没有达到一致,所以9号上午叫王飞参加,继续策划。"

(230)

审判员问:"你们继续策划了哪些办法?"

江腾蛟答: "9月8日晚上林立果提出三条办法:一条办法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主席的专用列车;第二条办法是用一只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的火车;第三条办法是要王维国趁毛主席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审判员问: "9 日你们还继续策划了什么办法?"

江腾蛟答: "因为8日晚上没有达成协议,9日就继续研究。周宇驰提出炸铁轨和炸铁路桥的办法,王飞提出来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

审判员问: "9月11日下午, 你和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又进行哪些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 "9月11日下午继续在老地方,西郊机场平房里,有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于新野和我,增加了关光烈,主要想从关光烈部队里调火焰喷射器运到上海去,和调动部队到北京来协助王飞攻打钓鱼台的问题。"

审判员问: "什么时间研究过炸硕放铁路桥?"

江腾蛟答:"是9日上午研究的。"

审判员问:"以后研究过没有?"

江腾蛟答:"以后那是11日晚上,派鲁珉去执行那个任务。"

法庭宣读王飞 1972 年 1 月 4 日的供词(节录): "1971 年 9 月 11 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和我以及关光烈,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攻打钓鱼台。林立果说明林彪的决心已定,林立果提出就在上海搞,如果毛主席住在机场,就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住在市里,就叫几个人用手枪干;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江腾蛟同意在机场和市里两个方案,并说:'一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

第三次审问江腾蛟,1980年11月27日下午。

审判员问:"你是怎么知道毛主席离开上海的?"

江腾蛟答: "是9月11日晚上,上海打来个电话,才知道的。"

审判员问: "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打的?"

江腾蛟答:"那我不清楚。"

法庭宣读了王维国 1972 年 3 月 11 日的供词: "毛主席去年 9 月 10 日下午在上海找我谈了话,我是 9 月 11 日下午 5 时回家的,因为太疲劳就睡了,到晚上 10 点多钟,我给周宇驰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毛主席已从上海北上。林立果、周宇驰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绝望。"

(231)

审判员问:"你们知道毛主席离开上海以后,又开会策划什么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 "9月12日策划南逃广州。可能是周宇驰召集,参加人有周宇驰、 王飞、于新野、李伟信和我。"

审判员问: "周宇驰在会上讲林彪在什么时间,怎么去广州?"

江腾蛟答:"周宇驰宣布说,他们决定明天早上8点钟,林彪的飞机从北戴

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审判员问:"周宇驰还讲了些什么?"

江腾蛟答: "周宇驰讲明天早上7点钟,他本人带一部分工作人员和一部分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明天早上6点钟由王飞、于新野和我3个人,先到西郊机场那个平房里,要王飞打电话给黄永胜,说林彪请他来有点事情。黄永胜到了以后,叫黄永胜打电话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找来,说林彪在某地要开一个会议,要他们到机场来;等他们到机场后,用两个人招呼一个,要他们上飞机,你们一块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

审判员问:"林彪到广州以后,准备干什么?"

江腾蛟答:"到那里以后,首先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的形势,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实行南北夹击。"

审判员问:"你们安排了南逃的飞机吗?"

江腾蛟答: "我没有安排,是周宇驰已经安排了3架,我在场的时候只安排了4架飞机。"

审判员问: "9月12日晚,周宇驰给你们宣布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你听了以后是什么态度?"

江腾蛟答:"我别的话没有讲,他安排飞机的时候,让我担任第三架飞机黄、 吴、李、邱的警卫。我说好。"

沈家良又问:"对南逃另立中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江腾蛟答:"我没有表态。"

副庭长问:"你愿意不愿意去啊?"

江腾蛟答:"我答应了,当然就是愿意去了嘛。"

审判员问:"回到你家又进行了什么准备?"

江腾蛟答:"于新野又给我来电话,说现在一切活动都停止,消灭一切痕迹。 所以南逃这个事情,我始终也没有正面给我老婆讲。"

(232)

审判员问:"你接到于新野电话以后,给什么人打过电话?"

江腾蛟答:"我想问问于新野到哪里去了,问周宇驰他们的下落,电话都打不通。找王飞,王飞说他在指挥所,就不准我讲话了。我就问鲁珉,是不是王飞值班?他说不是。这时我产生怀疑,怀疑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根据《江腾蛟供词》,可以概括林立果实施"五七一工程"的大致情况如下: 1971年9月7日,周宇驰到江腾蛟家谈话,告诉他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周宇驰提出暗杀毛泽东,并具体指出在上海"干",江腾蛟表示他愿意"干"。

- 9月8日,林立果召江腾蛟到北京西郊机场谈话,给江腾蛟看了林彪的手令, 江腾蛟表示"坚决干"。
- 9月8日晚,林立果召江腾蛟、王飞、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开会,林立果提出暗杀毛泽东的三个条办法,但参会的人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 9月9日,林立果继续召江腾蛟等人在西郊机场开会,周宇驰提出炸铁轨和炸铁路桥的办法,王飞提出采取开会的办法,众人仍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 9月11日,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于新野、江腾蛟、关光烈在西郊机场 再次开会,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 9月11日晚上,他们得到上海王维国打来电话,才知道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

9月12日,周宇驰召集、王飞、于新野、李伟信和江腾蛟,策划南逃计划。周宇驰说的南逃计划是:

第一步: 9月13日早6时,王飞、于新野和江腾蛟先到西郊机场,打电话 先把黄永胜"骗到"机场;黄永胜骗到机场后,再由黄永胜打电话把吴法宪、李 作鹏、邱会作叫到机场;等"四大金刚"到机场后,江腾蛟等人"强行"要他们 上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二步: 9月13日早7时,周宇驰带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三步: 9月13日早8时, 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 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四步: 林彪到广州后,先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江腾蛟说:"打算到广州以后,由林彪出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把问题揭开,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成立临时中央,林彪的声音群众都熟悉。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9月12日晚,江腾蛟回到家中后,于新野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停止一切活动,消灭一切痕迹。

后面我们将以《江腾蛟供词》为主轴,对一些来源清楚的当事人回忆录进行 对比。

(233)

因为种种原因,人们普遍对当时法庭供词的真实性有很大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江腾蛟供词》有多少可信度?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江腾蛟供词》中提到的人物,以及这些人后来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情况。如果江腾蛟在供词中所说的情况,与他提到的当事人后来自己回忆所讲的情况一致,那么就可以说明《江腾

蛟供词》这个部分是有可信度的,反之就是有疑问或不可信。

《江腾蛟供词》中提到了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后三个人都写了回忆录。他们在回忆录都说,他们四人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更不知道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以及"北上苏联"出国反毛的计划。

《江腾蛟供词》中说,他们准备借林彪的名义打电话给黄永胜等人,把这四 人骗到机场,然后逼他们一起乘飞机南下广州,把他们绑上林彪的战车。这就明 显地证明,黄、吴、李、邱四人是不知情的,所以才需要把他们骗来。

在这方面,《江腾蛟供词》与吴、李、邱三人的回忆录是一致的。这也反过来说,《供词》提到的"南下广州"另立中央计划,是有可信度的。

《江腾蛟供词》中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王维国,《供词》中两次提到王维国。第一次提到王维国,是说他们计划让王维国趁毛泽东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对毛泽东动手;第二次提到王维国,是王维国打电话告诉他们毛泽东离开上海的消息。

王维国 1919 年生,1938 年参加革命并入党,1966 年任 7341 部队(空四军、驻上海)第一政委,文革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会。王维国还有一个不显露的职务,这就是他是毛泽东到上海时,上海方面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负责人。在毛泽东到上海时,王维国多次上毛泽东的专列和毛泽东见面,所以他才有机会在专列上对毛泽东直接开枪。而且,毛泽东离开上海,王维国是最早知道的人之一,所以他可以打电话及时告知林立果等人。

另外,王维国还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被提到名字的人。"九一三事件" 后,王维国被定为"林彪死党"隔离审查,198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 受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14年。王维国不服判决,上诉后二审,被最高人民法院 裁定维持原判,1985年刑满释放,1993年病逝。

(234)

王维国不服判刑,在服刑期间曾先后多次写《申诉书》,寄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书记处等处,不断为自己申诉屈冤。据说监狱方面曾对前来探监的王维国子女们说:"你们劝劝他,叫他不要再写了。这个案子法院能定的了吗?是上面定的。而且你爸爸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应该懂得的,写了没用的。"

在特别法庭审判江腾蛟时,王维国曾被要求为江腾蛟的事情作证。法官见王维国不肯,就劝说他:"没关系,你是另案处理,即使作了证这件事情,也跟你没关系。只要你肯作证,对你处理上也会有好处的。"王维国依然不肯,所以特别法庭上用了王维国 1972 年 3 月的供词作证。

王维国没有写回忆录,不过留下一份《申诉书》,这也可以当作他的回忆材料。王维国在《申诉书》中说:【在文革中,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我把林彪一伙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来看待,我根本不知其为反革命集团,连想都没敢想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又怎能谈得上"自愿参加"呢?

我一不知道林彪一伙搞反革命政变,二不知道他们有个《五七一工程纪要》, 三不知道他们要谋害毛主席,我更不知道法庭叫我看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第 十三、十七两页的内容。至于说《纪要》上有我的名字,我认为,充其量是他们 为了实施《纪要》而想利用我,但这不等同于客观上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反革命勾 当,不等同于我知道《纪要》。再者,该两页上还有陈励耘、周建平的名字,陈、 周也不是反革命,也没被判刑嘛。

所谓我向周宇驰"密报"毛主席谈话内容一事,1971年9月10日下午6时,毛主席专列到了上海,停在了我们给他修好的专线车站。6时05分至8时,

毛主席与王洪文、汪东兴和我一起谈了话,其中有部分内容谈到了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缺点,和他们应该检讨的问题,并说回北京后和他们"吹一吹",即谈一谈的意思。于是,我把毛主席提出的"他们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他们应该检讨的问题,告诉了周宇驰,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向中央、向毛主席好好作个检讨,我在上海的问题也好解决了,别无他意。】

关于王维国派他儿子王大章(当时 23 岁)到北京"密报"之事,王大章回忆说:【因为于新野从杭州来上海后,跟我父亲说:"毛主席这次出来巡视,跟一些人都谈了话,肯定有一系列的最新指示,'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么讲话,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提前给我们透个气,这样也可以跟的紧一点。"

(235)

于新野的话讲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尤其是"'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一句,感觉不仅是林立果的意思,好像还是林彪的意思。我父亲既不好询问,又不好拒绝,主要他也希望自己能和林副主席跟的紧一点,这样后面有人撑着的话,他在上海的日子也好过一点嘛。我父亲觉得这个请求也在情在理,就默认了。

于新野讲话时神态如常,所以我父亲对此事也完全没有觉察有何异样。毛泽东是中午过后离开上海的,下午我父亲回家先睡了一觉,晚上才给周宇驰打的电话。如果他们真是一个有阴谋的集团,应该马上通报才对,所以单从这一点说他参与了"两谋"实在是苍白无力。

我父亲从毛的谈话中隐约意识到,事关重大,所以他决定把毛主席和他的谈话转告林立果,意思就是"我告诉你们毛的谈话,让你们有所准备就可以了"。

这个"准备"当然不是准备政变,指的是三中全会上重提庐山会议的一事。

9月12日早上, 我父亲把我叫起来, 他说: "你到北京去一趟。"

我对父亲是绝对尊敬和信任的,尽管一睁眼就听到这话觉得很突然,还是毫 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父亲解释说:"主席这次到上海来,讲了一些话,谈了一些事情"。

父亲叮嘱我:"到北京你只能告诉副部长(林立果)和周主任(周宇驰)他们两个人,其他的人,包括李伟信、于新野,都不能讲。"

我拿出个小本问他:"记一下可以吧?"

开始他说:"不行,这个记,恐怕有问题呢。"

我说:"到了那里我忘了呢?"

他想了想说,"好吧,那你记吧。"

他为了方便我记录,一字一句地讲道:"第一个,看样子三中全会快要开了, 国庆节前开三中全会,国庆节以后开四届人大。主席讲,总理给我写了个信,说 到庐山批评问题,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二中全会上的问题。三中全会要开成扩大的 三中全会,扩大到军一级,每个军都要有一个代表参加,在会上要重提庐山批评 问题。"

说到这里我打断他,问他:"什么叫'庐山批评问题'啊?"

他并不想让我了解更多,只是说:"你不要问了,你只要一讲,他们心里就有数了。"

他继续讲到:"另一个就是说庐山会议议事日程的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里有三个不知道,主席说他不知道,总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再一个就是说,看来他们一是有点害怕,二是有点硬干,回去之后再给他们吹一吹。"

我哪里明白,忍不住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你就不要问那么多啦。"

(236)

毛泽东当时还谈到:"黄、吴、叶、李、邱要很好地检讨一下,他们是人民内部矛盾"。毛还讲:"黄永胜呢,这个人我不是很了解,在他当总长以前呢,没有谈过话。"这就对黄永胜当总长的任命,有点推卸责任了。

我父亲叮嘱我,你就讲:"黄、吴、叶、李、邱检讨的不好,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这样好些。你就把这话告诉副部长和周主任,转告他们,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就行啦!"

以上就是所谓我去北京"密报"的内容。

于是9月12日上午,我背了个军用挎包就上路了,我母亲和大妹妹送我到 虹桥机场乘坐民航飞机。因为当兵出行应该持有"军人通行证",我没来得及开,所以上飞机时被查票的人拦住了,问我:"你通行证呢?"

我一惊:唉呀,这才想起来,不仅通行证没带,连钱也没带,根本就没想这些事。

结果当然不让我登机。我一时不知怎么办,四周张望,恰好民航的廖局长在 不远处,他认出我来,就冲着查票的人摆了摆手,放行了。

这是是一架伊尔—14 小飞机,大概有二十名左右的乘客。飞机先飞济南, 吃完中饭休息一会儿,下午再飞到北京。我到北京已经下午 3 点了,李伟信开 一辆"嘎斯—69"吉普车到首都机场接的我。

李伟信在路上问我: "客人(指毛泽东)什么时候到的?"

我吓了一跳!我父亲嘱咐过我,不要告诉李伟信和于新野,他怎么知道了呢?

一提"客人",我心里有些慌了,难道他知道我是来的原因了?这个保密性就没有了嘛。

李伟信没有觉察我的胡思乱想,接着又问:"客人什么时候走的?"

因为有父亲的叮嘱,所以我只好一律回答:"不知道。"毛什么时候走的,我 是真不知道。

李伟信说:"我们很忙啊,你看到现在中饭还没吃过。"

我说:"怎么这么忙啊?"一路上俩人东拉西扯。

车子开了将近一个钟头,到了西郊机场。我记得是到了一处平房,从窗户可以看到外面。于新野正在下面条吃,他说:"你看我们忙不忙啊?你怎么样?吃过饭没有?"我赶紧说在济南机场吃过了。

大概等了将近半个钟头左右,门外有汽车来了,于新野说:"可能是副部长回来了。"

随即林立果和周宇驰就推门进来了,我连忙站起来迎接,他们对我说:"你 辛苦啦!"

我敬了个礼,他们分别跟我握了握手,我受宠若惊,和林立果这也不过是第 二次握手呢。

当时他们两个人神情既看不出不慌张,也不显得紧张,跟平常差不多,稍有 些凝重。我被带到了会客厅,就我们三个在场,我把带的话讲了。

(237)

等我讲完了以后,林立果讲话了。林立果讲话一向很慢,好像是想一句讲一句,很慎重。他讲:"很好,很重要。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为我们送来了这么重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林副主席的感情很深。"

他接着说:"你回去以后告诉你爸爸,谢谢他,说明他以前采取的策略很好, 隐蔽的好。今后还要这样。开会的时候叫他不要表态,不要暴露了。今后少提林 副主席,也不要再提我,我嘛,还年轻,不要提我。"

我当时由衷地讲了一句:"副部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要向副部长学习!"

他讲:"不要提,今后不要提。请王政委和王洪文搞好关系,今后要少提林 副主席。"

后来林立果问了我一个问题:"主席和你爸爸谈话的时候,徐景贤当时在不在场(指专列上)?"

我说:"徐景贤应该不在场。"

他又问:"徐景贤在不在上海呢?"

我不明白林立果为什么要打听徐景贤的事,就照实说。

谈话前后大概不超过半个钟头。谈完以后,于新野就把我送到反帝路的空军 招待所去了。这就是我在北京见到林立果和周宇驰的整个过程。】

为了比较,这里再摘录一段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王维国的事情。徐景贤说:【早在文革之前,王维国就和林彪一伙挂上了钩。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叶群化名到江苏省太仓县农村蹲点,由王维国所在的空军部队派人保卫和照料生活,每天给叶群打饭去的时候,在白饭底下放两个荷包蛋或一条鸡腿,使叶群既得到艰苦奋斗的美誉,又吃得实惠,叶群当然是心中有数的。

1967年3月,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参军,就是在王维国属下的硕放机场正式 穿上空军服装的。林彪一家对王维国另眼相看,而王维国也亦步亦趋,紧紧相随。 林彪等人大权在握以后,王维国升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 并兼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军管委主任;1969年九大期间,根本不是九大代表 的王维国,却被提名为军队系统的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林立果向王维国交底说:"要一边倒,不要两边靠;与其分散投资,不如集中投资。"这些话说得够露骨了,也就是要王维国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来个"一边倒"和"集中投资"。王维国打了一下算盘,终于决定把赌资统统押在林彪一边,开始作巨额的"集中投资"。

(238)

王维国用全家的名义向林彪写了效忠信,他在信里写道:"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家,就没着我的一切。"声称自己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接着,王维国亲自带了老婆和儿女,到北京去当面拜望林彪。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毛家湾林家大院接见了他们,还和他们全家合影。王维国受宠若惊。林彪是当面称赞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个"很",就把王维国的魂儿很舒服地勾过去了。

1970年6月30日,就在林彪到庐山会议上争当国家主席的前夕,王维国和江腾蛟一起,去北京拜见林彪,然后由林立果亲自开着林彪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带有王维国和江腾蛟一起逛长城。他们在长城上边散步边密谈,同时合影留念,还用当时很稀罕的摄像机。

在他们摄下的录像带和照片上,可以看见沿着逶迤起伏的长城,年过半百、体态臃肿的王维国走在左边,瘦削苍老,戴着眼镜的江腾蛟走在右边,他们各用一只手挽扶着夹在中间的二十多岁的林立果,一步一步地登上石阶,又恭恭敬敬地攀上斜坡。这时,王维国谄媚地对林立果说:"今天副部长开的是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我们坐了不会迷失方向,永不翻车!"

1971年9月8日, 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命令, 谋杀毛泽东的计划进入倒计

时的最后阶段。9月11日中午,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王维国两次打保密电话给周宇驰,向林立果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找人谈话以及离开上海的情况。

9月12日早晨,王维国派他的儿子乘飞机赶往北京,向林立果、周宇驰当面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的情况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林立果动情地对王维国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爸爸还派你来给我们讲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林副主席感情很深。"

9月12日晚上,林彪接到多方密报以后,决定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大小"舰队"成员,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突然又改变原决定,叛国北逃。王维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犹如惊弓之鸟坐立不安,马上又派儿子赶乘火车去北京,摸到了林彪等人出逃的情况。王维国得悉后慌了手脚,马上把蒋国璋和龚着显两人叫到身边,订立攻守同盟,布置立即解散"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同时商量销毁罪证。9月20日下午两点多钟,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王维国在上海被拘押审查。】

因为王维国是林彪事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他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239)

我们从江腾蛟、王维国等人的材料,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 林彪的地下部队,是由内到外,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这种分层构造,是地下组织、地下党的典型结构。

最内层的核心层,是林彪一家,也就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和林立衡(林豆豆)。但林豆豆是比较特殊的,她没有与林家其他三人步调一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揭发",把林彪送上了绝路。如果没有林豆豆的揭发,林彪很可能不会死。因此,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中,明文写道:"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

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 衡,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多次提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并带头与 众人唱这首歌。当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 胜利"时,毛泽东说:"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 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林彪的失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出在核心层的"步调不一致",这就注定他 走上不归之路。

林彪的地下部队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是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四个人。1967年3月,林立果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指定"党办"的两个秘书周宇驰和刘沛丰,专门负责"帮助"林立果,这样林立果与周宇驰和刘沛丰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亲密朋友"的关系。1969年10月,林立果被提升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不久周宇驰和刘沛丰也升任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他们两人就成为林立果最为信任的左膀右臂。林立果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是师级官职,可以有自己的秘书了,这时林立果就有了政治秘书于新野和生活秘书李伟信。

这样一来,围绕在林立果身边的两个"亲密朋友"周宇驰和刘沛丰,两个秘书于新野和李伟信,就形成了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人员。这一层人员知道一切秘密,作为最高机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也只限于第一层人员知道,具体写下《纪要》就是林立果的秘书于新野。

"九一三"事件中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都死了,只有李伟信活了下来。 其中刘沛丰与林彪等人一起上了三叉戟,死于蒙古温都尔汗;周宇驰、于新野、 李伟信三人劫持直升机企图飞往蒙古,失败后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假装自杀活了下来。

(240)

不过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的李伟信。在第一层人中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因为"生活秘书"的角色只是负责生活方面的事,对政治应该是不过问的。比如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尽管李伟信也参加了,但他的角色是给林立果等人"端茶倒水"而已,所以李伟信对《五七一工程纪要》并不很清楚。

李伟信基本上属于林立果的传令兵,政变计划等重大事情,林立果当然不会和他商量,当然也不会告诉李伟信整个政变的具体细节。因此,李伟信对"五七一工程"知道的很有限。

林豆豆对"五七一工程"知道的肯定比李伟信多得多,中央对她寄予很大的希望,详细盘问她"五七一工程"的细节。

可是林豆豆在揭发林彪之后,却非常后悔自己的轻率行为,因为林豆豆没想到因为她的揭发,林彪等她家的其他人葬身于外国荒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林彪是被林豆豆"害死"的。因此林豆豆追悔莫及,背上极大的思想包袱。

之后,林豆豆拒绝向中央讲"五七一工程"的真相,反而为林彪辩护起来, 声称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的。林豆豆不配合中央,拒不说"五七一工程"的真相,反而替林彪辩护,这样一来,林豆豆就一下子从"反林英雄"坠落 为"林彪死党",开始接受各种严厉的政治审查。

在审查期间,林豆豆曾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后来林豆豆写信给毛泽东求助, 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批示解除对林豆豆的审查。之后林豆豆结婚,但日 子仍然过得十分凄惨。 "五七一工程"和政变的核心细节,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这六个人完全知情,林豆豆知道一定的细节,而李伟信就知道的就更少了。因为完全知情的六个人全部死亡,所以整个政变的详情我们已无法知道,只是从李伟信的交代得到了一些信息。

现在活着的人当中,只有林豆豆对"五七一工程"有一定的了解。可惜林豆豆却不肯说半个字,反过来却不停地到处为林彪"伸冤"。林豆豆所说的林彪事件,其实是她自己编造的各种"善意的谎言",她试图以此来为林彪翻案。

林豆豆这么做大概是出于良心的自责,希望自己编织的"谎言"可以洗清林 彪的"罪名"。

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林彪事件真相的唯一希望,就是林豆豆哪天突然"想通了", 不再沉溺于良心的自责了,讲出真实的林彪事件。

(241)

前面提到林彪地下部队的核心层是林彪一家四人,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是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他们知道一切机密;核心层之外的第二层,是林彪实施计划所必需用到的人物,这是林彪的贴身卫士李文普、专车司机杨振刚、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三名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第二层的几个人,并不需要知道政变的具体计划,但需要在关键时刻对林彪的效忠,在关键时刻绝对听从林彪的命令。

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林彪要在关键时刻用到这几个人,事先必须要做好"工作",才能保证这些人在关键时刻"用得上"。除了贴身卫士李文普临阵脱逃之外,专车司机杨振刚、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三名机械师,都在关键时刻"经住了考验",他们是协助林彪外逃的最关键人物。

林彪周围的警卫战士很多,但这些人已经变成监视他的人,林彪要想"逃出" 他周围的警卫战士包围圈,必须依靠专车司机、专机驾驶员这些人的帮助。至于 三名机械师,那是因为三叉戟飞机需要三个人驾驶:一名驾驶员,一名副驾驶, 一名机械师。副驾驶员可以不要,机械师是不能没有的,像启动飞机等很多事情, 没有机械师的协助是不行的。因此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专机强行起飞时,机 组人员只有一名驾驶员加三名机械师的最低限人数。至于副驾驶员,领航员、通 讯员等不是一定必要的人,就一个也不要了,以免不可靠的人带上天以后出意外。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二层人员,隐蔽得非常"深",平时不活动,直到"九一三"那一天才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江腾蛟供词》中根本没有提到第二层人员的这几个人。我们将在介绍"九一三"事件时再详细讲这几个人。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三层人员是: 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这四个人。 其中江腾蛟和王国维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里说一下王飞和陈励耘。

王飞,1922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48年参加解放军空军的筹建工作。1967年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时,王飞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也就是林立果的"顶头上司"。后来王飞因为与林立果的关系密切,1969年林立果升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后,王飞也升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242)

"九一三"事件后,王飞作为"林彪死党"被隔离审查,1974年患精神分裂症。1980年公审林彪集团时,原准备把王飞当作主犯,但因为王飞患精神病,不能起诉,所以把江滕蛟"升格"为主犯。

陈励耘,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64年任空军第五军政委,1968年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与王国维类似,陈励耘是毛泽东在浙江省巡游的

警卫工作负责人。因为毛泽东在这次南巡中,曾下榻于杭州汪庄,所以陈励耘多次见过毛泽东,也听过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九一三"事件后,陈励耘作为"林彪死党"被隔离审查,1980年公审林彪集团时,陈励耘被免于起诉。

陈励耘的判决书说:【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 阴谋活动,触犯了《刑法第 18 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 被告人陈励耘在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 32 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三层人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历史上与林彪毫无关系,这与黄、吴、李、邱四人在战争年代就与林彪建立起历史渊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的政治地位都不高,江腾蛟原是空四军政委,后被毛泽东免职,空四军政委由王国维接任,陈励耘是空五军政委,王飞是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江腾蛟、王飞不是中央委员,而王国维和陈励耘在"九大"上,通过林彪集团的途径跻身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般人都知道,林彪是极少见人的,而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四人林彪都亲自接见过。以林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亲自接见江腾蛟等小官,当然是不寻常的。如果说林彪接见王飞,还可以说是因为林立果的关系,而接见江腾蛟、王国维、陈励耘等人,就不能用一般关系来解释了。有人说林彪对林立果的"小舰队"毫不知情,那么林彪为什么要亲自接见林立果"小舰队"的成员呢?因此林彪亲自接见的这件事,也反映出林彪是知情的。

江腾蛟、王国维等人都给林彪写过"效忠信",声称绝对听从林彪的命令, 所以林彪和林立果对这几个人是很重视的。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把王维国、 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列为"骨干力量"。 (243)

尽管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被列入《五七一工程纪要》,但《五七一工程纪要》本身,却一直瞒着江腾蛟等人的。这是因为林彪和林立果对这些写"效忠信"的人,依然不敢完全信任。很多人是"只能共安乐、不能共患难"的人,在林彪得势的时候,这些人争先恐后地攀林彪,指望跟着林彪可以飞黄腾达;可是当林彪失势的时候,能够真的为林彪赴汤蹈火的人,那就凤毛麟角了。因此,林彪和林立果无法确定江腾蛟等人在关键时刻是不是真的能为林彪赴汤蹈火,所以《五七一工程纪要》等核心秘密要瞒着他们。

到 1971 年 9 月要实施"五七一工程"的关键时刻,林彪和林立果考虑动用这第三层人员了。但真正要向这些人透露"五七一工程"的时候,林彪和林立果却犹豫起来。万一说出来,这些人不愿干,或者不敢干,甚至去告密,那么"五七一工程"就要流产失败了。最后他们把这四人分为两组:告诉江腾蛟和王飞"五七一工程",拉他们进来干;王维国和陈励耘就不告诉了,这也就是说"五七一工程"就不指望他们了。

为什么分两组呢?因为江腾蛟是毛泽东点名不要的人,所以他只有跟林彪一条路;王飞是不被毛泽东重用的人,毛泽东从来没接见过王飞,所以他也只有跟林彪一条路。而王国维和陈励耘除了是林彪线上的人,他们也被毛泽东重用,毛泽东外巡时多次召见这两个人,他们对毛泽东不但没有仇恨,反而是有感情的。而且,王维国和陈励耘在官场上也很顺利,一路成为候补中央委员,让他们去干刺杀毛泽东的事情,缺乏内在的心理动机。

因此,林立果在9月8日,告诉了江腾蛟和王飞《五七一工程纪要》。江腾蛟说他在得知"五七一工程"时,表示"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据《江腾蛟供词》,林立果在9月8日曾设想让王维国趁毛泽东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但终究没敢用这个计策,因为他们怕王维国不愿干或不敢干,这样计划就败露了。

据王国维回忆,林立果秘书于新野只是对他说:"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么讲话,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提前给我们透个气。"这个要求是相当低的,所以王维国听到毛泽东在上海的讲话后,派自己的儿子王大章到北京去向林立果汇报。

(244)

林立果对王大章说:"你爸爸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的好。"这就是说王维国 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林彪线上的人,所以毛泽东没有怀疑他,亲自找他谈话。

林立果还说:"请王政委和王洪文搞好关系,今后要少提林副主席。"因为王洪文是毛泽东在上海的"代表",林立果让王维国与王洪文搞好关系,少提林彪,也就是劝王维国转而投靠毛泽东那边去吧。林立果问到徐景贤,是想知道徐景贤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如果徐景贤本人在上海,而毛泽东又没有召见他,只见了王洪文,这就说明毛泽东不重视徐景贤。

而对于陈励耘,林立果也没有通知他,所以他也就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 这样一来,陈励耘就因为"罪行轻微",免于起诉。

王维国的情况其实与陈励耘一样,他也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而王维国却被判刑 14年。这样一来,王维国就感到冤枉了,不停地上诉。其实王维国与陈励耘的差别,关键在于王维国派他的儿子到北京去向林立果汇报情况。如果没有这件事,估计王维国也会免于起诉的。

据《江腾蛟供词》,他和王飞都是在9月8日以后参与"五七一工程"的人。"五七一工程"有两个计划:上策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下策是北上苏联,出

国反毛。林立果对江腾蛟和王飞的信任仍然是有限的,只告诉他们南下的计划, 没有告诉他们北上的计划,所以江腾蛟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北上的计划。

江腾蛟说: 9月12日晚于新野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停止一切活动,消灭一切痕迹。但于新野没有告诉江腾蛟,他们将要"北上"了。因此江腾蛟后来又给周宇驰、等人打电话,却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王飞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只知道南下的计划,不知道北上的计划,所以在林彪一伙人"北上"之后,就不知所措了。不过王飞与江腾蛟不同的是,他患"精神病"了,这样一来,他就被免于起诉,而江腾蛟则被判刑 18 年。

还有一个特殊人物需要一提,这就是林彪的原秘书关光烈。1958 年关光烈 任林彪的秘书,1965 年关光烈离开林彪,到武汉军区 127 师任政委,此后关光 烈与林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可是在 1971 年 9 月 8 日,关光烈突然接 到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首长(林彪)"找他有事,要他马上到北京去。

关光烈一到北京,林立果就找他谈话,提出问他主管的 127 师"借用"喷火器和 40 火箭筒等武器,关光烈都托辞拒绝了。应该说关光烈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只是林立果想通过他搞到喷火器和 40 火箭筒等武器。然而《江腾蛟供词》中,却声称关光烈和他们一起策划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这样一来,关光烈就是有嘴也说不清了。后来,关光烈被判 10 年有期徒刑。

(245)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四层人员,是林立果等人笼络的一些不知详情的普通军人。 他们被告知有"阶级敌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他们去保卫林副主席。在那个强 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对"暗害"这种耸人听闻的语言并不感到奇怪,真的认 为有"阶级敌人",那么保卫林副主席也就是义不容辞之事。 这第四层人中的典型代表,是林立果领导下"调研小组"的翻译陈伦和。"九一三"事件后,陈伦和被隔离审查,1981年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处有期徒刑5年。陈伦和的判决书说:

【陈伦和是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成员,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7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武装政变前夕,陈伦和按照林立果的指使,向程洪珍传达了"舰队进入一等战备"的命令。9月8日,陈伦和随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即按照林立果的布置,一直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值班。9月11日,林立果又把他们在政变期间使用的代号告诉了陈伦和,当天,刘沛丰给陈伦和发了手枪。

陈伦和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南逃广州,分裂国家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向陈伦和等人布置南逃计划,指使陈伦和等人13日随林彪坐飞机到广州沙堤,在飞机上保卫林彪,并告诉他们说:林彪将来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9月12日深夜,陈伦和得知"南逃"计划暴露,即同王永奎等人转移到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秘密据点,于9月13日晚,伙同王永奎、许秀绪、王琢等六人从北京乘火车逃往广州。在广州因未打听到林立果的下落,陈伦和又冒充空军某团陈技师,妄图潜逃上海。9月16日在广东省源潭火车站被捉获归案。】

然而陈伦和出狱后,对上述指控矢口否认。陈伦和说:【1970年4月,我 从空军二炮学院调到空军司令部科研部任翻译。科研部部长魏坚向大家传达毛主 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扬林立果在空军搞科研,夸奖他敢想敢闯,专门写了批示, 还与他一起合影。这是我第一次得知林彪的儿子叫林立果,在空军任作战部副部 长。 9月,我被调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下属的外事处,16日上午,周宇驰给我和许秀绪等人说:"这里是空军党委办公室调查研究小组',简称'调研小组',我们都是围绕林立果工作。林立果是帮助林副主席处理全党全军的大事,到各处做调查研究,也要调研外国的情况,所以叫你来做翻译工作。"

(246)

后来周宇驰给我看了林立果与毛主席合影的大照片,林立果上报毛主席的技术材料,封面上有毛主席的批示和签字。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所以就形成了林立果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他到哪里工作的状况。我见到的林立果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像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日还督促我学马列,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

不知是否因为我的正统、生性坦诚和常常直言不讳,虽然我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却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有谋害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不知道当时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已分道扬镳,也不知道什么"选妃小组"、"教导队"的事。

1971年9月7日,林立果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并对我说:"现在起不要再搞资料翻译了,去值班守好电话,以及做好其他勤杂事务,如烧水做饭,整理房间等。"

9月8日及12日,周宇驰两次对我和其他人谎称:"毛主席病重,有人要捣鬼,所以我们要搞战备。"

谁都知道那时候"路线斗争很复杂",虽然他们没有明说"有人"指的就是 江青、张春桥等人,但是江、张在群众中的印象一直不佳,非议不少,暗地里对 中央的文武两派的不和一直都有传闻。直到9月12日,周宇驰还对我等人说: "林彪被他们(江、张)欺负够了。" 所以周宇驰的解释是合乎情理和令人信服的。

类似值班、代号、发枪等战勤事务,我在 1967 年赴越参战、1969 年战备时都曾经历过,专案组和法庭非要把这些说成我参加政变、有颠覆政府的目的,何以服人?

当时我不知道林彪已背叛毛主席,在"调研小组"里林立果等人一直在散布他们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所以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在与江青等搞斗争。 1971年7月林立果还在汕头对空十二军部分领导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现在有人要把他们分割开来,要提高警惕。"这个谈话纪要曾给我看过。

我随王永奎等三个副处长去广州,是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亲自对我等四人明确下令的,他说:现在八三四一部队也不可靠了,要我们在去广州的飞机上保护林彪。尽管我从未见过林彪,叶群,但是作为一个党员和军人,就应该服从命令去广州保卫党章已经确定的"接班人"。另一方面文革理论和实践搅乱了人的思想,只觉得阶级斗争越搞越大,阶级敌人越搞越多,遍地都是,连党的副主席也有危险。

(247)

在王永奎安排下坐火车去广州,并不是得知林彪"南逃"阴谋暴露之后的逃跑。包括王永奎在内,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然就不存在什么"得知阴谋败露"和"南逃"。所以9月13日我们依然执行原来林立果定的分头去广州的计划,去了广州之后我们就找林立果。

判决书对我们当时"在广州因未打听到林立果的下落,陈伦和又冒充空军某

团陈技师,妄图潜逃上海。9月16日在广东省源潭火车站被捉获归案"的描述 与事实不仅有出入,而且有本质上的区别,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没有找到林立果(那时又没有手机等现代通讯方式),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在上海?于是就从广州去上海。因为军人出差是要《军人通行证》的,我们的单位都在北京,不可能回北京去开证,所以就借用了广空某单位的通行证。我们既没有"逃",也没有"潜",人家要抓我们是人家的事,并不是因为我们干了什么坏事,我们不过是奉命行事,只是为了找到我们的领导。】

由陈伦和的回忆可知: (一)毛泽东曾经表扬过林立果"搞科研",还写了专门的批示,并与林立果有合影。陈伦和看过毛泽东与林立果的合影,还看过林立果上报毛泽东材料上,毛泽东给他的批示和签字。从陈伦和回忆的时间来看,毛泽东与林立果的合影和批示,应该是 1969 年的"九大"前后的事情。

- (二)陈伦和看到林立果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这与林彪是相像的。
- (三)陈伦和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也不知道庐山会议上毛与林之事。 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他们下达"一等战备"的命令,理由是:"毛主席 病重,有人要捣鬼,所以我们要搞战备。"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听上去很合理,陈 伦和等人也很相信,毫不怀疑。
- (四)值班、代号、发枪等是随着"一等战备"而来的,这在"路线斗争"的 年代,也不算异常之事。
- (五)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亲自对陈伦和等四人说:现在八三四一部队 也不可靠了,命令他们在去广州的飞机上保护林彪。
 - (六)9月13日,陈伦和等人没有见到林立果,他们就坐火车去广州找林立

果;在广州找不到林立果,他们又去上海找。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 命令,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林彪和林立果外逃之事。

由此看来,林彪地下部队的第四层人员,只是林立果等人借用林彪的声望利用一下他们而已,这些人都算不上是林彪或林立果的死党,他们只是简单地"被利用"了。因为那时新闻报刊一直宣传"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如果有人说"毛主席派人来抓林彪",一般人反而不相信。

(248)

那时一般民众都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密不可分的,无法想象毛泽东会下令抓自己的亲密战友。如果有人对林彪动手,人们自然地认为那一定是毛泽东病重,有人趁机篡夺林彪的接班人大权。因此这些第四层的人,被告知毛泽东病重,有人(江青等)要趁机夺林彪的权,要他们武力保卫林彪,这些人自然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

看上去轰轰烈烈的"五七一工程",其实知道整个"五七一工程"的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六个人,知道部分"五七一工程"的有林豆豆、李伟信、江腾蛟、王飞四人,总共不过十人,其他人都是属于各种各样"被利用"的。一件事情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五七一工程"之所以没有事前泄露出去,也是因为知道的人非常少。

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五七一工程",其实分为三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暗杀毛泽东的计划;第二个计划是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第三个计划是外逃苏联的计划。这三个计划是同时进行的,比如据后来的揭发材料说:【1971年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到广东深圳、尖沙嘴,在飞机上航测香港及周围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林彪)到香港指挥、遥

控。"

1971年7月底,林立果、周宇驰曾秘密进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训练。8月 8日,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9月7日,周宇驰向空军司令部航行局要苏联民航班机图;9月11周宇驰拿到可供导航用的中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

据揭发材料显示,早在1971年7月,林立果就开始策划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并看好了退路,万一情况紧急的时候,林彪可以逃到香港。因为深圳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所以开水陆两用汽车,可以从深圳直接开到香港,这也是林立果、周宇驰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从深圳逃到香港去。

周宇驰要苏联民航班机图等,则是为了外逃苏联之用,可见上述三个计划是同时进行的。三个计划的同时进行,也说明"五七一工程"不是林立果单独搞的,因为在广州另立中央,绝不是林立果可以背着林彪单独干的事情。

现在一些人为了说明"五七一工程"是林立果背着林彪单独搞的,于是就略去"五七一工程"三个计划中的另外两个,让人们误以为"五七一工程"只是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其实《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明文写道:【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可见《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策划的"军区搞地方割据",就是后来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是与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同时进行的。

(249)

把文革和林彪事件联系起来,进行过从头到尾认真研究的学者,比如高华、高文谦等人,都得出结论:林彪对"五七一工程"是知情的,不是林立果背着林

彪干的。例如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写道:【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劫后余生的林立衡极力回避其父林彪在企图谋杀毛泽东这个问题上的责任,而把它说成是林立果一人所为。实际上,这个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来的,但最后的决心还是只有林彪才能去下。林立果纵使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在谋杀毛泽东这样非同小可的问题上自行其是,拿全家人的性命来赌博。显然,没有林彪的点头,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擅作主张的。】

在"五七一工程"的三个计划中,第三个外逃苏联的计划,应该是其中的核心,因为这个计划实施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是主攻计划;第二个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可能性就小得多,只能作为辅助计划;第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是的"撞大运"理想计划,要有买彩票中头彩的运气才行。

林彪为什么想到在广州另立中央呢?这里有一个历史原因。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分为6个大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西北军区。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一直打到海南岛,中南军区成立后,辖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6省,林彪任中南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黄永胜任参谋长,陶铸任政治部主任。1955年,全国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以中南军区司令部为班底成立了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因此,广州军区是林彪第四野战军的班底,所以林彪要选在广州"另立中央"。当然林彪也想好"另立中央"失败的可能性,所以安排林立果等人学会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便万一时退到香港。

不过"五七一工程"的真正重点,还是外逃苏联的计划。要想实施"外逃" 苏联的计划,也是非常困难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林彪事件,还没有发生过一个高 官的外逃事件。其实刘少奇等人,也未必没有想过外逃,只是外逃的难度极大。因为高官们的警卫都是掌握在八三四一部队手中,要想逃出八三四一部队的监控,要想弄到供自己外逃的飞机,要想搞到效忠于自己的飞行员,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此,毛泽东也没想到林彪会"外逃",因为这是不太可能办到的。

而林彪居然办到了一般人看来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居然成功地坐飞机"外逃"了。如果不是后来飞机迫降失败,林彪的外逃计划就成功了,这也可以算是林彪"长胜将军"的最后一次"胜仗"吧。

林彪策划出走苏联的计划,其核心并不是为了逃跑,而是要给毛泽东一个重大打击。这点在后面重点分析。

(250)

前面提到"五七一工程"是三个计划同时策划的,第一个计划"暗杀毛泽东"是进攻性的,第二个计划"广州另立中央"也是进攻性的,而第三个计划"出走苏联"则是防御性的。在实施时的顺序是:先实施第一个计划,如果第一个计划不成功,就启动第二个计划;如果第二个计划不成功,再启动第三个计划。事实上,这三个计划也是这样实施的。

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否认"五七一工程"有三个计划。这些人认为,"五七一工程"只有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还瞒着林彪,是林立果擅自搞的。这些人的说法是:林立果在1971年9月5日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于9月8日从北戴河飞往北京,开始策划暗杀毛泽东的行动。9月12日下午4时,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林立果以为暗杀计划暴露了,于当日下午6时紧急从北京飞往北戴河。到了北戴河后,林立果才告诉林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林彪本来没有任何反抗毛泽东的想法,只是在得知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后,认为自

己已经洗不清了,才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逃往苏联。

这种说法有两个致命的硬伤:第一个硬伤是必须否认存在第二个"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以林彪为中心在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公开对着干,这个计划是具有强烈反抗性质的,完全否定林彪不准备反抗毛泽东的说法。而且,这个计划离开了林彪是不成立的,林立果不可能背着林彪擅自"另立中央"。

现在各种证据都显示,"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是存在的,我们前面举出不少证据,后面也还将举出一些证据。只要"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存在,"林彪不知情"的说法就无法自圆其说。

这种说法的第二个硬伤,是说外逃苏联的计划是在9月12日当天临时决定的。该说法声称林立果年轻莽撞,只知道暗杀,9月12日暗杀失败后,才临时决定外逃。可是事实证明,外逃的计划不是9月12日临时作出的,而是最迟在9月7日就已经有了。林彪女儿林豆豆的回忆,以及林彪的警卫人员都证实,林立果早在9月7日就有南下广州的计划了。

这里先看一下林彪一家的动向时间表:

1971年7月,林彪和叶群赴北戴河休养。

1971 年 7 月 9 日,林立果到广州,在空十二军等处讲话,说:"毛主席和 林副主席是不可分的,现在有人试图把他们分开。"

(251)

7月下旬,林立果等人在飞机上航测香港及周围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7月30日,林立果从广州回到北京。

- 8月8日,林立果从北京到北戴河,进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训练。
- 8月27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北京。
- 9月4日,林立果再从北京到北戴河。
- 9月7日上午,林豆豆坐飞机到北戴河,林立果与林豆豆密谈。之后林豆豆对警卫员说: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出逃。
 - 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飞回北京,指挥暗杀毛泽东的计划。
- 9月12日下午4时,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下午6时,林立果从北京飞往北戴河。
- 9月12日晚,林豆豆打电话给北京,说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出逃,并准备好了飞机。之后周恩来下"禁空令",禁止一切飞机起飞。
- 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登上林彪专机,飞机在机场未批准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后来坠毁在蒙古荒漠。

据林彪的警卫员吕学文回忆说:【北戴河 96 号楼是根据林彪、叶群的要求专门修建的。整座楼呈"工"字型,东西"两横"分别是林彪、叶群的卧室、会客厅、办公室和室内车库,中间"一竖",是走廊和工作人员的住处,这里既安全又安静。

1971年9月,当他们得到毛主席南巡时的一些谈话内容后,更加反常了。 一是叶群的电话特别多,她往林彪屋里跑的特别勤;林彪脾气特殊,他最喜欢一个人呆在屋里,任何人进屋,都必须报告完后迅速离去。叶群在他那里呆的时间长,这说明,他俩商量的事情很重要。

二是林彪的汽车司机杨振刚一天几次试车。该车是保险红旗轿车,安有防弹 玻璃,是当时国内一流车,性能特别好,并不需要天天试车。杨振刚的举动说明, 首长可能随时会急用车。

三是林彪、叶群突然把林立衡及林立衡的未婚夫张清林等一齐招到了北戴河。

最最引起我们工作人员怀疑的,是叶群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一方面,她在工作人员中说,"首长想动一动"、"准备去大连"、"女儿在国庆节要结婚"等等,让人们觉得,林彪这里一切正常无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让人从北京取来大批文件和生活用品,并出现非常紧张、惶惶不可终日的表情,有人听到她在林彪房间里哭泣,看到她的眼睛红肿了。

(252)

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嘴上不敢问、不敢讲,但心里都感到,近几天可能要出什么大事了。

叶群曾多次对工作人员说:"豆豆身体虚弱,神经不太好,言谈无度,没有逻辑性。对她说的话,你们一是不要信,二是听到后要及时向我报告。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严肃对待。"】

据负责林彪警卫的原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吉纯回忆说:【9月7日上午,林立衡从北京飞往北戴河,是我派车去山海关机场接的。午饭后,我刚休息,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房间,对我说:"张清林(林立衡的未婚夫)和杨森(林立衡的随从人员)有事找你。"

我随他到大队值班室,张、杨两人已在那里等我。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 "不知豆豆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老虎抓起来。"

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我大吃一惊:什么事这么严重?况且我怎么敢抓他们。 我说:"先别着急,去看看再说。"

我立即赶到林立果住处外面,看到他的车停在那里。我到96楼找李文普,

他是"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我向李文普报告了张、杨讲的情况。他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

由于事关重大,我也不敢同别人讲。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 "他们(张、杨)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林立衡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

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林立衡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 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到外地去。"

我说: "怎么办?是否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

林立衡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 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

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

林彪办公室秘书宋德金也回忆说:【大约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吉纯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说,主任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外逃,怎么办?"

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平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 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

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林彪在 1970 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隐约听说豆豆与叶群关系不好。

(253)

可是我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吉纯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 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吉纯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情 况,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 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林彪贴身卫士李文普回忆说:【(9月12日)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 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 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林立 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真把我 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

我同时也问有什么证据?但林立衡也不说任何证据,我当然就不会很相信了。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

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

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 说了此事。】

由此可见,早在9月7日,林豆豆已经从林立果那里知道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她反对这个计划,并试图阻止这个计划。这件事林豆豆之所以不敢直接向林彪说,是因为她也知道,林彪对这一切都是知情的,林立果并没有瞒着林彪,所以她才向周围的警卫员求援。如果真是林立果瞒着林彪,那么林豆豆应该主动向林彪揭发林立果干的"坏事",林豆豆为什么不告诉林彪呢?

据《风云九一三》的作者张聂尔说,他在1996年初曾经当面问林豆豆:"你当时为什么不向你父亲报告呢?如果那样,一切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张聂尔发

现林豆豆的脸在一霎间涨红了,她只是回答说:"他都糊涂了。"

张聂尔说的林豆豆反应,也证实林豆豆应该知道林彪是知情的。林豆豆说"林 彪都糊涂了",这个完全没有道理,林彪那时是很清醒的。林彪与毛泽东"斗争" 的计划,的确是高明的,因为他的这一招,彻底毁坏了毛泽东的威信。

(254)

不少人认为林彪搞暗杀、另立中央、出走外国等是不明智的。那么不妨设想 一下,林彪"不走"会是什么结局呢?

- (一)理想结局: 林彪保住副主席地位,继续当接班人。如果身体好,活过毛泽东,最后还能接班继位。
- (二)较好结局: 林彪丢掉副主席和接班人的位子,但保留政治局委员,成为 坐冷板凳的人,而在生活上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级高官待遇。朱德和陈云就 是这样的例子。再差一些,失去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1966 年以前的彭 德怀就是这样的例子。
- (三)最坏结局: 刘少奇和 1966 年以后的彭德怀就是这样的例子。1966 年 8 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排名第二降到排名第八,保留政治局委员,成 为坐冷板凳的人。当时人们以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到此为止,刘少奇在生活 上也继续享受一级高官的待遇。但刘少奇失权后,很快就失去了生活待遇,妻子 被捕,子女被下放,刘少奇本身也失去人身自由,不久就病死了。彭德怀也在 1966 年以后被关进监狱,失去了以前的一切待遇。

林彪不走的话,将会是那种结局呢?第一,理想结局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已经点了林彪的名,并且说庐山会议上与林彪的冲突 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这个人向来是说话算话的,他既然这么说出口了,就 是已经下决心一定要拿掉林彪,所以林彪副主席和接班人的地位肯定是保不住的。

第二,较好结局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为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明确地说: "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 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彭德怀搞军事俱 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毛泽东已经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并列起来,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既然把林彪与彭德怀和刘少奇并列,那么林彪的下场,就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下场,不太可能比彭德怀和刘少奇更好。

第三,林彪不走的话,他最可能面临的就是最坏结局,像刘少奇那样,妻子入狱,儿子和女儿被下放,林彪自己被软禁。软禁的生活条件是较差的,如果林彪的身体较好,或许还能挺过来,而林彪的身体较差,未必能在软禁中挺过来。林彪被软禁的话,好则一年,差则半年,恐怕就要一命呜呼了。

这样比较一下,林彪自然会选择"走",因为他预料自己留下来不会有好的结局。当然,林彪选择"走",不仅仅是为了逃命,他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机,那就是要战胜毛泽东。

(255)

林彪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对于他这样的军人来说,死并不重要,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以自己的死去换取胜利,也是值得的,这就是军人的境界。比如大部队要撤退,留下一小批战士阻击敌人,这些阻击敌人的战士,注定都是要死的,而且他们也心甘情愿去死。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死不是"白死",自己的"死"将换来大部队的胜利。所以军人的思维方式,是一切为了胜利,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胜利。如果军人没有这样的思维方

式和思想境界, 谁愿意留下来阻击敌人呢?

对于林彪来说,他已经把他与毛泽东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战争。林彪既然有"常胜将军"的美誉,他当然不能输掉这场战争,他一定要赢,哪怕是丢了自己的性命,也要赢,这才是军人的本色。然而,林彪与毛泽东的实力对比相差太大,正面公开的斗争,林彪绝无赢的可能。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大败,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林彪要赢,必须出奇兵,用诡计,为了胜利,不惜一切手段和一切代价。

林彪取胜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拿掉毛泽东的肉体生命,也就是暗杀。这个办法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一般搞暗杀,都是买通黑社会,雇用职业杀手,这样即使是暗杀失败,自己也不会暴露。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暗杀是经常发生的,这样的暗杀不管成功失败,一般都查不出谁是主使人。

可是新中国既没有黑社会,也没有职业杀手,所以雇人去暗杀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林彪只有动用自己的儿子去干。这样一来,一旦暗杀失败,林彪这个主使人就必然会暴露,林彪就要背上一个搞暗杀的污名。但林彪偏偏不怕这个污名,这个理由后面再说。

林彪也清楚,就是有黑社会的地下组织,有职业杀手的丰富经验,要想暗杀毛泽东这样警卫森严的人,也是极难的。林立果这支 10 人左右的小部队,又毫无搞特务工作和暗杀的经验,要想暗杀成功毛泽东,简直比买彩票中头彩的可能性还小。既然这样,林彪为什么还要干呢?这是因为暗杀即使失败,也是有价值的,这个理由也在后面说。

林彪取胜的第二个办法,是组建自己的军队打败毛泽东,这就是林彪在广州 另立中央的计划。然而鉴于毛泽东的巨大威信,尽管广州的部队是林彪过去的嫡 系部队,但此时广州的部队会不会跟着林彪"造反",是疑问很大的事情。从当 时的情况来看,广州的部队跟随林彪造反的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十。即使这样, 林彪也要干,这也是因为另立中央即使失败了,也是有意义的,这个理由也在后 面说。

(256)

林彪取胜的第三个办法,是向外国"借兵"打败毛泽东。向外国借兵的事,古今中外都很多,林彪想到的是向苏联借兵。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苏方认为核心问题是毛泽东的反苏,所以苏联极欲搞掉毛泽东,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在周恩来访苏的时候,苏联人就装着醉酒,向周恩来提出共同搞掉毛泽东的设想。如果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与苏联合作,共同搞掉毛泽东,苏联是很愿意的。

因此林彪外逃苏联,向苏联借兵打回中国来,毛泽东是很难招架的。因为林 彪对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军事部署太熟悉了,由林彪指挥苏军来打中国,取胜的可 能性很大。即使不占领全中国,只要占领东三省等部分地区,在那里建立一个反 毛泽东的苏联卫星国,也是苏联很愿意看到的。

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苏联是愿意出兵帮助林彪"打回来"的。可是中国已经有了原子弹,与中国开战就意味着一场核战争,苏联愿意冒着核战争的危险借兵给林彪吗?这是阻碍林彪这个设想的关键。一般看来,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应该是没有魄力面对核战争的,所以林彪借兵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样林彪外逃苏联,就会落下一个"叛国"的污名,但林彪却偏偏不怕这个污名,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回头看看"五七一工程"的三个计划:第一个暗杀计划,第二个另立中央计划,第三个外逃借兵计划,都是为了战胜毛泽东的计划。林彪也知道,这三个计划要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因此林彪还有一个没有写在《五七一工程纪要》

中的第四个计划,那就是与毛泽东"同归于尽"的计划。作为军人来说,不能战胜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也算是没有失败。

如果说林彪前三个战胜毛泽东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那么与毛泽东 "同归于尽"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当然林彪的"同归于尽",不 是在肉体上与毛泽东"同归于尽",而是在政治上与毛泽东"同归于尽"。

林彪知道,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可以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高官,最 主要靠的是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毛泽东最大的政治武器。 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建立,林彪是做出很大贡献的,可以说没有林彪的助推,毛 泽东不可能建立起那么高的个人崇拜。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林彪可以帮毛泽东建立起个人崇拜,也可以打掉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打掉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办法,就是以自己给自己泼脏水, 弄黑自己,也就染黑了毛泽东。林彪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坏人",这样才能打掉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57)

当时人们已经把林彪看成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并不是坏人,只是犯了错误,下了台,受到了批判,这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影响并不大。可是一旦人们发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原来是"坏人"的话,那么毛泽东就很尴尬了,他怎么向人民群众解释呢?毛泽东如果看出不自己的亲密战友是"坏人",被自己的亲密战友欺骗了,那么毛泽东的英明到哪里去了?这几年的文革到底为了什么?

因此, 林彪下台, 被批判, 都不会影响毛泽东的政治声望, 而林彪是"坏人", 才能打击毛泽东的政治声望。林彪怎么把自己变成"坏人"呢?

一般人心目中"坏人",是那种搞阴谋诡计,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 林彪就要搞暗杀,把自己变成"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一般人认为分 裂国家的人是"坏人",林彪就要另立中央,分裂国家;一般人认为叛国的人是"坏人",林彪就要外逃苏联"叛国"。

这样一来,如果林彪搞的暗杀计划失败,另立中央计划失败,外逃苏联计划失败,那么林彪的第四个"同归于尽"计划,就不声不响地成功了。因为此时林彪已经变成分裂国家、投敌叛国、阴谋暗杀的标准坏人,想要给林彪说好话都很难。这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林彪原来是这么一个坏事尽干的"坏人",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把这么坏的人,当成自己的亲密战友呢?因此,林彪表现得越"坏",毛泽东就越惨越尴尬,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丧失越大。

这样分析之后,就清楚林彪为什么不怕搞暗杀的污名,为什么不怕分裂国家的污名,为什么不怕叛国的污名。林彪就是要用这些"污名",与毛泽东"同归于尽",让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丧失和政治威信扫地。事实上,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确丧失殆尽了,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是永远正确和英明伟大的,人们看到"红宝书",就想起摇着"红宝书"的林彪这个阴谋家,"红宝书"自然而然失去它的魔力。

林彪的叛逃,造成林彪和毛泽东两个人都是输家,这就是林彪"同归于尽" 计划的结果。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可以说从没遇到过这样大的失败,这次林彪让毛 泽东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了洋相,让毛泽东失去了他最大的政治武器:个人崇拜。

毛泽东失去个人崇拜,还直接影响到他的接班人。人们不再迷信毛泽东了,那么毛泽东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神圣的光环。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下台,都与毛泽东失去个人崇拜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对于林彪来说,他的"出走"绝不是单纯的外逃,而是战胜毛泽东的一种方式。即使是外逃失败,林彪丧命,他也不算是完全的败者,毕竟他这是与毛泽东"同归于尽"了。

(258)

之所以称"九一三事件",是因为林彪的飞机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零时 30 分起飞,而真正惊心动魄的事,其实是发生在 1971 年 9 月 12 日这一天。这里先看毛泽东的情况,据汪东兴回忆: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我们陪着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毛主席这次去南方巡视的目的,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毛主席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日程是: 1971 年 8 月 15 日离京, 8 月 16 日至 27 日在武汉, 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 8 月 27 日至 8 月 31 日在长沙, 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在南昌, 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 9 月 3 日至 9 月 10 日在杭州, 找多位地方高官谈话。

汪东兴回忆说:【9月8日晚上,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毛主席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我还建议,可以转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

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作了各种防范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 励耘,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

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专列9月10日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下午4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晚10点抵达上海。在杭州动身前,我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

(259)

毛主席一直等到 9月11日上午10点钟,许世友方才来。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 "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 政委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 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

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在专车前方'压线路'的火车)。"

我说: "不通知他们了?"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 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到济南是早上5点,停车50分钟; 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 他们谈话。

12 日中午 13 点 10 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 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 3 点多钟才结束。过去,毛主席从来没 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 点 36 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 点 5 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感到诧异,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

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张春桥等)的阴谋,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 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 9 月 12 日下午回到中南海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

他们要实施早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

后来据调查得知,林彪他们有一个先谈判、后动武的计划。他们想到了广州 以后,先提出条件同北京谈判,但他们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小。这样,他们就 计划在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动武, 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

(260)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当时虽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但他出于某种警觉,临时改变了日程,提前回到了北京。这次毛泽东提前回北京,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等到汪东兴告诉他时,周恩来才吃惊地说:"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毛泽东在 9 月 12 日下午 4 时到达北京后,下午 7 时林立果乘林彪的 256 号专机匆匆飞往北戴河。关于此行,256 号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

【1971年9月12日是星期天,按惯例,我应该回城里探望家人。但是一天前,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说周末有任务需要值班,于是我给家里打电话说这个周末不回家了。9月12日晚18点开饭,这时值班室人员说:"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紧急任务!"

当我到达值班室时,潘景寅进来了,他只夹个小资料包,神色也没见任何异常。机组9个人到齐后,我们坐车到达停机坪。这时,一辆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心直口快的陈联炳随口说了句:"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啊?"潘景寅没有吭声。

一切准备完毕,我们就在机场待命。过了一会儿,一辆蓝色伏尔加小轿车驶来,下来的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从车上卸下很多东西。等了一会儿,伏尔加又开过来了,下来几个人,我认出浓眉大眼的是林立果,还有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和林立果同车抵达的还有两个不到 20 岁的女兵,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这次专机就是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一共 5 位乘客。

19点40分,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机长是潘景寅,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我是第二副驾驶。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下飞机前,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还一脸庄重地说了句:"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

林立果当时虽然只有 26 岁,但身份已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那时也经常 以林彪代言人身份出现在很多场合,所以他的这一番话我们听来,也没有什么不 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飞机后,机组人员开始例行检查。这时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说: "待会儿把飞机加油到 17 吨。"

这是潘景寅第二次嘱咐加油,我一听,马上就问:"为什么加这么多油?明天

上哪儿去啊?"

潘景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一会儿咱们上了飞机研究一下航 线。"

油车开过来后,才发现出了小麻烦。三叉戟飞机是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但山海关机场的这辆加油车导管不配套,无法正常加油。潘景寅听汇报后说:"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粗略地讲,飞机上此时剩了12吨半油,这也决定了256号后来的命运。根据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况,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飞广州的。】

(261)

据康庭梓回忆,在9月11日潘景寅就告诉他,周末有任务要值班。因为9月12日是星期天,所以所谓"周末",只能是9月12日。在9月11日,毛泽东还在上海,那时候除了毛泽东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毛泽东将于9月12日返回北京。由此可见,潘景寅早就做好飞广州的准备,这个计划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突然回北京才临时做出的。

北京到北戴河的距离很近,潘景寅指示飞机加大量的油,这是为了飞广州做准备的。后来飞机上剩 12 吨半油,这个油量还是可以勉强飞到广州的。

飞机到北戴河后,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林彪要用这架飞机",可见此时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了,这个计划也不是在9月12日晚上才临时定的。

这次飞机上的五个人,后来林立果和刘沛丰上了外逃的飞机,程洪珍和两个 女兵被留在山海关机场,没有带上飞机,可见他们三人是不知情的。

关于专机机长潘景寅,有不少人认为他不是林彪死党,理由是后来邓小平说

了一句话。据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写道:【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费尔时谈到了"九一三"事件,邓小平说: "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追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邓小平的话,只能说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话,1981年 12 月 23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民政部门发给了潘景寅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真是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潘景寅在飞机上进行过搏斗吗?原空军司令员王海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空军专家组的意见,该意见说:【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不可能进行搏斗,这一点可以从他当时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以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

9月12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

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256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256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自愿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了。】

空军专家组的意见,显然否定了邓小平的说法。其实邓小平只是随便说"据我个人判断……",并不是代表组织做出的正式决定。或许邓小平自己并不清楚,他说话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听到邓小平这句话后,马上给潘景寅做出"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而且还给潘景寅家属发了

抚恤金。潘景寅的上述结论,是典型的"唯上媚上"结果,不能作为分析林彪事件的证据。】

(262)

9月12日这一天,北戴河却很热闹,因为这天举办林豆豆和未婚夫张清林的"订婚仪式"。关于9月12日之前北戴河的事,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回忆说:【9月6日,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南巡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不清楚。随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林立衡带着正谈恋爱的张清林,还有张宁(林立果的未婚妻)马上到北戴河来,说:"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据李文普的回忆,周宇驰在9月6日这天把毛泽东南巡讲话向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三人汇报了。此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叫林豆豆带着未婚夫来北戴河。为什么要急着叫林豆豆来北戴河呢?显然他们准备就在北戴河"行动",把林豆豆叫来,就是准备带她走。

由此可见,在9月6日这一天,林彪、叶群、林立果和周宇驰就做好了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因为暗杀毛泽东的事,完全不需要叫林豆豆来,而要南下广州,才需要叫林豆豆来。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9月7日上午,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加上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处长杨森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到达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接到他在57号楼的住处密谈。这时林彪、叶群告诉我,要见林立衡,我去57号楼,周宇驰挡在门口,不让我进。我告诉他:"是首长要见豆豆",周宇驰才让我进去通报。】

据李文普回忆, 林豆豆一到北戴河, 林立果就找她密谈。这次密谈中, 林立

果应该对林豆豆讲了暗杀毛泽东,南下广州等计划。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当然与林豆豆无关,而南下广州的计划就要带林豆豆一起走,因此林立果要事先给她打招呼,让林豆豆先有个思想准备。没想到林豆豆听了以后,马上跟周围的警卫人员说了,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李文普还回忆说:【林彪看到张宁、张清林,很高兴。叶群问他满意不满意时,林彪表示:"满意,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因为张宁和张清林是在9月6日突然被叶群叫来的,林彪见到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和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表示很高兴,一点没有意外,可见林彪对这些计划都是知情的。

李文普接着回忆说:【9月8日,林立果突然去了北京,说是去治牙,叶群叫我瞒住林彪。这一天林彪一切如常,林彪也没有问我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安全到达北京,要我向首长报告。我马上去报告了林彪和叶群,林彪点头说:"好!"

当时我就感到林彪是知道林立果去北京的,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我。】 (263)

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李文普,应该不是为了防范李文普,而是放烟幕弹。这次林立果去北京,是搞暗杀的极为重大之事,所以叶群怕别人怀疑林立果去北京的真实目的,就放风说"去北京治牙",又说"不要告诉林彪",这样就造成林立果去北京,似乎与林彪完全无关的感觉。叶群希望李文普把"林立果背着林彪去北京治牙"这件事散布出去,这就等于释放一颗烟幕弹,不会引起有人怀疑林立果的行动。

关于叶群释放烟幕弹,吴法宪也回忆说:【9月9日下午,我去空军学院礼堂做报告,秘书给我递了一个条子,说是叶群来电话找我。我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就宣布会议暂时休息,去接电话。没想叶群告诉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准备放两部电影,让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庆贺。

由于林立衡是空军的干部,所以叶群要陈绥圻(吴法宪妻子)帮助找两部影片。 叶群还说:"只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来以后,告诉林办,他们自然 就会找出电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这个电话,我当时心里想:"这是什么问题,还要打电话来找我?"

回家以后,我就要陈绥圻帮着找一找。陈绥圻找了一本《大众电影》合订本, 坐在那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什么合适的。以后叶群没有再来电话问,事情也 就不了了之了。】

叶群让吴法宪找电影,根本就是没事找事,吴法宪也纳闷"这种事还要打电话来找我?"其实叶群的目的,是希望吴法宪把"林立衡要结婚"的消息散布出去,让人们认为北戴河正在忙着为林豆豆准备婚事。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怀疑北戴河在策划其他的事,这也是一颗烟幕弹。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9月10日中午,刘沛丰带着材料坐飞机来到北戴河。 见了叶群,密谈了约20分钟,谈什么我不清楚。我叫食堂给刘沛丰准备午饭, 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吃饭,又急急忙忙坐飞机走了。当天下午,林立衡带了张 清林、张宁、杨森去山海关游玩,买了一些送给林彪、叶群的小礼品,林彪见了 礼物很高兴,叶群叫我给他们照了相。

9月11日上午11点左右,叶群叫我给北京毛家湾打电话,要家里把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拿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

备问题。"

这一天,叶群试探性地向我讲了一下想去广州。我当时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叶群没有深说。现在看来,她是为南逃广州分裂中央做准备。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前一天,9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 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 负不起这个责任。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我就到空军疗养院办事去了。】 (264)

李文普回忆,刘沛丰9月10日坐飞机到北戴河与叶群密谈20分钟,内容应该是关于林立果他们策划暗杀的事情。9月11日,叶群向李文普透露去广州的事。此时毛泽东还在上海,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会在第二天突然回北京。由此可见,南下广州的计划是事先制定好的,而且林彪和叶群都是知情的,否则叶群不会对李文普提出去广州之事。另外这天林彪要看"副军级以上的干部名册",也应该与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有关。9月12日上午林彪说要去大连,在也是释放烟幕弹,其实上是准备去广州。

另外,9月12日下午林豆豆与李文普谈到"林立果干坏事,要害毛主席,要去广州,不行去香港"。9月12日下午,毛泽东还在返回北京的路上,林立果他们的暗杀计划还没有"失败",可见南下广州的计划是早就策划好的,并不是

暗杀计划失败之后才临时想出来的。

关于9月12日这天的事,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晚饭前,林彪也没有说要去大连,而是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婚礼,要我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

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

叶群把我叫进客厅,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了合照;又强拉着林 立衡、张清林接吻,拍了照,又让女儿女婿出去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晚饭后,在96楼走廊里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这时林立果正从北京乘飞机返回山海关机场。机场打电话问是谁来,秘书们都不知道。叶群告诉我:"豆豆今晚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

叶群要刘吉纯坐车去接。林立果是坐机场的汽车,在半路上换乘刘吉纯的车 回到北戴河的。这时,已经到了晚上8点以后。过去,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 勤,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叶群却把他们赶出来看电影,自己躲进林 彪房间,关上门长时间地密谈。

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清。21 点左右,林立果回到 96 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

据李文普回忆,林彪、叶群和林豆豆、张清林拍了合照,表示祝贺他们订婚。 这时林立果乘飞机来北戴河,叶群告诉他们,林立果是"赶来"为林豆豆祝贺的, 显然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在看电影时,叶群又违规把林彪身边的内勤"支走", 她与林彪两人单独密谈。林立果来了之后,他们三人又一起密谈。 (265)

对此警卫科长刘吉纯也回忆说:【晚饭后,我们在院里纳凉,忽然听到空中有一架大飞机飞往山海关方向。这时,叶群打来电话说:"老虎专程从北京来这里祝贺豆豆和张清林订婚,你快去机场接他。"

我找司机驾一辆"吉姆"同去机场,过秦皇岛不远,看到前方有车过来,我叫司机把车停靠在路中间。这时对面的车也开过来了,里面正是林立果和刘沛丰。 我说:"主任叫我来接你们,因为通知晚了,所以才到这里。"

林立果什么话都没说,与刘沛丰各提一个小箱子,改驾我们的"吉姆"车走了。我同司机上了他们从机场借来的吉普车,返回驻地。回到驻地后,我一直没有见到林立果,怀疑他来北戴河一定有别的事情,不像是为林立衡订婚而来。

我见到李文普,问他: "怎么看不到老虎?他的房子准备好了没有?" 我见李文普不说话,便说: "我觉得老虎回来有点不对劲,是不是要出事呀?" 李文普说: "等上飞机后再说。"

我说:"上了飞机可就晚了,工作人员中就咱俩有枪,是不是从部队挑选几个人上去?"李文普没表态。

过了一会儿,叶群给秘书办公室打来电话,她派我去大连看房子。我问:"怎么去?"

叶群说:"坐火车去。"

我说:"夜里没有开往大连的火车。"

叶群改口说:"机场不是有架小飞机吗?"

我想了一下,说:"我不想去。"

叶群说:"不去就算了。"

当时我感到很蹊跷,因为夜间乘火车去大连,第二天晚上才能到达,而他们第二天上午乘飞机,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大连了。况且,大连的房子,林彪多次住过,不用做什么准备,先给那边打个电话就行了。我想,叶群是否要把我支走?】

据刘吉纯回忆,李文普对他提起"上飞机"的事,是因为林豆豆也向刘吉纯说过,要求他千万阻止林彪上飞机。

当时林彪这样高官的警卫体制,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林彪办公室的人员。不过林彪办公室里,大部分都是秘书、保健医生、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等工作人员,他们并不负责保卫林彪的安全。在林彪办公室中,只有李文普(林彪办公室警卫处长)和刘吉纯(林彪办公室警卫科长)两人是负责林彪安全的,所以只有他们两个人有枪,其他人都没有枪。李文普和刘吉纯是固定跟着林彪的,林彪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第二个部分是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人员。这些人不是固定跟着林彪的,林彪在北京,有警卫战士在他的住处附近站岗放哨;林彪到北戴河,并不是把在他北京的警卫战士带到北戴河,而是由八三四一部队另外派人到北戴河警卫。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人员都是带枪的。

林彪办公室中的两个警卫中,林彪和叶群信任李文普,不太信任刘吉纯,所以叶群试图派刘吉纯去大连,想把他"支走"。李文普基本上是帮林彪的,只是在最后一刻才临阵脱逃。如果李文普听从刘吉纯的意见,派几个带枪的八三四一部队战士事先上飞机里面警戒,那么林彪的飞机就很可能无法飞走了。

(266)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晚上,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次对我讲 "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对她的话,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仍然问她:"有什 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对此,林立衡也没往深处说。后来,她走了。对于林立衡的这次谈话,我还是有考虑的。除了上次讲的原因,我要证据,没证据我一个工作人员怎么能不让首长上飞机呢?】

对此刘吉纯也回忆说:【当晚 10 点半左右,林立衡对我和李文普说:主任、 老虎要挟持首长到广州去,在广州呆不住就去香港,她想要去八三四一部队的值 班室报告。

李文普说,他怕林彪、叶群会找他,他不去。

我见李文普不去,便和林立衡一起去八三四一部队值班室。那时部队干部战士早已休息,我把林立衡带到小树林里,然后找到姜作寿大队长,说:"林立衡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报告。"

我把姜作寿领到小树林后,说:"你们谈吧,我过去看看动静。"

我并嘱咐姜作寿,为了林立衡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在部队会安全些。

我回到 96 楼后,心情十分紧张,但因事关重大,又不敢对别人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对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看到陈伯达不参加会议,觉得他可能出了问题,至于别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对这天的事,林豆豆本人回忆(林豆豆的材料据说被人修改过)说:【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

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叶群当着林彪的面,为我和张清林举办婚礼。晚

8点,我去秘书办公室,宋德金秘书接到海军方面的电话,说一架飞机要在山海 关降落,问是不是"林办"的飞机。宋秘书不清楚,便去问李文普,李文普也不 知道。

晚9点,叶群叫我到她的住处看电影,这时我才知道是林立果回来了。我立即找林立果,问他要去哪儿?他说马上去广州。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去八三四一部队讲明情况,让他们作好准备以对付紧急情况,并通过八三四一部队与中央取得联系。因为单靠"林办"的工作人员,即使能把问题解决了,许多事情中央不知道还是不行。

(267)

这时已是晚上9点50分了,我和刘吉纯跑步到位于58号楼的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部。我在外面等着,刘吉纯进大队部,与张宏、姜副大队长谈了一会儿,便陪他们来见我。我问张宏:"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

我问张宏:"我是提着脑袋来找你们的,我讲的情况你相信不相信?要是不信,你就问问他(指刘吉纯)和李文普。"

张宏点头说:"我们相信,刘科长已经对我说了,你放心,不要着急。有些事情我也看出来了,我们为林副主席里里外外当守卫和内勤这么多年,也了解和听说了不少情况。"

我对张、姜二人说:"虽然到明早 6 点还有一段时间,但要防止林立果他们 提前行动"。

我请张宏立即采取措施,调动部队包围林立果、刘沛丰住的 57 号楼,同时将林彪、叶群及工作人员住的 96 号楼也包围起来,必要的话先把林立果、刘沛

丰扣起来再说。

张宏说:"这些都需要好好安排一下,需要研究具体的措施和步骤。现在的问题是要马上请示中央。" 张宏说要马上把这些情况向汪东兴报告。

我问:"向汪东兴报告行吗?"

张宏说:"那先向周总理报告。"

我说:"北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向总理报告,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是专门负责这里警卫的,要绝对保护首长安全,请立刻调动部队、采取主动措施。"

张宏说:"我还得向汪主任报告,他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汪主任会向上报告的,我一边报告一边马上采取具体措施就是了。"

我见张宏副团长态度这样明确,考虑问题这样周到,就放心地和刘吉纯离开 大队部返回林彪住地。进屋后,我坐到走廊原先的座位上,将去八三四一部队的 情况告诉了还在看电影的张清林。就在这时,叶群的内勤来找我,说叶群让我马 上去见她。

我去了叶群的房间,她通知我,明早6点出发去广州,叫我和张清林、张宁三人准备一下行装。】

(268)

在林豆豆再三催促下,八三四一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向北京打电话通报。对此 汪东兴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 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 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 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是要转移工作人 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晚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她心里很紧张,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和大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 "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 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张耀祠在回忆录中说:【9月12日下午4时,毛主席安全回到中南海。林立果得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哭着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把性命都交给我了,我怎么去见首长呢?"

叶群接到林立果的电话,林彪说:"慌什么,快执行第二方案。"林彪的第二方案,就是暗杀不成逃往广州。林立果要了一架三叉戟飞机飞到北戴河。林立果一到,三人便开始商量向外逃跑的方案。他们原计划如果暗杀不成功就逃往广州,另立中央,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这时候,林立衡听到了他们要逃跑的情况,便立即找到警卫秘书李文普,要他立即向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报告此情况,李文普说:"我离不开。"

林立衡只好在晚上9点50分左右,到八三四一部队找到大队长姜作寿,她

说:"林立果、叶群正商量要挟持林彪逃跑,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报告。"

姜作寿给张宏副团长打完电话后,在晚上 10 点 20 分钟给我打来电话,先 将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我立即用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又马 上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269)

据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下午5时左右,周总理起床,他是工作到上午11时才睡的。这天由于睡够了六个小时,总理显得特别精神。早已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主管总理的警卫工作)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向总理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停在丰台,到丰台后就把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叫上车。"

总理听后说: "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 总理问毛主席什么时候进北京, 杨 德中说还不清楚。

周总理和往常一样,吃完一杯豆浆冲鸡蛋后,带上他那厚厚的文件包,去人民大会堂,准备晚上开会。会议是晚8时开始,地点在福建厅,内容是讨论即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准时开始,当会议进行到 10 时 40 分左右,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主管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来电话,有紧急事情要向总理报告。周总理离开会场,接通了电话。

张耀祠向总理报告说,接张宏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林豆豆来八三四一队部报告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晚8时已调来了林彪的专机二五六号。"

周总理紧锁眉头,对张耀祠说:"请告张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动向,及时

报告。"

周总理并问张耀祠:"现在什么地方?"

张耀祠回答说: "在中南海游泳池。" 周总理实际上是在询问毛主席在哪里。

总理放下电话,进入会场,向开会的人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政治局的成员留下,其他人员请回。

周总理向空军司令吴法宪查问飞机去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吴法宪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总理叫他马上查。吴法宪就用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编造的假话向总理报告,说是一架改装的飞机,试飞中发生故障,降在山海关机场。总理听后,叫吴法宪下令这架飞机停在原地,不准起飞。

晚 11 时 20 分,叶群与总理通电话说:"首长(林彪)想动一动。"

总理仍沿用他多年的习惯说:"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凡关系到领导人的 重要活动,总理都用对方可理解的语言讲话,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

叶群答:"是天上动。"

总理问:"你那里有飞机吗?"

叶群说:"没有。"

周总理知道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飞机是当天晚上调去的,叶群却说没有飞机, 纯属假话。总理看透了她电话的目的,也想到了事情发展的严重性。总理指示海 军政委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那里的任何飞机起飞。】

据高振普回忆,周恩来这天的安排本来与林彪毫无关系,只是在接到林豆豆的揭发电话后,周恩来停止了正常的会议,专门处理这件事。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此事是非常重视,所以他才会停止会议。

周恩来对林豆豆的话当然是半信半疑,因为她没有说任何证据。林豆豆话中

唯一可以作为证据的事,就是有一架飞机已经调到山海关机场,所以周恩来就从 飞机查起。周恩来之所以打电话给李作鹏,是因为山海关机场是由海军管理和警 备的。

(270)

关于周恩来给吴法宪的电话,吴法宪回忆说:【大约是当晚的 11 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我回答说:"没有。"

周恩来再次追问我: "究竟有没有?"

我说:"绝对没有。"

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

我说: "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给空三十四师(负责领导的专机)师长时念堂,问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

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 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

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

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

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

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

吴法宪之所以不知道调飞机的事,是因为林彪已经不信任他了,怕吴法宪知道了会说出去,所以调飞机的事完全是瞒着吴法宪的。那么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什么要瞒着吴法宪给林立果调飞机呢?其实胡萍并不是林彪死党,不过在后来的审判中,胡萍因为向林彪提供飞机,以"资敌罪"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胡萍对此不服,后来他回忆说:【作为空军副参谋长,我的工作就是分管专机,我按正常情况派专机,怎么能是"资敌罪"?那时的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他们要叛逃。

吴法宪查问三叉戟,并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我并不清楚这中间的严重后果,还以为是吴法宪在捣鬼。庐山会议很紧张,但我不知道细节。林立果让周宇驰对我们说:吴法宪在庐山上表现不好,和吴法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我们警惕吴法宪,不要跟吴法宪走。空军以"反吴"和"保吴"划线,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在庐山上犯了错误,正在没完没了地写检讨。

我承认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错队。可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哪一个人愿意 被打倒?】

(271)

胡萍说的是可信的。那时胡萍这一级别的人,搞不清上边的斗争,他只知道 吴法宪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并没有听说林彪也犯了错误。既然吴法 宪犯了错误,按当时的做法,要想不牵连到自己,就要跟吴法宪"划清界限"。 林立果是代表林彪的,那么胡萍自然认为林立果是空军里"正确路线"的代表, 而吴法宪是空军里"错误路线"的代表。胡萍因此要紧跟林立果,与吴法宪"划清界限"。

这次林立果与吴法宪给了胡萍不同的指示:林立果让胡萍把专机调到北戴河, 供林彪第二天用;而吴法宪却让胡萍立即把专机飞回北京。胡萍心想:如果自己 按照吴法宪的指示,把专机立即调回北京,那么肯定就要彻底得罪林立果和林彪 了,那么以后自己怎么在空军里混呢?

胡萍无法想象林彪会叛逃,他宁可得罪吴法宪,甚至宁可得罪周恩来,也不敢得罪林彪。毕竟在胡萍眼中,林彪还是堂堂正正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胡萍当然不敢做得罪林彪的事。因此胡萍就骗吴法宪,说飞机出了故障,不能立即飞回来,这样就可以把飞机留在北戴河供林彪使用,这样也就不会得罪林彪了。因此,胡萍的做法只是为了讨好林彪,他对"五七一工程"是完全不知情的。

关于叶群和周恩来打电话,应该是"九一三"事件中很关键的一件事。可是对这件事的细节,当事人的说法又有所不同,各种回忆录也差异较大,有必要在此进行一些分析。首先看《汪东兴回忆录》中的说法,汪东兴说: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 周总理还说: "需要的话, 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些情况和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周总理后来对我说,他确实打算 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

(272)

张耀祠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与汪东兴不同,他说:【当晚 23 点 30 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她说:"林彪今天晚上想动一动。"

总理问:"是空中,还是地上?"

叶群说:"是空中。"

总理问:"有飞机吗?"

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报告总理后再调。"

总理讲道:"晚上飞行怕不安全吧?"

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张耀祠的说法,与高振普回忆相似。另外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在 9月13日上午向政治局委员介绍林彪出走的经过,当时还不知道林彪的飞机已 经坠毁。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 【1971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秘书到卧室来叫醒我说:"总理通知,在人大会堂四川厅开政治局会议,要你立即去。"

文革当中,无论什么时候开政治局会议都是常事,我也没多想什么,马上就起来了。我因刚吃了安眠药,脑袋晕晕忽忽的,到了人大会堂四川厅,江青、姚文元等人已经先到了。我到了不久,张春桥也到了。李作鹏也在警卫员的掺扶下进入会场,他也服了安眠药,站不稳。纪登奎,李德生也是后到的。在这个时候,政治局究竟开会干什么?谁也不知道。

我们大概等了近三小时,于 13 日早 6 时,周总理进入大厅,叶剑英、黄永胜、李先念、吴法宪等人也跟在总理后面进来了。周总理刚进来时,我观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别,看起来不光是疲劳的问题。但我万万没想到,竟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总理坐下之后,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全场,就特意对着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凌晨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

江青当时不可能理解总理的话,因此她没有回答总理的问话。总理看江青对 他的话毫无反应,又补充了一句:"林彪坐飞机走掉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

当时全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真的肃静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的地步。 大家的面部表情都凝固了,有的张着嘴巴,有的竖起耳朵,但每个人的双眼都盯着总理。我自己也和大家一样,思想上震动极大。我的脑子都麻木了。

周总理说:"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在事件发生之前,不仅没有人想到,也是 根本没有人敢想。"

周总理接着说: "12 日晚上 11 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 101 想动一下, 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 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

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

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明天白天走。"

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

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

(273)

总理接着说:"晚 11 时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总理说:"接到林豆豆的第三次电话,是11点多钟了。"

总理说:"这个人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准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周总理继续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总理最后说:"13日零时左右,还得到住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林彪的老警卫员李文普,在北戴河到山海关的途中被打伤了。又据说林豆豆的报告,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药,在北戴河上汽车都是两个人扶着上去的。这些情况都还有待查清楚。"

总理最后说:"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飞机是强行起飞的。"

总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较远。因此,总理既没有说他和吴

法宪、李作鹏想办法阻止飞机起飞的情况,也没有说主席讲"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话。总理有政治态度的话,都是在9月14日确认林彪摔死之后说的。】

关于9月12日晚周恩来与叶群之间的电话,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汪东兴为主的版本,李德生在他的《回忆录》持与汪东兴同样的说法;另一个是张耀祠为主的版本,邱会作和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持与张耀祠同样说法。这两个版本主要有以下五点不同:

(一)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还是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

汪东兴版本: 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汪东兴说:【晚上 11 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张耀祠版本: 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张耀祠说:【当晚 23 点 30 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

(二)叶群是否告诉周恩来他们已经有飞机了?

汪东兴版本: 叶群告诉周恩来他们已经有飞机。汪东兴提到【叶群说:"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如果明天天气好,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上天转一转。"】

张耀祠版本:叶群告诉周恩来他们还没有调飞机。张耀祠提到:【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调飞机,报告总理后再调。"】

(三)叶群是否坚持晚上起飞?

汪东兴版本: 叶群说晚上不飞了,第二天再飞。汪东兴提到【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天气好了,再飞。"】

张耀祠版本:叶群坚持晚上飞。张耀祠提到:【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274)

而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进一步提到:【9月12日晚上11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101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特向总理报告。"

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

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

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

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

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

(四)周恩来是否准备亲自去北戴河?

汪东兴版本: 周恩来说他准备亲自去北戴河。汪东兴提到:【周总理还说: "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张耀祠版本:没有提到周恩来说过准备亲自去北戴河。邱会作和高振普的回忆也没有提到此事。

(五)得知周恩来与叶群电话谈话内容的来源。

汪东兴版本: 周恩来事后告诉他的。汪东兴提到:【这些情况和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

张耀祠版本:张耀祠没有提别他的来源,而邱会作则说,他们的消息是来自周恩来9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亲口讲话。

汪东兴和张耀祠的说法不一样,因此有人据此说:"汪东兴和张耀祠两人中 必有一人说谎。"但如果认真分析下去就会发现,其实汪东兴和张耀祠都没有说 谎,他们的说法不同,是因为周恩来本人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周恩来对汪东兴的说法,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古今中外的官场惯例:古今中外的官员,对于同样一件事,他向上级汇报的说法,与他向下级讲话的说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向上级汇报的时候,一定要说实情,这样才能得到上级的信任;对下级讲话的时候,就不一定说实情了,因为很多实情是不能让下级知道的。典型的例子有《大参考》和《参考消息》,《大参考》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才能看的,而《参考消息》是一般群众都能看的。同样一件事,在《大参考》和《参考消息》上的报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汪东兴的说法,是来自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版本,因为很多事情都是通过 汪东兴向毛泽东转述的。而张耀祠的说法,是来自周恩来向下级讲话的版本。这 两个版本出现不一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林彪事件的特殊性:周恩来与叶群两人打电话,别人不知道他们两人具体谈了什么,所以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只能出自周恩来之口或者叶群之口。因为叶群已死,周恩来与叶群之间的电话内容,只有周恩来一人知道了。

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中是陷得比较深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周恩来"帮助"了林彪出走。如果周恩来真的要"卡"林彪的话,林彪是肯定走不了的。周恩来对林彪的最大"帮助",就是没有向毛泽东及时汇报,同时也没有采取断然措施。

(275)

不管是上面提到的汪东兴版本,还是张耀祠版本,他们都没有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当叶群跟周恩来提出"林彪想动一动"的时候,如果周恩来接口说: "好,我去请示一下毛主席。"周恩来马上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知道了 这件事,那么林彪肯定是走不了的。事实上,毛泽东是在林彪的飞机起飞 30 分钟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周恩来得知林豆豆的揭发,大约是当晚 10 时半;与叶群通电话,大约是当晚 11 时半;林彪飞机起飞,大约是次日凌晨 0 时半;毛泽东得知林彪的消息,大约是次日凌晨 1 时。如此重要的情况,周恩来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才向毛泽东汇报,这就给林彪出走争取到最宝贵的时间。

有人说周恩来为阻止林彪出走,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下令林彪专机返回北京,下令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下命令才能起飞等等,但周恩来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就不能报告毛泽东呢?此时毛泽东就在人民大会堂不远处的中南海,周恩来要见毛泽东,十几分钟就可以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可是周恩来偏偏要独自处理林彪的事情。

再者,林彪在党内的级别高于周恩来,按道理,周恩来没有资格处理林彪的事。比如周恩来下令,只有周、黄、吴、李四个人下命令,林彪的专机才能起飞。因为林彪是周、黄、吴、李四人的上级,林彪的飞机是否起飞,难道还要遵从这四个下级的命令吗?因此,周恩来应该向比林彪级别更高的毛泽东汇报,由毛泽东亲自来决定林彪的专机是否可以起飞,而不是不告诉毛泽东,由周、黄、吴、李四人自己决定林彪的专机是否可以起飞。周恩来这种处理林彪事件的方式,从党纪上来说,也是不合适和不应该的。可以说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有点像现代版的关羽华容道。

正因为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上陷得比较深,所以他需要向毛泽东"解释"一下这件事,因此就有了汪东兴的版本。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周恩来和叶群的电话问题。

(一)究竟是谁给谁主动打电话呢?据林彪办公室的记录:"11 时 22 分,叶

群给周总理来电话。"也就是说,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是正确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对汪东兴说,是他主动给叶群打电话呢?

这是因为,如果是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就应该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相反如果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当然就不需要向毛泽东汇报了。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是他主动给叶群打电话的,这样这件事他就没有必要向毛泽东汇报了。

(276)

(二)叶群是否告诉周恩来他们已经有飞机了?这件事张耀祠的版本是正确的,因为它得到其他的旁证。比如吴法宪回忆说:【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叶群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

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

据吴法宪的回忆,周恩来当时在电话里告诉他: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要吴法宪调飞机。"后来叶群果然打电话给吴法宪,谈到调飞机的事。据

此可知,叶群没有告诉周恩来他们已有飞机,是正确的。当然,叶群不算是说谎,因为林彪的确没有"调"飞机过来。林立果飞来的那架专机,并不是通过林彪办公室"调"过来的,而是林立果以搭乘试飞飞机的名义,飞到北戴河的。至于叶群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吴法宪调飞机,我们在后面分析。

这里的问题是:周恩来为什么对汪东兴说,叶群说他们已有飞机了,并说林 彪明天准备乘坐这架飞机呢?这是因为,周恩来在发现林立果飞到北戴河的飞机 后,没有采用措施把这架飞机控制起来。如果叶群说林彪不知道北戴河的飞机, 周恩来就完全有理由派士兵强行把这架林彪不知道的飞机控制起来;相反,如果 林彪知道这架飞机,并声称明天要使用这架飞机,周恩来就不便控制林彪准备使 用的飞机了。

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因为叶群声称林彪明天要使用这架 飞机,所以周恩来不便违背林彪的意愿来控制这架飞机。

(三)叶群是否坚持晚上起飞?这件事张耀祠的版本是正确的,因为它也得到其他的旁证。比如李作鹏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晚上刘秘书进来说:"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

我听后说:"立即转过来。"我拿过来电话,等待总理讲话时,看了一眼手表: 23 时整。

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我:"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277)

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 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23 时 05 分, 我

就同山海关机场接通了电话。

我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

我问:"飞机走了没有?"

回答:"没有走。"

我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总理电话。接通后,我把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空军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10分左右。

听完我的报告,总理仍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 当我听到"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老伴帮助我记录。

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四点指示: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 安全,不宜飞夜航。

第二、他要飞夜航, 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 待他到达机场后, 请他给我来个 电话。

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 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23点35分,我要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电话,随即将总理指示向调度室值班员做了传达。我对总理的第三条指示,又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的指示均可放飞。"

这是我当时对总理电话指示精神的理解:除周、黄、吴、李的指示外,其他 人的指示不可放飞。

23 点 45 分左右,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此时大约是 23 点 55 分左右。】

由李作鹏的回忆可知,周恩来在电话里对他说:"北戴河那位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可见叶群是坚持要晚上起飞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对汪东兴说,叶群答应今晚不飞,第二天飞呢?

这是因为,如果叶群答应今晚不飞,第二天飞,周恩来轻信了叶群的话,没有想到林彪的座机突然在晚上起飞,这样周恩来就是"被欺骗"的角色,对这件事没有责任。相反,如果叶群已经明言告诉周恩来,今晚林彪要飞,而周恩来却没有采用相应的措施阻止,那么周恩来就有责任了。

因此,周恩来想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因为叶群声称林彪今晚不飞了,周恩来轻信了叶群的话,所以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周恩来是否准备亲自去北戴河?

张耀祠版本没有提到周恩来准备亲自去北戴河之事,只要汪东兴版本提到。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告诉汪东兴他准备亲自去北戴河呢?这是因为,周恩来在毛泽 东与林彪问题上,一直持中立态度,没有主动帮毛泽东解决林彪问题。而周恩来 亲自去北戴河,就意味着他准备积极帮助毛泽东解决林彪问题。因此,周恩来想 通过汪东兴转告毛泽东,周恩来曾经试图积极帮助毛泽东解决林彪问题。

(278)

前面讲了叶群和周恩来打电话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搞清, 那就是为什么叶群要给周恩来打电话?或者说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的动机何在? 我们先看看在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之前,北戴河发生了什么事情。

据林豆豆本人回忆,9月12日晚9时左右,林立果乘飞机到北戴河。林立果一到,林豆豆就问他情况。林豆豆说:"我立即找林立果,问他要去哪儿?他说马上去广州。"

林豆豆得知这个情况之后,马上找警卫处长李文普和警卫科长刘吉纯,要求他们带她去八三四一部队报告。林豆豆大约在晚9时50分左右,从林彪住的96楼悄悄溜出去,和刘吉纯一起去找八三四一部队的领导谈话,然后又悄悄溜回96楼。

林豆豆回来后,叶群叫她过去。林豆豆说:"就在这时,叶群的内勤来找我,说叶群让我马上去见她。我去了叶群的房间,她通知我,明早6点出发去广州,叫我和张清林、张宁三人准备一下行装。"

此时大约是 12 日晚 10 时半左右。林豆豆从叶群那里出来之后,又去找李文普和刘吉纯,在院子里的某个角落密谈。林豆豆的不正常行动,引起了叶群的警觉。据林豆豆未婚夫张清林回忆说:【叶群连找林立衡两次,问她哪里去了?第二次找林立衡时,叶群直接问:"是否去向八三四一部队报告去了?"叶群显得很紧张。】

据林彪的警卫员吕学文回忆说:【叶群对林立衡始终不放心,认为她是一块"心病"。叶群几次到电影场察看,当她看到席位上只有张清林,没有林立衡时,立即过去查询,并派工作人员四处寻找。大约 12 日晚 11 时左右,林立果走出96 号楼,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林立果转了个小圈以后,匆匆赶回了96 号楼,他可能发现了警卫部队的异常行动。】

由此可见,直到12日晚10时半,林彪的计划还是第二天一早去广州,叶

群亲口告诉林豆豆明早去广州,并要她准备好行装。

这里再分析一下林彪怎样飞广州。按照正常的规矩,林彪的专机起飞之后,就要通知广州方面,在哪个机场降落,然后广州方面派出警卫部队,去机场迎接林彪。等林彪一下飞机,警卫部队就把林彪保护起来。因为广州方面派出的警卫部队,并不是林彪的亲兵,林彪被这些警卫部队"保卫",他仍然没有自由,不可能指挥和领导政变。

因此林彪第一步,就是要摆脱广州方面的警卫部队。从现在已知的情况来分析,林彪的行动大致是:周宇驰等人率领"联合舰队"的先头部队,先从北京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降落。然后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通知广州方面准备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这样广州方面的警卫部队就会事先到白云机场等待。等到林彪的飞机飞到广州上空后,谎称飞机故障,忽然在广州沙堤机场降落。这样就可以"甩掉"广州的警卫部队,由周宇驰率领的"联合舰队"把林彪保护起来,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开始实施政变。

林彪也可能采用另一种方式,就是飞机先飞向大连,到了大连之后,以飞机 故障为由,从大连上空直接飞出国境到公海,然后沿着公海飞到广州,突然在广 州沙堤机场降落,形成突然袭击的效果。

(279)

林彪飞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有各种人证物证。人证有当事人林立衡、江腾蛟、李伟信提供直接的证词,非当事人李文普、刘吉纯、吕学文、以及周宇驰的妻子王圣兰提供的间接证词。更有物证,也就是林立果手下的陈伦和等人按照命令真的到了广州。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广州另立中央"是没有疑问的定案。

可是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执意要否认"广州另立中央"之事。因为一旦承

认有"广州另立中央"一事,就无法再声称林彪不知情了,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瞒着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的。

"广州另立中央"能不能成功另当别论,但至少这个计划的前期是相当成功的,没有任何人怀疑和察觉到林彪的计划,要不是林豆豆的告密,林彪突然飞抵广州至少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林彪再千谋百虑,也想不到自己的女儿会在关键时刻背叛自己。林彪是爱林豆豆的,所以他在9月7日特别把林豆豆和她的未婚夫招来,准备带他们一起走。如果林彪不喜欢林豆豆,把林豆豆留在北京,不带她走,不把她叫到北戴河来,那么林彪的计划就可以顺利实施了,至少不至于摔死在异国他乡。

直到9月12日晚10时半,林彪的计划似乎一切顺利,可是这时情况发生了突变,叶群发现林豆豆不见了,估计林豆豆很可能是去告密了。本来林彪去广州的计划,是建立在突然袭击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可能成功。如果对方已经知道林彪第二天早上去广州搞政变,就会在广州做好准备,那时林彪再去广州,就等于是自投罗网。林豆豆告密之后,去广州肯定是不行了,于是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紧急商定,改用第三计划,先飞外蒙古,然后去苏联。

据吕学文回忆: "大约晚 11 时左右,林立果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林立果转了个小圈以后,匆匆赶回了 96 号楼。"据此可以推测,林立果找不到林立衡返回 96 号楼,是晚 11 时左右的事情。因此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紧急决定改用第三计划,应该是在 9 月 12 日晚 11 时左右定下来的。

12 日晚 11 时 22 分,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按照过去的常规,林彪出行是不必通过周恩来批准的。林彪外出的时候,只是让林彪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通知周恩来办公室的秘书,告诉周恩来办公室林彪去哪里,住在哪里,以便中央有

什么事可以及时通知林彪。这些事完全是秘书做的事,根本不需要叶群亲自打电话通告周恩来。而且叶群也知道,周恩来是大忙人,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叶群是不会亲自打电话给周恩来的。显然,这次叶群亲自给周恩来打电话,是有重要的事情。

(280)

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确认林豆豆的告密,目前已经上报到哪个层次。如果已经上报到毛泽东的层次,那么一切都晚了,要想走也很困难了;如果只是上报到周恩来的层次,那么一切还有希望。因为此时林彪一家的命运,就掌握在周恩来手中。如果周恩来手松一下,他们就可以走;如果周恩来手紧一下,他们就走不了。因此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向周恩来求援,请周恩来高抬贵手,放他们走。

虽说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那天叶群对周恩来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叶群和周恩来之间的对话,并不是现在透露出来的那一点内容,叶群还应该对周恩来说了一些"交底"的事,请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帮他们一把。当然,叶群肯定不会用明语说,而是用周恩来能够理解的暗语,双方心领神会。

叶群也不会告诉周恩来,他们要去广州另立中央,因为周恩来绝对反对分裂 党的这种事情。所以叶群应该是向周恩来暗示,他们要去苏联当"寓公"避祸。 叶群之所以要向周恩来"交底",是因为他们不"交底"的话,周恩来也不知道 该怎么帮他们。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9月3日,汪东兴已经把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专门送周恩来处。因此周恩来是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也知道毛泽东下决心要拿掉林彪了。接到叶群的电话,周恩来的心情肯定是百感交集。早在林彪就学黄

埔军校的时候,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周恩来结识林彪,甚至比毛泽东结识林彪还早。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挨过不少人的"整",但林彪是从没有"整"过周恩来的少数人之一,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也可以说是"亲密战友"。

此时此刻,周恩来打定主意,他要救林彪。怎么救林彪呢?周恩来要做的事情,首先是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周恩来知道,关于林彪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之事,目前只有林豆豆一个人的说法,大家对林豆豆的话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只要林彪的飞机不起飞,那就可以证明,林豆豆说林彪第二天"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之事,完全是胡说八道,周恩来就可以用林豆豆乱说为借口,把这件事压下去。这样一来,南下广州之事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林彪可以继续留下来,用和平的方式与毛泽东抗争。

这是周恩来最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他向李作鹏指示,命令山海关机场尽可能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这不仅是挽救林彪,同时也可以和平地解决这件事。不过此时周恩来很清楚,这件事是绝对不能让毛泽东知道的,所以周恩来一直瞒着毛泽东,自己处理这件事。

周恩来希望阻止林彪硬干的念头,希望林彪留下来,希望挽救林彪。周恩来 知道,一旦林彪的飞机起飞,他就无法在中国境内体面地降落了,这件事情的性 质就变了。

当然,周恩来也知道,林彪是性格非常强硬的人,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就很难 改变。所以周恩来试图用语言和行动劝阻林彪的同时,也还是给林彪留了后路。 如果林彪一意孤行,周恩来还是准备放他走。因此周恩来没有下令山海关机场采 取强硬措施,如果林彪的飞机硬要飞,也还是可以飞的。

(281)

据李作鹏回忆说:【大约是0时20分左右,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报告我说:"李政委,机场站长要同你通话。"

我答:"好,请讲。"

对方说:"我是机场站长潘浩,李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

我再次向他传达总理的电话指示。通话中,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

我拿着电话思索片刻:潘浩的请示出人意外。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起飞 夜航,总理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我不敢决定。 我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

当时,在总理没有明确指示的特殊情况下,我只能这样答复机场。因为总理 在亲自处理林彪专机的问题,只有总理有决定权。

放下潘站长的电话,我本想立刻给总理打电话,报告潘浩请示的情况。但转念又一想:潘浩怎么能够预先设想到飞机会强行起飞?从来没有过不经机场塔台指挥,就有飞机强行起飞的事情出现过,所以必须把机场的情况先搞清楚,再给总理打电话。不然总理问我"强行起飞"的根据是什么?我如何回答呢?

大约 0 时 30 分左右,我正准备给机场打电话,机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当时接到的电话报告词只有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

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

总理十分镇静的"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

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对方回答:"西北。"

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0时55分。】

其实周恩来并不意外林彪飞机的强行起飞,而且在林彪飞机强行起飞之际,

周恩来就知道,这架飞机将飞向苏联,因为叶群在电话中已经向周恩来暗示过了。

1981年,李作鹏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 17年。李作鹏的《判决书》说:【在林彪、叶群叛逃前,李作鹏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李作鹏对此不服,后来他在《李作鹏回忆录》中,为自己申辩说:【我的《判决书》中所谓"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修改电话报告记录"的用意, 无非是让不明真相的人们相信:其一,周恩来曾"下命令"阻止林彪专机起飞; 其二,林彪是我李作鹏有意放跑的。

周恩来是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问题的总指挥。在预审时,以及在特别法庭上,为了维护周总理的威信,我没有一句涉及到总理的指挥措施,我咬紧牙关保持了沉默。现在,我想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

第一、周总理有没有处置紧急情况的经验和能力?我的回答是:周总理可以 算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内,处理紧急情况的第一高人。

第二、周总理事先是否知道内情?众所周知,林立衡在飞机起飞前几个小时 就向中央做了报告,总理是完全知道内情的。

(282)

第三、所谓"四条电话指示",是阻止飞机起飞的最佳措施吗?这个指示是很模糊、很难执行,甚至是根本无法执行的。这完全不是总理处理紧急重要问题的作风和风格,是一种推诿和搪塞的托词。

第四、林彪在驶离北戴河驻地前,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这不仅足以证明林 彪要离开北戴河的决心,而且完全说明事态的严重性,并不像叶群所说的,林彪 要到大连"转一转"那么简单。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得到报告:"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周总理不但不向汪东兴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拦截住林彪的专车,而且仍没有立即采取拦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关闭机场。如果当时周总理下死命令关闭机场,不准专机起飞,我会拼着老命,指挥机场场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拦截飞机,因为时间还来的及。但周恩来却语气平和地做了"待他(林彪)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拦截的机会。

总理为什么要那样做?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处理这件事。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四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

第五、事后我一直在反复思索,周总理用电话遥控我来传达他的指示,但又不把当时他所掌握的全面情况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周恩来是真想在山海关机场拦截林彪的专机吗?是对我的不信任吗?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

第六、"九一三"凌晨,总理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问题,内情深处太复杂了。 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里,都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对国家、对党中 央都是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权威是极大的损害。林彪跑不了,比跑了 好的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 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综上所述,我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二五六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

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当然,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

(283)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指出周恩来在处理"九一三"事件时的问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周恩来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外逃",这个结论也是合理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一种阴谋论,认为是周恩来故意放走了林彪,这样既除掉了林彪,又打击了毛泽东的威信,可谓一箭双雕。周恩来成为"九一三"事件的最大得益者。

周恩来真是这样吗?如果从单单从"九一三"事件孤立地来看,周恩来的确有较大的嫌疑。可是如果从"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整个历史来看,就可以看出,周恩来不是这样的人。下面是这个原因的分析。

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他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地位才能稳固。第一方面是军队和高官的支持,第二方面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能够同时得到这两方面的条件,领导人的地位很稳固;如果同时得不到两方面,只得到一个方面,领导人地位也能维持;如果两个方面都得不到,那么领导人的地位就不稳定了,随时有倒台的可能。

毛泽东在文革前,既有军队和高官的支持,在人民群众中又有很高的威信, 他的地位是稳固的;在文革中,毛泽东得罪了大批高官,其中也有大量军队高官, 因此毛泽东失去了军队和高官的支持。但毛泽东却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了极高的威 信,威信就成为毛泽东掌权的主要武器。

正如李作鹏说的那样: "不管林彪跑到哪里,对毛主席的权威都是极大的损害。" 钦定接班人林彪的 "不辞而别",极大地损害了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迷信和信仰毛泽东了,甚至一些人对毛泽东开始产生怀疑。在林彪事件之前,谁要是敢说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马上就会有人汇报上去;而在林彪事件之后,就不再有人向上汇报这种事了,对毛泽东不敬的话也悄悄开始在民间蔓延。到 1976 年 4 月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有人公开贴出反毛的诗词:【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在文革之后,毛泽东失去了高官们的支持;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又大打折扣,这样一来,毛泽东的领导人地位就不稳了。相反,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后,既有高官们的支持,在人民群众中也有相当的威信,所以周恩来是有相当大的机会将毛泽东"取而代之"的。据说当时已有一些高官给周恩来煽风,希望他带头向毛泽东发难,把毛泽东的大权夺过来,让毛泽东真正退居二线。

但周恩来却拒绝这么做,他一直在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未想过将毛泽东"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具有那么多有利条件的情况下,都没有对毛泽东发难,又何必在林彪事件上,搞什么伤害毛泽东的阴谋呢?

(284)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一方面劝说林彪放弃硬来的念头,不希望林彪出走;另一方面,如果林彪一意孤行,执意要出走,周恩来又给林彪放一条生路,这就造成李作鹏抱怨周恩来"未采取果断措施"的原因。周恩来之

所以放走林彪,主要应该是由于他们两人之间"亲密战友"的关系吧。

毛泽东与林彪是"亲密战友",毛泽东自己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毛泽东说这句话,就是给自己的"亲密战友"林彪放一条生路。毛泽东可以给自己的"亲密战友"放生路,周恩来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亲密战友"放生路呢?因为周恩来与林彪也是"亲密战友"。

我们把话题转回来看 9 月 12 日发生的事。这里先说一点题外话,关于"九一三"之前林彪一家在北戴河的情况,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写过回忆录《我写我自己》。但张宁的回忆录属于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基本上没有作为历史资料的参考价值。

9月12日晚上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之后,林彪一家很快就动身了。关于林彪一家是怎么走的,有多位当事人提到这件事,这里先看周恩来的说法。邱会作回忆录中提到了9月13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周总理说:"晚上11点半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总理说:"接到豆豆的第三次电话,也是十一点半多了。这个人(林彪)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能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周总理继续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

周恩来叙述的林彪出走过程是这样的:

- (一)9 月 12 日晚 11 点半多,叶群宣布"今晚首长去大连",并声称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
 - (二)叶群宣布完,很快就与林彪一行人上汽车走了。
 - (三)此时林豆豆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说:叶群、林立果把林彪搞走了。
- (四)周恩来说林彪这个人脾气很怪,很难说服他不走。这也是委婉地说:林 彪非要走不可。
- (五)周恩来出于为林彪"安全"的考虑,派人警卫部队把林彪等人追回来, 不让林彪的飞机在晚上起飞。
 - (六)山海关机场并没有放行飞机,而林彪一行是强行起飞走的。

(285)

周恩来的说法,得到了其他人的印证。林彪卫士李文普回忆说:【大约晚 11 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

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

前面提到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调飞机的事。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调飞机,其实并不是真的为了调飞机,叶群是借着调飞机的事,向吴法宪打个"招呼",希望吴法宪在关键时刻能够对他们"网开一面"。因为吴法宪毕竟是空军司令,吴法宪要是手松一点,林彪他们就会少掉很多麻烦。

但吴法宪事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对叶群态度冷淡,并抬出周恩来说事。这

时叶群看出吴法宪靠不住了,也就不提"打招呼"的事了。事后证明叶群没有向吴法宪"打招呼"还是对的,后来吴法宪主动提出派战斗机打林彪的座机,这真可谓辜负了林彪对吴法宪一生的栽培。

叶群对李文普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其实也不是想骗他,只是想让李文普把这个消息散布到林彪办公室,让大家以为林彪要等吴法宪的飞机来了之后才走。这样大家就会放松警惕,坐等吴法宪的飞机来到。这时林彪他们突然出走,就会让其他人措手不及。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 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吧?"

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再说,胡萍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

这里叶群对李文普"交底"了:"有人要抓林彪,再不走就走不了",因为林 彪准备带李文普一起走,不"交底"是不行的。不过叶群没有把具体去哪里告诉 李文普,现在告诉李文普还为时过早。此时李文普也感到情况异常,就向在北京 的主管专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询问。这时周恩来已经派吴法宪找胡萍查 飞机了,胡萍怕与林彪方面的人再接触会进一步给他"惹祸",就拒绝与林彪办 公室的人联系,说"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

(286)

同时,林立果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通知他们取消"南下"计划,改为"北上"。据周宇驰妻子王圣兰回忆说:【周宇驰在家接电话,都是关着门的,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那天天热,窗户开着,加上线路不好,他声音很大,因此从窗户那里飘来一些声音。所以我听见周宇驰大声问:"上哪儿?上哪儿?哦,北上?北上啊!"】

结合李文普和王圣兰的回忆,可知林立果当晚给周宇驰打电话是用暗语讲的,第一句是"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第二句是"北上"。周宇驰得到消息后,马上找于新野等人劫持飞机飞往蒙古,这与林彪飞机的飞往地点是一致的。林立果在电话中,只对周宇驰说了一句"北上",周宇驰就马上明白飞往蒙古,这也说明"北上"的计划是早就策划好的,不是9月12日才临时决定的。

李文普继续回忆说:【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 58 楼八三四一部队张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

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

这时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

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

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按照常规,林彪出行时,不能林彪的专车单独出去,要有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车辆开道和押尾。因此,林彪正常的出行是要事先通知八三四一部队的。这时李文普按规矩通知八三四一部队林彪准备走,而林立果却压断了电话,不让李文普与八三四一部队联系。关于此事,林彪办公室警卫科长刘吉纯也回忆说:

【晚11点多钟,听到叶群在走廊上大喊:"快走!快走!"

我以为是去大连,就跑到秘书办公室,让宋秘书给大连打电话。宋秘书刚拨通,把话机交给我,恰好林立果进来,问我:"给哪里打电话?"

我说:"大连。"林立果立即按断电话机。

这时,八三四一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给李文普,询问情况。林立果又把电话按断,并大声喊:"谁都不要打电话,也不准接电话!"

接着,林立果拉李文普出去,李文普立即叫司机杨振刚备车。我跑到大队部,让姜作寿赶快派人去机场,先把飞机看住,别让起飞。等去机场人员上车后,我回到96楼,刚到楼前,看到林彪的车已经开了出来。由于没有看见叶群的车,我到秘书办公室,让李秘书看叶群的车走了没有。他看过后,说还没有走。

就在这时,林彪的内勤张恒昌跑来说:"他们都坐一辆车跑了。"

我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伏尔加轿车,就跟宋秘书、李秘书和小张一同上去。 考虑到四个人中就我一个人有枪,又拉一个有自动步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 (287)

林彪办公室秘书宋德金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9月12日晚上,电影厅里放映香港电影,我照例是不看的,仍在办公室。刘吉纯告诉我,豆豆说林立果又逼她表态,他已陪豆豆到58号楼向张副团长、姜大队长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并

且做了布置。

不大一会儿,林彪的警卫李文普匆匆回到办公室,一边忙着办别的事情,一边让我立即给大连打电话,通知做好准备。电话刚接通,站在我旁边的刘吉纯拿起话机刚要讲话,林立果进来,问是哪里电话,并立即将电话按断。林立果说:"哪里也不要通知。"随后就匆匆出去了。

平时林彪办公室的行动,由李文普统一调动,林彪的车在前,叶群的车紧跟,秘书及其他人员殿后。这次则一片混乱,听说要行动,我们按惯例注视着叶群的车,不见启动,以为她仍在房间。忽然,林彪的内勤小张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说:"主任、老虎他们都坐首长的车跑了。"

这时我们才真正感到问题的严重。于是急忙叫上一名警卫部队的司机,驾驶 伏尔加轿车飞速紧追,车中有我同刘科长、李秘书和小张。我忽然想到,四人之 中仅有刘科长是警卫人员,配带一只手枪,其余都是赤手空拳,遂在 58 楼前, 拉上一名持长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

根据上述人员的回忆,上林彪专车的人共有六个: 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以及司机杨振刚。这六个人都是林彪认为最为信任的,准备带走的。 很显然,李文普和杨振刚应该是事先做了"思想工作"的,但李文普跳车"临阵脱逃",而司机杨振刚则忠于林彪,不仅把林彪送到机场,还和林彪一起上了飞机。关于李文普和杨振刚的事,我们后面专门分析,这里先看事情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李文普、刘吉纯、宋德金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 林彪或者叶群叫林豆豆一起走,可见此时他们已经不要林豆豆了。对这件事,林 豆豆本人的回忆是:

【就在这时,张清林在 56 号楼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打给我的电话:"他

们(指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正在床上拽首长,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你们快,快呀!"

一进值班室,张清林便气呼呼地对张宏说:"情况万分火急!最多不超过十分钟上面的汽车就要开跑了!部队为什么还没行动?为什么还不进行阻拦?"

(288)

这时已是 11 点 30 分,我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

张宏默不做声,不慌不忙地当着我的面往北京挂电话,在电话里向对方说: "他们刚才说再过十分钟汽车就要开走了。"

接着,只见张宏频频点头,连声说:"是,是,是……"

放下电话后,张宏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我气愤之极,往大队部值班室的床上一坐,问张宏:"为什么叫我们跟着上 飞机?"

张宏说:"这是中央指示。"

我质问道:"中央是谁下的指示?我坐在这儿就是不走了,要上,你们自己上!" 张清林挥动着拳头说:"在这么大的事儿面前,你们再也不能犹豫了。汽车 马上就开动了,如果被你们放跑了,党和人民绝不会宽恕你们!"

张宏火了,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的!"

我不禁哭着喊:"中央?首长难道不是中央负责人吗?首长的安全你们难道不管吗?你开始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求求你们快拦住吧!副团长!·····"

值班室里的人越来越多,肖奇明中队长等警卫干部卷着袖子,提着枪,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还不下命令,冲上去就来不及了!……下命令吧,副团长!"

但张宏始终没有下命令让他们冲上去。我反复问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跟着 上飞机的?"

张宏说:"中央。"

我问:"你刚才和哪位领导通的电话?"

张宏又不回答。

我进一步问:"你刚才是不是和张耀祠团长通的电话?"

张宏非常勉强地点了点头。】

林豆豆的回忆,是造成"九一三"事件扑簌迷离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仔细分析林豆豆就会发现,她的话硬伤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太多,而且得不到其他人的印证,因此林豆豆的回忆可信性不高。关于林豆豆的回忆,已有人专门做过研究,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讲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央"命令她跟着一起上林彪的飞机之事。

先看一下林豆豆回忆中提到的几个当事人的说法。林豆豆回忆提到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急得嗷嗷叫,跳着喊",那么肖奇明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289)

肖奇明回忆说:【林立衡对我说:"肖队长,你们快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如果在楼里不动手,到了机场就打不过他们了。林立果对我说了,他们从上海带来60多人,武器比你们好,都是微型冲锋枪。"

在这紧张时刻,作为警卫部队,没有上级的命令随便抓人,万一弄错了,后果不堪设想。再说,96楼有林彪的一套完备的指挥系统,如果他们借口说我们暗害他们,问题将更加严重。因此,我请林立衡跟我一起去值班室找领导。

这时,张副团长正在值班室,林立衡又把情况向张副团长说了一番,其中她

还是强调马上派人去把叶群、林立果抓起来。张副团长没有表态,他立即打电话向张耀祠同志请示。耀祠同志在电话里答复是:"现情况不明,不能扣他们。他们走,你们随后跟着,并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

接着林立衡也和张耀祠在电话里讲了话,耀祠同志与林立衡讲完话后,又在电话里向张宏指示,要求我们把林立衡保护起来,保证她的人身安全,不能出事。】

肖奇明本人的回忆与林豆豆的说法大相径庭,林豆豆要求张宏等人阻拦林彪的汽车,肖奇明不仅没有支持林豆豆的要求"急得嗷嗷叫,跳着喊",而是拒绝了林豆豆的要求。肖奇明说:"作为警卫部队,没有上级的命令随便抓人,万一弄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显然肖奇明的说法是合理的,肖奇明作为中央警卫团的中队长,他当然知道 应该遵从上级的命令。林豆豆的话又不是上级指示,他怎么可能"急得嗷嗷叫" 地附和林豆豆的要求呢?

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后,张耀祠指示说:"现情况不明,不能扣他们。他们走,你们随后跟着,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肖奇明转述的张耀祠的指示是合理的,因为没有上级指示,张耀祠这个级别的官员,怎么可能下令阻挡林彪的坐车呢?更不可能扣押叶群和林立果。

张耀祠本人则回忆说:

【晚 23 点 40 分,张宏再次向我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

我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张宏说:"准备好了。"

我说:"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去的方向。"

这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向张宏交待注意去的方向。】

张耀祠的回忆与肖奇明相差不多,而与林豆豆的回忆大相径庭。张耀祠明确 说"此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而林豆豆却说张耀祠向她传达 了"中央指示",并让她很林彪一起走。后面将分析对比一下林豆豆和张耀祠这 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290)

在说林豆豆提出"中央"命令他们上飞机之前,先看看林豆豆这个人。林彪经历过两次婚姻,共有三个子女。林彪与前妻张梅生育一个女儿林晓霖(1941年生),与叶群生育林立衡(乳名豆豆,1944年生)和林立果(乳名老虎,1945年生)。林豆豆出生于延安,据说"豆豆"这个乳名是来自林彪喜欢吃黄豆的嗜好。

林豆豆 1962 年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1964 年从清华大学转学到北京 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林立衡转学到北大后,北大中文系指定了两名女教师辅导她 的功课。林立衡到北大后,因病经常缺课,北大中文系建议,有病长时间不能上 课,可办休学手续,保持学籍,病好后可以复学。林豆豆因此办了休学手续。

但林豆豆休学后,却没有再回北大就学,而是于 1965 年去了《空军报》工作。据说毛泽东知道林豆豆的情况后,同意她到《空军报》工作锻炼,《空军报》专门指派了两名业务骨干帮助林豆豆。1969 年,林豆豆升任《空军报》副总编辑,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解放军报》任总编辑,林豆豆比李讷低半级,与林彪比毛泽东低半级的情况一样。

林豆豆脾气,那是元帅府大小姐的典型脾气:任性。叶群与林豆豆关系不太好,正好当时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给林豆豆,说叶群不是她的亲生母亲,搞得林豆豆与叶群的关系更加紧张。因为林彪宠爱林豆豆,她的任性脾气没人敢管,叶群也怕林豆豆三分,因为林豆豆动不动就要自杀。1964年和1968年,

林豆豆两次自杀未遂, 搞得林家更不敢管她了。

一些小事也可以看出林豆豆的大小姐脾气。林彪专机的副驾驶康庭梓,回忆了他们 1971 年 9 月 7 日把林豆豆从北京接到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康庭梓说:【9 月 7 日,这一次飞行性质也是"训练飞行"。可是那天我一到西郊机场,就发现有点不一样。平时的训练飞行,飞机都停在停机坪上,可这一次却拖到了候机室,只有专机或者有重要任务的时候,才会这样。

正在我纳闷时,看见一群穿着空军衣服的年轻人上了飞机,我认出其中一位 瘦瘦的女军人是林立衡。等到人都坐齐,我准备推操纵杆滑行的时候,林立衡突 然说:"不行,不行,还有点事儿,停一下!"

后来知道,是林立衡落了一双皮鞋要回去拿,于是我们等了 40 分钟,等她第二次上飞机,才开始正常飞。不过林立衡坐的不是专机,属于搭便机,这种飞行在我们部队还是很多的。】

据康庭梓回忆,林豆豆坐的并不是专机,而是"搭便机"。林豆豆为了回去取一双皮鞋,让机组人员和其他"搭便机"的乘客等她 40 分钟,林立衡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没有表示什么歉意。

(291)

我们再看林豆豆对八三四一部队领导的说话口气,都是命令式。比如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回忆说:"林立衡对我说:'肖队长,你们快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

林豆豆是什么官职,她有什么资格下命令抓人呢?这就是帅府大小姐的脾气。 因为林豆豆自从懂事以来,周围的人都对她唯唯诺诺,养成她出口就命令别人的 脾气。林豆豆本人也回忆说: 【我责问张宏(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 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

张宏火了,大声说:"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指挥。我们是听中央的!"】

以林豆豆的官职,她只能向张宏汇报情况,绝无向张宏下命令的资格。张宏不买林豆豆的帐了,林豆豆反而还很生气。林豆豆凭什么生气呢?林豆豆似乎认为,张宏应该违背"中央",听她的指示才对。

再看林豆豆写给"中纪委"的材料,口气也完全是一副"自己完全正确,错误都是别人"的大小姐脾气。原空军政委高厚良回忆了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一些情况,高厚良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在玉泉山写了不少揭露林彪搞两面派,表面高举紧跟,私下流露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情况,同时认为林彪叛逃是受叶群、林立果的影响,为她父亲开脱。

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接见林立衡时,曾对她"自以为是"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决定让她回空军报社,接触群众,通过学习,正确对待自己。1972年9月,林豆豆要回到《空军报》参加学习。总政工作组李平在报社作了动员,说"过去她是仙女,你们夹道欢迎。现在她不是仙女,你们也要欢迎。她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

李平说林豆豆"起义"的事实根据是: 1971 年 9 月 7 日, 林立果把谋杀毛泽东不成就去广州另立中央, 再不成就去苏联当"寓公"的计划, 告诉了林豆豆, 谈了两个多小时。林豆豆自己说:"当时怕林立果对自己下毒手,都曾向林立果表示'跟你们走'。"

林豆豆思想斗争激烈,不同意林立果的行为,却因林立果向她说过"首长也同意",而不敢去当面劝阻父亲林彪制止林立果的活动。9月9、10、11日三天,

林豆豆都在北戴河林彪身边,还去山海关游览购物送给父亲。林豆豆知道林立果在北京从事谋害毛泽东的活动,但没有及时向中央检举揭发,直到9月12日晚林彪、叶群、林立果要逃跑之前,才去八三四一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所以中央、总政认为她是"起义"。】

(292)

高厚良说总政认为林豆豆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这句话是对的。林豆豆9月7日就知道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却不向中央汇报,这就任听毛泽处于危险的境地。从这点来看,林豆豆的态度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如果林立果暗杀成功,林豆豆就不向中央汇报了,坐享胜利果实;如果林立果暗杀失败,准备外逃,她此时才告发他们。林豆豆在毛泽东最危险的几天,不向中央报告,这显然是林豆豆的"错误"。周恩来也批评林豆豆"自以为是",让她回《空军报》学习。

高厚良继续回忆说:【林立衡以"九一三事件"的功臣、反林英雄自居,向大家宣传她一贯反对林彪。林豆豆说自己对林彪很早就"有所认识、有所警惕、有所察觉、有所斗争",说自己是林彪的"掘墓人"。林豆豆还说:"我想把《空军报》办成反林立果的基地";"我很早就想给主席写万言书,讲林彪不能当副统帅";"九一三以前我没有向中央报告,主要是为了里应外合,配合毛主席这场反林、叶的斗争。"

林豆豆随意讲的一些情况,难以自圆其说,和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家不接受她的观点,她就说:"多少年后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时,林豆豆就经常借口写材料,不到报社来参加学习,有时来也不发言,私下对人说:"你们把我当敌人看待。"】

由高厚良的回忆可知,林豆豆经常毫无根据地随意讲一些情况,造成大家对她的疏远,然而林豆豆却还是"自以为是",自认为"多少年后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高厚良继续回忆说:【1974年2月,林豆豆再次自杀未遂。因为林豆豆闹自杀,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一次,周恩来、江青都参加了。后来周总理生病,汪东兴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政治局要再议一下,对林立衡要解除监护,她和死党有区别,准许她同张清林来往。让她到农场劳动锻炼,更多地接触群众。"

空军党委研究挑选了条件较好的河南开封某空降兵师农场安置林立衡和张 清林。二人打报告提出结婚,空军政治部批准他们结婚。林立衡在开封农场,只 干一些轻微的劳动,享受正常的党员干部待遇。1975年10月,林立衡夫妇作 转业处理,11月中旬安排到郑州汽车厂某分厂任革委会副主任。

林立衡在报刊上说:"她没有转业手续,上不了户口,拿不到购粮本、肉证,也领不了工作证,仍然用假名,从此化名路漫,十四年来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黑人。"

这种说法完全是耸人听闻的谎言,转业是中央批准由河南省委接收办的手续。 工厂按厂级领导干部对待,生活用品经常送到家,怎么可能成了"没有户口的黑 人"?

(293)

林豆豆的同父异母姐姐林晓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批评林豆豆,规劝她为人要正直,要诚实。1977年冬天,林晓霖特地从北京赶到郑州探望妹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那时,林豆豆就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

林豆豆拿出她写的许多材料给林晓霖看,林晓霖看后觉得林豆豆所写的材料水份太大。例如她说:"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药,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林豆豆还说:"叶群搞了几年选美,是因为毛泽东好色,叶群为了讨好才在全国各地挑选美女向毛泽东进贡。"

林晓霖当时就觉得林立衡说这些话太假,便说:"你讲这些别人能信吗?我们 不能只从林彪是我们父亲,要为他翻案的个人利益出发,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

这样姐妹俩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林豆豆一心为林彪辩护,把林彪干的事都推在毛泽东身上,似乎林彪什么错都没有。林晓霖说:"我和豆豆同是一个父亲所生,姐妹同根,我也不能说豆豆多么坏,但对她爱虚荣、爱说假话,我也深感痛心。因为假话不能持久,终究要被事实揭穿,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

以上说了那么多林豆豆的事,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 林豆豆是那种毫无根据随意说话的人,因为,对林豆豆提出的"中央"命令他们上飞机之事,也没有必要特别深究,因为这本来就是林豆豆随便说的事情。

有人在林豆豆说"中央"命令他们上飞机之事上,大做文章。其实林豆豆说的这件事,本身就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林豆豆说的"中央",肯定只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其他人都担不起"中央"这两个字。

如果说周恩来命令林豆豆"上飞机",那就是说周恩来要主动放飞林彪的飞机,所以才会命令林豆豆上飞机。然而在事实上,不只是汪东兴、张耀祠等人,就是吴法宪、李作鹏等被判刑的人,也都承认周恩来曾向他们下令,尽可能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周恩来一方面要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另一方面又命令林豆豆"上飞机",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如果说是毛泽东命令林豆豆"上飞机",那就等于是毛泽东要放飞林彪,主

动让林彪跑到苏联去。林彪跑到苏联去,对毛泽东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毛泽东似乎还不至于愚蠢到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地步。因此,根据林豆豆随意说的话去探究历史,只能是走入歧途。

(294)

这里转回来说林彪上飞机的情况。据林彪卫士李文普回忆说:【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林彪的专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

车开到 56 楼时, 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 "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说: "不远,很快就到。"

汽车开到 58 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八三四一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 "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 58 楼喊了一声: "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 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 只一米左右, 我侧着身, 手扬着, 所以

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 我倒在路边, 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

林立果开枪把我打伤之后,叫杨振刚加快速度驰向机场,刘吉纯和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战士分乘几辆车在后面追赶。追车的八三四一部队干部战士途中被一列火车挡住耽误了时间,到达机场时,林彪的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升空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林立衡、张清林被中央接到北京玉泉山高级首长住处,写回忆及揭发材料。我和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到北京亚洲青年疗养院接受审查。因为我没有像林立衡那样及时向中央报告林彪、叶群要从北戴河逃跑的情况,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

对于李文普为什么跳车的问题,有很多争议,这个话题放在后面说。这里先 把李文普说的林彪专车出走的过程整理一下:

- (一)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和李文普上车之后,司机杨振刚马上就 开车了。
 - (二)汽车开到 58 楼时, 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 (三)叶群说"冲!",杨振刚没有理会姜作寿示意停车,冲了过去
 - (四)李文普大喊"停车",然后打开车门跳车出去。
 - (五)林立果向李文普开了一枪,李文普倒地,杨振刚继续开车驶向机场。
 - (六)林彪办公室的刘吉纯和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战士分乘几辆车在后面追赶。
- (七)追车的队伍途中被一列火车阻拦,等他们到达机场时,林彪的飞机已经 强行升空了。
- (八)林豆豆作为"起义有功",到北京玉泉山高级首长住处写材料;李文普等 林彪办公室的人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受到隔离审查的处理。

(295)

姜作寿也回忆说:【大约晚 11 时半左右, 林彪的内勤小陈打电话给我说:"大 队长, 他们走了, 都乘首长那辆车, 连我也不让上车。快点, 快点。"

听得出小陈很是紧张。我放下电话,向张副团长(张宏)做了报告,便往楼下跑。从 96 楼乘车出去,必须经过 58 楼门前,我想在这里把车拦住问一问:"首长,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警卫部队怎么跟你走?"

我刚站到马路中央,就看见林彪那辆大红旗保险车拐过了弯,开着大灯直射过来,照得我连眼都睁不开,转眼之间,车子驶过百余米的坡路逼近我的身边。 我做出紧急停车的手势,高喊:"停车!停车!快停车!"

可是,车不仅不减速,而且在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旁若无人地直冲过来,根本没有停车的意思。若不是我快捷躲开,看那样子,就是把我撞死了也不会停车的。瞬息之间,红旗保险车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据姜作寿回忆,他让示意林彪的坐车停车,并不是真的想阻拦,只是想问问林彪去哪里,他们这些警卫队伍怎么跟着走。而林彪的坐车却以为他要阻拦,加速冲了过去。

林彪坐车冲过姜作寿的阻拦后,李文普跳车,林立果向李文普开枪并打伤李文普。一旦开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由"文斗"变成了"武斗"。林立果对李文普开枪,这就意味着林彪的武装反抗,这个性质就上升为敌我矛盾了。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为了避免林立果开枪造成"敌我矛盾"的难题,于是就说林立果没有开枪,李文普的枪伤是他自己开枪打自己的。为此李文普辩解说:"我已经跳车了,又何必再打自己一枪?"

李文普为了表明他不再跟林彪了,有跳车的行为就足够了,再打自己一枪完

全没有必要。再说,自己开枪打自己的枪伤是很容易鉴别的,李文普试图以此来 欺骗组织也不太可能。因此,李文普自己开枪打伤自己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李 文普的枪伤应该来自林立果。

另一位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回忆说:【林彪的轿车从 96 楼方向迎面 驶来,见前面有人时,车不但没有停,反而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呼啸而过。 然而这辆红旗车却在距离我们 50 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停下,从车上下来的是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当我追到离红旗牌轿车约 20 米左右时,林立果向我连开了两枪,接着我又听到一声枪响,李文普倒下了。

这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急闪而过:林立衡的报告已变成了现实。我凭借着路旁的树作掩护,迅速掏出手枪,"啪啪"还击了两枪。林彪一伙见警卫部队有人竟敢拦阻他们的专车,并追赶不舍,而且公然开枪还击,更加惶恐万分,连车门都顾不上关,驶车仓皇逃窜。】

(296)

张耀祠虽说非当事人,但他做作为八三四一部队的团长,当然有自己的渠道了解消息。张耀祠对此事回忆说:【林彪的汽车离开 96 号楼后,路上被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肖奇明挡了一下,没有拦住,汽车跑出约二十多米,李文普叫停车,他从车里跳出来,与此同时连响三枪,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打的,李文普左手负伤。此时肖奇明听到枪声,还击了两枪。林彪的汽车加大了油门,以每小时 100 公里的速度向机场飞驰而去。】

综合肖奇明和张耀祠的回忆, 林彪坐车遭到枪击的情况如下:

- (一)大队长姜作寿阻拦林彪坐车,被闯过。
- (二)李文普叫停车, 林彪坐车停下。

(三)与此同时李文普跳车出来, 肖奇明追向林彪坐车。

(四)林立果打开车门,向远处的肖奇明开两枪,向近处的李文普开一枪,李 文普负伤倒地。

(五)肖奇明没想到林立果会向自己开枪,以为林豆豆说的话变成了现实,一时激动,于是就向林彪的坐车还击两枪。这两枪据说打在林彪专车的后风挡玻璃上,因为林彪专车是防弹玻璃,所以子弹没有穿透。后来,周恩来对这两枪提出了批评,说:"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

因此肖奇明对林彪专车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示,而只是自己一时激动 的个人行为。

林彪的坐车开走后,警卫科长刘吉纯等人驱车在后面追赶。刘吉纯回忆说: 【虽然我们的车已开得很快,我们还是不断催促司机开得再快一些。由于车速太快,天黑又没路灯,司机突然刹车,拐了一个大弯后才停了下来。原来前面正有一辆长长的火车通过,我们的伏尔加车已接近铁轨,若不是司机年轻机敏,我们不是撞上火车便是翻到路边沟里。如今回想起来,还很后怕。

当我们赶到机场时,那里一片黑暗。林彪乘坐的红旗车停在那里,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稍后,张宏副团长也赶到机场,把没有上飞机的机组人员集中起来。我和一起去的几个人乘车返回北戴河。下车后,才知道李文普已受伤住院。 "林办"所有在北戴河的工作人员一起被软禁起来,开始接受长达四年的审查。】

张耀祠继续回忆说:【9月13日0点22分,林彪的汽车一进机场,就直奔停机坪开到二五六号专机附近。汽车还没有停稳,叶群先跳下车,高声嚷叫:"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快,快!飞机快起飞!"

他们不等飞机加完油和开机舱门,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往上爬。他们看到 八三四一部队汽车赶来时,顾不上等机组人员和搬运车上携带的机密文件,就命 令驾驶人员起动飞机。9月13日0点32分,林彪乘坐的飞机,在一片漆黑中 强行起飞了。】

林彪三叉戟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了他们机组人员,从北京到达北戴河山海关机场之后的情况。康庭梓说:【9月12日晚上,我们就住在山海关机场的招待所里。潘景寅是师级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剩下我们7个人住在另一栋平房里:最东边第一间住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第二间住程洪珍;第三个房间正好有3张床,分给了3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我与领航员李成昌住第四个房间;第五间住陈副驾驶陈联炳和通讯员陈松鹤。

(297)

过了一会儿,潘景寅来了,我们机组 9 个人聚集在 3 个机械师的房间里。 按惯例,在飞行结束后有个讲评会,潘景寅简单地评了一下当天的飞行。潘景寅 最后交代:"明天 6 点起床, 6 点半吃饭, 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 待命。"

睡觉的时候接近晚 11 点了。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我的窗户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 1 米远。9 月份的山海关夜晚已经有点寒意,临睡前我还特地把窗户关得严严的。睡得正香,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李海彬在门外急呼:"首长到了!快起床!"

接着又听到猛敲隔壁房门的声音。我一下子就爬起来了,打开电灯,李成昌也起来了,我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见很响的一声"轰——",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是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我更着急了,没顾上系鞋带,衣扣也没扣好,提个包就往机场跑。

借着招待所外的灯光,我看到陈联炳和陈松鹤两人已经跑在了我们前面。我们4个人还没上,飞机怎么就走了呢?我满脑子都是不解,也顾不上想很多,只有加速往停机坪跑。

我看到三叉戟飞机正在快速移动,准备进入跑道,发动机的声音在深夜显得格外大。这时,海军地面人员也迅速赶来,我们站在一起,不约而同望着飞机,呆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混乱中,一队人马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一辆卡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陆军士兵在停机坪中央停住,有人已经端着步枪从车上跳下,有人喊:"开枪!",又有人喊:"不准开枪!"在那辆卡车到达的同时,一辆吉普车也出现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一位 40 多岁的陆军军官急速跳下车,他看我上身穿飞行员工作服,知道我是机组人员,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点着正在滑行的飞机,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非常着急地说:"你,你……快把飞机拦住!"

我也很着急,就一个劲儿问他:"谁在飞机上?"

他答非所问,只是不停地说:"这架飞机不能起飞!你把它拦住!"

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你拉我干吗?你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他赶紧上了吉普车,可是这时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一头,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后,便冲天而起,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空。此时是 1971 年 9 月 13 日零时 32 分。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塔楼里气氛异常紧张。我看见调度员正在用话筒喊:"听到请回答!"、"快回来!"这些话,可是对方一片沉寂。我明白,机上肯定把与地面的通话系统关闭了。八三四一部队的那些人拿着电话呼叫,喊接"北京九局"。

电话接通后,我听他们说:"向中央报告,老虎和叶群把首长搞走了!"声音很大,满屋子人都听得特清楚。

我们都知道,"老虎"是林立果小名,林立果和叶群把林彪给绑架了?】 (298)

这里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林彪三叉戟专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 三叉戟从北京起飞时,机上有9名机组人员,5名乘客。乘客中林立果和刘沛丰 下飞机后,立即去北戴河的林彪住处。而另外三名乘客,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 珍,以及两名年轻女兵,被留在机场。为什么林立果不把这三个人一起带到林彪 住处呢?原因应该是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

两名年轻女兵,林立果肯定不会告知她们"五七一工程";即使是程洪珍, 林立果也没有向他透露暗杀毛泽东计划等最秘密的情报。这些人当中,只有刘沛 丰是完全知情者,所以他与林立果一起去了林彪住处,又一起上了飞机。

林彪等人登上飞机后,飞机立即起飞,程洪珍和两个女兵被留了下来。他们 三人没有上林彪的飞机,并不是因为时间来不及,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让他们上 去。

三叉戟的 9 名机组人员是: 机长潘景寅、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庭梓、主管机械师李平、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普通机械师张延奎、领航员李成昌、通讯员陈松鹤、女服务员魏秀玲。其中潘景寅和 3 名机械师上了飞机,其余 5 名机组人员没有上飞机。一些文章说这 5 名机组人员是没有时间上飞机,其实不然,他们是完全有时间上飞机的,而是被故意"甩"在机场。

对此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三叉戟起飞后,一片混乱的山海关机场渐渐恢复了宁静,很多信息从各方面汇集过来,我们也慢慢知道了很多细节。

那天晚上,潘景寅并没有回他自己的房间睡觉,而是待在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的调度室里,程洪珍也没有睡,他们3个在一起聊天。9月13日凌晨0点5分左右,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他随后就通知李海彬叫油车来加油。在李海彬打电话要加油车的时候,潘景寅走出调度室,先经过程洪珍的门口,再经过我们的房间,直接走到3名机械师的房间,把他们叫起来去机场。

我的房间与3名机械师们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我是个睡觉很轻的人,房间开着灯就不能入睡。可是,3名机械师起床时,我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

3 名机械师到机场时,油车还没有来,他们开始做飞行前的准备。一会儿,油车来了,一名机械师爬到机翼上准备加油时,突然,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从停机坪外的黑暗中急驶而来,在飞机的左后方停了下来。此时是 0 点 22 分。

这是林彪的专车,潘景寅随即直奔停机坪。从调度室到停机坪只有50米,潘景寅到了停机坪,直接登上飞机。潘景寅在0点5分接到电话后把机械师叫醒,让机械师做起飞准备;最后潘景寅在0点22分登上飞机。在这中间有十几分钟的空余时间,但潘景寅一直没有把我们其余5名机组人员叫起来。在我看来,他是有意识地把我们甩掉的。

(299)

现在有很多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评论文章,其中一个观点是,林立果的最大失误是把有用的人(指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甩下来,而把没用的机械师带走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机械师是飞机的关键人物,飞机舱门的钥匙都在机械师手里,加油也靠机械师。飞机在起飞前的种种动作,没有机械师是完不成的。

我后来听海军的地面人员说,林彪的红旗车停了以后,第一个下来的是叶群, 她说:"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并高呼: "誓死捍卫林副统帅!"第二个下车的是林彪,他们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软梯, "上拉下推"地上了飞机。

特设机械师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 5 位成员还没到,他可能有点纳闷,到飞机下面抓起临时内线电话,找到调度室主任李海彬,说:"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来齐?"李海彬也大惊,才赶紧去敲我们的门。

三叉戟起飞后,我们5名留下来的机组人员都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我们推举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有人说:我们应该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可是怎么才能找到党中央呢?最后大家想起找空军航行局局长,他是直接管飞行的。陈联炳把电话打到航行局局长那儿,把前后情况大致汇报了一番,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飞机走了,把你们留下来的事?不可能!"

我们又费了一番口舌,他才确信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第二天中午饭的时间,我们还在商量汇报的事,这时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 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我们听 到后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面都站上了岗。我明白:我们失去自由了。】

关于林彪一行人在山海关机场的行动,原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也回忆说: 【1971年9月12日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首长下飞机,这是惯例。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 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来车,向我要车。吉普车很 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 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机场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300)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 40 多公里,路况不好,林立果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 22 点,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

晚上 11 点 30 分左右,场站政委史岳龙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几次电话,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认为这是大事,直奔机场调度室。

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个话?我们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

潘浩又请示: "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 李作鹏表示同意。

潘站长去通知潘景寅,但他不在房间里,事后才知道潘景寅那时正在隔壁李海彬的调度室里。如果他们到调度室看一看,就可能通知到潘景寅,当然潘景寅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的地方时, 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

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 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

叶群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被她这么一喊,油车司机开始犹豫着往后面倒,可是还没等油车完全倒走,飞机就急着开始滑行,结果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挂在了油车顶部,灯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机坪上。

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

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 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

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三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邰起良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5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

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

能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林立果推着的起良上了飞机, 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301)

机场的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而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三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调度员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

这时,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 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致使 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 没有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专机升空 看不见了。

之后,我们几个当事人,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等都被集中到沈阳军区, 各写各的材料。之后我们又回到机场上班,没有受到什么处理。】

结合康庭梓和佟玉春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

- (一)潘景寅这天晚上没有睡觉。三叉戟专机原定计划是第二天一早飞广州,按道理机组人员是应该睡觉的,这样才能保证第二天的飞行安全。可是潘景寅却不睡觉,而是一直在调度室里聊天,这说明事先林立果向潘景寅交待过,让他今晚随时待命,以防突发情况,所以潘景寅就没有去睡觉。
- (二)9月13日凌晨0点5分,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应该是来 自北戴河林立果打来的,他通知潘景寅立即准备起飞。
- (三)潘景寅悄悄叫醒三名机械师,不惊动其他人。康庭梓说他与3名机械师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竟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潘景寅不叫醒其他5名机组人员,是因为在紧急起飞的计划中,其他5名机组人员是事先计划好不带上飞机的,怕这些局外人上了飞机不好控制。

(四)三名机械师中,主管机械师李平,应该是与潘景寅一样的知情者。三叉

载飞机的驾驶舱有三个座位:前方是机长和副驾驶,后方是机械师,三叉戟飞机有3名机组人员就可以正常飞行。林彪的二五六专机之所以有9名机组人员,是为了保证副统帅的安全,特别配备了9人。但实际上,飞机只有机长和机械师两个人就能驾驶,这是最低限的机组人员。

因此,林彪和林立果要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这架飞机,当然没有必要对多余的人"做工作",只要对机长潘景寅和主管机械师李平"做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在原计划中,二五六专机将由潘景寅和李平两个人来驾驶,其余的人都是多余的。但由于当天晚上3名机械师被安排在一间房间睡觉,潘景寅只叫李平,而不叫另外两名机械师,会使那两人起疑心,反而更麻烦,所以只得把3名机械师一起叫去了。

(302)

特设机械师邰起良和普通机械师张延奎显然是不知情的。对于普通机械师张延奎,康庭梓回忆说:【张延奎本不是二五六专机的机械师,由于当时二五六专机的机械师临时有事情,就让张延奎顶替,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冤死鬼。】

对于特设机械师邰起良,佟玉春回忆说: 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 其他5名人员还没到,就从飞机上下来打电话通知其他5名机组人员。当佟玉 春告诉邰起良"不准二五六飞机起飞"的命令后,邰起良更感到无法理解,最后 是被林立果推上飞机的。

(五)潘景寅在临起飞前,紧急通知给飞机加油,可见潘景寅事先知道这次要 飞较远的航程,所以才紧急加油。只是由于林彪一行人来得太快,加油车没有来 得及加油,反而把机翼上的航行灯撞坏了。

(六)林彪一行人下车后,叶群和林立果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

了",然后林彪一行人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梯子爬上飞机。

(七)林彪一行人上飞机后,飞机马上起飞,机场调度室熄灭了机场的所有灯火,三叉戟是靠自己的照明灯强行起飞的。

(八)飞机起飞后,剩下的5名机组人员才吃惊地发现自己被"甩掉"了。

这里有一个时间表值得注意: 林彪的专车从北戴河出发是 12 日晚 11 时 30 分左右,北戴河距山海关机场 40 多公里,那时没有高速公路,40 公里的路汽车要行驶 1 个小时左右,林彪的专车于 13 日凌晨 0 时 20 分左右到达机场。

据吴法宪回忆说:【我到达西郊机场,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汽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周恩来却告诉我说:"林 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

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 34 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林彪专车于晚 11 时 30 分左右强行离开北戴河,在出发前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周恩来立即就知道了,他还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吴法宪。可是这么重要的情况,周恩来却没有及时向毛泽东报告。从在 12 日

晚 11 时 30 分林彪离开北戴河,到 13 日凌晨 0 时 22 分三叉戟起飞,有 50 分钟左右的时间,周恩来是有足够的时间向毛泽东汇报的,可是周恩来却没有这么做。

(303)

据汪东兴回忆说:【13 日 0 点 32 分, 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 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

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专机已经 起飞 30 多分钟了,正在向北飞行,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 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

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 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

这时已是 13 日凌晨 1点 12 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 40 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

这里还有一个时间表需要注意。13 日 0 点 32 分, 汪东兴得到林彪专机已 经起飞的报告。汪东兴立即通知周恩来,他们一起去毛泽东那里汇报。周恩来 0 点 32 分从人民大会堂出发,到达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大约需要 15 分钟,那 么毛泽东大约在 0 点 47 分左右得知这个消息。此时据林彪专机起飞,已经过了 25 分钟了。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晚才知道消息呢?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304)

在谈到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晚才知道林彪的消息之前,先要澄清一件事。汪东 兴在回忆录中,明确说周恩来和他是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后,才去向毛泽东汇报 的。而现在有一种新说法,声称周恩来在林彪飞机起飞之前,就已经向毛泽东汇 报了这件事,并说汪东兴的回忆录是假的。另外,因为林豆豆报告说林立果要派 人轰炸中南海,所以毛泽东在林彪飞机起飞之前,紧急从中南海游泳池的住所, 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118 厅。

这种新说法例举了种种"证据",比如声称张耀祠在接受采访时说:"三叉戟二五六还没有起飞,主席就已经到了人民大会堂 118 厅。"但张耀祠本人的回忆录中,却并无这样的说法。细究这种新说法的各种"证据",就会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牵强附会,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可以推翻汪东兴的说法。这种新说法的最大硬伤是:如果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前,就知道林彪准备外逃之事,那么毛泽东必须做出一个指示:是否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

这种新说法中提到的毛泽东指示,还是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 去吧!"如果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前,就做出这样的指示,那就意味着毛泽 东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允许林彪出走,这样一来,林彪就是在伟大领袖亲自批准之下出走的,又何罪之有呢?

而且,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之前,曾下令林彪的飞机必须由周恩来、吴法宪等四个人同意才能起飞。如果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前,就做出"由他去吧!"的指示,那么就与周恩来的指示发生冲突了。这样的话,周恩来必须马上打一个电话到机场,说: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准许林彪的飞机自由起飞,撤销先前我的命令。

由上述推理可知,毛泽东在林彪的飞机起飞前,做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指示,是完全不合理的,也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这种新说法经不起最简单的逻辑推证,是不正确的。

前面说过,9月12日晚11时30分林彪离开北戴河前,与警卫部队发生了"枪战",打伤了警卫员。既然林彪已经开枪动武出走,那么林彪必然是要想逃走的。下面的问题是:林彪怎么逃呢?

显然,林彪的出路只有"空路"一条,走地面的"地路"或水面的"水路",那是绝对逃不掉的。既然林彪逃走的出路只有"空路"一条,那么林彪的飞机就一定要强行起飞,这是很容易推理的结果。

因此,以周恩来的智慧和经验,他在得知林彪打伤警卫人员强行离开北戴河的时候,就判断出林彪的飞机是一定要强行起飞的,不然的话林彪是没有第二条可走的。那么下面的问题是: 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后,飞往哪里呢?

(305)

林彪飞往广州的方案,必须是在他们的意图没有暴露之前,才有可能实施。 现在林豆豆已经把他们准备飞广州的事情告密了,林彪此时再飞广州,等于是自 投罗网。因此, 现在林彪的飞机只能飞往外国。

再下面的问题是: 林彪飞往哪个外国呢?从北戴河的地理位置和三叉戟飞机的航程来看,可以飞到的外国有三个(北朝鲜除外): 南朝鲜最近,日本次之,蒙古再次之,直接飞到苏联是不可能的。南朝鲜和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蒙古是苏联的盟国。

单从逃命的角度来看,林彪从北戴河飞往最近的南朝鲜是最安全的路。南朝鲜不仅距离近,而且很快就飞出中国国境进入公海,到了公海上就不会有被中国战机击落的担忧了。林彪到了南朝鲜之后,可以转去台湾。1971年蒋介石还健在,他肯定是非常欢迎林彪去"反正"的。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投奔台湾,将给蒋介石一个非常大的面子,在台湾林彪一家一定会得到非常优厚的生活待遇。

当然,苏联也非常欢迎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投奔过去,这个理由在前面的 文章中提到过。不过从北戴河飞往蒙古,比飞往南朝鲜危险得多,一来因为大部 分时间将在中国上空飞机,有被击落的危险;二来是航程较长,燃油有不够的危 险。事实上,林彪的座机正是因为燃油不够而追降失败的。

林彪选择去比较危险的蒙古,而不是去比较安全的南朝鲜,这就说明林彪不单单是为了逃命,他还想要与毛泽东继续进行"战斗"。一旦去了台湾,林彪就不可能再回到大陆了;而去了苏联,林彪还有可能回到大陆的。再者,林彪去台湾,就意味着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去苏联,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周恩来熟知林彪的为人,所以周恩来可以预料到林彪的飞机起飞后将飞往蒙古,而不会飞往南朝鲜。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9月12日晚11时半得到林彪开枪伤人,强行离开北 戴河的时候,就预料到林彪一定要赶往北戴河机场,预料到林彪的飞机一定会强 行起飞,而且预料到林彪的飞机一定会飞往蒙古。这个时候,周恩来的行动就决定了林彪的命运。因为林彪从北戴河赶到山海关机场,需要近一个小时,在这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恩来完全有时间做出不让林彪走的措施。

周恩来真的要想不让飞机起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命令警卫山海关机场的部队,立即把住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的潘景寅等 9 名机组人员扣押起来,或者干脆把这 9 人押上汽车,紧急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这样林彪一行人到了机场,找不到飞行员,飞机自然也就无法起飞了。

在林彪从北戴河出发到机场的这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恩来显得头脑糊涂,不知所措,乱打电话。一会儿给吴法宪打电话,一会儿给李作鹏打电话,一会儿给汪东兴打电话,一会儿给张耀祠打电话,显得非常忙,其实都没有忙在点子上,偏偏就忘了给毛泽东打电话。其实周恩来此时是故意"装糊涂",故意装得对林彪的行为不知所措,这样才能为林彪争取到最宝贵的时间。

(306)

周恩来这么做的动机,在前面已经分析过。毛泽东迟迟到林彪的飞机起飞之后才知情,这并不只是周恩来的问题,汪东兴和张耀祠也有问题。汪东兴和张耀祠都是长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和亲信,和毛泽东非常惯熟,有事可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根本不需要通过周恩来。汪东兴和张耀祠都是在9月12日晚11时半左右得知林彪开枪伤人和强行离开北戴河之事,那么他们这两个毛泽东的亲信,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偏偏不向毛泽东汇报呢?

这就显出这两个人的私心了。汪东兴和张耀祠这次跟随毛泽东去南方,完全 知道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也完全清楚毛泽东将要拿掉林彪了。这样一来,汪东兴 和张耀祠不得不想另外一个问题:林彪被拿掉之后,谁来接替林彪的第二把手和 接班人的位子呢?从当时的各种情况来分析, 汪东兴和张耀祠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 林彪倒台后, 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位子将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将是未来的王储。

当时周恩来还没有发现癌症,那时周恩来的身体非常好,人们普遍认为比毛泽东小 5 岁的周恩来,将比毛泽东活得长。汪东兴和张耀祠既然预料到周恩来将是未来的王储,那么谁都知道,王储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了王储,将来到了周恩来时代,那一定要吃苦头的。

汪东兴和张耀祠看出周恩来犹豫来, 犹豫去, 就是不想报告毛泽东。如果他们两人违背周恩来的意思去报告毛泽东, 那就要大大地得罪周恩来, 以后在周恩来手下的日子将会不好过。所以汪东兴和张耀祠都不愿得罪周恩来, 周恩来犹豫, 他们也跟着犹豫, 大家都不去向毛泽东汇报。

直到林彪的飞机起飞, 汪东兴觉得再拖下去实在无法向毛泽东交待了, 所以才赶紧打电话给周恩来, 说: "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 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 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 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汪东兴向周恩来明确提议报告毛泽东,周恩来也不能再拖下去了,就赶紧去毛泽东那里报告。当时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汪东兴距毛泽东住处的距离,比周恩来近得多。尽管如此,汪东兴和周恩来还是"同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汪东兴是故意这么做的,如果汪东兴先到毛泽东那里单独汇报,周恩来难免 会怀疑汪东兴在毛泽东面前讲了什么不利于自己的话。现在汪东兴和周恩来一起 进毛泽东的门,汪东兴就是要在这件事上,让周恩来对自己完全放心。 汪东兴和张耀祠这两名毛泽东的亲信,在关键时刻却怕得罪他们想象中的未来王储周恩来,这也是造成毛泽东很晚才知道林彪出走的关键因素之一。

(307)

从林彪方面来看"九一三"事件,可以分为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第一时间点: 9月12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站,毛泽东返回中南海游泳池住处。

第二时间点: 9月12日晚7时30分左右,林立果等人乘林彪的三叉戟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林彪别墅。

第三时间点: 9月12日晚8时左右,林立果乘坐的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降落。

第四时间点: 9月12日晚9时左右,林立果到达北戴河林彪别墅,立即与 林彪等人密谈。

第五时间点: 9月 12 日晚 10点 30分左右, 林豆豆在向中央告密, 林彪第二天南下广州的计划败露。

第六时间点: 9月12日晚11点30分左右, 林彪一行人打伤警卫员, 强行离开北戴河别墅前往山海关机场。

第七时间点: 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 林彪的三叉戟专机强行起飞。

第八时间点: 9月13日凌晨2时左右,三叉戟飞出中国国境进入蒙古,三叉戟在中国国境内飞行大约1个半小时。

第九时间点: 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 追降失败,机上9人全部死亡。

从周恩来方面来看"九一三"事件,也可以分为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第一时间点: 9月12日晚8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长参加的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会议。

第二时间点: 9月 12 日晚 10 时 40 分左右,周恩来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得 知林豆豆告密的林彪南下广州计划,但半信半疑。

第三时间点: 9月12日晚11时,周恩来打电话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山海关机场上是不是停有林彪的专机。李作鹏查后向周恩来汇报,林彪专机的确在山海关机场。这时周恩来感到林豆豆所说的不是空穴来风,开始认真处理这个问题。

第四时间点: 9月12日晚11时多一点,周恩来打电话给司令吴法宪,问是不是他把林彪专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吴法宪说不是他调的飞机,他也不知道这件事。这样周恩来就判定吴法宪与此事无关。

第五时间点: 9月12日晚11时20分左右,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声称林彪要乘飞机"动一动",叶群很可能在电话中向周恩来"交底"。

第六时间点: 9月 12 日晚 11 时 30 分左右,周恩来给李作鹏打电话,下令停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不准起飞,除非有周恩来等四人的批准。

第七时间点: 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周恩来得林彪一行人强行离 开北戴河别墅前往山海关机场。

第八时间点: 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周恩来得知林彪的专机强行起飞。

第九时间点: 9月13日凌晨0时50左右,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汇报林彪情况,毛泽东的指示是: "天要下雨,娘要家人,由他去吧。"

第十时间点: 9月13日凌晨1时10分左右,周恩来离开毛泽东住处,回到人民大会堂,指挥处理林彪事件的各种问题。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时间大约为 20 分钟左右,毛泽东除了"由他去吧" 的指示之外,没有再发出其他指示,而是把处理林彪事件的全权,全部交给了周 恩来。

(308)

关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9月13日1时许,刚刚睡下的毛主席也被叫起来。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我到门口迎接,总理与前来迎接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然后一起进毛主席卧室。

大约过了 20 多分钟,周恩来、汪东兴出来说:"主席说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请示周恩来:"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

周恩来略一思索,说:"先转移到人民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

我们把周恩来送出门,他匆匆乘车回人民大会堂去了。尽管这里距西花厅只有几百米,周恩来也没有回家。

毛主席从卧室出来,我看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显得筋疲力尽,又很生气。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毛主席这种脸色,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毛主席还是乘坐他那辆吉斯牌轿车,出中南海西门向人民大会堂驶去。到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又住进老地方118 厅。

周恩来不时过来与毛主席交谈,报告最新情况。凌晨2时,林彪坐的三叉

载飞出国界,便从雷达上消失了。我们经历了一段极为担心的时间,不知道三叉 载飞到哪里去了。

"九一三"事件对于毛主席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他的内心 充满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此毛主席的身体每 况愈下。头几天,毛主席没有合眼,除了说"天要下雨"几句外,再也没有说过 话。一连几个月,他精神都不好,脸色苍黄,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也不像以前主 动和警卫战士说话,甚至不想见任何人。我真的担心啊,毛主席他能承受得了吗?】

据陈长江回忆,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的时间并不长,只有 20 分钟左右。大约在 9 月 13 日凌晨 1 时 10 分前后左右,毛泽东就把处理林彪问题的全权交给了周恩来,然后周恩来匆匆离开毛泽东的中南海住处,回到人民大会堂担任处理林彪事件的总指挥。值得注意的是,9 月 13 日 1 时 10 分的时候,林彪的三叉戟还在中国境内飞行,三叉戟是在 9 月 13 日 2 时才飞出国境的。这也就是说,在林彪尚未"出国"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把处理林彪问题的全权交给周恩来了。

毛泽东紧急从中南海转移到人民大会堂,这是因为林豆豆报告说:林立果准备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所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就把毛泽东紧急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118 厅。

另据陈长江回忆,毛泽东的身体在"九一三"事件后"每况愈下",这件事对毛泽东的打击是极大的。

(309)

第十一时间点: 9月13日凌晨1时20分左右,周恩来回到人民大会堂,全权处理林彪事件。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的第一件事,是向正在中国境内飞行的二五六号飞机上的林彪喊话。对此李德生回忆说:【1971年9月12晚,我从北

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进行到晚上 10 点多钟,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出去了,周总理一直没有回来。

直到午夜 12 点过后,周总理对我说: 林彪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 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二五六号飞机正在向北 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 置向周总理报告。

周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 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周恩来喊话请林彪"回来",并没有向毛泽东请示,这是他独自做出的决定, 但林彪没有理会周恩来的喊话。

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的第二件事,是下达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

飞机停飞, 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然而在 13 日凌晨 3 时左右,一架直升机违反禁空令,从沙河机场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这架飞机就是周宇驰等人劫持的飞机。

周恩来得到汇报后,立即指示迫降或打掉这架飞机的。据李德生回忆说:【凌 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周总理指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决不能让它飞走!"

我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令后,还让飞机上天?"

机场报告说: "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我立即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六战斗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导航歼六飞机,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 也能对直升飞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

(310)

这时候,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修文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祝后,他供出了驾机外逃的经过。】

由李德生的回忆可见,周恩来处理周宇驰飞机时,也没有请示毛泽东,而是 果断直接命令迫降和打掉。毛泽东为什么把处理林彪问题的全权交给周恩来呢? 因为林彪出走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按理说,毛泽东应该亲自处理这件事。从历 史上来看,凡是遇到重大事件,毛泽东都是亲自处理的,比如刘少奇的事,从开始的《评海瑞罢官》,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到把刘少奇开除出党,都是毛泽东亲自指挥和策划的。再看林彪发起"突然袭击"的1970年庐山会议,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件突发的重大事件。毛泽东是怎么处理的呢?

第一,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70年8月25月下午,江青、张春桥等人到毛泽东处告状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在8月26月和8月27日,连续三天亲自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庐山会议问题。

第二,除了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大局上把握方向之外,毛泽东还在会下,不停地找人个别谈话,打通思想。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编的《毛泽东传》记载:【从1970年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里,九届二中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

毛泽东处理重大事件是一贯做法是: (一)召开政治局会议;(二)找人个别谈话或开小会。在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前的南巡中,毛泽东也是不停地找人谈话,做思想工作。

可是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出走,这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却没有亲自主持过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或常委扩大会议,处理林彪事件的会议,全部是由周恩来主持的,毛泽东只是听取周恩来的汇报,也不做出指示,除了"天要下雨……由他去吧"这句话。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毛泽东过去一贯的做事风格。

而且,毛泽东在林彪出走后,也没有找人个别谈话,这也是十分异常的。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头几天,

毛主席没有合眼,除了说"天要下雨"几句外,再也没有说过话。以后一连几个月,毛主席精神都不好,脸色苍黄,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也不像以前主动和警卫战士说话,甚至不想见任何人。】

(311)

为什么毛泽东在林彪问题上,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也不找人个别谈话,而是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呢?因为林彪暗杀毛泽东、出逃外国,是党内斗争历史从未有过的事情,这些事,只能说明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野心家阴谋家。而毛泽东却把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当作自己的"亲密战友",并在《党章》中写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因此,在林彪事件上毛泽东肯定是有错误的,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苦心替毛泽东开脱责任,在林彪成为党的接班人问题上,周恩来多次说:"林彪成为接班人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要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

周恩来可以这么说替毛泽东开脱责任,而毛泽东本人却不能这么说替自己开脱责任说,因为毛泽东本人这么说,是无法让人心服的。因此,毛泽东如果召开会议处理林彪问题,或者找人谈话谈林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一个难题:就是毛泽东必须在林彪问题上做自我检讨,否则就说不过去。

一个领导人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自我检讨,本来就是很丢面子的事,而毛泽东的部下们,大部分是比他小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是可以当毛泽东儿子的小字辈。 让毛泽东在这些小字辈面前自我检讨,更是让毛泽东感到颜面尽失,如果说感到 "尴尬",那是不够份量的,可以说感到"狼狈"。

毛泽东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特别是他在文革中已经被林彪捧上神坛,成

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圣人;现在毛泽东一下子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堕落到要向自己的部下自我检讨的地步,这个心理落差也太大了。因此,毛泽东很难拉下面子,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自我检讨。

当然,毛泽东一句自责的话不说,也说不过去,所以毛泽东就用自己的拿手好戏,在接见外国朋友的时候,在外国朋友面前说几句自我检讨的话,然后再把这些自我检讨传到高官们中间,就算毛泽东的自我检讨了。比如 1971 年 11 月 22 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在谈话中承认自己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然后指着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等人,说:"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

此时周恩来当然要给毛泽东面子,赶紧说:"我们也犯了错误。"

在毛泽东得知林彪出走的消息,首先当然是"震惊",但马上他又想到对应的方法。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次他被林彪"坑"苦了,他已经无法亲自处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毛泽东亲自处理林彪事件,肯定会是"越描越黑",越处理越没面子,越处理越丧失威信。还不如把此事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毛泽东在威信上的损失,要比他自己亲自出面处理少得多。

(312)

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 20 分钟谈话之后,他就马上决定,林彪的问题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毛泽东做出此决定的时候,林彪的飞机还在中国境内,还没有飞出国境。早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把林彪问题全权交给周恩来处理了,可见毛泽东的反应还是极快的。

毛泽东在处理林彪问题上的唯一指示,就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做出这样的指示呢?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是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底线。毛泽东虽然搞过很多政治斗争,整过很多人,但毛泽东的整人还是有底线的,就是"一个不杀"。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犯错误的动机有两种:第一种是"为自己"犯错误,比如贪污腐败等。毛泽东对"为自己"犯错误的人,毫不手软地"杀",最著名的是建国初毛泽东亲自签署枪毙贪官刘青山和张子善。

因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曾立过不少的功劳,不少人向毛泽东说情,希望从轻处罚这两个人。毛泽东却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两人,才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认为人犯错误的第二种动机,是"为革命"犯错误。不管是左倾、右倾、路线斗争、主义之争,都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出于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看法。因此,毛泽东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包括彭德怀、刘少奇这些人,都是"为革命"犯错误。对"为革命"犯错误的人,毛泽东的处理原则是撤职、批判,但不杀。彭德怀、刘少奇等文革中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处理的。

按照毛泽东的标准,林彪是犯了路线错误(那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林彪有暗杀他的"五七一工程"),因此林彪也是"为革命"犯错误,那么林彪当然也就不该杀了。如果毛泽东下令打林彪的飞机,那就等于是下令杀林彪,这就超过了毛泽东路线斗争的底线,因此毛泽东要放过林彪不杀。

毛泽东不打林彪飞机的第二个方面,是考虑到这件事造成的社会影响。"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说明林彪事件,有人写条子询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

周恩来看了条子后,非常认真地解释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上写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嘛!"

周恩来这样解释之后,台下热烈鼓掌表示信服。周恩来又说:"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非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非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313)

周恩来的解释,其实也反应了毛泽东担心的社会影响。把林彪的座机打下来,不仅周恩来没法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毛泽东也同样无法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如果毛泽东下令把在中国境内飞行的林彪座机打下来,总得有个理由吧?毕竟林彪当时还是党章上写的接班人,没有合适的理由不行。

如果说林彪叛国罪,证据在哪里呢?只要林彪的飞机在中国境内飞行,或者 林彪的飞机在国内坠毁,就不能给林彪叛国罪的罪名,因为林彪毕竟没有出境嘛。 当林彪的飞机飞出国境,叛国罪是成立了,但到了国外的飞机,中国方面是不可 能派战机或导弹追到外国去打的。

因此,毛泽东指示不打林彪的飞机,第一方面是出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底线, 第二方面是出于没有合适的理由。

我们再转回来说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10分左右,周恩来从毛泽东住处出来之后,马上回到人民大会堂,全权处理林彪问题。

13日凌晨2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出国界,从雷达荧光屏上消失。13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开紧急政治局会议。

据李作鹏回忆:【从 12 日 23 时到 13 日凌晨 0 时 55 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我处理"九一三"山海关机场事件的全部过程。此后我虽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 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了。为什么强行起飞呢?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觉得有问题。

我刚刚躺下两个多小时,13日凌晨3时,秘书来报告说:政治局通知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到人民大会堂。由于睡眠不好,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就赶往大会堂。】

邱会作也回忆说:【13日凌晨3时许,秘书叫醒我说:"总理通知,在人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要你立即去。"我因刚吃了安眠药,脑袋晕晕忽忽的。

我们大概等了近3小时,于13日早6时,天都快大亮了的时候,政治局的会议才开始的。周总理随即进入大厅,叶剑英,黄永胜,李先念.吴法宪等人也跟在总理后面进来了。周总理刚进来时,我观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别,他看起来不光是疲劳的问题。但我万万没想到,竟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恩来本来是准备在凌晨3时左右开会的,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通告林彪飞机出境之事。由此可见,周恩来办事的行动是极为高效迅速的。林彪的飞机凌晨2时出境,凌晨3时周恩来就通知政治局委员们来开会。就在周恩来准备开会的时候,在3时15分,忽然来了报告,一架直升飞机违反禁空令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这样一来,周恩来不得不推迟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集中精力处理这架直升飞机。

(314)

关于此事,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9月13日凌晨3时15分,北京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向张家口方向飞去。李德生立即将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果断地指示:"迫它降落,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

于是空军先后派出八架飞机拦截。因天黑没有找到这架直升机,空军调度室一片紧张,总理在大会堂内等待着。这架被周宇驰等人劫持的直-五飞机,携带大量文件向北飞,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驾驶员陈修文是一位智勇双全、具有高度觉悟的驾驶员,他识破了他们的企图,机智地骗过他们,把飞机飞回北京,将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

接近地面时,陈修文与周宇驰等搏斗,被周宇驰枪杀。周宇驰等爬出飞机,狼狈奔逃,被赶来的部队、民兵、群众追进庄稼地里,团团围住。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料已无法脱逃,约定一起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当场毙命,李伟信朝天空放一枪,保住性命,被战士、民兵捕获,留下这一活的口供。】

关于周宇驰等人劫持飞机之事,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回忆说:【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9月12日那一夜,但是从家人的描述里,我了解到9月12日发生的事。

9月10日,我二叔接到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二叔带著三岁多的 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1957年刚上大学就 赶上"反右",所以二叔历来对政治没兴趣,淡泊名利,这在父亲看来属于政治 上不要求进步。二叔问父亲:"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父亲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 形势比较紧张。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 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

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

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你不用惦著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父亲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枪。

二叔看父亲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 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后父亲走了,看来父亲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 亲的事情来的。

9月12日晚上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

说着父亲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母亲。父亲和母亲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父亲说:"你不要问。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315)

二叔听了父亲的话,知道他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母亲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父亲接着母亲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母亲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母亲很信任父亲,也从来不过问父亲的事情。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父亲要是不跟母亲"交底",母亲怎么跟他走呢?

后来父亲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 父亲才显得有些着急了。父亲匆匆忙忙带着母亲和我的哥哥和弟弟走了,家里就 剩下二叔陪奶奶。

谁知没过多久,父亲他们又回来了,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

父亲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 是什么意思。

父亲要马上开车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周向红的哥哥)带走吧! 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父亲在车上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 我父亲开车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母亲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 又开走了。母亲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母亲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父亲留给母亲的临终遗言。

据我哥哥回忆,父亲在9月12日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因为没走成, 父亲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 父亲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 么死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 1971 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于新野叔叔在"九一三"之前发自一封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口气挺内疚的,他也准备去死了。】

据周向红回忆,早在9月10日,周宇驰就准备好南下广州之事,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弟弟,可见"南下广州"这件事是早就策划好的。本来在"南下广州"计划中,周宇驰等人也是带着家眷一起去的,所以周宇驰事先对他妻子"交底"了。

(316)

没想到因为林豆豆的告密,林立果紧急通知周宇驰改为"北上",于是周宇驰立即带着一家人直奔北京西郊机场,在那里他们似乎也事先准备好"北上"用的飞机。但这时吴法宪已经亲自到西郊机场去查飞机,这样他们准备好的"北上"用的飞机,就不能使用了,周宇驰只好又把一家人带回家来。

此时周宇驰做出破釜沉舟,劫持飞机外逃的决定,他把弟弟送到火车站,并 且把自己的大儿子托付给弟弟;而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以及他母亲,就只好留在 家里了。周宇驰在路上说:"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他已经准备好去死 了。

关于周宇驰劫持飞机之事,林彪专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说:【1971年"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除了256号三叉戟之外,还有一架是被周宇驰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但是很多年来,关于这架直升机的故事却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这架直升机的一位亲历者陈士印,是我在航校时的同学。1971年

春,空军参谋长胡萍找到直升机团,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这位准备学习直升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只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他与林立果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作为直升机团副大队长的陈士印,被指定担任训练周宇驰飞行的指挥员。

9月13日凌晨1点多,正在熟睡的陈士印被周宇驰的电话叫醒。周宇驰让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里,周宇驰拿出一张白纸让陈士印看,上面是红铅笔写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让陈士印开直升机去北戴河给林彪送文件。

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 3 人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匆匆忙忙装上一大堆 东西后,拉着陈士印赶到沙河机场。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飞直-五型直升机,陈士 印觉得没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周宇驰拿着这张林彪手令,骗过了机械师打开直升机,也骗过汽车连连长给 3685号飞机加了油,最后骗过场站调度室给直升机放飞。凌晨 3 点 15 分,3685 号直升机起飞。其实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向全国发出了"禁空令"。

陈士印和陈修文当然不知道这一切。直-五驾驶舱只能坐3个人,陈修文坐 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陈士印在右边驾驶,周宇驰坐在陈士印的后面。他关 掉了通话开关,又熟练地关闭了航行灯和机舱所有灯光,说是任务绝密,要保持 静默飞行。

3685号直升机起飞后,周宇驰让两位飞行员向张家口方向飞。飞行员质疑: 不是到北戴河执行任务吗?周宇驰认为不可能再继续瞒下去,才拿出一张北京— 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命令两位飞行员飞乌兰巴托。 (317)

陈士印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 周宇驰是要叛逃,这是他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一边飞一边想对策。

其实,这架 3685 号飞机当时已经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 8 架歼击机已经起飞。陈士印回忆,他和陈修文也隐约看到了在飞机周围闪过的 小飞机的影子,他们告诉周宇驰有飞机拦截,当周宇驰慌忙伸着脖子往外看的时候,飞行员趁这个间隙,眼疾手快,偷偷把飞机航向表往回拧了 180 度,并巧妙地操纵飞机向后转弯。就这样,直升机调转机头开始返航。

凌晨 4 点 50 分左右,到达官厅水库上空。北京城内的灯光依稀可见,周宇驰顿时意识到被骗了,他方寸大乱,先是掏出手枪要跟两个飞行员拼命,又让他们冲击钓鱼台国宾馆,飞行员回答说:钓鱼台附近都是高炮,还没飞到就会被打下来。

直升机渐渐飞到怀柔上空,天已经亮了。陈士印说他在沙峪一带看到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便慢慢下降高度。此时已经飞了3小时,周宇驰也知道剩余油量已经不可能飞出国境线,所以没有再阻止落地动作。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时,陈修文突然猛地向右转身,想夺周宇驰的枪,结果周宇驰顺手一枪近距离射中他的左胸。

飞机落地后,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和李伟信登着梯子上来了。他们看见陈修 文倒在座位上,知道发生了冲突,于新野立即将枪口对准陈士印准备射击。陈士 印从眼睛余光里发现有人上来,赶紧向右前方趴下去。此刻,周宇驰的两只手正 使劲抓着他的肩膀,陈士印趴下的瞬间枪响了,于新野的子弹射过来,打穿了周 宇驰的手腕。周宇驰大叫:"打着我了!"陈士印说他趁乱推开右舱门,跑了出来。 陈士印跑了后,于新野和李伟信架着受伤的周宇驰从飞机上爬下来,跑到一处玉米地里,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3个人都掏出手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而李伟信冲天打了一枪,活了下来。我听说李伟信后来在上海从事建筑业,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据康庭梓转述陈士印的回忆,周宇驰等人的直升机,并不是强行起飞的,而是通过正常手续由调度室给直升机放飞的。那时候周恩来已经对全国机场下达了禁空令,可是为什么沙河机场给周宇驰的直升机放行呢?那就是因为有"林彪的手令"。据李德生回忆说:【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我问沙河机场: "为何在接到禁空令后,还让飞机上天?"

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318)

所谓的"林彪手令",据陈士印回忆,就是一张白纸,上面用红铅笔歪歪斜斜写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林彪写几个字,没有红头,没有红章,就可以让机场违反周恩来发出的禁空令,破例让飞机起飞。可见当时林彪在一般人中间,还是有相当威信的。林彪顺便写个纸条,就是副统帅的命令,机场的人不敢不服从。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林彪坐的三叉戟飞机升空后,刚开始航向不明,后来才 把航向调到飞往蒙古。有人推测说:林彪在三叉戟升空之后,还没有确定航向, 飞了一段时间后,才下决心飞往蒙古。

根据周宇驰等人劫持飞机的行动来看,他们一上来就要飞往蒙古。周宇驰劫持的飞机与林彪的飞机不约而同地飞向同一个地点,这说明他们事先已经商约好

飞往蒙古的"北上"计划。所以林彪的飞机,并非在起飞之后才临时决定去蒙古, 而是早就准备好去蒙古了。

周宇驰的飞机凌晨3时左右起飞,在天上飞了3个小时,早上6时左右降落。周宇驰的飞机降落后,周恩来才一块石头落地,开始主持紧急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飞机出境之事。关于周恩来在这次紧急会议上说明林彪出走的过程,邱会作回忆录中有介绍,我们前文中引用过。邱会作说:【总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较远,因此,它既没有说他和吴法宪、李作鹏想办法阻止飞机起飞的情况,也没有说主席讲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话。总理有政治态度的话,都是在9月14日确认林彪摔死之后。】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周总理对大小问题都做了具体的布置。周总理把所有紧急的问题都处理完了,最后郑重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回到北京来了,并已进住中南海。"但总理并未宣布毛主席什么时候进住中南海的。

江青无头无脑地说:"昨天下午,我已经到中南海把主席卧室的窗户打开了, 换了空气。室内也做了卫生消毒处理。"

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江青也根本不会知道毛主席的行踪,她是有意吹 牛皮,抬高自己的身价。

周总理用带有调侃的语调说:"啊?我是在主席回到丰台以后,才知道这一情况的。"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之后,不仅不脸红,而且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

从 13 日凌晨 3 时,到下午 5 时半,历时 15 个小时的政治局紧急会议到此结束。】

(319)

据邱会作回忆,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们(李德生等人除外),包括江青在内,都不知道毛泽东已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可见毛泽东这次南巡行动的保密工作,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不过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发现林立果的暗杀行动,他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直觉性的防范,或者叫做革命斗争经验吧。

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于9月13日晚给在毛泽东写信汇报。周恩来在信中说:【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等人,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有通电话,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次会谈,现已入睡。今日(13日)凌晨6时半追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缴获文件材料甚多。目前北京军区、卫戍区部队均己进入部署位置,机场均有陆军驻扎,手中亦有机动兵力,便于机动,一切请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9月14日上午11时,已忙碌了40多个小时的周总理,显得格外疲倦,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才服了安眠药,上床休息。总理躺下后,很快便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14 日下午 2 时,服务员叫我们接电话,说是王海容问总理在什么地方,她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我们叫醒总理,报告了王海容电话的内容。总理叫她马上来大会堂,并让我到门口等王海容。王海容手持密封信,边走边着急地问我: "总理在哪里?"

我说:"先进去吧。"

总理已在卫生间漱口,秘书纪东接过王海容手中的信,总理催他快念。信中说,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失事,机上9人全部遇难,其中有一妇女,机号256。总理听后拿过电报,穿着睡衣拖鞋,急步走向毛主席所在的118厅。他们

谈得很久,约下午 4 时,总理才离开。政治局的全体成员已转到福建厅,总理向他们宣布了林彪摔死的消息,会场马上变得一片轻松。总理叫人准备饭,他们要好好吃一顿饭了,还破例喝了茅台酒。】

林彪一行人"摔死"的消息,中国方面是9月14日下午才知道的。周恩来拿着这个消息,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谈了两个小时。此后,毛泽东还是没有露面,由周恩来全权处理林彪事件。

(320)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得知林彪一行人在蒙古机毁人亡之后,先把这个消息报告毛泽东,与毛泽东单独谈了两个小时。晚上,周恩来向政治局全体成员宣布林彪"摔死"的消息,据邱会作回忆说:【晚上开会时,总理宣布: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了,机毁人亡,飞机上9个人都死了。

张春桥听到周总理宣布林彪死了之后,亲自到外间服务台拿出了一瓶茅台酒和几个杯子,他手拿着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说:"今天,我自己花钱请大家干一杯!"

张春桥给每人斟了一杯酒,并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好工作。"张春桥走到总理跟前时,也说了什么话,但我没有听清楚,总理没有站起来同张春桥碰杯。】

李作鹏也回忆说:【"上海帮"那几个人得知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叶剑英看到他们的这种表演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姚文元红着脸说:"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 "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

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这几句落地有声的话,驳得他们 哑口无言,低头不语。】

周恩来宣布了林彪的死讯后,连日来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松了下来。据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回忆说:【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当时李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

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下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

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 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

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 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 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毛泽东流泪的事情听过很多,不仅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多有回忆毛泽东流泪之事,就是蒯大富等人也回忆说,毛泽东当着他们的面流泪。然而周恩来却是一个极少流泪的人,很少听说周恩来流泪的故事。像纪登奎回忆说的,周恩来在林彪死后,失声痛哭的情况,是极少见的。

(321)

周恩来为什么流泪呢?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在我们看来,周恩来的流泪,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悼念林彪这位"亲密战友"。在文革中,林彪没有整过周恩来,没有为难过周恩来,相反在不少地方对周恩来还伸出援助之手。现在林彪死了,

周恩来不能不为此伤心。

周恩来流泪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感谢林彪用自己的生命,帮了周恩来一个"大忙"。本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实力对比是相差较大的,林彪的死,使毛泽东的威信大损,周恩来的威信上升。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的实力已经与毛泽东势均力敌了,毛泽东再想打倒周恩来,已是不太可能了。

当然,周恩来流泪的原因可能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下面接着说 周恩来处理林彪事件。

9月15日,从周宇驰劫持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中央政治局,其中不少与林彪四大金刚黄、吴、李、邱有关。对此邱会作回忆说:【9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会场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搪瓷盘子,里面放着一个大黑本子,本子上有两页白纸,贴着很多碎纸片拼起来的有数行红字的一张条子。这就是号称林彪写给黄永胜的那封信,信上写道:"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林彪。"

上文是我按材料抄在这里的,我现在能记得起来的不完全。信是用红铅笔写的,信的形式像林彪写的,但疑点一看就能看出来。当时就有人提出:"这是手迹吗?"我也走近桌子去看了一下,我看后,摇了摇头,表示怀疑。看完我一抬头,看见周总理就在我旁边,他用眼瞪了我一下,但没有说话。黄永胜气得坐在那里不说话。】

毛泽东看到这些材料后,对"四大金刚"产生了怀疑。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已经缴获的林彪一伙的罪证材料判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与林彪、叶群等人关系密切,非同一般。对此,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看

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9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传达到省、军级高官;9月18日,《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9月21日,中央成立林彪、陈伯达专案组,由纪登奎和汪东兴领导。毛泽东阅批:"同意。"

9月23日,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黄永胜"四大金刚"的情况。周恩来本来是"想"保这四个人的,但毛泽东下决定要拿掉这几个人。

(322)

关于周恩来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情况,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林彪等已葬身于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已是六神无主,他们没有主动向中央坦白交待,而是私下活动,销毁证据,对抗中央。毛主席决定把他们四人抓起来,这项决定由周总理执行。

9月24日上午8时,李先念率团去越南访问,去机场送行的有邱会作。逮捕他们四人的行动需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反应,便改在送走李先念以后。

24 日早晨 7 时 50 分,周总理到了首都机场。纪登奎等已到候机室,邱会作也坐在那里。和往常一样,总理与他们相互握手就座。李先念到后,我紧随在周总理的身边警惕着周围的动向。李先念登上飞机,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

周总理转身对纪登奎、邱会作说:"9点钟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其实纪登 奎知道开会的内容,邱会作也接到开会的通知,但他却不知道今天的会对他是个 什么结果。

9时,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先后到会,与邱会作一块坐在福建厅。9时

10 分左右,周总理、叶帅、纪登奎走进福建厅。他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周总理等和他们四人一一握手。就座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四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线,交待你们的错误。"

周总理指出他们四人从庐山会议到这次林彪叛逃期间的所作所为。总理没有用"罪行"二字,大概也是个策略。总理说:"林彪叛逃后,毛主席等了你们十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待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待,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所以,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

总理接着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 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就这样,比较顺利地把林彪的四员干将抓了起来,消除一大内患。这也是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一大行动。】

据邱会作回忆说:【9月17日下午4时,周总理给我打电话。总理说:"刚才,我同黄总长打电话,他理发去了。现在,我把要同他说的话,先同你说一下,等会儿你到山上去同他说一下,我现在就去睡觉了。"

周总理说:"你告诉黄总长今晚召开一次各总部、军兵种首长会议,把三北情况很好研究一下,并要尽快落实。告诉黄总长可不许撂挑子呀!"

我回答说:"总理的指示精神我懂了。我很快就上山去向黄总长报告。"

周总理又说:"会作呀,你的水平怎么这么低呀,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

我说:"总理呀,我不只是水平低,我的觉悟也很低。对现在发生的事,我想不通,也说不清楚,更是写不请楚。"说完,我的眼泪就随之流下来了。

(323)

"啊!"总理叫了一声,有些吃惊地说:"你还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你的事没有多少,黄,吴麻烦一点,黄总长是横竖看不起江青。你过去同我说过的那些问题,现在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对那些问题,我是不会忘记的(总理说到这里,我的心里很感谢他)。最近两、三天内,我会抽时间来找你谈,你的情况我还会同毛主席谈。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你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是保你的。一会你见到黄永胜,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

我说:"这个时候做黄的工作有难度。总理呀,你可要把握住江青。江青要 耍霸道,有意挑衅,黄是个很硬的人,他不怕江青。"

总理说:"你去做工作嘛!批陈整风会上,黄不肯检讨,说他在庐山没有发言, 还跟我们讲党性原则。后来,你做了工作,他才肯检讨,我相信你能做通工作。"

我说:"好,照总理的指示办。"

接完总理的电话,我一时感到轻松多了,说;"这下好了,总理保我了。"

约 6 点半钟的样子,我同黄永胜见面谈了话。这次谈话是"九一三"之后, 我们第一次谈话,也是此生我们最后一次谈话。

两人坐下来之后,反而没有立即说话,这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最后还 是黄永胜开了口。

黄永胜说:"老邱啊,我们以后谈话的机会不会多了。"

当我讲了周总理的态度后,黄永胜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总理做不了这个主,江青不会罢休的。"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不顶住文革小组那一套, 不行嘛!况且,张春桥还是个板上钉钉子的叛徒,不让江青插手军队,是怕军队 乱了,这也不对吗?"

当时黄永胜对林彪是十分有气的,他说到这里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然后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图的墙前,大声疾呼:"你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黄永胜喊完坐下来后又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还没有吃够苦头?我看,林 彪的下场就是反江青的结果,现在该轮到我们头上了。"

黄永胜说着说着,有些不耐烦了,突然说:"说这些王八蛋干什么,算了, 不说这些了。"

黄永胜又换了一个话题,说:"老邱呀,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说:"我在江西苏区就知道你,我刚参军时,你就当团长了。"

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从江西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延安、热河、东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说着说着,我们都开始流泪,边说边流,黄永胜则大哭起来,当谈到我们在敌人的炮火下生死与共的情景时,两人泪眼相望,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心里痛快极了。

(324)

9月18日下午3时,总理又给我打电话,问昨天晚上战备会议情况,转问 黄永胜的精神状态。总理问:"黄总长的情绪怎样?"

我说:"怎么好得起来,总的来说是悲观的,还做了最坏的打算。"

总理问:"主要是什么问题?"

我说:"最主要的是,他说只知道难受,不知道'病'在哪里。林彪给他的那封信,也是他负担很重的问题。"

总理说:"你同黄总长再谈一下:光难受不行,还是要好好想想,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你还要告诉他,过去你和他同我谈过的问题(指江青攻击总理之事),

我是不会忘记的。"】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在9月23日毛泽东发话抓"四大金刚"之前的9月17日,周恩来还是想保他们,特别是想保黄永胜,让邱会作去做黄永胜的工作,希望黄永胜主动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负荆请罪,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可是黄永胜却很"硬",拒不认错,还说:"我们反江青、张春桥有道理嘛!"这样一来,周恩来也没法保他们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9月24日,早6时去东郊机场送李先念出访越南。 送走李先念后,总理主动对我说:"8点钟福建厅有会,知道吗?传达主席的指示。"

我回答说:"知道。"

总理又说:"我就直接去大会堂了,你还回家不回家?"

我回答说:"那我也不回家了。"

总理说:"你不回家,还不给胡敏打个电话?"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把我们抓起来,随即笑着对总理说:"给她打电话 干什么,不用。"

总理说:"那好吧,到大会堂,我们先谈一谈。"

一踏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一眼就可以看出一切都变了。福建厅是昔日的中央政治局办公地,今天变成了法场。东边只有两张单人的沙发,南边四张沙发,北边还有两排若干张沙发。厅内沙发后面有若干警卫人员像西安临潼兵马俑的泥人一样,面无表情地站立在那里,每个人手扶着腰上的手枪。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张才千、刘贤权在北面的沙发外站着,他们对我视而不见,我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

我是第一个到福建厅的,不久,吴、黄、李先后到了,他们进来时,同我的

神情几乎一样。

大约9时,总理在杨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厅。看上去,总理心情沉重,很疲劳,步伐也不十分稳健。杨德中有意坐在总理和我们之间,这种坐法就是为了"安全",把总理和我们分开。杨德中是中央警卫团政委,专门负责总理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德中这种做法,在我们来看是多余的,在他来看是必要的。

总理坐下之后,首先喝了一口茶,并扫了我们一眼,即开口说:"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政治局内部的意见也很尖锐(指江青一伙),这样就只好先对你们采取一些措施了。党内发生过许多重大问题,毛主席都处理得很好。这次对你们的问题会处理得更好。"总理的讲话很平静、很客气。

(325)

总理说到这里又喝了一口茶,并略微思考了一下,说话时前后并不很连贯。 总理说:"出事都十天了,你们几个人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的岗位,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时 间不会太长。你们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林彪叛国,造成很大的被动,上了党 章嘛,几乎要毁掉我们的党。"

此时,吴法宪支吾地说:"我昨天晚上向主席、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凌晨五时送出去的。"

总理对吴法宪的话没有做任何表示。总理接着说:"主席说等了你们十天, 不能再等了。十天的时间,你们怎么一个字都没有给主席写?"

我们都默默无语。写什么呢?难啊。关于庐山会议的检讨,在主席那里已经过关了,主席还跟我们开玩笑。在主席那里检讨过关以后,我们没有犯新的错误, "九一三"的事,的确一无所知。写什么呢?总不能说我们也搞"政变"吧?实际 上,我们被关起来以后,主要挖我们的就是"政变"问题。

然后,总理先问了黄永胜几件事,主要问的还是前几天的那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信,黄永胜完全否认,态度很强硬。总理不好再往下说,从座位上起来,一边说:"你先走吧。"一边走上来和黄永胜握手,并叫吴忠跟黄永胜走。

接下来,总理问吴法宪:"林立果大学没有毕业,就当了什么副部长,林彪的子女都在你们空军工作。空军搞得很乱,你吴法宪是有责任的。你把空军搞得一塌糊涂!"

总理刚问完,吴法宪就站起来说:"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们 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

因为吴法宪提到了军委办事组反江青的事,李作鹏突然大声说:"吴法宪胡说八道!是他自己讨好林彪、叶群。"李作鹏心里认为,反江青算什么错?李作鹏激动得不能自己。

总理没有顾及李作鹏,马上对吴法宪说:"你也走吧。"并与吴法宪握手,由 杨俊生跟吴法宪走了。

总理又坐下来对李作鹏说:"不要急,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考虑问题。" 李作鹏走时,总理也上去与李作鹏握手。

总理有些生气地问我:"你怎么也搞进去了?"我没有吭声,也没有正视总理。接着,我有些醒悟似的,把胡敏(邱会作妻子)给林豆豆、林立果找对象的事讲了一下,我向总理做了检讨。

我走前总理和我握手,我含着泪对总理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总理那双很有神的眼睛看了我很久说:"好。"

我就要离开福建厅了,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双手握住总理的手,从肺腑里 吐出一句话: "希望再见到总理!"

总理又盯住我看了一眼,用很低沉的口气说;"到那里去,好好住下!"】 (326)

据邱会作的回忆,周恩来明确说,抓他们四人是"毛主席"的决定,并说毛泽东等了"四大金刚"十天。毛泽东等"四大金刚"十天,这里面应该包含有周恩来说好话的因素。可是这十天来,"四大金刚"一言不发,一字不写,没有任何表态。

其实周恩来在这十天中间,特别提醒他们四人,甚至明确让邱会作转告黄永胜,说:"见到黄永胜,也要给他做工作,尽快向主席表示态度。"可是黄永胜四人没有理会或者没有理解周恩来让他们向毛泽东"表示态度"的意思。不过对于黄永胜这些军人来说,他们的确也不会政治家的那种"表态",想不通就是想不通,这样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周恩来处理完林彪的"四大金刚",林彪事件算是告一段落。在毛泽东的十次路线斗争中,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彭德怀等人被批斗,被监禁,但没有被开除党籍;与刘少奇走资派司令部的斗争,只有刘少奇一人被开除党籍,王光美等人都没有开除党籍;而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有林彪、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等7人被开除党籍,这是建国后高官开除党籍人数最多的一次。

林彪的问题与刘少奇大不一样,涉及的人极多。刘少奇的秘书、警卫员等,都没有因刘少奇的倒台而受到处分;可是林彪的秘书、警卫员等人,都受到了隔离审查,贬官下放等处分。正因为林彪涉及到如此多的人,黄永胜曾不满地大喊:

"你(林彪)跑什么跑,害死人呀!"

在林彪事件结束之前,再回顾一下林彪事件的整个过程。这里主要着眼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非要拿掉林彪呢?要理解这个问题,要追溯到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如果毛泽东不搞文革,是不可能与林彪发生冲突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来自三个"不满";第一个是对刘少奇以及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的不满;第二个是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第三个是对党员干部队伍的不满。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前面已经讲过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毛泽东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满,主要是毛泽东不满苏联式政治体制。新中国建国时,由于种种原因,照搬了苏联的一套政治体制,但毛泽东却对苏联式体制很不满意。苏联式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之下。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苏联式体制的弊病很大,会导致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甚至会导致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苏联之所以变修,根本原因就在政治体制上。

(327)

因此毛泽东搞文革的一大目的,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毛泽东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打破"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苏联体制的新政治体制,比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领导班子、非党员群众参加整党、工农兵大学生、赤脚医生等等,都是苏联体制完全没有的东西。再比如王洪文这样的普通工人当副主席,陈永贵这样的普通农民当副总理,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在 1967 年说:【建国 18 年了, 我们脱离了群众。1949 年到 1952

年群众欢迎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饭,住帐篷。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搞薪金制,搞军衔制我从来就反对,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1952年以后群众对我们冷淡了,我们党脱离了群众,群众不欢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变我们脱离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不满,主要是不满干部队伍贪图安逸享乐,脱离群众。 因此毛泽东试图通过文革,对党员干部进行一次彻底的整顿。毛泽东在 1969 年 说:【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 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 就是吃饭有个定量。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 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对于毛泽东的"三大不满",那么林彪的看法如何呢?在对刘少奇不满方面, 林彪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点两人之间没有矛盾。

在对政治体制不满方面,林彪的看法就与毛泽东相左了。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林彪认为当时的政治体制并无大的缺陷,甚至觉得很不错。因此,林彪对毛泽东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携手旁观,就是消极抵制,这样一来,就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了,也就引发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

在对干部队伍不满方面, 林彪的看法也是与毛泽东相左的。林彪认为干部队 伍, 特别是军队的干部队伍, 是很好的, 根本不需要整顿。

所谓"整党",实质就是"整人",整党越彻底,整人就越多。不"整人"的

"整党",完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走过场。不少人一提起"整人",就有不好的印象,其实对"整人"应该辩证地看。

一个党要保持纯洁性,就必须经常地把混进党内的不纯分子、坏分子清除出去,这就是"整党"。不用"整人"的手段,怎么把那些不纯分子和坏分子清除出去呢?因此,"整人"本身是有必要的,但扩大化就不好了。

(328)

林彪在历史上,一直是不愿整人的"老好人",如果让林彪这样老好人来领导"整党",那么整党肯定会变成一种蜻蜓点水的走过场形式。因此,林彪这样的"老好人",是担当不起"整党建党"重任的。

另外,要想完成"整党建党",领导人必须做到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对亲朋好友一视同仁。如果领导人的私心重,把人情带到"整党建党"中,对自己的亲戚照顾一下,对自己的好友放松一下,那么下面的干部就会上行下效,大家都讲人情,都照顾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一来,"整党建党"也就只能整几个毫无背景的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不少人批评毛泽东不讲人情,六亲不认,然而要完成"整党建党"这样的工作,还非要靠毛泽东这种不讲人情的六亲不认之人。

从各方面来看,林彪是讲人情的,对自己的老部下格外关照,整党绝不会整到自己的老部下头上。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林彪这种性格的人,如果成为接班人,肯定不可能完成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毛泽东之所以欣赏张春桥,就是因为张春桥不讲人情,敢整人,这样的人才能担当起"整党建党"的重任。

综上所述,在毛泽东看来,林彪的政治理念、人品性格,都不足以托付他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因此,林彪不是称职的接班人,林彪必须拿掉。尽管 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历史上对毛泽东的贡献很大,但要想成就宏伟事业, 必须铁面无私, 六亲不认, 就是"亲密战友"也要拿掉, 这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要拿掉林彪,而林彪却不甘愿被扫出历史舞台,于是一场围绕着接班人的攻防战就展开了。在毛、林下的这盘攻防大棋中,林彪走的棋是先声夺人,毛泽东不得不被动应付,毛泽东遇到他政治生涯中最棘手的敌人。直到南巡讲话,毛泽东以为这次可以先声夺人了,但没想到林彪出手更快,来一个叛逃,搞得毛泽东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使毛泽东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受到重大的打击。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说:【当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干将后,我明显地看到,主席的身体、精神不如从前了,一下子变老多了,他后悔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毛主席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苦苦思虑,白发骤增,我们无不为毛主席的身体而焦虑。】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长江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对于毛主席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此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

1972年1月初,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从八宝山回来毛主席就病倒了, 1月13日突然休克,时隔不久,毛主席再一次休克。这以后,毛主席的身体一 直没有恢复过来。】

毛泽东的身心受到巨大创伤,就是林彪"同归于尽"战术想要达到的目的。 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他已无法全面主导中国的政事,之后中国政治进入一个 新的时代,这就是周恩来时代。

第二十二节 短暂的周恩来时代

(1)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因为群众对林彪问题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为了避免引起太大的震动,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林彪事件。"九一三"不久恰逢国庆节,往年在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这一年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这是建国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而且毛泽东从此再没有在国庆节登上过天安门城楼。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成了中国事实上的第二把手。前任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和林彪,党的宣传机构都对他们有很大力度的宣传,比如刘少奇标准像与毛泽东并列在一起,对林彪更是铺天盖地宣传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而周恩来成为第二把手以后,报章刊物上从来没有正面宣传过,从来没有"以毛主席为首、周总理为副的党中央"这种说法,尽管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后,是货真价实的第二把手。

虽然宣传机构没有对周恩来进行正面宣传,周恩来的威信和实力,不管在高官中间还是在群众中间,都远在刘少奇和林彪之上。刘少奇当权时,只是主管党务;林彪当权时,只是主管军队;而周恩来当权时,是党、政、军都管,实权远大于刘少奇和林彪。特别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情况相当差,国家事务基本上全由周恩来主持,因此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周恩来时代"。

周恩来掌权后,他就试图推动中国走上他设想的道路。周恩来大幅度地修改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按照当时的话叫做"扭转局面"。周恩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着林彪事件,让一批在文革中被批判和靠边站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重新出来掌权。周恩来让这些"靠边站"的高官们赶快"揭发批判"林彪,利用批林

彪来铺垫自己复出的垫脚石。

揭批林彪罪行的"靠边站"高官有:朱德、刘伯承、陈毅、李富春、聂荣臻 等人。

朱德给毛泽东写信说:【毛主席,党中央: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 57 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的叛党卖国的 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 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 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 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 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 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 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余容后呈!朱德。1971年10月22日】

(2)

刘伯承在揭发谈话中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结果贻误了战机。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

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林彪却对政变很有 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李富春在揭发谈话中说:【遵义会议后林彪就反对毛主席,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陈毅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措施。林贼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的阴谋未逞。仓惶出逃,坠机自取灭亡。这是卖国贼的必然下场。这是党的又一次最伟大的胜利。今后的胜利会更大。特此祝贺!

我患病将近一年,仍在继续治疗。我感谢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我揭露 林贼罪行的录音稿太长,难于看。兹先整理一份摘要材料,先送呈,请审阅。

敬祝主席万寿无疆!陈毅。1971年10月10日】

陈毅在揭发讲话中说:【红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1944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等人。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苏联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 • • • •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 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28 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 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

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聂荣臻在揭发谈话中说:【第一次庐山会议后,林贼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

(3)

这些老干部虽说口诛笔伐地揭批林彪,但揭发的理由多半是牵强附会,没有多少说服力。其实这些高官过去与林彪的关系都不错,甚至是支持林彪的。比如陈毅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曾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陈毅说:"九大之后,我是被打在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现在这些高官上纲上线地大批林彪,他们心中并非真的那么痛恨林彪,这些只是一种政治策略而已。只可惜当时刘少奇已死,否则刘少奇也很可能会写信揭 批林彪。

最著名的还是邓小平写给毛泽东的信,邓小平写道:【林、陈反党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

邓小平在信中揭批了林彪的五个问题之后,笔锋一转说:【我在主席的关怀

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

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周恩来对林彪的揭批,调子却是比较缓和的。周恩来说:【不能讲毛主席从 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已看出林彪反党、只是当时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没有提林的问题, 这不是我们党看问题的方法和主席的作风。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 题。

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会有变化的。同样,我们对林彪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怎么会一下子就识破他呢?九大时还不可能识破他,否则,怎么会让他当副主席?林彪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因此,对林彪要作具体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就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总之,对我们党来说,林彪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

周恩来让文革中批臭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本身就是变相地否定文革,这些人的平反,本身就是证明打倒老干部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令人意外的是,面对周恩来这种变相否定文革的做法,毛泽东不但没有反对,反而积极支持给一部分老干部平反,重新"请"他们回来工作。

毛泽东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前一段文革运动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面,也使得前一段文革的成果"前功尽弃"。因为毛泽东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些有影响力的高官"靠边站"了,现在再把他们"请"回来工作,岂不是前功尽弃吗?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被打倒的老干部再"请"回来呢?下面我们将进行一些分析

(4)

林彪作为党的第二把手倒下之后,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必须有人来填补林 彪的空缺。不论从资历还是能力,周恩来都是最为恰当的第二把手,但毛泽东从 来没有想过让周恩来填补这个空缺。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本来应该由第三位的周 恩来接任第二把手,可是毛泽东却破格提拔排名第六位的林彪顶替刘少奇的空缺。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让周恩来当自己的接班人。

由于林彪的倒台过于突然,毛泽东完全没有准备,不得不让周恩来暂居第二 把手的位子。周恩来也清楚,自己不是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自己的第二把手只 是暂时的,毛泽东早晚会找别人来取代自己。后来毛泽东试图让王洪文当第二把 手和接班人,就是明显取代周恩来的举措。

然而周恩来一旦上了第二把手的位置,他就不能轻易下来,他要争这个位子。按照现在的主流说法,周恩来争第二把手的位子,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党和国家"。因为周恩来如果不"占住"第二把手的位子,这个接班人的位子就要被江青集团"四人帮"拿去。周恩来表明上是与"四人帮"争权,实际上是与毛泽东争权。

前面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最初以为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取胜,可是遇到种种困难之后,毛泽东发现自己已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文革,他要把"继续革命"的任务交给他的接班人来完成。因此在文革后期,毛泽东的主要布局不再

是夺权,而是安排自己的后事,也就是接班人。

因为林彪不是毛泽东意中的接班人,所以毛泽东必须拿掉林彪,换上自己意中的接班人。林彪的自我爆炸,某种情况解决了毛泽东拿掉林彪的麻烦,可是毛泽东还要面临一场更为艰巨的战役,这就是拿掉周恩来。毛泽东知道,周恩来是他搞文革最大的阻力,如果让周恩来接班,他的文革不仅不可能完成,而且要半途而废,百忙一场。因此,毛泽东为了完成他的文革"继续革命"大业,就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内,拿掉周恩来,换上自己意中的接班人。

林彪事件之后,一场新的接班人之争,就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悄悄展开了。 这场毛、周的接班人之争,与毛、林的接班人之争有相似之处。毛泽东试图用"四 人帮"中的张春桥取代林彪,又试图用"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取代周恩来。

林彪和张春桥争夺接班人,用的是"硬办法"。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亲自吹响批张春桥的号角,然后陈伯达和"四大金刚"一齐煽风点火,刮起一股揪"张春桥"之风。林彪试图用"硬办法",逼毛泽东被迫放弃张春桥。

而周恩来和王洪文争夺接班人,则是用"软办法"。周恩来表面上支持王洪文当接班人,实际上则用种种办法,让王洪文干不下去,这样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王洪文。"以柔克刚"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而林彪只擅长打硬仗,不擅长"以柔克刚"的战术。

(5)

毛泽东拿掉林彪的战役,用的是"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角"的三板斧战术,毛泽东拿掉周恩来的战役,同样也用"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角"的三板斧。毛泽东先对周恩来实施"挖墙角"。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大量老干部, 赢得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人心, 这是周恩

来最大的武器。而毛泽东要拿掉周恩来,首先要把支持和拥戴周恩来的一批老干部"挖"过来,跟周恩来争取老干部的"人心"。

毛泽东争取人心的策略,就是把文革中批斗老干部的责任推到林彪身上,声称自己是听了林彪的谗言,误伤了老干部们。现在林彪倒台了,毛泽东就给老干部平反,让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毛泽东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老干部的人心争取过来。

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主要有八组:第一组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第二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第三组是薄一波为首的 61 人集团;第四组是贺龙;第五组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第六组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第七组是陈伯达;第八组是林彪集团。另外还有一组人比较特殊,他们没有被打倒,但是被"靠边站"了,这就是"二月逆流"事件中的"三老四帅"。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给老干部平反的力度是比较大的。第一组人物中的罗瑞卿平反,第二组人物中的邓小平平反。陶铸如果不死,也很可能平反;第四组的贺龙平反;第六组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还有武汉"七二零"事件的首要人物陈再道也获得平反。

这些人虽然得到平反,但都没官复原职,只是任一个闲职(邓小平除外)。比如罗瑞卿任中央军委顾问,杨成武任副总参谋长,陈再道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可见毛泽东并没有想重新启用他们,给他们平反,只是为了争取人心之举。

毛泽东"挖墙角"的第一批对象,直指周恩来派系的铁杆人物,也就是参与"二月逆流"而被罢官或"靠边站"的高官们。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谈话中,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平反的态度。

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讲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谈话时,得知陈毅病重时,再次明确表示说:【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叶剑英立即赶往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晚上,陈毅去世。陈毅是因"二月逆流"受打击最大的人之一,临终前得知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心情一定是很愉快的。

(6)

毛泽东破例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被传为文革中的一段佳话。有不少人说: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因为毛泽东思念陈毅这位老战友的旧情,这种看法是不太合理的。一来,毛泽东是一个讲路线而不讲人情的人,当初批陈毅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念旧情,怎么会在陈毅死后忽然念旧情呢?二来,陈毅是最顽固地抵制文革的"右派"之一,就是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毅还跳出来公开支持林彪,被毛泽东批为"二陈合流"。

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虽然说里面肯定有悼念老战友的意思,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并非如此。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因为毛泽东不是那种"心血来潮"做事的人,他做事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比如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出毛泽东做事的计划性。

毛泽东的原计划是不参加陈毅追悼会的,因为当时陈毅的身份只是普通中央

委员。按规定,普通中央委员不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追悼会的规格比较低。 不过考虑到陈毅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所以陈毅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追 悼会的规格"低于谢富治,略高于李天佑"。谢富治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委员,上将军衔;李天佑的身份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军衔。陈毅 的追悼会,原定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只 请内宾,不请外宾。

关于陈毅的悼词,周恩来也是颇费心思。陈毅的悼词总共 600 字,简历就占去了一大半。在审改陈毅的悼词稿时,周恩来亲笔加入了一大段话:【(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周恩来把修改后的悼词送毛泽东审阅,并对他加入的一段话进行了解释:"陈 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毛泽东阅后删去"功大于过"等话,批示说:"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毛泽东虽然删去"功大于过"等话,但也没有说"陈毅是好同志"等赞扬陈毅的话,更没有表示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可是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出席,此举众人都没有想到。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

过了一阵, 主席突然问我: "现在是什么时间?"

我告诉他:"现在是1点半。"

主席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7)

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 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 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 就行了。'

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和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他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毛泽东来到八宝山悼念大厅的休息室后,提出要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 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迎接。 张茜握住毛泽东的手,流泪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陈毅 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旁的人立刻把 一块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

据陈毅之子陈昊苏回忆说:【听说毛主席到了那一天,他就老惦记着这个事

情,然后临时就说,让身边的人派车,他要去,当时很急促。我们进休息室,看 到毛主席是穿着一件睡衣,后来进入这个大厅就在追悼会的现场披了一件大衣。

我们当时有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毛主席那时候有胡子,胡子很长。因为经常在报纸上或者是电视上看到毛主席的照片都是没有胡子的,毛主席如果是事先就预定要来的话,他当然会把胡子刮掉,看来是临时来的。

毛主席在见我们的时候,就鼓励我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且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要真正懂得这个世界的大事儿,并不容易,你总要准备去奋斗20年,摔很多的跟头,才能够懂事儿。"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想,因为他们老一代人,大概都是这样奋斗过来的,也都 是摔过很多跟头的,都是走过坎坷的道路。】

(8)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电话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发出通知:"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宋庆龄副主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负责人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并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参加。凡是提出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立即把陈毅追悼会提高到最高的规格。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在京的高官们迅速赶到追悼会会场,宋庆龄、朱德、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等人都来了,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在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他跑了!他的飞机摔到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他摔死了!"

毛泽东还指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陈毅追悼会原定是叶剑英致悼词,而叶剑英在快开会的时候,把悼词递给周恩来,意思是改请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也心领神会,就改为他亲自致悼词。周恩来对陈毅的感情是很深的,短短几百字的悼词,周恩来三次哽咽念不下去。在 向陈毅遗体告别时,周恩来还掀起覆盖的白布单,抚摸陈毅的手背。

周恩来念完悼词后,毛泽东率领众人向陈毅遗体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脚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只好由工作人员帮他登上汽车。毛泽东这次突然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由于事先没有准备,穿着单薄的衣服在严寒中受凉,结果感染了肺炎,不久又发生休克,使毛泽东的健康急剧恶化。这些是后话了。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通栏标题《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陈毅追悼大会,同时刊登了陈毅遗像、周恩来的悼词和西哈努克的悼文。陈毅追悼会大大超出了原定的范围,成为新中国建国后最降重的追悼会之一。

现在的各种资料显示,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之前,曾经做过长时间的反复再三思考,最后才终于下决心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为什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需要如此慎重地前思后想呢?

毛泽东自己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第二件就是文革。因此,毛泽东最后几年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文革"这件大事展开的,毛泽东试图把"继续革命"的重任托付给他的接班人。可是现在周恩来已经占了接班人的位子,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拿掉周恩来。

(9)

毛泽东急于拿掉周恩来,是基于自己死在周恩来之前的考虑。从1971年到

1972年这段时间来看,周恩来的身体远好于毛泽东。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 毛泽东的睡眠就很不好,不停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 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而周恩来虽说有心脏病,但身体状况还 是很好,一天可以工作十几个小时。

所以那时大家普遍认为,周恩来将活到毛泽东之后,谁也没想周恩来的身体 急剧恶化,居然走在了毛泽东之前。如果毛泽东可以预知周恩来走在自己之前, 那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宋江投降派"等针对周恩来的"甩石头"之事,根本 就没有必要了。

毛泽东拿掉周恩来的最大障碍,是周恩来在老干部们中间的口碑极好,特别是文革中周恩来尽可能地"保"老干部,不管什么派系的,只要能保他都保。从这点来看,周恩来真的有点像《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不管谁有为难之事,他都伸出援助之手。

老干部们普遍认为毛泽东要打倒他们,而周恩来在保护他们,所以老干部对周恩来心存感激之情,而对毛泽东心怀不满,甚至怨恨。这样一来,老干部们的感情天平是倾向于周恩来的,这是毛泽东要拿掉周恩来的最大障碍。因此,毛泽东一定要把老干部们的感情争取过来,这是拿掉周恩来不可缺少的一步棋,否则老干部们紧紧团结在周恩来周围,毛泽东根本搬不动周恩来。

林彪事件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毛泽东借此给众多高官"平反",试图让他们意识到,毛泽东当初打倒他们,只是因为误听了林彪的谗言。现在毛泽东要和老干部们重新修好,要把老干部们重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因此,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与老干部们"修好"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陈毅在文革中是作为"右派"的典型代表,他对文革有严重的抵触情绪。而

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就意味着像陈毅那样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的 老干部,毛泽东都改变了看法,称他为"好同志"。那么对于其他没有那么严重 错误的老干部们,毛泽东更应该认为他们都是"好同志"了。因此,毛泽东参加 陈毅追悼会,对团结老干部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也的确 被传为佳话。

然而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却又有"不利"的一面,这就是它会影响人们对"文革"这件事的看法。对于"文革"这样的革命运动,必须要让人们感到一种"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样才能激发人们来为它奋斗献身。因此,树立和保持文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10)

单纯看林彪"叛逃"这事件本身,它对毛泽东的冲击并不大,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把林彪与文革联系在一起。这里摘录一段 1968 年 10 月公布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当时人们的想法,文革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发起的,而是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和发起的。当时的报章刊物,都把文革描述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现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林彪成了反革命,人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彪在推动文革运动方面,的确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文革早期大

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大搞学习毛主席语录。"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林彪发起和促成的,还有随时随地手拿《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学习,也是林彪开创的"一代新风"。

文革从发起到开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许多是林彪出面主持的;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思想和提法,都是由林彪首先讲出来的。林彪这位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忽然成了反革命,这就使人们不可避免地对文革这场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正当人们对文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怀疑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人们又会怎么想呢?

人们的第一个想法,是陈毅被冤枉了,陈毅被"靠边站"是冤案,所以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表示一种歉意和安慰。尽管可以说陈毅是被林彪的谗言陷害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文革这场运动所造成的。还有罗瑞卿的冤案,贺龙的冤案,杨成武的冤案,这些都是文革中搞出来的冤案。虽然可以说这些冤案的责任者是林彪,但文革这场运动,居然被坏人利用,造成这么多的冤案,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怀疑文革的"合理性"。

人们的第二个想法,是对领导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产生怀疑。当时一般人普遍认为,陈毅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陈毅才被"靠边站"了;而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林彪才成为写入《党章》的接班人。

根据当时的宣传,人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怀疑的,更不能怀疑副统帅。而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又说陈毅反对林彪是正确的。当时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陈毅敢于反对林彪,事实上也就是敢于质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推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不一定绝对正确,对"无产阶级

司令部"也不能盲从。

(11)

"无产阶级司令部"中,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江青等人。根据上述推论,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不一定绝对正确,人们也可以质疑江青等人,甚至可 以质疑毛泽东。既然领导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不一定绝对正确,也是可 以质疑的,那么人们也就有理由质疑文革的"正当性"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对修复和改善毛泽东与老干部们的关系,是"有利"的;而对于保持和改善人们对文革这场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看法,又是"不利"的。因此,毛泽东对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不得不前思后想,权衡利弊,直到最后一刻,毛泽东才终于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本想借此修补与老干部们的关系,以便在后来"倒周"的时候,老干部们可以站到自己的一边。可是没想到匆匆参加陈毅追悼会,使毛泽东受凉得了重病,差点见了马克思。在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毛泽东基本上处于养病状态,无力掌控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周恩来掌权的"短暂周恩来时代"。

在 1972 年的时候,毛泽东已是 79 岁高龄之人,一般人在这个年龄得了重病,要想恢复是很难的。所以当毛泽东病重的时候,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官们,都以为毛泽东的日子不多了,没想到毛泽东在 1973 年下半年之后,身体又恢复过来,重新掌权,这是后话了。

对于高官们来说,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如果领导人的健康 状况不好,大家看他"来日无多",很多人就会赶紧"另寻出路"。1966 年毛泽 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前畅游长江,并大肆宣传,就是要让高官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信 心。可是在 1972 年,高官们对毛泽东的身体都失去信心,除了江青集团之外,包括汪东兴、张耀祠等毛泽东的亲信,都在水面下活动,寻找在毛泽东身后的出路。

领导人得势的时候,身边会有大批高官前呼后拥,高呼万岁,宣誓尽忠;可是当领导人失势或者死去的时候,真正能够尽忠的高官,就寥寥无几了。刘少奇失势的时候,对刘少奇"尽忠"的,除了妻子王光美之外,还有一个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开除刘少奇党籍时,拒绝举手,可以不严格地算为"尽忠"。

林彪失势的时候,除了妻子叶群之外,没有一个高官为林彪尽忠。最后拼死 为林彪尽忠,帮林彪出逃的,都是一些小人物或小官:飞行员、机械师、司机、 还有林立果拉起的队伍里的小官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人。毛泽东去世后, 也只有江青和张春桥两个人为毛泽东"尽忠",连王洪文和姚文元都积极检举揭 发,表示要戴罪立功。

(12)

毛泽东病重,高官们自然而然地团结到了周恩来的周围,这也是开创周恩来时代的重要因素。周恩来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旦他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行使的权力,周恩来马上亮出自己的颜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在短暂的周恩来时代,周恩来做了和准备做三件事:(一)外交上走出新的"联美抗苏"的道路;(二)政治上展开"批林整风",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虽说批判"极左思潮"表面上是针对林彪的,实际上涉及到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三)经济上抓生产,一扫文革中重视革命,不重视生产的倾向,使经济有较大的回升。

先说周恩来时代的外交成绩:实现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和与日本建交。新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两个外交关系。与美国的关系,牵扯到台

湾问题;与日本的关系,牵扯到历史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在历史问题上,如果中国方面毫不让步,就无法打成协议;而如果中国方面让步太多,又有被贴上"卖国"标签的可能性。周恩来勇于承担责任,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两大外交难题。

从历史来看,中共高层中可以不严格地分"亲美派"和"亲苏派"。中共高层为什么会有亲美派呢?这要追溯到抗战时期。美国对日本宣战后,向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美元和武器物质,希望蒋介石积极对日军发起作战,消灭一部分日军的有生力量,这样可以减少美国对日作战的伤亡。

可是蒋介石拿到美元和武器物质后,却保存实力,对日军避而不战,这样就 大大激怒了美国人。美国反感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避战,开始转而接触在延安的 中共,试图向延安提供武器物质,让中共向日军发起作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 领导层,对美国的这个设想大为欢迎,声称只要美国的援助到位,他们就立即开 始对日军作战。

1944年11月4日,毛泽东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祝贺他再次当选总统,并表示中共军队如果得到先进武器装备,一定会更好地配合美军的太平洋作战,更大规模地歼灭日军。毛泽东还托人向罗斯福总统转达:如果在白宫把中共当作中国的一个重要党派来接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尽快地单独或同去华盛顿。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美国援助中共对日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中共却因此与美国建立了"交情"。抗战结束后,美国又积极促成国民党与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1945年10月,毛泽东在美国特使的陪同下,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内战再开之后,美国的调停失败,美国转而支持蒋介石政府,中共与美国的接触就此中断。尽管如此,中共还是感谢美国帮助和平调停,因为当

时成立联合政府,对中共是有利的,因此也就产生了亲美派,亲美派为首的就是 毛泽东和周恩来。

(1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继而中国志愿军又在朝鲜战场与美军作战,中共进入直接与美国对抗的阶段。这样中共高层亲美的声音暂时消失了,但在内心感情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比较亲美的。因为苏联斯大林一直不喜欢毛泽东,支持王明,所以毛泽东对苏联也是不喜欢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于是两国就在第三国开展大使级的会谈。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地点,1955年到1958年在瑞士的日内瓦,1958年到1970年在波兰华沙,所以又称"中美华沙会谈"。1970年以后,中美建立了直接会谈的渠道,华沙会谈也随之结束。"中美华沙会谈"一共进行了136次,但由于会谈双方的官员级别低,谁也作不了主,所以会谈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果。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边境冲突,一时间中苏关系极度紧张,有大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1969年1月新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从中苏关系紧张看到美国对付苏联的新的可能性,就是联合中国共同反苏。于是尼克松开始考虑"打中国牌",向中国方面发出一系列"信息",并多次声明他将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尼克松还请巴基斯坦总统向北京传话,表示美国无意孤立中国,愿在任何时候同中国进行会谈。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由于受到苏联巨大的军事压力,也开始考虑"打美国牌"

来对付苏联。1969年7月,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名元帅,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交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书面报告,该报告认为:对于苏联来说,苏联与美国的矛盾,大于苏联与中国的矛盾,所以苏联不会轻易发起侵华大战;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与苏联的矛盾,大于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所以可以考虑利用美国对付苏联。

据原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回忆说:【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定稿后,陈总(陈毅)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总说: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 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 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 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 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

(14)

陈毅的"不合常规"想法核心是:(一)中方应该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条,主动与美国接触,更不要拒绝美方提出的建议;(二)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可以在这方面适当让步。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应验了陈毅的"不合常规"

设想。

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华沙举办的时装表演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与中国外交官搭话,但中国外交官却离开会场走了。这时美国大使急忙叫住中方的翻译,用波兰语说:他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尼克松总统想与中国进行"重大的、认真的会谈"。

中方翻译不敢做主,只是把这件事汇报上去。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最初的反应是: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1970年1月,在华沙再次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周恩来在中方的发言稿中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1970年2月,在华沙又再次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基本上接纳了中方的建议,准备派特使到北京会谈。不久从巴基斯坦传来美方的口信:尼克松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派基辛格来中国秘密接触。

就在中美关系即将出现突破的时候,1970年3月18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入驻柬埔寨。中国为了支持柬埔寨,推迟了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计划,直到1970年底,中方才重新把中美高级会谈提到日程上。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时,毛泽东对斯诺说:【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上,美国代表队提出访华的希望,外交部经过研究,提出"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的结论。其实周恩来是倾向于邀请美国队来中国的,可是他还摸不清毛泽东的底,怕贸然同意美国队访华,会惹来"投降派"的帽子,所以周恩来在外交部的"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的报告书上,写了"拟同意"三个字,然后把报告呈送毛泽东。

周恩来写"拟同意"这三个字非常巧妙,既不说自己已经同意了,也不说自己不同意,"拟同意"让别人抓不到把柄。这样不管毛泽东是赞同还是反对美国队访华,周恩来都不会让人抓到把柄。

(15)

4月4日,这份报告转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最初在报告上圈阅同意,也就是同意外交部不邀请美国队来中国。对此事,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毛主席在4月6日那天,给我看了外交部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 4 月 6 日那天,主席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 11 点多了,他就坐在床边,我坐在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就坐在他对面。

主席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下。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嚷嚷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白天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呀?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

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 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

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主席,你刚才都跟 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

主席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 遍。我就反问了一句:"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

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毛主席做了最新的决定。】

据吴旭君回忆说,毛泽东刚开始并没有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因为这是中方主动向美方示好。新中国自从朝鲜战争后,中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当时的宣传也把"美帝国主义"说成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现在中国要向这个头号敌人"示好",很多人必然在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慎重考虑。

不过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也就是吴旭君说的"有心事",最后还是决定邀请美国队。得到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马上通知邀请美国队访华,这就是所谓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是中国主动向美方示好,加快了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之后,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政府传递了《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4月29日,美方传来口信,表示接受邀请,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周恩来写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一天,中方向美方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秘密会晤。

7月9日,基辛格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秘密抵京,在北京停留 48 个小时,与周恩来行了 6 次总计 17 小时的会谈,双方商定尼克松总统在 1972 年 5 月前访华。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次他对周恩来的印象:【周恩来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

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 文儒雅,耐心无穷,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 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目的的。】

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公告,全世界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注意到1971年7月这个时间,此时林彪"九一三"事件还没有发生,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据吴法宪回忆说:

【中美和解的事情,以前就有酝酿了。第一是尼克松公开发表讲话,说他愿意访问中国,愿意和毛泽东会谈,这个消息曾在《参考消息》上发表过。第二是"乒乓外交"事件,美国队来北京访问,周恩来还接见了他们。第三是斯诺访华,1970年12月,毛主席通过斯诺向美国政府发出信息,说:"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作中间桥梁,多次向美国秘密传话。

之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准备来中国进行一次秘密访问。毛主席制定的 方针是,同意基辛格来谈,具体的工作由周恩来全面负责。最后商定,基辛格从 巴基斯坦秘密到北京来,飞机降落在南苑军用机场。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长和翻译唐闻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还派了中国的领航员一同前往,把他们的飞机领进来。飞机方面的事情,周恩来交给我来负责。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护,机场着陆等都由我负责。另外,基辛格来时南苑机场封锁起来,以免走漏消息。

(17)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长和翻译唐闻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还派了中国的领航员一同前往,把他们的飞机领进来。飞机方面的事情,周恩来交给我来负责。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护,机场着陆等都由我负责。另外,基辛格来时南苑机场封锁起来,以免走漏消息。

这件事情是十分突然的。因为从 1949 年起, 经过朝鲜战争, 中美双方一直 处于战争状态。全党全国对于基辛格的到来, 思想上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 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打一个招呼, 不然的话, 怕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主席在 政治局讨论时, 决定开一个会议, 讨论怎样在全党和全国转这个弯。

这样,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刚结束,就又开起了中美关系通气会,内容是讨论中美关系。会议首先由外交部详细介绍美国的情况,并通报了中、美通过巴基斯坦之间多次联系的情况。接着,传达毛泽东确定的方针,以及外交部的意见。

外交部的意见说,我们欢迎基辛格先来,因为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有所转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争取通过中美正常关系的建立,进入联合国;第二、要求美国承认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争取解决台湾问题;第三、中美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提出来,如美国在华财产的冻结问题。如美提出归还,我们准备怎么对付等等。

外交部的意见还说,在中美建交以后,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能一致的一致,不能一致的放在一边,继续和他们斗争。我们的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又建交又斗争。

最后,我们要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变化,进行公开的宣传和教育,要在思想上转过弯子来。为此,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报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文件。】

相对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美立场,刘少奇是比较明显的亲苏立场,而林彪因为一直不负责外交问题,所以他对中美和中苏关系的立场不明确。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林彪是亲苏派,反对中美接近;另一种认为林彪也是亲美的,至

少是反对中国与美国对抗。

前一种说法,主要是从林彪最后出走苏联,以此来证明他的亲苏倾向。后来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也提到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 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18)

关于后一种说法,据吴法宪回忆说:【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彪除了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外,没有说过任何其它的话。当时,为了庐山会议的事情,林彪自己已经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去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呢?

据我了解,在国家不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不主张与美国直接对抗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1950 年在决定出兵朝鲜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甚至是反对的。本来,林彪是率领军队入朝作战的最合适人选,但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的,毛泽东只好去请彭德怀出山。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发 1971 年 57 号》文件中指出:"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所以,说林彪和我们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这是凭空转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改善中美关系的决议和进程。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此时林彪事件才结束不久,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十次会谈。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台湾不再被承认是中国的代表。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

中国如此迅速地得到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周恩

来后来对外宾说:【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也 出乎美国的意料。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 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

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发表公告:【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对中国访问。】这样,中美接近的事情就向全世界公开化了。

关于周恩来的外交政绩,正确地说,战略构想还是毛泽东的,周恩来的功劳,主要体现在具体事务上。周恩来后来会见美国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打开中美关系,乒乓球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主席下的决心,他相信这个'球'打出去,你们会响应的。"

不过虽说毛泽东下决心"打美国牌",但真的要把"美国牌"打好,真正开辟出"联美抗苏"的外交新格局,没有一个好的外交家来操办这件事,肯定也是不行的。特别是中美关系牵扯到台湾当局和主权问题,是非常不好谈的棘手问题。如果让江青或者张春桥去负责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恐怕非谈砸了不可。周恩来能把"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么棘手的问题谈下来,谈得不卑不亢,美方对中方也很敬佩,这是很不容易的。

毛泽东也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周恩来搞外交的能力比自己强,所以他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具体的问题不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

(19)

尼克松预订于 1972 年 2 月 21 日访华,然而就在尼克松访华前 9 天,2 月 12 日的凌晨,毛泽东突然休克昏迷了。当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毛泽东身旁,及

时发现毛泽东发生了休克,立刻叫人抢救。如果毛泽东像斯大林那样,一个人单 独呆在房子里,发生休克后无人知道,那就非常危险了。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立刻赶到毛泽东住处。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

周恩来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他们有的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在数脉搏。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血压,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慢慢地清醒过来。】

毛泽东这次虽然死里逃生,从休克中清醒过来,但此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一落千丈。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记载:【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毛泽东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毛泽东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毛泽东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毛泽东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毛泽东的个性依然那么强。

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主席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三十

九度五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地说:'我什么事都没有。'"

毛泽东重病的这些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 1972 年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当时的健康状况。

1973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1972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毛泽东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20)

毛泽东在 1972 年到 1973 年上半年身体健康状况很差,这就在客观上造成这一年半短暂的"周恩来时代"。尽管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很差,但像尼克松这样重要的客人,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见。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毛泽东突然休克病危的日子只有9天,毛泽东健康状况仍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毛泽东却下决心"冒险"会见尼克松。对这件事吴旭君回忆说:

【毛主席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

在会见时,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在门后头,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是处于临战状态。

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

也很惊人。在主席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 15 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 65 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

当然,尼克松等人是不知道毛泽东真实健康状况的。尼克松到中国的当天下午2时,便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尼克松事后回忆说:【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的飞机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 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 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 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毛泽东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毛泽东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周恩来后来告诉我,毛泽东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 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21)

每一个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对毛泽东表示其所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十分钟后,周恩来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毛泽东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 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基辛格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毛泽东过分疲劳。

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可是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毛泽东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 周恩来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我说:"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只争朝夕",毛泽东露出了笑容。】 关于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的具体内容,除了《尼克松回忆录》和基辛格的《白 宫岁月》中不完整地提到之外,现在网上流传一份《解密毛泽东与尼克松谈话》, 号称是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解密材料。不过这份材料的疑点甚多,只能作 为参考。总而言之,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全文并不重要,只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毛泽东只谈哲学问题,让周恩来谈具体问题。

尼克松说:"如果可能,我希望跟总理,以及以后跟主席除了讨论眼前的问题,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

毛泽东不等尼克松讲完,就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总理跟你谈的事。"

基辛格也回忆说:"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二)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

尼克松说:"周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也在伸手,那么问题是, 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 的问题,但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在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

毛泽东说:"就是啰。"

(22)

尼克松说:"当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时,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说:"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周恩来说:"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关于毛泽东的这些话,基辛格分析说:毛泽东在这里暗示"我们的兵也不出国",这个保证消除了美国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

基辛格还分析认为:尼克松提出的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毛泽东并未回答这个问题,根本不提苏联,而是说"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通过排除法,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

基辛格又认为:毛泽东说"中国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这是毛泽东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

(三)毛泽东对过去中国僵硬的对美政策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 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也不干,包括 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在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之后,周恩来就着手与美方谈具体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都体现在《中美联合公报》中。《中美联合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一方面没有掩饰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另一方面又强调双方有共同的利益。《中美联合公报》最后能够签署,周恩来的作用是很大的。

周恩来与美国谈判最难的是台湾问题。首先,美国过去对台湾的一贯立场,

是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这里稍花笔墨说明一下"台湾地位未定论"。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代表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 正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正式划入日本版图,这是符合国际法的。1943 年 11 月美国、英国、中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声明:"日本过去从中国所得到 的所有领土,比如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不过《开罗 宣言》只是单方面的"宣言",并不是双方签署的"条约",所以没有法律效力。

按照国际法,中国应该在战后与日本重新签署一份两国条约,在《条约》中规定日本把台湾归还中国。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中日双方始终未签署这样的条约。这也就是说,从国际法来看,日本并没有在法律上把台湾归还中国,这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基础。

(23)

中日双方为什么没有签署归还台湾的条约呢?这是因为这段历史非常复杂。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杜鲁门总统发出命令,派隶属于盟军的中国军队进驻 台湾。美国认为,中国军队进驻台湾,只是军事占领,并不意味着中国拥有了台 湾的领土主权。这与当年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并不意味着美国拥有了日本的领土 主权一样。

不过蒋介石可不管什么"国际法",他认为既然在《开罗宣言》说了台湾归还中国,那么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了。1946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将日本国籍的台湾人,改为中华民国国籍。美英两国曾对此提出抗议,认为中国只有对台湾的"管辖权",还没有对台湾的主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应该由中国与原主权国日本签订了正式条约之后,才能生效。

然而 1949 年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后, 出现了两个中国政府。1950 年朝鲜

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保护台湾,并宣称:"台湾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恢复,以及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成立,或经过联合国讨论后,再作决定。"这是美国开始公开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

1951年,日本与 48 个国家签署《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正式结束战争状态。本来作为参战国的中国,是应该参加签署《旧金山条约》的,可是因为此时出现两个中国政府,究竟由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出席呢?苏联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美国则主张由中华民国出席,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决定"两个中国"都不邀请。

这样一来,由于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条约》,所以《旧金山条约》中只是规定: "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群岛的一切主权。"《条约》没有说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后,把主权移交给谁。这样一来,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就成为"未定"了。

当然,不论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坚决反对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介石认为台湾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主权"未定"的问题。但由于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力量弱小,不敢与美国正面争执,所以蒋介石政府没有正面否认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1954年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但又加注说:"本条约不得视为台湾法律地位的变更。技术上,台湾和澎湖的地位并未决定,这是因为在《旧金山和约》上只载有日本放弃主权。"而蒋介石政府尽管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却没有敢公开进行反驳或论战。

美国也知道,中国大陆不比台湾,他们在这方面必须做出让步。不过让步多少,就要看双方在谈判中讨价还价了。这次周恩来与美国谈判,第一个底线是要

求美国不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第二个底线是要求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第三个底线是要求美国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

(24)

在谈判中,美方接受了中方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底线,而第三个底线,美国却没有让步。当时美方把"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交换条件,前提是中方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明确承诺。由于中方拒绝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因而美方也没有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立场。至今在美国国会中,还不时有政客援引"台湾地位未定论"来讨论台湾问题。2007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而美国政府则致函潘基文,明确表示美国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不过在谈判中,周恩来口头表示,中国将努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基辛格也口头表示,他可以保证美方官员不再发表"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周恩来又追问基辛格:"如果日本或其它国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时,你们将持什么态度?"基辛格表示:"如果其他政府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将不会支持。"

1972年2月28日,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故又称《上海公报》。该公报采取十分特殊的形式,就是中美双方"各说自己的一套"。《中美联合公报》说:

【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自 1972 年 2 月 21 日至 2 月 28 日访问了中国。尼克松总统于 2 月 21 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

讨论。

中国和美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朝鲜和平统一八点方案》;坚决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

美国方面声明: 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预计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

《中美联合公报》的这一部分讲的是国际问题,主要是中国的近邻:越南、朝鲜、日本三国。这三国的问题虽说不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可是因为双方的立场相差太大,所以只能是"各说各的"。

(25)

《中美联合公报》继续说:【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美国在这里含糊地使用了"acknowledge"(认识到),而不是"recognize(承认)"。美方没有说"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说"美国认识到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中文中,"认识到"和"承认"的意思差不多,而在英文中,"acknowledge"和"recognize 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虽说中方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从总体上看,这个《公报》对中国是有利的, 所以说《中美联合公报》可以说是中方的一个胜利。从此之后,中国与美国在各 方面迅速接近,对抗共同的敌人苏联。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周恩来又积极推动解决另一个外交难题,就是实现中 日建交。中国与日本建交的关键问题,主要是历史问题,特别是战争赔款问题。

二次大战后,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其中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印尼、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则得到了战争赔款。具体赔款额为(当时价格):印尼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韩国3亿美元……,战后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共计约22亿美元。

前面提到,中国由于没有参加《旧金山和约》,所以中国在国际法上并没有放弃对日本索要战争赔款的权力。中国的受害远大于印尼、菲律宾等国,1951年中国政府新公布了抗战期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人员损失 1000 万人,经济损失 500 亿美元,中国政府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

因为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要求可以高达 500 亿美元,所以日本与中国建 交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国放弃战争赔款。对此周恩来表示说:"中国不准备靠他 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 是不合理的。"

由于中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赔款的要求,所以中日建交比较顺利。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比较"痛快"地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实现邦交正常化。

(26)

《中日联合声明》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 1972年9月25日至1972年9月30日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主席于1972年9月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首相,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这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 1972 年 9 月 29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在 1972 年中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时,周恩来顾虑日方的立场,把"侵略"两字改为"战争"。周恩来说:"外交就一定要替对方设想。"

在短暂的周恩来时代,周恩来所做的大手笔,除了外交之外,就是政治上展开批判"极左思潮"。林彪事件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肯定是要对林彪进行一场批判,展开一场"批林整风"运动,这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不过问题是另外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谁来领导或者主管"批林整风";第二个是谁来给这场运动"定调子",也就是从哪个角度来批判林彪。

自从文革以来,宣传工作一直是由中央文革小组主管。"九大"之后,中央 文革小组不再提起,转而在 1970 年 11 月成立 "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 宣传组的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中央组 织宣传组管辖的主要单位有: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社、 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宣传部门,原中央宣传部取消。

因为"批林整风"属于宣传工作,按照党内的分工,应该由"中央组织宣传组"主管。而周恩来在党内的分工长期以来一直是主管经济的,所以周恩来似乎不应该主管"批林整风"。

像"批林整风"这样的大运动,原则上应该是由党主席毛泽东来定调子。当时周恩来连党的副主席都不是,由周恩来为"批林整风"定调子,似乎也是不合适的。

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调子、方针和口号,都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而 这次"批林整风"的调子批判"极左思潮",这个调子显然不是毛泽东定的,而 是由周恩来定的调子。批判"极左思潮"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不是由毛泽东主导 的政治运动。当时毛泽东由于身体原因,无力顾及这场运动。等到毛泽东身体有 一定的恢复之后,他马上改变了"批林整风"的调子,由批"极左"改为批"极右"。

当时周恩来之所以大胆地掀起和主导一场批判"极左思潮"政治运动,一个很大的因素是认为毛泽东的身体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如果周恩来事先预知毛泽东的身体还能恢复过来,他也未必会这么"大胆"地主导和展开这场运动。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运动,也是导致后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中央组织宣传组的组长康生,在"批陈整风"之后就称病不出,在林彪事件之后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康生更是"躺倒不干"了。据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透露:【1973年12月,靠造反起家、已爬至江西省委常委位置的涂烈给江青等人写信,攻击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传播政治谣言"。

涂烈诬告刘俊秀在省委的一次老干部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有'四句话'的指示:'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就位,小兵回营'。会后,有的单位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调整领导班子,把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新干部'打扫回营'。

还说有人捏造毛主席'四个想不到'的指示,向下传达。'四个想不到'指示的大意是:(一)想不到文化大革把老干部整得这样苦;(二)想不到林彪会反对我;(三)想不到康生告老还乡、躺倒不干;(四)想不到姚文元当了政治局委员水平这样低。】

虽说毛泽东的"四个想不到"指示是谣传,但其中说到康生"躺倒不干", 也是事实。而姚文元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一度沉默不再发表文章,这也是事实。

在"批陈整风"运动前期,毛泽东身体不支,没有精力研究和发出具体的指示,而主管宣传部门的康生又"躺倒不干",这样一来,下面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持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部门就自然地转而听从周恩来指示了。在1972年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等重要宣传工具,基本

上是根据周恩来的意思开展宣传工作的。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干部政策方面。周恩来说:"开展批林整风,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该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周恩来提出"犯过错误的人,有可能工作得更好"这样的新观点,显然是为了"解放"老干部而制造舆论。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在文革中被夺权的老干部,大部分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些复权的老干部,在后来成为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中坚力量。

(28)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第二个方面,是在生产经济部门"放宽政策"。 周恩来说:【学习大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目前还是提"先公后私",不宜提"大公无私"。如果只讲"公",不讲"私",就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因为发展生产的结果,是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

197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农

村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思潮。

1972年2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这是文革以来,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整顿企业"抓生产"。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应该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抓好产量、品种、质量、成本、利润等指标。周恩来说:"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

1972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一系全国性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几乎是逢会必讲,反复加以批判。如果说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仅仅停留在他主管的经济部门,毛泽东还可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 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进入到第三个方面:文化教育界,这就超过了毛泽东的容忍界限。在 1972年底,毛泽东的身体有一定恢复,这时毛泽东开始直接出面干涉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了。

政治批判都是为了现实的目的,批判林彪这个死人,是着眼于借"死人"的话题来说"活人"。林彪事件之后,全国展开"批林整风"运动。那么要批判林彪的什么错误呢?这里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看法完全不同,周恩来认为林彪错误的性质是"极左",而毛泽东则认为林彪错误的性质是"极右"。

据原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说他听到过"周总理唯一的一次国骂"。纪东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于 1972 年 12 月 5 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很同意周总理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主张,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

但王若水的信激起轩然大波。毛主席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

信我看不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王若水的那封信,我把它和毛主席批过的其它文件一起,装在专门文件夹里,放在总理办公室单人床头的一个茶几上。这天下午我在中直俱乐部看电影,在那里忽然听到广播:"总理值班室纪东赶快回去,有车在门口等你。"

(29)

我马上站起来直奔门口,出门先看到的是倾盆大雨,接着,看到邓大姐的司机王炳文坐在吉姆车里向我招手。我马上到总理办公室去,总理直截了当地说: "把王若水的那封信和有关材料拿来。"

总理的声音和情绪好像有点不大对劲。我平静了一下心情,嘴里答应着:"好的。"

我从那个小茶几上,把毛主席批示过的那封信递到总理的手里。总理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翻看,翻得很快,看得也很快。几份材料翻完,总理猛地朝办公桌上拍了一下,劲儿很大,连桌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

接着,总理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总理说的一句话:"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

总理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蹙,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看到总理如此生气,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这样发过火。总理的那声"国骂"是我在他身边工作几年里,听到唯一的一次。可见,总理精神上的痛苦煎熬已经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内心的愤怒已经压抑得无法再压抑了,才发泄出来一点。

1973年7月到12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毛主席连续三次批评周总理。这在客观上为"四人帮"向周总理发动进攻壮了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据纪东的回忆,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那封信,气愤不已。周恩来认为林彪的实质是"极左",而毛泽东认为是"极右",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看法非常不满,甚至不觉脱口而出了"国骂"。这里且不论毛泽东的看法正确,还是周恩来的看法正确,不管怎么说,周恩来的看法与毛泽东完全相反。党的第一把手与第二把手在重大问题上看法完全相反,这就必然引发出一场政治冲突。

每个政治运动都是有目的的,周恩来为什么要发起一场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呢?按照官方的主流看法,认为这是周恩来"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为毛泽东是文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周恩来试图纠正文革的错误,其实也就是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这里我们不妨试想一下,一个部下试图去纠正自己顶头上司的错误,这是需要极大勇气和胆识的,因为它引起的后果必然是严重的。

这里可以再试想一下,周恩来发起这场批判"极左思潮"运动,难道是不搞不行吗?显然,周恩来不搞批判"极左思潮",也完全是可以的。有人说批判"极左思潮"是因为当时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1972年的国民经济,较1966年到1969年的文革高潮时期,已经恢复了很多。国民经济在最乱的几年都熬过来没有崩溃,现在怎么会有崩溃的危险呢?再说,如果批判"极左思潮"只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那是没有必要把批判"极左思潮"引到文化教育领域的。

(30)

现在一些人撰文,声称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被毛泽东批评完全是无辜的,周恩来是被冤枉的。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政治斗争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刘少奇并不是毫无动作;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林彪更不是俎上之肉;同样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不应该简单地说周恩来"被冤枉"

了。周恩来的确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这点毛泽东并没有 冤枉他。

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虽然时间不长,动静还是比较大的。周恩来本人对极左思潮的定义是:"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夸夸其谈,走极端。"周恩来还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这里回顾一下周恩来掌权时期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主要动作。

1974年4月1日,《红旗》杂志以《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为题,提出:【钻研业务、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坚持为革命而钻研业务,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 艺术质量的提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要有点地方的色彩。"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5月1日《红旗》杂志又以《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计》为题,提出: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仅要解放干部,还要正确使用。】

5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索马里革命代表团时说:"社会的改建是长期的。 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剥削制度的革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不是10年、20年,要半个世纪,也许一个世纪。这将是继续几代的问题。"

5月21日至6月23日, 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汇报会", 有中央各部门和

各省市负责人 312 人参加。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林彪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 关于政变的讲话,是'极左'的。"周恩来的这个说法,与后来毛泽东对林彪"极右"的说法完全相反。

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的重头戏,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 1966 年写给江 青的《滴水洞家信》。

(31)

周恩来在 5 月 21 日的讲话中说:【这次批林整风会议,文件相当多。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的讲话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

但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

主席写这封信是 1977 年 7 月 8 日在武汉写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 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 么清楚。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是不大懂的,将来我们还可以加以解 释。】

江青也介绍这封信的背景说:【1966年5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1966年7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这封信不是

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 只能写给像我这样的人。】

关于这件事,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也回忆说:【1972 年 5 月,在林彪机 坠人亡 8 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由周恩来主 持,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会上最重要的议程,是向与会者公布 1966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大家对信件的内容极感兴趣,因为这是一封私人信件,在信里毛泽东袒露了自己的心迹,说出了对自己的评价,不赞成"我的朋友"林彪的一些提法,同时,也揭示了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使大家感到更加好奇的是:据周恩来在会上说,这封信的原件已经烧毁了,现在发给与会者的是抄件。周恩来告诉我们说: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江青收到以后,感到十分重要,给周恩来看了,江青和周恩来商量觉得应该把这封信给林彪看一下,于是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但指示给林彪看后当面烧掉。

当时林彪正住在大连,周恩来特地把信送往大连,给林彪亲自看了后当面烧毁,这封信的手稿从此消失了。只有毛泽东、江青、周恩来、林彪四人看过(据说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看过此信手稿)。等到 1971 年林彪命丧蒙古大草原以后,毛泽东却从它的档案处找出了这封信的抄件。原来,1966 年毛泽东写完了给江青的信,当场要秘书照抄一份,原件发出,抄件存档。

(32)

尽管原件已经当着林彪的面烧掉,毛泽东却暗暗藏着此信的抄件,并决定在 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公布出来。为了使与会者相信这封信件的真实 信,周恩来特地把抄件复印后,发给与会者过目。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 人的字迹很稚拙,上面留有一、两处改动,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

在这次会上公布了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每个人都要表态。我也在小组讨论时做了发言,大意是说:读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两面派,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毛主席高瞻远瞩,对林彪的问题早有察觉。"其它人的发言,也都是这样一个基调。

说实话、参加"批林整风汇报会"以后,我心头也有一些疑问:毛主席既然对林彪"早有察觉",为什么仍旧坚持选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这一点写入《党章》;周总理既然早就看过毛主席给江青的信,知道毛泽东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有不同意见,为什么仍旧盛赞"林彪同志的《五一八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当然,这些疑问,在当时我是不能提,也不敢提的。】

在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还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自我检讨。因为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批林整风",与周恩来本来没有关系,周恩来为什么要做自 我检讨呢?这件事显然有些蹊跷。关于这次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的原因,现在有不 同的看法和解释。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于6月10日到12日,连续用三个晚上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这个报告依次讲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战时期王明的第二次错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谈到王明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时, 周恩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对自己进行了

严厉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检讨。关于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的原因,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毛泽东"逼"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第二种说法是周恩来自己主动做自我检讨。

第一种说法的典型代表是《晚年周恩来》,该书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让周恩来当众自揭历史老底,自我批判"。该书作者提出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作为证据,周恩来在信中写道:【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不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33)

《晚年周恩来》作者试图用这封信,说明周恩来迫于毛泽东的压力,不得不自我检讨。其实仔细看一下这封信就会发现,信中完全看不出毛泽东有要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的意思。毛泽东只是让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向众人讲讲党的前六次路线斗争。因为当时的中央委员,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前六次路线斗争,当然也不了解这些斗争。所以毛泽东希望周恩来讲讲这些路线斗争,让众人意识到党内的路线斗争是经常出现的,这就使大家认识到出现林彪的这次斗争,从党的历史

来看,也是"正常"的。

毛泽东的本意,不过是让周恩来讲讲过去的路线斗争经验教训。可是对于周恩来来说,很多事情就不那么好讲。因为在这几次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几乎都是卷进去的,特别是在王明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在前期是支持王明的,陷得很深。因此周恩来本人讲到这些路线斗争,他就不得不做一些自我检讨,要不然就会有"隐瞒历史"或"掩盖历史"的嫌疑,就会被别人抓住"辫子"。

在政治斗争方面,周恩来是非常精明的,他知道"隐瞒历史"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很多高官都栽在"隐瞒历史"上。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隐瞒自己的"旧账",把自己在王明当权时期,反对毛泽东的事情主动如实地讲出来,就可以把那些试图"揭发"他的人的嘴堵住,让别人无法给他扣"隐瞒历史"的大帽子。

周恩来说:【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从我的历史教训中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周恩来不愧是做自我检讨的高手,他说出来的话不但不会损害自己的声誉,甚至相反有"自我宣传"的作用。一些年龄比较轻的中央委员,首次听说历史上周恩来在党内的职位曾一度高于毛泽东,都感到震惊不已,反而对周恩来更加敬佩了。

当然,周恩来在自我检讨的基础上,又对自己给予不露声色的"肯定"。周

恩来说:【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我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这几年我常说按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34)

在 6 月 23 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周恩来不仅对 1932 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作了详细的说明,还讲述周恩来自己在 1967 年5 月 19 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并公布了毛泽东 1968 年 1 月 16 日为此写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与刘少奇不同,周恩来的历史是比较"清白"的,没有被国民党被捕后又出狱的"说不清楚"历史问题,唯一的一件事麻烦事就是"伍豪启事"。这件事与周恩来无关,其实很容易证明。但周恩来仍然不敢大意,他要把这件事做成万无一失。

在这次会上,已经"靠边站"多年的陈云,重新出来参加中央会议。陈云知道他能够重新出来,周恩来是出了不少力的,因此陈云也在这次会上,为周恩来的"伍豪启事"作证。陈云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陈云还特别写了书面材料:【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关于"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与"批林整风汇报会"的主题也是完全 无关的。周恩来之所以在这次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大张旗鼓地做这么一个与大会 主题无关的报告,是因为有人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揪"周恩来的历史问题。

现在周恩来在中央大会上,公开说明此事,并亮出毛泽东的亲自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样一来,如果有人再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揪"周恩来的辫子,那就很难了。果然,后来"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了各种"攻击",但他们再也没有提到周恩来的历史问题。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的发言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就是周恩来公开声称自己"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周恩来说:【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我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

周恩来心里真的认为自己只能当助手?还是心里并不这么想,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如果周恩来真是甘当毛泽东的助手,毛泽东掌舵把中国这条大船,驶向"继续革命"的文革大方向时,周恩来应该帮助毛泽东把中国这条大船沿着"继续革命"的文革大方向继续行驶下去。而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抵制文革,干扰毛泽东的掌舵。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试图否定文革,这就是要改变中国这条大船的行驶方向。周恩来做的这些事,都是"舵手"干的事,而不是"助手"干的事。

(35)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又进一步推进批判"极左思潮"运动,并把这个运动深入到非周恩来主管的文化教育领域。在文革前期,毛泽东是一直是进攻的一方,周恩来是防守的一方,而在林彪事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

次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可以说是周恩来主动发起进攻了。

关于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的动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是:周恩来要纠正文革的错误。比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一书中,把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这段"斗争",称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王年一的看法是比较合理的。

在文革前期,毛泽东搞文革势如破竹,毛泽东的反对派能够自保就不错了, 完全无法形成"否定"文革的势力。而在林彪事件之后,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就 是文革运动本身也大受打击,于是出现了周恩来为代表的"否定"文革的势力。 在文革前期,毛泽东把精力放在怎样把文革"进行到底"的问题上,而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不得不把精力放在这样防止文革被"否定"的问题上,这个差别是巨大的。

关于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动机,另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是《晚年周恩来》一书提出的"还账"说。该书写道:【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为自己"补过还账"。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后,周恩来暗中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周恩来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这个文革重灾区的"马蜂窝"。】

"还账"说并不合理,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是支持 毛泽东搞文革的,后来发现文革的问题很大,周恩来因此后悔了,忏悔了,所以 想到要"还账"。 但事实上,周恩来在文革一开始,就对文革持抵制态度,像文革初期的"二月逆流",就是周恩来主导的。因此周恩来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既谈不上后悔,也谈不上忏悔,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心想帮毛泽东搞文革。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管从当时看,还是从事后看,都对应得比较恰当,没有什么需要后悔或忏悔的。

一些人认为周恩来应该像彭德怀那样,在文革问题上跟毛泽东"硬顶"。但 "硬顶"的结果会怎么样呢?"硬顶"很可能造成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爆发全面内战。如果周恩来"硬顶"出内战来,他才是需要后悔和忏悔的。

退一步说,即使周恩来"硬顶"的结果没有出现内战,那么周恩来倒台肯定 是必然的了。周恩来倒台,文革的结局会更好吗?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周 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都没有必要后悔和忏悔。

尽管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这场批判"极左思潮" 是周恩来主动发起的,是周恩来主动去捅"马蜂窝"。

(36)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不仅仅停留在批判上,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纠左",也就是用行动来纠正"左倾错误"。虽然说在文革中,各个领域都出现"极左"的问题,但问题最严重的显然是教育界。工厂、企业、机关虽说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但整个体制基本上没有大的破坏。教育界完全不同,特别是高等学校,文革以后就一直"瘫痪",不再招收学生,不再具有学校的功能。

197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决定废除过去的高考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工农兵学员先在清华、北大两所大学搞试点;1972年开始,全国高校开始普遍招收工

农兵学员;1973年,国务院发出指示《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强调: "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1973 年各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进行了笔试的高校入学考试。辽宁省一名叫张铁生的知青考生,写的一封批评高校入学考试的公开信,一时间成为"反潮流"英雄。这是后话了。

对教育革命的看法,周恩来显然与毛泽东有所不同。周恩来认为应该恢复传统的"正规教育",而毛泽东的看法则是要打破传统的"正规教育"。1972年7月,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来中国参观探亲,杨振宁提出中国应该加强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杨振宁正好说了周恩来想要说的话,于是周恩来一方面称赞杨振宁的意见说: "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周恩来又趁着这个时机,对陪同会见杨振宁的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恩来对周培源说"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并且周恩来还强调要"扫除障碍、拔掉钉子"。谁是障碍?谁是钉子?周恩来没有明说,但周培源是心领神会的。

10月6日,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引发起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激烈反弹。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讲,这里先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

1972年8月1日和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对外事口负责人作长篇报告,报告的主题是"要批透极左思潮"。周恩来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

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他们打倒一切,破坏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 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 呀,其实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

(37)

周恩来强调说:"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虽然没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却在干部、群众中广泛转 抄和流传,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72年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且还提出:"也可以考虑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这明显有违于毛泽东提倡的"工农兵上大学"。周恩来把自己的想法,先说给外国人听,试探各方面的反应,这个做法似乎是跟毛泽东学的。

在林彪事件之前,周恩来在会见外宾的时候,都是就事论事。对国内的事情,特别是政策方针的大事,周恩来总是尽可能避开不谈。可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在外国人面前,开始比较放开地谈中国的事情了。1971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做了长篇谈话,这篇谈话后来发表在美国的《New China》杂志上。

周恩来与韩丁的这次谈话,是周恩来少有的坦诚谈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因此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因为原文较长,所以这里对周恩来的谈话进行概括介绍。

(一)对中国阶级现状的看法

周恩来说:【资本家这些人还在,人数不少,可能比农村地主的比例高。估 计全国资本家和家属共有一千万人左右。

另一个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地虽没被分,但合作化了。 虽然城市里的小商贩合作了,但有人从国营企业那里买到批发货后,挑着担子去 零售,城市里还有夫妻老婆店,摆小摊子的还很多。这说明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 数量,还有个人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公社里的贫下中农也有小资产阶级 思想。按马列主义的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

相反的,产业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不超过三千万,总数连职员、教员、 医生等共是五千万拿工资的。真正的产业工人,按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商品生产者, 不过三千万。美国比我们多得多,日本工业发展很快,可能超过我们了。

以上数字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说,是少数人专了多数人的政。如果说同盟军,工农联盟是多数人专了少数剥削阶级的政,但工农联盟中的无产阶级思想还很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很多。

一方面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制是全民和集体所有两种,都是社会主义所有,是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意义上说,是多数专了少数的政。 另一方面,如果讲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一切,那是少数专多数的政。

我说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有些人不同意,但具体分析,又 反驳不了。】

周恩来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有三千万人,所以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管是从人数上,还是从思想上,都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这意味着什么?周恩来没有继续讲下去。

(38)

(二)对中国阶级斗争的看法

周恩来说:【我不同意陈永贵的说法(陈永贵说中国的阶级斗争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在政治斗争上陈永贵是对的,但在思想分析上他是错了的。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从陈永贵的觉悟出发,他那里可能没有地、富,但劳动人民自己也有落后的思想,也有反映剥削阶级的思想。

韩丁问:【那么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那些特权所造成的走资派呢?光看着地主,会不会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失去警觉?】

周恩来说:【我正要说这个问题。如果工人掌权的人,像会计,工程师,管理干部等等,也容易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一个特权阶层,成为你所说的走资派。这样的人数量很大,如不斗争,资产阶级思想经常侵蚀无产阶级思想。承认不承认存在阶级斗争是个关键问题,是个政治原则问题。

刘少奇在工商业改造以后,说阶级斗争没有了。这不止他一人,陈伯达也有这种思想。不承认阶级斗争,剩下的就只有唯生产力论了,这完全违反了马列主义。

刘少奇说我们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剩下的是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根据刘少奇的思想,中国的生产关系已经非常先进了,也就不能靠进一步改变生产关系,来发起一个大跃进。刘少奇认为不可能有大跃进,反对大跃进,因此他提出形左实右的口号,提出办不到的口号,来破坏大跃进。】

周恩来这里似乎是肯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批判了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三)对集体和个人的看法

周恩来说:【资产阶级骂我们只有集体,没有个人是不对的。资本主义只有个人,没有集体,造成无政府状态,如公害问题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解决。你们

参观的东方红炼油厂解决了污染问题,把污水变得可以养鱼,可以浇地。我们还 不满足,再高的要求就是还可以喝。

美国在这方面就不行了,日本的公害也厉害,有个东京市长和横滨市长来中国和我谈。我问他们公害怎样办?他说日本制度下,他毫无办法。个人主义发展到高峰成了公害,每个企业增加投资,减少产量,才能制止公害,还有赔钱的危险,谁干?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是不顾环境破坏的,也不人道。

毛主席号召学大寨,我不反对吧。大寨还是有缺点,大寨是个"先公后私"的好的典型。文革时,人们对此争议很大。我们说的"先公后私",有极左思潮的人说大寨人是"大公无私";另一些人说大寨人背后其实也是为自己。

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大寨人不满意。陈永贵到北京,我说"先公后私"是中央说的,是有道理的。李文忠和雷锋那样的人很好,但只能是少数。不能学李文忠,人人找死还行?那是没必要的。

英雄只能是少数的,哪有那么多"重于泰山"的机会?如果你到处找死,那只能是"轻于鸿毛"。那就成了法西斯式的,军国主义的行为,那不行,那不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还是"先公后私",这样大家可以学得到。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是要把"公"和"私"安排好,而不是"大公无私"。 社会主义不可能改造得只有集体利益,没有个人利益。我们要的是个人利益服从 集体利益,要是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和谐。】

在这里,周恩来认为人们的思想水平,还达不到"大公无私"的程度,所以 只能强调"先公后私",不应强调说"大公无私"。

(39)

(四)对自力更生的看法

韩丁问:【那自力更生呢?能走极端吗?】

周恩来说:【大寨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有次灾年他们向国家只借了一次钱,第二年就还了。我们不能说国家没有给他们任何援助,国家还是给了,比如化肥就是优先卖给他们的。所以说自力更生为主,国家帮助为辅。把问题不能说绝对了,这样别的地方就不能学了。

虽然大寨是先进的,不能说大寨没缺点,大寨还是有缺点的。大寨的核算制度,大寨的石窑洞不要机械地照搬。大寨人原来住的也是土窑洞,一场大洪水把多数土窑洞冲垮了,陈永贵就带领大家建造了一排一排的石窑洞。这样一来,家前的小菜园没有了,也无法各自养猪了。如果其他的村子也这样办,那就糟了。大多数地方群众的觉悟,还达不到取消自留地,取消自家养猪的地步。

完美无缺的榜样和典型是没有的,我们要每个县,每个省,每个市都要建造 自己的大寨。各地有各自的大寨,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都从千里外来学大寨。】

(五)对个人崇拜的看法

韩丁问:【斯诺文章里讲毛泽东是"和尚打伞",这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说:【主席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个歇后语。和尚剃光头没有头发,和尚打伞就遮住了天。"发"指的是法律,"天"指的是皇上,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无法无天。

当时的情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群众发动起来造走资派的反,这是好的,但几年来有些副作用。

第一,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都说绝对了。如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给四个 伟大,毛主席最不满意,这是陈伯达搞的。 第二,"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完全错了。毛主席在这方面有权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么能是权威呢?而且这也有时间性,你今天是权威,你明天也是权威吗?如果你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绝对权威,那还有发展的吗?

再说权威是群众承认和支持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它只能是在群众的斗争 中涌现出来的,怎能是"树"起来的?所有树权威的观念都是不对的。

第三,到处挂毛主席的肖像,摆主席的雕像,这是不对的,把好事做到反面了。在北京饭店一进门的柜台两边,有两个主席像,我看了后说"主席还给你们看柜台";饭店电梯里也有主席像,我问:"你们还让主席给你们看电梯?"这样过分了,是有害的。

当然,在对待领袖这件事上,主席和修正主义是不同的。斯大林思想上的领导作风都有错误,但功大过少。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有个人野心的,不能因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我们就也反对。

不崇拜领袖是不对的,问题是看他值不值得崇拜,是不是群众公认的,还是 "树"起来的。主席说的对个人崇拜,就是要事实求是。领导人要谦虚,谦虚就 是事实求是。】

周恩来这里说:"毛主席在这方面有权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么 能是权威呢?"这样直接评论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前,是看不到的。

(40)

(五)关于文革中一些问题的说明

周恩来说:【从 1962 年起,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文革"的先导,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但没有点名。随后,在 1963 年毛主席为"四清"运动制定了

《前十条》, 刘少奇抛出他的《后十条》, 主席在 1965 年又发布了《二十三条》。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到桃园大队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且未经中央和主席同意, 就在全国到处做报告。

刘少奇以自己夫人的经验为基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了。"他就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刘少奇说这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彭真:"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后以一个修改版公布了。但王光美的未经修改的讲话,却在各地传开了,录了音并且在全国广播了。

刘少奇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看成是没有一个好的,全是一团糟,打击一大 片。当刘少奇或他的工作组去一个村子"蹲点"时,他们搞所谓的"扎根串连" 这种神秘化的工作。在我们掌权十五年后,他们还做什么秘密工作呢?这一切都 是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把"四清运动"变成一场干部之间"四清"和"四不清"之争,他们是贪污,还是没有贪污?由此看来,刘少奇一点也不要阶级路线。根据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可以撤换成批的干部并使另一批新的掌权,把"四清运动"带到针对掌权者的无原则斗争中去。

1965 年冬,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发表了,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才正式开始。

这一系列都是反对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当然严重的、激烈的是在 1966 年 8 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动了亿万群众。这个路线斗争一直继续还 没结束, 斗批改还在深入。】

韩丁问:【为什么极左派对外交问题这么注意,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周恩来说:【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五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集团是最大的阴谋集团,有意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不必要的地步,大树特树权威,大讲天才。他们表面上拥护毛主席,支持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分裂党,分裂军,分裂政府。

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

韩丁问:【他们怎样攻击你?】

周恩来说:【人民大会堂是红卫兵未闯进过的少数建筑物之一。当然我们常请他们进来开会,他们从来没有强行进入过。1967年8月11日,我们举行一个批判陈毅的大会,我也到会。当时,第一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宋远利主持会议,现在查明,他是一个"五一六"份子。

(41)

开会时,我的左边是宋远利,我的右边是刘令凯,他也是"五一六"分子, 他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我同意参加这个会的先决条件,是批判陈毅可以,但不能打倒他。因为刘令凯要打到陈毅,他是不应该到会的,更是不应该发言的。当我发现刘令凯到会了,我问宋远利为什么刘令凯也在主席台上?宋远利说:"刘令凯在主席台上好,这样他就不会捣乱。"

就在那时,他们通知我,刘令凯要发言。我对宋远利说:"你如果让他讲话, 我就离开会场。"听到这样,宋远利答应不让刘令凯发言,但他在这问题上又一 次失信了。当我出去休息一会儿时,刘令凯上了讲坛,讲了话。谢富治当时也在台上,他对这很不高兴,他找到了我。

在我们二人都出了大会堂时,某些武斗份子立即跳上舞台袭击陈毅。但我们的警卫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当学生们跳上台打陈毅时,警卫员们围上来保护他。学生们漫骂,但警卫员说:"你们不能带走陈毅,毛主席下令保护他。"因此,没人敢抓陈毅。】

韩丁问:【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内,你出了什么事?】

周恩来说:【据说造反派的武斗份子要捉我,但我不太相信这个传说。假如他们不敢抓陈毅,他们怎么敢抓我呢?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许多好同志受到蒙蔽。他们分不清好坏。

坏人利用最革命的口号,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他们抓住我有一次曾谈起蒋介石时说的话。当时是 1924 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而我是政治部主任。在那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

另一个例子: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重庆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写过: "我们支持蒋介石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今天把这句话拿来,对年轻的红卫兵 们来说似乎很可怕,他们问:"怎么能支持蒋介石呢?"

从 1945 年到今天,才过了短短的 26 年,但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不懂历史,有时就会被人愚弄和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去教育人民。

1967年8月7日王力大放厥词,姚登山要外交部长,王力要当副总理,因

为他后面有人要当总理。这事一直发展下来,主席发现了这事。阴谋家总是要失败,武斗也是阴谋集团挑起的,凡是阴谋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他总是打着革命的口号,用极左的思潮欺骗群众,表面上支持文革,拥护主席,暗中是反革命的。他们的口号是极左的,他们烧英代办,炸印尼,印度使馆,这样的事以后也有。】

(42)

(六)关于林彪的问题

韩丁问:【我有个问题,当然我没有权利让总理回答,但如果可能的话,谈 谈林彪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提得很突然,我要说几句,把几个问题说清楚,把路 线讲清楚。

路线是我党的生命。我党五十年的历史说明了路线对了就会胜利,我们当时只有几个人,没有军队,什么也没有。但是,只要路线对了,我们可以吸纳党员,建立军队,争取胜利。路线错了,有党,党要垮;有军队,也要失败。王明路线就是说明。

犯错误就要勇于改正错误,我都犯过路线错误,但还当总理。不管你多大的官,只要不按主席路线办事,只有自己失败,群众军队都不跟你。林彪这件事,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

要注意到周恩来与韩丁的谈话时间"1971年11月",这是周恩来短暂掌权的"黄金时代",所以他才"敢"有这么大胆的发言。到1973年下半年之后,随着毛泽东身体的恢复,短暂的周恩来时代过去了,周恩来又小心谨慎起来,这样大胆直率的谈话再也看不到了。

1972年10月1日国庆节,《人民日报》照例要发表《国庆社论》,人们都

要《国庆社论》视为理解中央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周恩来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试图把批判"极左思潮"作为中央的精神写入《国庆社论》。

起草《国庆社论》小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的一段话,但均被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

这次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过去的观望姿态,对《国庆社论》草稿提出反对的意见。周恩来清楚张春桥和姚文元对《国庆社论》的反对态度,肯定不是他们的个人看法,而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因此,周恩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再坚持直接写"批判极左思潮",而是把这个意思改头换面地写出来,比如"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要提倡又红又专,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等。

前面提到,周恩来曾布置北大副校长周培源抓"基础理论教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周培源不久就写出一篇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果然遇到了阻力,姚文元不同意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于是转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姚文元说:"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不发不好,不发是得罪人,所以发在《光明日报》上。报刊上的文章并不都是对的,都对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文章。现在看来,周培源的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是在当时的教育界,却有一颗炸弹爆炸的感觉,因为它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质疑的意见。

(43)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文革期间反映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它的核心是两个估计:【解放后 17 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 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专了 无产阶级的政;原有的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的学生,大多数人 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第一个估计称"文革前十七年是'黑线专政'"; 第二个估计称"大多数知识份子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在 1971 年 4 月 15 日到 7 月 31 日,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制定的。《纪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主持起草修改,最后由毛泽东亲自批发。因为《纪要》的纲领性地位,所以当时的报刊宣称:谁反对《纪要》,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而文革后,《纪要》遭到了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正式撤销《纪要》的通知,指出:【《纪要》是四人帮一手把持下炮制出来的,是错误的。它在教育战线危害极大,流毒很深,应当继续批判。】

《纪要》一方面对文革前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今后教育革命的实施办法,主要有:(一)工人宣传队长期领导学校;(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三)减少学习书本知识,重视培养实际经验,等等。

《纪要》规定:中学生毕业之后,要经过两年以上从事"工农兵"劳动锻炼的实际经验,才有资格上大学,这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1972 年 10 月 14 日,周恩来在接见美籍华人李政道博士时,讲话说:【学校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周恩来说中学生可以直接上大学,不需要经过两年劳动锻炼,这就是对《纪要》精神的否定了。当然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引起的反响并

不大。而周培源公开发表的文章,引起的反响就十分巨大了。《纪要》提出:大学教育要减少以书本知识为主的"理科",以工科代替理科。而周培源的文章提出:"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既要批判理论脱离实际,又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这实际上是取消理科,是十分有害的。"

(44)

周培源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显然是与《纪要》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引起教育界的"震动"。1972年11月开始,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组织人在上海《文汇报》上连续发表《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等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不点名的批判。据说张春桥、姚文元还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进行追查和反击。"

因为《纪要》是毛泽东主导制定的关于教育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所以在林彪事件之前,是没有人敢怀疑或者议论这种纲领性文件的。而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居然组织人写文章对《纪要》公开提出不同的看法,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这是周恩来在对他的权威进行挑战。

继 10 月 6 日发表周培源质疑《教育工作纪要》的文章之后,10 月 14 日,《人民日报》上又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特别是突出批判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中写道:【搞无政府主义的人,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鼓吹'群众说了算',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革命的言论,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把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工具。】

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白,这里批判的"无政府主

义",表面上针对的是林彪,实际上"群众说了算"等都是毛泽东的思想,这是委婉间接地和对文革进行否定。关于这些事,当事人王若水回忆说:

【1972 年末我在担任《人民日报》临时业务领导班子成员期间的一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和困难处境。"九一三"事件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

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1972年周恩来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

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 召集人是鲁瑛。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1972 年夏,周恩来提出《人 民日报》"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要鲁瑛提出一个名单。

(45)

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打电话催询,鲁瑛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周恩来不喜欢鲁 瑛这样的人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瑛当作一个钉子而拔掉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 瑛外,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 是中年干部。 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要比鲁瑛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瑛的地位摇摇欲坠了。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五七一工程", 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声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 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 没有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

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刘 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1972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对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调批左。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纳闷: 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1972年3月,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黑龙江省委写作组写了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10月14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根据王若水的回忆,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出面改组了《人民日报》的领导班子,增加了吴冷西和王若水等老干部。当然,王若水这些新增的人都是支持周恩来,反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于是他们趁着张春桥、姚文元不在的机会,在

《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整版的反映周恩来思想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

(46)

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一直主管经济的"务实"部门,没有主管过文化宣传的"务虚"部门,所以人们很少听到周恩来的主张和观点。在 1972 年前后的短暂周恩来时代,周恩来一度控制了《人民日报》等宣传媒体,并在《人民日报》内部安插了自己的人。就像王若水说的那样:"周恩来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情了。"

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中有了自己的人之后,这些人就按照周恩来意思,在《人民日报》上宣传周恩来的主张。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整版"批极左"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周恩来的做法,必然引起一直掌管宣传媒体的江青集团的反弹。江青集团一方面组织人在《文汇报》上写文章进行反击;另一方面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提出要追查"批极左"的背景。

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人民日报》的动向,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也大为不满。但毛泽东在这段时间身体情况很差,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过问批判"极左思潮"的事情。直到 1972 年年底,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好转,他也就开始过问批判"极左思潮"的事情,起因是来自《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

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的原因,据他本人说,是因为对批判"极左思潮"一事感到混乱。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过了头"。《人民日报》在周恩来的主导下提倡批左,而《文汇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主导下反对批左,当时的混乱情况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王若水回忆说:【当时批判林彪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以下几件事看出: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讲话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而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的讲话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强调反左,政委纪登奎强调反右。"

这种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

(47)

当时《人民日报》已经有些同志上书中央,我却想,既然"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我的信是 12 月 5 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信的主要内容复述如下:

我报告了《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它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如果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知道?

我在信里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但主要是"左"。因此,批林彪就要批"极左思潮"。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

以上是我写给毛主席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 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毛泽东看到王若水的信后,马上做出批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

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是叛党叛国。"

前面提到,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气得"骂娘"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回忆周恩来在这段时间情绪异常,乱发脾气。张佐良回忆说:【1972年晚秋,一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例行政治局会议。大约在七、八点钟,一位女服务员急匆匆地跑到我跟前,大声地说:"张大夫,快!总理在发脾气,他让你快进去!"

我一听她的话,从沙发上站起来,边走边琢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脾气?从没有听说过。总理在这样高层的会议上发脾气,为什么?怎么把我叫进去?

我不安地走到会议室门口,蹑手蹑脚地走到总理坐的沙发背后,蹲下身子轻声地问道:"总理,您有什么事·····"

总理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用右手拍了一下茶几,立即站了起来,手指着我, 气愤地问:"我吃的蛋炒饭里为什么不放盐?你尝过没有?"

沉默了几秒钟,我说:"没有尝过。"

总理大声说:"你为什么不先尝尝再叫他们端来?你们整天跟着我,说是照顾我,可你们做了些什么呢?"

我无话可说,只好低头不语,大概有几十只眼睛盯着我。蛋炒饭里没有放盐, 是厨师工作的疏忽大意,不应该怪到我头上。即使是错了,叫厨房里重新搞一份 就是了,又何必在这种场合叫我难堪?我心里感到委屈,可不敢向周总理作任何 解释。我知道,我今天是代人受过。

(48)

政治局会议午夜方散,我随周总理回到西花厅。我对"蛋妙饭"的事情仍想 不通,因为从来没有规定保健医师必须先尝首长的饭菜,今天厨师忘了放盐,责 怪医生是毫无道理的。凌晨睡前,我陪周总理在院子里散步,他边走边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着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我心里很不平静,原先对周总理的怨气已经消失,相反,又增添了对他的崇敬。总理啊,您也有苦衷无处说,不然,为什么要"迁怒"呢?至此,我心里也明白了一点,对周总理的理解又多了一点。】

周恩来对毛泽东驳回他的"批极左",感到异常气愤,又是"骂娘",又是"迁怒",这对于平时十分注意自己形象的周恩来,的确是"失态"了。周恩来为什么这么生气呢?一方面是毛泽东不给他面子,全盘否定了他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不满。

在周恩来看来,林彪事件出来之后,毛泽东应该吸取教训,停止文革,停止继续革命,把国家的重点转到发展经济方面。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搞文革的一切问题,就是落在一个"左"字上。再从长远来看,毛泽东从建国以来,就开始提倡"左"的冒进路线。1956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结果被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反击战,打得一败涂地。

1959 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又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又被毛泽东的反击战打得一败涂地;1962 年刘少奇再次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结果在 1966 年被毛泽东拿下;1969 年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再次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结果又被毛泽东的反击战打得出走外国;到了这次 1972 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试图再一次"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但又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击。为此,周恩来的气愤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不过毛泽东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搞的是"左倾路线"。相反,毛泽东认为他

的战友们是"右倾路线"。毛泽东认为他的战友们建国后开始贪图平稳安逸了,不愿意继续革命,甚至不愿意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与他的战友们"决裂"的根本原因之一。

周恩来虽然气愤,但他也知道,对毛泽东的反击进行"硬顶",后果都是不好的。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些人的经验教训,都是犯了对毛泽东"硬顶"的战略错误。所以周恩来不能用"硬顶"的办法,他要以柔克刚,用软办法战胜毛泽东。

(49)

毛泽东明确反对批判"极左",并声称林彪的性质是"极右",这样就等于全盘否定了周恩来的主张。周恩来看到毛泽东要反击了,马上后退。从此周恩来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主动把宣传大权重新交回到毛泽东和江青集团手中,避免了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

虽说周恩来把宣传大权重新交回去,也不再公开提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但周恩来的行动其实并没有变,他用行动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事后的结果也证明,周恩来的策略是明智的。

关于王若水的信,因为毛泽东已明确批评了王若水,周恩来也不好与毛泽东唱反调,他也批评了王若水,但批得很巧妙。据王若水回忆,事后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专门找他谈话。王若水回忆说:

【张春桥说:"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

姚文元: "在阶级斗争这个关键时刻,你王若水站到哪里去了?" 这句话意味 深长,使我一惊。 周恩来说:"你王若水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 毛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王若水同志这封信,把形势看得漆黑一团,像《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 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 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 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毛泽东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 得张、姚不好,而毛泽东大概是受他们包围蒙蔽。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 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后来我才省悟:如果说林彪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林彪"极左" 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这样一来,事情不就麻烦 了么?如果说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担忧,是不奇怪的。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1973年《人民日报》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我想:我这样的区区干部,值得那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我,暗里是批谁呢?这时。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本节完】

CHAIRMAN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